

上下五千年

上古篇
春秋戰國篇
秦漢王朝篇
魏晉南北朝篇
隋唐五代篇
宋遼夏金元篇
明朝篇
前清篇
後清篇
民國篇
中華人民共和國篇

第二卷

科普教育与艺术修养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上下五千年

夏于全 常 桦 主编

第二卷

春秋战国篇目录

第一章 王室衰微与大国争霸

第一节 东周的建立和王室衰微	(1)
一、平王东迁	(1)
二、王室衰微	(2)
第二节 郑庄公小霸	(2)
第三节 齐桓公争霸	(7)
一、齐鲁交恶	(7)
二、管仲的改革	(10)
三、长勺之战	(10)
四、“尊王攘夷”，桓公称霸	(14)
第四节 宋襄公图霸	(17)
一、降服齐国	(17)
二、宋楚争霸	(18)
三、泓水大败	(20)
第五节 晋文公称霸	(22)
一、假途灭虢	(22)

二、晋国的勃兴	(23)
三、城濮之战	(26)
四、秦晋崤之战	(31)
第六节 楚庄王称霸	(36)
一、一鸣惊人	(36)
二、问鼎中原	(37)
三、必阨之战	(38)
第七节 晋国重振霸主地位	(43)
一、齐晋鞌之战	(43)
二、鄢陵之战	(47)
三、晋楚三驾之役	(50)
一驾之役	(52)
二驾之役	(53)
三驾之役	(54)
第八节 晋楚争霸的终结—弭兵大会	(55)
一、弭兵大会前的列国局势	(55)
二、弭兵大会	(61)
第九节 吴楚争霸	(68)
一、太伯开吴	(68)
二、吴楚鸡父之战	(69)
三、伍子胥佐吴	(72)
四、吴楚柏举之战	(74)
第十节 越王勾践的霸业	(77)
一、吴越争霸的序幕	(77)
二、携李之战	(78)

三、卧薪尝胆	(79)
四、笠泽之战	(83)
五、勾践称霸	(85)

第二章 封建社会的开始——从战国到秦的统一

第一节 战国历史帷幕的揭开	(88)
一、政出私门	(88)
二、三桓分鲁	(89)
三、田氏代齐	(90)
四、晋分三家	(91)
第二节 齐魏争雄	(95)
一、魏国的兴起	(95)
李悝任相	(96)
吴起治军	(97)
西门豹治邺	(99)
二、桂陵之战	(102)
三、马陵之战	(104)
第三节 秦国的勃兴	(105)
一、秦人的起源	(105)
二、商鞅变法	(108)
三、商鞅取西河	(113)
第四节 燕齐角逐	(115)
一、济西之战	(115)
二、即墨之战	(117)

第五节 “合纵”与“连横”	(120)
一、两种对立的斗争策略	(120)
二、大国合纵对秦战争	(124)
赵魏燕韩楚五国联合攻秦	(124)
齐魏韩三国联合攻秦	(125)
华阳之战	(126)
赵楚燕韩魏五国联合攻秦	(128)
第六节 秦赵较量	(130)
一、胡服骑射	(130)
二、渑池之会	(133)
三、秦赵阌与之战	(136)
四、长平之战	(138)
五、宜安之战	(141)
第七节 秦始皇统一六国	(145)
一、统一的趋势日渐明朗	(145)
二、秦王政亲政	(152)
三、李斯《谏逐客书》和尉繚献计	(154)
四、秦灭六国的基本战略与策略	(156)
五、秦始皇统一六国	(157)
兴师东进——秦灭韩	(157)
施行离间——秦灭赵	(159)
燕国灭亡	(161)
灭魏之战	(164)
灭楚之战	(164)
灭齐之战	(167)

第三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民族关系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	(169)
一、春秋农业	(169)
二、井田制的崩溃	(175)
三、春秋手工业的发展	(179)
四、工匠造反和“民溃”	(182)
五、战国农业	(186)
六、战国手工业的发展	(191)
七、战国商业和城市的繁荣	(199)
第二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与民族关系	(204)

第四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领域和科学文化

第一节 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	(217)
一、孔子的思想和学说	(217)
孔子的政治思想和伦理学说	(217)
孔子的认识论和教育思想	(220)
孔门教材与“六经”	(223)
二、墨子的思想与学说	(227)
三、孟子的思想与学说	(232)
四、老、庄的思想与学说	(237)
五、荀子的思想与学说	(243)
六、大法学家韩非	(248)
七、孙武与孙臆的军事学说	(251)

孙武与《孙子兵法》	(251)
车轮上的军师孙臆	(256)
八、惠施、公孙龙的名家学说	(259)
九、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	(263)
十、战国时的农家学说	(266)
第二节 科技与文学艺术	(270)
一、《星经》和发达的天文学	(270)
二、民间工艺大师鲁班	(273)
三、传统诊断法的奠基人—扁鹊	(276)
四、《左传》和《国语》	(280)
五、《诗经》和《楚辞》	(284)
六、音乐艺术的繁荣	(290)
七、战国时的绘画艺术	(296)

春秋战国篇

第一章 王室衰微 与大国争霸

第一节 东周的 建立和王室衰微

一、平王东迁

周幽王死后，申侯拥立太子宜臼为平王，因镐京残破，又处在犬戎的威胁下，于前 770 年（周平王元年）迁都雒邑（河南洛阳），至此，西周结束，东周建立。东周从前 770 年（周平王元年）起至前 256 年（周赧王五十九年），共经 25 个王，历 154 年。东周的历史，史学界习惯上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从前 770 年至前 476 年（周敬王四十四年）这段时间大体上相当鲁国编年史《春秋》的纪年，故称为春秋时期，它是我国奴隶社

会的瓦解时期，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代。

二、王室衰微

东周时“周王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周王室丧失了“天下共主”地位，日益衰弱。其领土只有雒邑周围一二百里，今河南西部一隅之地，相当于一个小封国。诸侯国几乎都成了独立政权，不再听从周王命令和定期向周王朝朝聘纳贡，周王也不进行巡狩。据《春秋》记载，在 242 年间鲁国仅向周天子朝贡 7 次，其中鲁君亲自去的只有 3 次，但同时鲁朝齐 11 次，朝晋 20 次。周的地位明显低于齐、晋等诸侯大国。周王在经济上也不得不仰赖诸侯的资助。前 720 年，周平王去世，周桓王无力丧葬，派人向鲁国“求赙”。但由于周王还保存一个“天下共主”的名义，一些强大的诸侯国就利用周天子这面旗子，“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扩展自己的势力。

第二节 郑庄公小霸

东周“礼崩乐坏”局面的形成，诱使诸侯中的野心家乘机破门而出，觊觎和争夺霸主地位。其中郑庄公就是这方面的“始作俑者”。

郑国虽迟至西周后期方才分封立国，但由于其开国君主郑桓公为周厉王的幼子，与王室关系十分亲近，加上在镐京之

役和平王东迁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因而一直为周王所倚重,被委以为王室卿士,主持周室中枢大政。另外,郑桓公当年还曾将国内民众由关中地区迁徙到今河南省新郑县一带,据有了四通八达的天下形胜之地。这些条件结合在一起,使郑国在进入春秋后国势蒸蒸日上,成为诸侯中举足轻重的力量。

郑庄公寤生即位后,凭借国力强盛,又身为王室权臣的有利条件,平定内部共叔段的叛乱,同时竭力扩充领地,侵伐诸侯,进一步增强郑国的实力。在军事外交上,他实施高明的“远交近攻”策略,拉拢齐、鲁两国,打击和削弱卫、宋、陈、蔡诸国,并一度灭亡了许国,造就了所谓“小霸”的局面。

随着政治、军事实力的增长,郑庄公对周天子的态度变得有点倨傲不羁了,尤其在战胜强敌宋国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忘乎所以。而王室方面也不够冷静,一意孤行,不能妥善处理双方关系。于是矛盾便越来越尖锐,终于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

其实早在周平王在位之时,周郑之间的关系就出现了裂痕。当时周平王为了稍加限制分散郑庄公的权力,曾打算任命虢公林父为卿士。但由于事机不密,为郑庄公所侦知。郑庄公对此大为不满,对周平王提出质问。平王力图予以否认,结果发生了“周郑交质”事件,即周平王的长子作为人质留在郑国,郑国的公子忽也作为人质住在周都洛邑。这一事件既动摇了周天子的权威,也没有消除双方互不信任的心理。

公元前720年周平王去世,其孙姬林继位,是为周桓王。在这之前,在郑为质的王子孤已客死在郑国。王子孤是桓王的父亲,他的死使得桓王痛恨于郑庄公的专横跋扈,加之桓王本

人年少气盛，缺乏政治经验，所以上台伊始，便急不可耐地处处屈辱和打击郑庄公，双方的关系更是日趋冷淡恶劣。

周桓王虽然对郑庄公深恶痛绝，但顾忌到郑的强大，一开始并不敢马上剥夺郑庄公的权力，而是投石问路，想用先祖的手段，任命虢公担任右卿士。谁知郑庄公寸步不让，立即作出激烈反应，委派祭足带领军队抢割了属于周室所有的温地方的麦子和成周附近的稻禾。这样双方的关系就更僵了。然而郑庄公毕竟十分老练，他知道一味和周天子顶牛并不符合郑的根本利益，所以在给桓王碰了一个硬钉子后，他决定于公元前 717 年主动去王都朝拜桓王，希望藉此缓和矛盾。

可是桓王心里恨透了郑庄公，丝毫不为所动，不给庄公以任何礼遇，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的矛盾。

接着周桓王又不理智地干了两桩让郑庄公极不愉快的事情。一是于公元前 715 年正式任命虢公林父为右卿士，使他与作为左卿士的郑庄公分庭抗礼。二是于公元前 712 年强行向郑国索取了郕、刘、苏、邾等四邑，而以本不属于周王所有的苏忿生十二邑作为交换，这等于是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周桓王的所作所为，令郑庄公十分愤慨，但他还是按捺怒火忍耐了。

可是周桓王把郑庄公的妥协忍让误认为是软弱可欺，得寸进尺，步步进逼，公元前 707 年贸然宣布剥夺郑庄公王室卿士的职位，把郑庄公逼进了绝路。这一回郑庄公再也无法容忍，从此便不再去朝觐桓王。周桓王认为必须教训惩罚这种无礼犯上的行为，便于同年秋天，沙场点兵，亲自统率周、陈、蔡、卫联军开赴郑国，大举征讨。

郑庄公闻报周室联军倾巢而来，忍无可忍，决定反击，遂

统领大军迎战。很快，双方军队相遇于 繻葛（今河南长葛东北）。为了赢得作战的胜利，双方都加紧调兵遣将，布列阵势。周桓王按照当时的常规战法，将周联军分为三军：左军、右军和中军。其中左军由卿士周公黑肩指挥，陈军附属于内；右军由卿士虢公林父指挥，蔡、卫军附属于其中；中军作为主力，由桓王本人亲自指挥。

郑庄公针对周联军这一布阵形势和特点，也相应作了必要的部署。他将郑军也编组为三个部分：中军、左拒（拒是方阵的意思）和右拒，指派祭仲、曼伯等大臣分别指挥左、右拒，自己则亲自率领中军，准备同周联军一决雌雄。

交战之前，郑国大夫公子元针对周室联军的组成情况，对敌情进行出正确的分析。他指出陈国国内正发生动乱，因此其部队兵无斗志，如首先对陈军所在的周左军实施打击，陈军一定会土崩瓦解；而蔡、卫两军战斗力不强，届时在郑军的进攻下，也将难以抗衡，先行溃退。有鉴于此，公子元建议郑庄公首先击破周联军薄弱的左右两翼，然后再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桓王所指挥的联军主力中军。郑庄公欣然采纳了这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作战指导方针。

另一位郑国大夫高渠弥鉴于以往郑军与北狄作战时，前锋步卒被击破，后续战车失去掩护，以致无法出击而失利的教训，提出了改变以往车、步兵的笨拙协同作战方式，编组成“鱼丽阵”以应敌的建议。所谓“鱼丽阵”，就三军阵形的特点而言，是军队部署两翼靠前、中军稍后的倒“品”字形，像张网捕鱼似的打击敌人。就各自军阵内部兵力部署特点而言，是“先编后伍”、“伍承弥缝”，即把战车布列在前面，将步卒疏散配置于战

车两侧及后方，从而形成步车协同配合、攻防灵活自如的整体。郑庄公不愧为一代雄主，听了高渠弥这番建议，大喜过望，拍案叫好，当即吩咐将士具体落实。

会战开始后，郑军即按照既定作战方针向周联军发起猛攻，“旗动而鼓”，击鼓而进。郑大夫曼伯指挥郑右军方阵首先以泰山压顶之势攻打联军左翼的陈军。陈军果然士气低落，一触即溃，周联军左翼即告解体。与此同时，祭仲也指挥郑左军方阵奋勇进击蔡、卫两军所在的周联军右翼部队。蔡、卫军的情况也不比陈军好到哪里去，未经几个回合的交锋，便纷纷丢盔弃甲，一败涂地。周中军为溃兵所扰，军心立见不稳，阵势顿时混乱。郑庄公见状，立即擂鼓摇旗指挥郑中军向周中军发动攻击，祭仲、曼伯麾下的郑军左右两方阵也乘势合围，夹击周中军。失去左右两翼掩护协同的周中军无法抵挡郑三军的合击而大败，仓惶后撤，周桓王本人也身负箭伤，被迫下令退出战斗。

郑军将领见周联军溃退，不胜振奋。祝聃等人遂建议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可郑庄公却说出一番出乎人们意料之外而又在情理之中的言论，婉拒了部下的意见：一般的君子尚且不希望逼人太甚，何况敢于欺凌天子呢？假若能够保护自己，使郑国免于灭亡，这就足够了！基于这样的想法，郑庄公下令郑军停止进攻，使战场沉寂下来。郑庄公这么做是政治成熟的表现。他知道周天子的地位虽已今非昔比。但余威犹存，不可过分冒犯，以致引起其他诸侯国的敌视和作对。为此，他当晚还委派祭足去周营慰问负伤的周桓王，同时问候桓王的左右侍从，藉此缓和双方之间的尖锐矛盾。周桓王刚遭惨败，自知再

无力与郑国一战，见郑庄公主动示好，正合心意，也就顺水推舟，接受了现实。

繻葛之战是一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战事。它在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政治上 繻葛之战使得周天子威信扫地，桓王之后，再没有一位周天子敢于率军出来和称雄的诸侯进行较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传统从此逐渐走向消亡。军事上，“鱼丽阵”的出现和获得成功，使中国古代车阵战法逐渐趋向严密、灵活，有力地推动了古代战术的革新和发展。

第三节 齐桓公称霸

一、齐鲁交恶

齐国是春秋时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由于齐国疆域广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又东临大海，有渔盐之利，所以，它的社会经济相当发达。早在春秋初期，齐国就已经开始使用铁制农具来砍伐森林、开垦荒地，扩大了耕地面积。齐国还先后吞并了邻近的一些小国，国力日益强大。鲁国则是比较弱小的诸侯国。无论是疆域还是国力，都无法跟齐国相比。

公元前 690 年，齐国吞并了跟鲁国有亲戚关系的纪国（在今山东寿县西南）；公元前 687 年，齐、鲁两国又共同进攻

成阝国(在今山东汶上县北),但是成阝国的土地却被齐国独占。这样齐鲁两国之间的关系便紧张起来。

公元前 686 年,齐国国君齐襄公到姑棼(在今山东博兴县附近)去打猎,碰到了一头凶猛的野猪。齐襄公向它连射几箭,被激怒的野猪竟直立起来,大声嚎叫。齐襄公吓得浑身发抖,从车上掉下来,跌伤了脚,连鞋子也丢了。

原来,齐襄公有个叔伯弟弟,名叫公孙无知,早就想伺机夺取君位。这时,公孙无知听说齐襄公受伤,便派人杀死了齐襄公,夺取了君位。但是,公孙无知即位不久,又被一帮大臣杀掉。国君的位置又空了下来。

齐襄公的两个兄弟——公子纠和公子小白,这时都在邻国避难。公子纠是鲁国国君鲁庄公(前 693—前 662 年在位)的外甥,他和他的师傅管仲都住在鲁国。公子小白和他的师傅鲍叔牙住在莒国(今山东莒县)。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听到公孙无知被杀的消息以后,都想赶快回到齐国去做国君。

鲁庄公为了让公子纠尽快得到国君的位置,特意派了一支兵马和 10 辆战车,护送公子纠回国;同时派管仲带领一支人马赶到从莒国到齐国的路上,准备半路上拦截公子小白。当管仲带领人马赶到即墨(今山东即墨县)时,公子小白在莒国军队的护送下,刚刚过去不久。管仲得知这一情况后,一口气追了三十里,果然追上了小白。于是管仲张弓搭箭,嗖地一声向小白射去。那支箭正好射在小白的铜带钩上。聪明的小白将计就计,乘机咬破嘴唇,大叫一声,口吐鲜血,倒在车上,假装已死。管仲见了,信以为真,赶快派人去报告公子纠。公子纠听到这个消息,也认为小白已经死了,就放宽了心,不慌不

忙地向齐国进发。等公子纠到了齐国国境时，才知道公子小白早就到达齐国的都城临淄，并做了齐国国君。公子小白就是齐桓公（前 685 年—前 643 年在位）。这样，公子纠和管仲见国君的位置已经被小白抢先夺去，只好仍旧回到鲁国安身。

这件事使齐、鲁两国的关系更加紧张。因为鲁国积极支持公子纠，想叫他做齐国国君，所以刚刚即位的齐桓公对鲁国非常恼火；鲁庄公也因为自己的外甥没有当上齐国的国君，对齐国更加仇视。公元前 685 年秋，两国军队便在齐国境内的乾时（在今山东临淄西）大动干戈。结果，鲁国战败，鲁庄公把自己乘坐的车子也丢掉了，后来另换了一辆车，才逃脱了性命。

不久，齐将鲍叔牙又领兵打上门来。他要鲁国杀死公子纠，交出管仲。否则，齐国军队就要继续围攻鲁国。鲁庄公没有办法，只得逼死公子纠，囚禁了管仲。这时，鲁国的谋士施伯说：“管仲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齐国要是重用了他，将对鲁不利；不如杀掉管仲，把尸首交给齐国。”但是，鲁庄公没有采纳施伯的意见，把公子纠的头颅和管仲送交了齐军。

管仲等人被押出鲁国国境以后，鲍叔牙亲自迎上前去，替管仲松了绑。他和管仲本来是好朋友，也深知管仲的才干。回到齐国以后，鲍叔牙就在齐桓公面前竭力保荐管仲。齐桓公虽然被管仲射过一箭，但他不仅不念旧恶，反而接见了管仲，向他征求治理国家的意见。管仲的见解很合齐桓公的心意，因此，齐桓公便重用了管仲。

二、管仲的改革

管仲上任便进行了一场改革。即管仲“作内政而寄军令”，其内容就是把“国”和“鄙”即“野”的编制进行了一番整顿。他把国分为 15 个士乡和六个工商乡，使“国人”都有固定的居住地点，不得任意流动。15 个士乡一分为三，乡以 5 家的“轨”为最小的基层单位，每家出兵一人，组成 5 个人的伍；以 10 轨为里，4 里为连，10 连为乡。5 个乡组成 1 万人的军，15 乡共 3 军 3 万人，分别由国君和国、高二卿为帅。这种军政合一的组织，因同伍的士兵都是乡邻，声音面貌彼此都熟识，无论夜战还是白天打仗，都能互相救应，从而提高了战斗力。

管仲把“鄙”分为五属，每属设一大夫做长官。每属 10 县，每县 3 乡，每乡 10 卒，每卒 10 邑，每邑 30 家。依照这个规划，五属共有 45 万家，连士乡、工商之乡在内，共有 49.2 万家。实际数字不会这样整齐，但大体上可以从这数字估计齐国的人大约有 250 万左右，加上奴隶、公族可能有 300 万人。鄙的居民不服兵役，只向国家缴纳赋税。

在经济方面，管仲规定：依据土地好坏，决定赋税数量；又利用沿海的条件，大兴渔盐之利。

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齐国收到了国富兵强的效果。

三、长勺之战

管仲建议齐桓公对内要革新政治，整顿军事；对外要联络

其他诸侯，同他们结好。等到自己的力量进一步强大起来以后，再乘各诸侯内部发生变乱的机会，想法扩张势力。但是，齐桓公急于向外扩张，没有采纳管仲的正确意见。公元前 684 年春，他又发动了对鲁国的战争。

这时，鲁国吸取了乾时之战失败的教训，加紧训练军队，赶造各种兵器，并疏通了曲阜以北的洙水，加强了对国都的守备，以防备齐国的再次进攻。同时，在政治上，鲁庄公也做了一些取信于民的工作。所以，面对齐国的进攻，鲁庄公决定动员全国的力量同齐国决一胜负。

鲁国有一个名叫曹刿的人，听到齐国要进攻鲁国的消息以后，非常着急。他虽然不是什么肩负军国重任的大官，但是他认为，对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事，每个人都有责任来关心、过问。于是他决定去见鲁庄公，跟他讨论有关这次战争的问题。

曹刿的乡亲们知道后，纷纷阻拦他。他们说：“战争是国家大事，让那些成天吃鱼吃肉、酒醉饭饱的大官们去谋划吧，你何必多管闲事呢？”曹刿说：“不。那些身居高官的人往往目光短浅，不会深谋远虑。”说罢，就一直向王宫走去。

曹刿见了鲁庄公，开口就问：“齐军快打来了，听说你已经做出应战的决策，但不知你凭什么同齐军作战？”鲁庄公正需要有人帮他出主意，见曹刿这样关心国家大事，就高兴地回答说：“我对待别人还算是宽厚的，对衣食等生活用品，我从来不肯一个有享用，总要分一些给别人。”曹刿认为单凭这一点还远远不够，还不能作为战胜齐军的保证。就对鲁庄公说：“你只不过给人家一些小恩小惠，何况这些小恩小惠又只落到少数

人身上。多数人并没有得到。这样老百姓是不会和你一起去跟齐军死战的。”鲁庄公接着说：“我不仅待人好，就是对待天地神明我也是很虔诚的。我在祭祀天地的时候，使用的牛、羊、猪和宝玉、丝绸等祭品，总是有多少就说多少，从来不敢夸大。我这样诚实，天地神明一定会帮助我打败齐国。”曹刿还是不以为然，说：“你不虚报祭品的多少，这只能算是有点信用，还谈不上是很有信用。单凭这些，老天爷不会给你降福，老百姓也不会信服你。”鲁庄公沉默了一会儿，又继续摆他能够战胜齐国的理由。他说：“咱们鲁国每年发生千百起诉讼案件，我虽然不敢说件件了如指掌，判决公平，但是，我总算尽了最大努力，总算是慎重处理了呀！我想，老百姓会相信我、支持我的。”曹刿听到这里，果然连连点头。他用赞同的口气说：“诉讼案件，无论大小，都关系到人们的生命财产；案件处理得公平与否，会直接影响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你能够这样重视诉讼案件，并尽可能地公平处理，就是为老百姓办了一些好事。因此，我认为你可以跟齐国决一胜负了。”

接着，曹刿又自告奋勇，请求跟随鲁庄公一起出战。鲁庄公见曹刿很有智谋，便答应了他的请求，请他跟自己乘一辆战车，率领着鲁国军队，去抗击齐军的进攻。

当时，齐军仗着兵强马壮，步步深入鲁国。鲁国兵少国弱，处于劣势。为了保存实力，待机反攻，鲁军不得不暂时避开齐军的锋芒，采取守势。后来，鲁军退到一个有利于反攻的地方——长勺，战局才开始扭转。

齐军攻到长勺后，稍稍稳住阵脚，便先发制人，向鲁军发动猛烈进攻，鼓声震天动地。鲁庄公见鲁军阵地受到威胁，心

急火燎，要立刻下令击鼓反击。曹刿连忙阻拦说：“等一等，不要击鼓反击。眼下敌人士气正旺，如果我军出击，正合敌人心意，不如先不跟他们交锋，消磨消磨他们的锐气。”说话间，齐军随着咚咚的鼓声冲杀过来，眼看就要攻入鲁军阵地，鲁军突然万箭齐发，齐军无法前进。齐军求胜心切，一连擂了三次鼓，冲了三次锋，始终没能同鲁军正式交锋，鲁军的阵地像扎了根一样，怎么也攻不动。齐军接连发动了几次攻势，都没有奏效，弄得人人泄气，个个疲劳。

曹刿看准了这个时机，便对鲁庄公说：“齐军已经泄气了，你赶快下令擂鼓，发起反击。”鲁军阵地战鼓一响，士兵们士气高昂，争先恐后地冲向齐军，锐不可挡。不大一会儿，齐军的阵地就被冲垮了。

鲁庄公一见齐军败退，就要下令追击，曹刿又制止说：“别忙，等我看看敌人是真败还是假败。”说着，他就跳下车，查看了齐军战车留下的车辙，接着又登上战车前的扶手，观察了齐军的旌旗，然后对鲁庄公说：“请下令追击吧。”追击令一下，鲁军军心大振，杀声震天，很快追上了齐军。经过一场厮杀，终于把齐军赶出国境。

鲁国虽然打胜了这一仗，但是，鲁庄公对曹刿的军事指挥却很不理解。战争结束以后，鲁庄公向曹刿提出了一连串问题。比如，为什么要在齐军三次击鼓冲锋之后，鲁军才发动反击？为什么齐军已经溃退，还不让鲁军立即追击？曹刿为什么要查看齐军的车辙和旌旗？

对这些问题，曹刿一一作了回答。他说：“打仗凭的是一股勇气。当士兵听到第一次冲锋的鼓声时，士气正旺；如果第一

次冲锋没有成功，再次击鼓冲锋时，士气已经衰退；到第三次击鼓冲锋时，士气已消失殆尽，不会有什么作为了。在齐军三鼓过后、勇气衰竭的时候，我们才擂响战鼓，激发士兵斗志，所以能一鼓作气，战胜齐军。”关于不匆忙追击齐军的问题，曹刿解释说：“齐国是大国，我们不能低估它的实力。齐军开始溃退时，我怕他们是假败。因此，我劝你不要立刻下令追击，以免遭到齐军的伏击，吃亏上当。后来，我见齐军车辙混乱，旌旗也东倒西歪，这说明他们军容不整，十分狼狈，肯定是真的溃败了。所以，我才请你下令追击。”鲁庄公听了这番话，心里明白多了。

四、“尊王攘夷”，桓公称霸

齐桓公和管仲不搞郑庄公那一套，非但不与周王磨擦，而且提出了“尊王攘夷”的策略。

所谓“尊王”就是要尊重周王室，承认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地位。所谓“攘夷”就是联合中原各个诸侯国的力量，共同抵御北方游牧部落的进攻和阻遏楚国向北发展的势头。当然，这实际上是利用天子的名义来号令其他诸侯，以达到称霸中原的目的。

齐桓公不记前仇，拜管仲为相的事，很快传遍了天下。鲁庄公闻讯，直翻白眼。他下令全国加紧练兵，造兵器，打算报仇。早有人把情况报告了齐国。齐桓公想先发制人，打到鲁国去。管仲拦着他说：“主公刚继位，内部还未安稳，不可轻举妄动……。”但是齐桓公不听劝阻，命令鲍叔牙带领大军攻打鲁

国，结果在长勺被鲁国打得大败。

齐桓公吃了亏，心里很懊悔，忙向管仲问计，管仲回答说：“臣以为君王欲霸天下，先得派人开铁矿，这样既有兵器，又有铁农具，农业发展了，国家、百姓的粮仓就会充实起来。我们还要利用我国近海的有利条件加快发展盐业、渔业。这样，离海远的国家就得依赖我们的食盐而听从我们。另外，还要优待工商、甲士……。”齐桓公听了管仲这番议论，对他十分信服。

齐国在管仲的治理下，不到5年便强盛起来。国都临淄城里矗立着许多巨大的宫殿，商店遍布全城，商贾、游人熙熙攘攘。齐国兵强粮足，齐桓公腰杆壮了，便对管仲说：“能不能会各国诸侯？”管仲了解齐桓公心思，却有意反问：“周天子新立，是天下共主，我们凭什么去会诸侯呢！”齐桓公沉思起来。管仲见齐桓公遇事冷静而不急躁，就说：“主意倒有一个，周天子新登位，主公可派人向他贺喜，请他下令早定宋国的君位，制止那里的内乱。我们只要得令，便成大事。”齐桓公听罢，转忧为喜，派人先去北杏布置会场。

不久，宋、陈、蔡、邾四国诸侯先后奉命来到北杏。齐桓公摇着头对管仲说：“通知了八个，只来了一半，改期再开吧。”管仲不以为然，说：“三人成众，再加上我国已过了半数。齐桓公觉得有理，起身来到会场，拱着手对四国诸侯说：“周已衰落，弄得国内经常出乱子，外族也常来侵袭我们。今天开会得推一人为主，把大家带动起来。”陈宣公首先明白意思，站起来朝齐桓公说：“既然天子托您召开会议，就该推您为盟主。”其他诸侯听了，恍然大悟，都举手赞成。齐桓公故意推让了一阵，坐上

了盟主的交椅。

自此以后，齐国力量日益强大，齐桓公先后采纳了管仲的许多好建议，伐鲁国、攻宋国、降郑国……到处势如破竹。并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挟天子以令诸侯，一匡天下，公元前651年，大会诸侯于葵丘，齐桓公再次当上九国盟主。齐桓公以大政治家管仲为辅相，改革旧制、发展生产，按土地好坏征收赋税，开矿、晒盐收归官营。选拔人材也打破陈规，给少数庶民以上升的机会，还允许犯罪的人用兵器和铜铁赎罪，用铜铁铸造生产工具。使得齐国国势兴旺，日渐强大。

当北方戎狄屡犯中原、侵扰洛邑、攻邢灭卫的时候，管仲为齐桓公出谋划策，以“尊王攘夷”为旗号，打败戎狄，存邢救卫，还安定了王室的内乱。齐桓公起了“共主”的作用，也就实际上成了诸侯的领袖，被尊为霸主。

齐桓公称霸中原时，南方的楚国也强大起来，雄心勃勃，意欲饮马黄河。管仲协助齐桓公兴师问罪，迫使楚王派人讲和。楚国北上受阻，转向东面江淮地带发展，形成了齐国独霸中原的局面。

齐桓公创建春秋霸业成为第一位霸主，同辅相管仲的运筹是分不开的。所以，古人称赞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

第四节 宋襄公图霸

一、降服齐国

公元前 643 年,73 岁的齐桓公一病不起。他的儿子们为争夺王位发生火并。齐桓公的尸体在床上搁了两个多月,蛆虫长得又长又粗,从墙角、门边爬了出来。

宋襄公见齐国乱了套,便做起了霸主梦。恰巧,齐桓公得宠的儿子昭来投奔襄公。他望着面色憔悴的公子昭,心里一亮:何不趁机去联络诸侯,扩张势力,坐上霸主交椅呢!于是一口答应公子昭的请求,通知诸侯开会,共同护送公子昭回国。

开会这天,卫、曹、邾三个小国惧怕宋国,派了些兵车来报到。宋襄公带着四国的兵马杀向齐国。齐国的大臣马上反戈一击,杀死初立的国君,投降了宋国,打开城门迎接公子昭即位,这就是齐孝公。

宋襄公没损一兵一卒降伏了齐国,以为自己很强大了,耍起了霸主威风。他向几个小国发出会盟通知。滕国国君开会迟来了一步,曾卅国国君把通知扔在一边,压根没来开会。宋襄公觉得他们是故意给他难堪,指着滕国国君的鼻子大声责问了一番,把他关闭起来。曾卅国国君闻讯吓得星夜赶来。宋襄公看见满脸尘土的曾卅国国君,火冒三丈,先是臭骂了一

通,继而令刽子手把他拉下去杀了。在场的曹国国君害怕祸及自己,没等会议结束,就不告而别。宋襄公见诸侯们一个个和他作对,绞尽脑汁,想出一条对策:借助齐、楚两国的势力来压服中原各国。

二、宋楚争霸

当时的大诸侯国,有齐、秦(今甘肃天水一带)、晋(今山西太原一带)、楚等。齐国自从发生内乱以后,国力已经衰弱下去。秦和晋,一个在西边,一个在西北,离中原还远,它们暂时并不妨碍宋襄公去称霸。只有楚国,才是宋襄公称霸的唯一对手。

楚国占有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的广大地区,疆域很辽阔。黄河流域的各诸侯国一向瞧不起它,称它为“蛮子国”。这个“蛮子国”不断向北方扩张势力,同那里的各国经常发生冲突。那时候,楚成王在位(前 671—前 626 年),国力很强大。鲁、陈(今河南开封一带)、蔡(今河南上蔡一带)、郑(今河南新郑一带)等中小诸侯国,都被迫同楚国订立了盟约,接受它的节制。

对于这样一个强敌,宋襄公打算采取联络它的办法。他的如意算盘是:只要把楚国拉过来,那么,那些同楚国订立盟约的诸侯国自然也会随着一起过来了,他的霸主地位也就可以确定了。

他把这步高着告诉了目夷。目夷却另有看法:第一,宋国称霸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如果急于去称霸,恐怕会惹出祸事来;第二,楚成王野心很大,能力也很强,恐怕宋襄公斗不过

他。宋襄公却认为目夷的顾虑太多，仍旧坚持自己的意见。拉拢楚国的方针就这样草草地决定了。

公元前 639 年春天，宋襄公约请楚成王、齐孝公在鹿上（今安徽阜南南）开了个小会。会上，宋襄公要求楚成王约请他的盟国出席下一次诸侯大会。高傲的楚成王居然答应了。

那年秋天，宋襄公带了目夷和其他一些文官兴高采烈地到盂（今河南睢县）地去大会诸侯。楚成王也带了一帮人如期到达。此外，郑、蔡等五国诸侯也都出席了会议。

宋襄公满以为这次会议既然是由他召开的，当然得由他来担任盟主。因此，他就大模大样地登上了盟主的座位。哪里料到，他还没有坐稳，楚成王一声号令，楚兵一拥而上，就把这位“盟主”从宝座上揪了下来。顷刻间，“盟主”变成囚犯。会场上秩序大乱。在混乱之中，目夷逃回本国，准备应付事变。

楚成王押着宋襄公，带领楚军一直打到宋国的都城商丘（今河南商丘）。幸亏目夷早作准备，楚军一时攻不破城。

楚军这次攻打宋国，本来是临时采取的措施。楚成王只是看到有机可乘，才用军事行动试探一下。现在，强攻的一手一时不易奏效，他就试用讹诈的一手。他向宋军说：“你们再不投降，我就要杀掉你们的国君了。”宋军回答说：“我们已另立国君。随你怎么办，我们决不投降。”

楚成王觉得在宋襄公身上已经榨不出什么油水，与其把他杀了，还不如卖个人情把他放了。这样，宋襄公才获得了自由。楚成王带着军队凯旋而回。

三、泓水大败

碰了钉子的宋襄公怀着满腹委屈被目夷等一帮大臣迎回宋国。他越想越生气，楚成王如此不讲信义，这个仇非报不可。

但是，对标榜“仁义”的宋襄公说来，要报仇，总得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才行。凑巧，公元前638年，郑国的国君去朝见楚成王。这给宋襄公带来了兴师问罪的“理由”。在宋襄公看来，郑国国君祖祖辈辈都受到周王的信任，而那个没出息的后代竟然不去朝见周王，却拜倒在“蛮子”的脚下，这简直是忘恩负义，有失体统。单凭这一点，他就有责任去惩罚郑国。何况，宋襄公十分清楚，郑国的兵力不强，打起仗来，宋国赢得胜利是十拿九稳的。郑是楚的盟国，把郑国打败了，好歹可以出一出这口窝囊气。

提不同意见的，还是那个目夷。他认为攻打郑国可能引起楚国出兵干涉，会闯出乱子，劝宋襄公忍耐一下。但是，宋襄公仍旧不听。那年夏天，他就出兵去攻打郑国。

郑国打不赢宋国，果然向楚国求援。楚成王立刻发兵，矛头直接指向宋国。宋襄公得到消息，急忙带领军队往回赶。宋军赶到泓水（故道在今河南柘县北）北岸，楚军也已到达泓水南岸了。

两军隔河相对，大战一触即发。

目夷对宋襄公说：“算了吧！楚强我弱，乘现在还没有打起来，同楚军讲和吧。”宋襄公不答应。

宋军列好了阵。楚军正在乱哄哄地渡河。

目夷对宋襄公说：“敌军多，我军少。乘他们刚渡河的机会，给他们来个迎头痛击，或许能够打败他们。”宋襄公还是不同意。他说：“不行，讲仁义的人不能乘别人困难的时候去攻打人家。”

过了一会儿，楚军全部渡过了河，但是还没有摆开阵势。

目夷又建议道：“乘他们还没有站稳脚跟，我们即刻发动进攻，还可以打赢。”宋襄公仍旧不同意。他说：“不行，讲仁义的人不去攻击不成阵势的队伍。”

不一会儿，楚军摆好了阵势，千军万马冲杀过来了。到了这个时候，宋襄公才下令还击。但是，已经迟了。宋军抵挡不住，一个个地倒了下去。宋襄公的卫队全部被楚军歼灭，宋襄公的大腿上也挨了一箭，受了重伤。在目夷等的拼死保护下，宋襄公狼狈地逃了回去。

泓水之战以宋襄公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宋襄公争霸的“理想”由此破灭。

回到宋国，大臣们都埋怨宋襄公丧失战机。宋襄公却理由十足地争辩说：“讲仁义的人不去伤害已经受伤的人，这叫作‘君子不重伤’；也不去捉拿头发已经花白的老人，这叫作‘不擒二毛’。我怎能忍心向没有摆好阵势的敌军发动进攻呢？”

宋襄公的伤势很重。泓水之战以后不到几个月，他就死去了。

第五节 晋文公称霸

一、假途灭虢

晋国地处汾水流域，和戎狄杂居，常受侵扰，晋献公继位后，改革内政，带军经武。在国内作二军。正当齐桓公独霸中原，楚成王争雄受阻的时候，晋国在山西汾河流域也吞并了霍、耿等许多小国，逐渐强盛起来。晋国虎视中原，却为山河所阻。晋国南部中条山下有个虞国（今山西平陆），虞国南边黄河之畔有个虢国（今河南陕县）。晋若据有虞、虢之地，出入中原，进可攻，退可守。可是，虞、虢虽小，却地势险要，路窄河宽，难于用兵。

公元前 658 年，虞君收到晋国送来的厚礼——良马玉璧。晋国使者委婉地请求虞国借道，让晋军过境攻虢。虞国大夫宫之奇看出晋国居心不善，竭力劝阻虞君万万不可借道，虞君不听。后三年，晋又来借道，宫之奇又向虞君劝谏说：“虞、虢都是小国，相互比邻，唇齿相依，在当今以强凌弱之世，只有彼此依傍，否则，如若嘴唇没有了，牙齿的处境也就危险了。”鼠目寸光的虞君，不听劝告，让晋军长驱直过。结果，虢被吞灭了。晋军回师时，又吞灭了虞国。虞君乖乖地把良马玉璧奉还给晋国。晋献公狡诈而又幽默地说：“马还是我们的马，只是口齿老

了一点了！”

二、晋国的勃兴

晋献公晚年，宠信骊姬，废嫡立庶，引起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太子申生被杀，公子夷吾和重耳逃往国外。骊姬之子奚齐被立为太子，史称“骊姬之乱”。公元前 657 年，晋献公去世，太子奚齐被杀，秦穆公乘机派兵送公子夷吾回国继位，是为晋惠公。不久晋惠公杀了里克，邳郑等大臣，又与秦国发生战争，为秦所俘，后被释放。晋惠公死后，其子圉继位，是为晋怀公，与秦的关系仍很紧张。秦转而支持晋献公之子重耳。

晋公子重耳年轻时胸怀大志，善于任用贤才，在国内享有盛誉。后来，重耳为了躲避祸乱而逃到了狄国，狐偃、赵衰、介子推、先轸等一批有胆有识的大臣便跟随他一起出逃到狄国。身居异乡，年过 50 岁的重耳壮志未酬。当齐桓公称霸中原时，重耳闻讯，马上千里赶去拜会。他们路经卫国，卫文公见来了个落难公子，紧闭城门不纳。吃了闭门羹的重耳只得继续上路。一粒米都未落肚的重耳饿得走不动了，向正在耕作的农民讨饭吃。农民见是一群衣冠楚楚的贵族，就鄙视地把一碗土递给重耳。重耳受到凌辱，气得举起马鞭子要抽打他们。赵衰知道不能把事情搞僵，婉转劝说：“公子快收下吧，得土地就意味着将占有国家呀！”重耳听了觉得有理，转怒为喜。他们又上了路，勉强走了几十里，饥肠辘辘的重耳倒在一棵大树下，耷拉着眼皮，靠在别人的背上。这时介子推一拐一拐地走了过去，笑嘻嘻地捧了碗肉汤献给重耳。重耳闻到肉香味，坐了起

来,接过碗一气喝完。问道:“这肉从哪里弄来的?”介子推说:“是从我身上割下来的。”重耳望着介子推裤脚上的一滩血迹,感动得话也说不出。他们十分艰辛地来到齐国。齐桓公热情地接待了重耳,把宗女齐姜嫁给了他。长期流离失所,疲于奔命的重耳在齐桓公处得到温饱,过着舒服的生活,壮志渐渐消磨,这下可急坏了他的助手们。他们和志同道合的新娘齐姜一起,当晚设计把重耳灌醉,抱他上了车。等重耳被阵阵晨风吹醒时,人已到了曹国都城。曹共公看见重耳这副愁眉不展的样子,挺不客气,只让住上一宵,连饭都不给他吃一口。重耳见曹共公这般无礼,转身离开了曹国。过了些天,他们来到郑国。郑文公一向认为在外流浪了十几年还不能回国的重耳是个没出息的家伙,就用卫文公的办法来对付他。重耳又吃了个闭门羹,十分沮丧。接着楚成王摆出了招待诸侯的礼仪来接待他们。晚上,楚成王安排了盛大的酒宴来为重耳接风,酒过三巡,楚成王开玩笑似的问重耳:“公子将来回国得了君位,拿什么来报答我呀?”重耳恭恭敬敬地回了话:“贵国珍宝遍地,我实在想不出能用什么来报答大王”。楚成王乐了,笑着说:“多少要有一点表示吧”。重耳想了一会说:“这样吧,假如万一咱们两国交战,那时,我下令军队退避三舍,远离贵军 90 里,来报答您的大恩。”楚成王听了大笑起来,心想:“该不是喝多了吧。”席罢,重耳在楚国过了几天舒服日子,转身来到秦国。秦穆公找个机会,于公元前 636 年派军队帮助 62 岁的重耳打回了晋国。

大器晚成的重耳,经历了 19 年的流亡生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回国即位后,马上对多年来追随他共度患难的功臣加

官晋级，安排在军队机要处，整顿和安定社会秩序，进一步改革内政，训练三军。晋国不久又出现了一派兴旺景象。

这有好几个因素。

其一，晋在献公时国势已强，基础比较好。

其二，韩原败后，晋大臣韩简等为争取民众的支持，推行了两项改革。一是“作爰田”，承认开垦的私田的合法性，不再定期分配。这在当时起了解放生产力的作用。二是“作州兵”，所谓“州”，是“国”和“野”的中间地带，实际就是与“国”毗连的一部分“野”。“作州兵”就是让居住在这部分地方的“野人”改变身份，像“国人”一样当兵。“野人”能够提高身份地位，当然高兴。国家扩大了兵源，因而增强了实力。晋文公即位时，这两项措施已经实行了好几年，国力比从前强得多了。

其三，晋文公和随从他流亡的老部下都是人才。晋文公用人也不限于这些人。旧仆头须在主人出国流亡时，偷了由他保管的财物逃走。文公不算老账，仍加任用。重耳当年逃离住处时，追兵已到，只得急急忙忙越墙而走。带兵的寺人披追到墙边，一剑斩掉他一段袖子。这样的账文公也不追究。他选择元帅，根据德才兼备的原则，用了个谷β 穀。他想用赵衰做下军主将，赵衰请求让给栾枝、先轸。他使用栾枝做主将，先轸做副将。文公君臣通过这些措施，团结了晋国各种各样的人，因此能够把晋国的潜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当时，周襄王因狄人侵犯而求救于重耳，派使者来求搬援兵。晋文公听了心里暗自高兴，说：“这正是天赐我取威定霸的大好时机呀！”于是，马上带领精兵强将出征，打败了狄人，杀了太叔一班乱党。周襄王在重耳的护送下重返京城洛阳，把晋

文公看作第二个齐桓公，命人大摆酒席庆功。酒后，周襄王命人拿出大量黄金、绸缎赏给晋文公。可他心中另有所求。晋文公推辞说：“重耳没有大功，不敢接受赏赐，只求天子一件事：我死后希望有条地道，通往坟坑的门口”。周襄王脸上露出几分笑意，心里却骂道：“呸！诸侯也想用天子的葬礼。”骂是骂，但不能得罪现在腰圆膀粗的晋文公，他略加思索说：“这是先王们订下的制度，我不敢更改。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你的，决定把京城附近的四座城池封给你。”

三、城濮之战

周襄王十九年（前 633 年），楚成王准备围攻宋国，派前令尹子文在睢地演习练兵，派令尹子玉在蔿地作战前演习。子文一早就完事，没有惩罚一个人；子玉整整一天才结束，鞭打 7 人，箭穿 3 人之耳。子文设宴，元老们都表示祝贺，年轻大夫蒍贾却不祝贺，认为子文把楚国政权让给子玉，而子玉刚愎自用，内不能治理百姓，对外率领兵车超过 300 乘，恐怕就要吃败仗。子玉如果失败，那是由于子文的推荐，等到子玉胜利归来再祝贺，也不算迟。不久，楚成王便会同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

宋国的公孙固急忙到晋国报急求救。晋国名将先轸认为，报答宋襄公在晋君流亡时的施舍，救援宋国被围之难，成就晋国的霸业，都在这一次了。晋文公之舅狐偃认为，楚国刚刚得到曹国，又新近同卫国结成婚姻，如果攻打曹、卫，楚国一定会

救援,那么宋国和齐国就可以免遭楚军的进攻了。于是,晋国就在被庐举行大规模的阅兵式,组建上、中、下三军,晋文公委派却谷统率中军,却溱辅佐他;委派狐偃率领上军,狐偃把上军之帅让给狐毛,自己做副帅;又派栾枝率领下军,先轸辅佐他。荀林父为晋文公驾御戎车。

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春,晋文公打算攻伐曹国,向卫国借路,卫国不答应。晋军回师,从南河渡过黄河,袭击曹国,攻打卫国。正月,晋军占领了卫国的五鹿。二月,晋中军元帅却谷死,先轸继任中军之帅,胥臣补先轸的空缺辅佐下军。晋侯与齐侯在卫国的斂孟结盟,卫成公向晋请求订立和约,晋国不答应。于是卫成公想投靠楚国,卫国的贵族不同意,就赶走他们的国君,以此来向晋国讨好。卫成公只好离开国都居住在襄牛。鲁国大夫公子买率鲁军助卫防守,楚军救援卫国,不能取胜。鲁僖公害怕晋国伐鲁,就杀了公子买来讨好晋国,对楚国人却说,公子买没有完成戍守的任务,所以杀了他。

晋军在打败卫国后,又包围了曹国国都,攻打城门,战死许多人。曹国的士卒把晋军的尸体陈列在城墙上,以此打击晋军士气。晋侯很为此事担忧,士卒们献策说:让军队在曹人的墓地扎营,示意掘他们祖先的坟。文公采纳了士卒们的意见,曹人果然非常恐惧,就把晋军的尸体用棺材装好送出城来,晋军乘机发起进攻,攻破曹都,俘获曹共公。晋文公当年流亡在曹,曹共公无礼地观看他洗澡,文公一直耿耿于怀,现在俘获了他,于是文公列举曹共公罪状,责备他不用贤臣僖负羁,却大封亲戚故旧,使曹这样一个小小的国家,素餐尸位的大夫就多达300余人。为了报答僖负羁当年赠飧置璧的恩惠,文公下

令不许晋军进入僖负羁的住宅，同时赦免了他的族人。当年跟他流亡的魏犇、颠颉很生气，认为文公不考虑有功之臣，却去报答那些小恩小惠。于是两人带兵就放火烧了僖负羁的住宅，僖负羁被烧死，魏犇放火时伤了前胸。文公很恼怒，打算杀死他，但又爱惜他的勇武，就派人去察看伤情，如果伤势严重，就准备杀他。魏犇伤得不重，文公于是饶恕了他，杀颠颉在军中示众，又命舟之侨为兵车右卫。

晋军袭卫攻曹，愿意解宋围。但楚见此二国已失，并不前来相救，反率陈国、蔡国的军队加紧围攻宋国。于是宋国派大夫门尹般向晋君告急求救。晋文公十分为难，因为舍弃不管，宋国就会与晋绝交；请楚国退兵，楚国肯定不会答应；如果与楚国作战，齐国和秦国不会支持。进退两难之际，中军元帅先轸献上一计：让宋国用财物去贿赂齐、秦两国，请他们出面求楚国退兵，晋国扣留曹共公，然后分曹国、卫国的土地给宋国。楚国同曹、卫两国友好，其国土被分，必定不会答应齐、秦的调解，而齐、秦二国接受了宋国的贿赂、又恼恨楚国不给面子，就必然出兵伐楚。晋文公同意了先轸的离间计，实施“喜贿怒顽”的外交策略。果然，齐、秦与晋联合了起来。

楚成王见形势不利，退回申地（今河南南阳）驻扎，防备秦国的袭击，又命令戍守齐国谷邑的申公叔时和围攻宋国的子玉率部撤退，避免与晋军交战。他认为晋文公在外流亡了19年，险阻艰难，全都经历了；民情真假，他都知道了，上天使他享有高年，同时除掉他的祸患。天所予、不可败。但是子玉却骄傲自负，坚持要与晋军作战，他说：虽不敢保证一定能建立什么了不起的战功，但希望用胜利堵住奸邪小人进谗的嘴。

于是，子玉派大夫宛春到晋军中谈判，条件是：恢复卫侯的君位，同时退还曹国的土地，楚军解除对宋国的包围。狐偃认为子玉太无礼了，晋文公只得到释宋之围一项好处，而子玉却得到恢复曹、卫两项好处，不能失掉这个战机。先轸不同意，他认为楚国一句话就使曹、卫复国，宋解围，3个国家都安全，晋国如果不同意，这3国就均被灭亡，这就是晋国无礼。不如暗中答应恢复曹、卫两国，使他们叛离楚国；再用扣留楚军使者宛春的办法来激怒楚国，等打完仗再考虑曹、卫的问题。晋文公很高兴，就采纳了先轸的意见。曹、卫两国果然派人到子玉营中同楚断交。

子玉十分气怒，立即率军北上与晋军作战。文公见楚军逼近，下令退避三舍。将士们对后退很不理解，认为晋君躲避楚臣是极大的耻辱，何况楚军攻宋不下，在外转战多时，已经疲惫不振。狐偃向他们解释这样做是为了报答文公当年逃亡时楚君给予的恩惠，兑现文公当年所许的“两国若交兵，退避三舍相报”的诺言。于是晋文公、宋成公、齐国大夫国归父、崔夭、秦穆公之子小子憖率军退后90里，在卫国的城濮（今山东濮县南）驻扎下来。楚军随即逼了上来，在城濮附近的险要地带扎营。

晋文公既害怕别人议论自己忘恩，又担心士卒不愿尽力作战，所以在与楚交战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三军将领都劝他下决心打。狐偃认为，这一仗若打胜，就可以得到诸侯国的拥戴，取得霸主的地位；即便打不胜，晋国外有黄河之阻，内有太行之险，没什么可担忧的。栾枝也说，汉水北面的姬姓国都被楚国吞并，思念小恩小惠而忘记大耻大辱，于国不利，应当与楚

国交战！文公这才坚定了决心。

子玉误把晋军战略性的后撤误认为是害怕楚军，于是刚扎下营盘便派大夫斗勃向晋文公挑战道：“请和您的部下游戏一番，您可以扶着车前横木观赏，我也陪您来开开眼界。”文公让栾枝回答说：我们国君领教命令了。楚王的恩惠不敢忘记。既然得不到谅解，那就烦请大夫告诉你们的将帅：准备好你们的战车，敬奉你们的君命，明天早晨战场上相见！

晋楚城濮大战前，晋军方面，有战车 700 乘，兵员 3.7 万人，另有齐、秦、宋的支援。中军元帅是先轾，却湊为副；上军主将是狐毛，狐偃为副；下军主将是栾枝，胥臣为副。楚军方面，子玉为中军主帅，指挥警卫王室的西广、东宫及若敖 6 卒，共有战车 180 乘；子上为右军主将，指挥陈、蔡两国的军队；子西为左军主将，指挥申、息两地的地方部队。晋军的上军对楚军的左军，下军对右军，临战，子玉夸下海口说：“今天晋军必定覆没！”

战争开始，晋下军副将胥臣命令士卒把驾车的马蒙上虎皮，首先向楚右军发起攻击，陈、蔡的军队从楚本是不得已，遭到这一突然进攻，立即溃不成军，蔡国公子印也被杀死，晋上军主将狐毛另设前军两队，出击楚军的逃兵，楚军右翼被彻底打垮；晋下军主将栾枝让士卒砍伐木柴拖在车后，扬起尘土，伪装败逃，楚中军立即发起追击，左军主将子西求胜心切，以为晋军主力溃逃，带部率先追赶，造成楚军侧翼空虚。晋见楚中计，元帅先轾率领中军精锐拦腰截击，狐毛、狐偃反转回头杀来，前后夹击，楚国的左军也被打垮。子玉见左右两军全垮，急忙收兵，这才不至于全军覆灭。

城濮之战以晋胜楚败而告结束。晋军在楚营内歇兵3天，班师而归。向周天子献上俘获的战车100辆和俘虏的步兵1000人。周天子设享礼款待晋文公，命令大臣尹氏、王子虎和内史叔兴父用策书颁命晋文公为诸侯之长，并赏赐了文公许多财物。

楚成王本不愿与晋交战，听说子玉大败而回，就派人对子玉说：“你若是活着回来，有何面目见申、息两地的父老呢？”逼子玉自杀谢罪。但在打发走使者后，成王又后悔起来，忙派人收回成命，这时子玉在连谷（今河南西华县南一带）已自杀了。

城濮之战使晋国国威大振，以前与楚国结盟的国家纷纷投靠晋国。公元前632年，晋文公在践土建造王宫，纠合宋、齐、鲁、陈、郑、蔡等9国当上霸主，同年冬天，晋文公又率领10国诸侯朝见周天子，实现了他多年的雄心。而楚国北上的战略在这一战中受到沉重的打击，此后一段时间只好转向南方经营。晋文公又挥戈北上“御狄”，不断开拓北方疆土。晋文公死后晋襄公继位，曾北败狄人、西遏秦国、仍然称霸中原。晋襄公死后，晋灵公立，晋国因内乱，国势逐渐衰落。至景公时国力回升，又开始对外争霸。

四、秦晋崤之战

晋文公去世后，其子驩继承君位，这就是晋襄公。襄公继位后正在安葬晋文公时，晋与秦爆发了一场战争。

文公在世时，晋与秦是联盟。公元前631年，晋秦联军以晋文公流亡时过郑，郑不礼遇以及在城濮之战中郑和楚以晋

为敌为口实，攻打郑国。郑国请老臣烛之武到秦军中以破郑后使晋强、使秦弱为由，说通秦穆公。秦穆公就悄悄将军队撤回，并同意与郑国讲和，派秦国将领杞子、逢孙、杨孙领兵戍守郑国。晋文公见秦军撤回，非常生气。狐偃请求晋文公派兵攻打秦军，文公说：“不能那样做，我如果没有秦君的帮忙，是到不了今天的。我当年依靠秦国力量即了君位，今天反而去伤害他，这是不仁；丧失了同盟国家，这是不智；用动乱来代替完整统一，这是不义。我们还是回去吧！”晋军也只好撤回了。但是从此种下了秦晋交恶的种子。

秦穆公在位 39 年，对于齐桓霸业羡慕不已。因此重用贤臣百里奚和蹇叔，发展实力，以求东进图霸。然而晋的强大成为秦东进的障碍，为了控制晋国，秦穆公先后送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回国为君，但都未收到效果。晋文公一死，秦国得到了一个东进的好机会。

这时秦国留守郑国的三员大将觉得是否并郑国的好机会，于是就写密信给秦穆公，由他们作内应，秦派军队来袭取郑都。秦穆公与大臣们商量攻打郑国的事，老臣蹇叔说：“秦国离郑国千里之遥，中间还隔着晋国。让部队辛辛苦苦地偷袭那么遥远的国家，会把军队搞得疲惫不堪，筋疲力竭。远方的国家又会作好准备，我们兴师动众，劳而无功，是很不合算的。”可是秦穆公不听劝阻，执意发兵袭郑，命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蹇叔的儿子白乙丙和西乞术三人率军攻打郑国。出东门时蹇叔为他们送行说：“孟子，今天我看着大军出发，可是我看不见你们再回来！”秦穆公见蹇叔沮丧军心，就派人去呵斥他：“你知道什么，老而不死，如果你只活到六七十岁就死了，现在

你坟上的树也该有两手合抱那么粗了。”蹇叔还是对儿子说：“这次晋国人一定会在崤山地区狙击我军。崤山那个地方有两个山头，南边一个是夏代君主皋的坟墓，北边一个是周文王曾经躲避风雨的地方。你们肯定会死在两个山头之间，等以后我到那里去收拾你们的尸骨吧。”孟明视听了只有感到晦气。

秦军到了滑国，郑国的商人弦高正要到周都去做买卖，恰好遇到了秦军。弦高得知秦军要去偷袭郑国，便急中生智，一面派人连夜回郑国报告，一面用 12 头牛和四张熟牛皮做礼物，去犒劳秦军。他说：“我们郑国国君早已听说你们行军将经过我们国家，特派我冒昧地前来犒劳大军。我们国家虽然不富裕，但还是为你们食宿做了准备，在你们离开的时候，也会为你们安排一夜的守卫。”

孟明视看到郑国已有了准备就说：“我们不必指望了，假若攻打，不一定能取胜，况且没有后援，还是撤回算啦。”他们在回国途中顺便灭了滑国。郑穆公接到弦高告急后，派人探看杞子等人的馆舍，发现他们已经装束完毕，磨砺了武器，喂饱了战马，只待接应秦军，于是便派皇武子将他们驱逐。他们知道事情败露，就跑出了郑国。

晋襄公在曲沃守丧，接到秦国派孟明视偷袭郑国的报告，就召集大臣商议如何对待。先轸说：“这次秦穆公不听蹇叔劝告，是因为他贪心太大，而不吝惜百姓的劳苦。这实在是上天给我们的好机会，千万不能把敌人给放跑。假如放走了敌人，那可就会产生祸患。现在看来是非攻秦军不可。”栾枝说：“这样怕不太好。秦国对先君有恩惠，我们打击秦军，怕不符合先君的心意。”先轸说：“秦国现在不但不为我们国家的丧事哀

悼,反而要去攻打我们同姓的郑国,完全是秦国无礼,那我们还讲什么恩惠呢?我们现在这样做完全是为子孙后代着想,这怎么能说是因为国君死了我们就忘记旧交情呢?”胥臣等大多数人都同意先轸的看法。

晋襄公采纳了先轸的意见,下令迎敌,战事仍由先轸统一指挥。先轸到渑池察看了崤山的地形,就点拨人马:命梁弘引兵 50000 埋伏于东崤山,待秦军过完后,再从后面追杀;命狐射姑领兵 5000 伏于西崤山,截住秦军厮杀,另给 5000 兵砍伐树木,堵塞秦军的归路;命先且足引兵 5000 伏于崤山左面,胥婴引兵 5000 伏于山崤山右边,待秦军过其大半,从两侧拦腰袭击。到时候会把秦军装入崤山 35 里险道的大口袋里。

当孟明视率秦军进入崤山时,白乙丙和西乞术提醒他注意,但孟明视不以为然。他吩咐秦军分成四队,各队相距一二里,有事时前后互相照应。进入崤山后走了好一阵,一个人影也未见,孟明视放心了,就让走累了的士兵脱下铠甲,轻装前进。进入东崤山路越来越难走,突然听到远处鼓角之声,有人报告晋兵从后面追杀上来。孟明视就命部队快速前进,走不多远,前面兵士又退了回来说,道路被乱木头塞断了,人马都过不去。孟明视断定前面肯定有伏兵,就命士兵搬开树木,开路前进。正在这时,晋兵漫山遍野涌来,并将秦军开路先锋褒姒子活捉。孟明视看了地形后,命军后撤,以便到东崤山较为宽阔的地方与晋军较量。

刚要后撤,东路晋军的伏兵又喊杀上来,道路又被堵死了。孟明视一看,左旋右转,没有可去的地方,也没有可停的地方,就命令军队丢掉辎重,从左右两边爬山越溪,寻找出路,绕

道西行。可是晋军伏兵又起，秦军被杀的杀、俘的俘，前后左右都是晋兵。他们虽转战多时，最终都成了晋军的俘虏。先且居将孟明视、白乙丙、西乞术交给晋襄公。后来晋襄公在其母即秦穆公的女儿劝说下，将孟明视三人释放了。先轸听说后，马上跑到晋襄公处说：“壮士千辛万苦，冒死把敌将抓住，妇人只说了一句话，就把他们放了。今天放虎归山，以后懊悔可就晚了。”晋襄公这才醒悟，马上派阳处父去追赶，可是孟明视已上船渡河了。

秦穆公见孟明视三人生还很是高兴，他说：“我没有听蹇叔和百里奚的劝告，让你们远道出师，很不应该，这全是我的过错。”于是仍让他们任三军主帅。

此后孟明视为报崤山之仇，又两次同晋国作战都失败了。第四次由秦穆公亲征，孟明视仍为主帅，从蒲关（今山西永济西）渡过黄河后，烧了所有渡船，以鼓士气。晋国看秦军来势汹汹，采取坚壁固守策略，不肯出战。秦军打了几个小胜仗，就到崤山收取死亡将士的尸骨，为他们祭奠。

秦晋崤山之役，阻止了秦国东进的势头，使晋国的霸业得以持续。晋襄公在位的七年间，仍然维持诸侯盟主的地位，虽然战事不断，但所采取的措施促进了晋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秦国东进不成，就向西发展，任用谋士由余，逐渐灭掉戎人所建立的 12 个国家，新辟土地千里，周天子赐给秦穆公金鼓以示祝贺，这就是“秦霸西戎”。秦国又与楚国接近，逐渐形成秦楚联合抗晋的趋势。

群雄逐鹿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第六节 楚庄王称霸

一、一鸣惊人

公元前 613 年，楚成王之孙、穆王之子侣即位，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楚庄王。楚庄王在位期间，很会用人，并采取了一套考察官吏的办法。他即位 3 年不问朝政，日夜饮酒作乐，并发布命令说，谁劝告他就处谁死刑。对这样一位“昏君”，有的大臣百般逢迎拍马，进献奇禽异兽和美女，希望得到提拔，有的一时还真得到庄王的重用；有的大臣对楚国的前程焦虑万分，冒死进谏。

忠臣伍举进见庄王说：“我有隐语要进献大王：有一只鸟在一座小山头上，三年不飞不鸣，这是什么鸟？”

“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庄王会心地说：“你先退下，我知道了。”这以后几个月，庄王淫乐日益厉害，大夫苏从又进谏庄王，庄王冷眼望着苏从说：“难道你不知道劝我是要杀头的吗？”

“用自己被杀的举动来劝醒君王，这就是臣下的意愿！”苏从慷慨激昂地回答。庄王听了十分高兴，心想：现在大臣们谁忠谁奸，谁贤谁愚完全清楚了，现在一飞冲天、一鸣惊人的时候到了。于是庄王停止淫乐，开始整理朝政。楚庄王采取的第

一个行动就是把3年内逢迎拍马的官吏免职的免职、杀头的杀头，而伍举、苏从、孙叔敖这些忠臣，他又根据各人的才能，提升到各级重要岗位上。

楚庄王任用孙叔敖来管理经济。孙叔敖是个理财能手，他实行综合经济发展制，商、农、手工业同时并举，楚国出现一派繁荣景象：货物流通，粮食满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清明的政治，殷实的经济，精锐的军队，这就是楚国称霸的基础。

二、问鼎中原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因讨伐洛阳西南的陆浑戎而到周王国边境，为了向周天子炫耀武力，他还在那里检阅军队。徒有虚名的周定王马上派大夫王孙满去慰劳楚军。楚庄王想：周王朝这么虚弱，我楚国实力这么强大，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洛阳夷为平地，天子该轮到我了。因此他轻蔑地问王孙满道：“九鼎的大小轻重有多少啊？”

九鼎是历代王权的象征，王孙满知道楚庄王的用心，便针锋相对地说：“掌握天下的根本在于德政，在于人心归向，至于谁夺得九鼎只是表面现象而已。”

“不许阻止我夺九鼎！”庄王勃然大怒，厉声喝道：“凭我楚国的武力，可随手夺鼎，统治天下！”

“啊呀呀，您怎么连这也不知道哇？”王孙满手拈胡须，镇定地说：“想当年，禹王把九州进贡的铜铸成鼎，这就是九鼎，这只是天下统一的象征，而统一的根本在于禹王的德政。夏桀

行暴政，商汤行德政，九鼎就转移到殷人手中；殷纣行暴政，周文、武王行德政，九鼎又转移到周人手里。只要人心归向，没有鼎，江山也是稳固的，如果人心背离，虽有九鼎也早晚要失去的。”听王孙满这样讲，楚庄王才算点了点头。王孙满又说：“现在周王虽弱，但还没出现一个圣贤取代他的时候，因此，九鼎的轻重是不可问的。”楚庄王听完这席话，一言不发，勒转马头率军回楚国去了。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楚庄王问鼎中原事件，这是楚国北上争霸中原的具体表现。

三、邲之战

晋国方面自取得城濮之战的胜利后，开始放松对楚国战略动向的警惕，而与原先的盟国秦国之间产生了矛盾。秦国要染指中原，争夺霸权，一心想越过黄河，锐意东进；而晋国要独霸中原，号令诸侯，也势必要扼阻秦的东进，将其活动范围限制在西方一隅。双方矛盾的激化，使两国间先后多次兵戎相见。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崤之战。在这场战争中，晋军虽然伏击秦军成功，使对方“匹马只轮未返”，取得战役上的大胜；但是在战略上却是失大于得，它使得秦晋同盟关系陷于瓦解，两国间战事频繁，秦国亲近楚国，从而极大地牵制了晋的力量，使之陷入侧背受敌的不利态势，战略上趋于被动，这就为楚国再次北进中原提供了客观上的帮助。同时，晋国内部这时也出现了问题，表现为：君权削弱，君臣关系紧张，异姓大夫之间内讧不断。这使得晋国社会政治动荡，军心士气涣散，不能集中

力量应付强楚的挑战，于是促成了晋、楚优势地位的转换。

当时，郑、宋等国夹在晋、楚势力之间，对哪一方也不敢轻易得罪，只好八面玲珑，两头讨好，以求自保。尤其是郑国，位于中原腹心四战之地，处境更是微妙。这时它为晋国所威逼，权衡利害，又投靠了晋国。楚国深知郑在争霸全局中的重要性，决定对郑用兵，迫使其归附自己，以便进而封锁黄河，阻晋南下。于是在周定王十年（前 597 年）春，楚庄王以郑通晋为罪名，统兵大举伐郑，拉开了晋楚必败之战的序幕。

同年六月，郑国都城在被围数月后，因得不到晋军的及时援助，虽经坚决抵抗，但终于为楚军所攻陷。郑襄公肉袒向楚军请和，为楚庄王所接受。楚军退兵 30 里，派使臣与郑结盟，郑国以襄公弟子良入楚充当人质。

郑国是晋进入中原的通道，晋国自然不能允许楚国控制这里。所以当楚国围郑二个月后，晋景公就委任荀林父为中军元帅，率军救郑。然而晋国发兵已延误战机，开进又不迅速，所以当郑与楚媾和的消息传来时，晋军才抵达今河南省黄河北岸的温县地区，陷入了战略上的被动。

在决定下一步战略方案之时，晋军内部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和激烈的争执。荀林父认为郑既已降楚，晋军再去救郑就失去了意义，所以主张暂时不渡黄河，勒兵观衅，待楚军南撤后再进兵，逼郑附己。上军主帅士会赞成这一意见，强调兵只可观衅而动，楚军当时正处于有理、有利、有节的优势地位，现在同它作战对晋不利，主张另待时机，再树霸权。他们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遭到中军副将郤穀的反对。他认为晋之所以称霸中原，是因为军队勇武，臣下尽力。如今丢掉郑国，称不得

“力”；面临敌人而不打，称不得“武”，若是在自己手中失掉霸主地位，还不如去死。并强调“成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丈夫也”。在这种好战心理的驱使下，郤穀遂擅自率其部属渡河南进。他这种行为严重干扰了晋军统帅中枢的有效指挥，为晋军会战失败投下了阴影。

郤穀擅自渡河的事件发生后，晋下军大夫荀首即认为这么做必败无疑。这时司马韩厥就向荀林父建议道：“郤穀以偏师攻敌，势必落败。您身为元帅，对此是负有罪责的，还不如命令全军渡河前进。这样即使是打了败仗，责任也是由大家共同承担。”荀林父犹豫不决，最后被迫传令全军南渡黄河，行至必阯地（今河南衡雍西南），由西而东背靠黄河列阵。

楚军听说晋军渡河，内部也出现了战与不战的分歧。令尹孙叔敖主张见好就收，及时撤兵，不同晋军作正面冲突；而宠臣伍参则在分析了晋军内部将帅不和、士气低落等弱点后向楚庄王建议同晋开战。楚庄王采纳了伍参的意见，打消了南撤的念头，转而率兵向北推进，抵达管地（今河南郑州市一带）。

就在大战一触即发的前夕，郑襄公派遣使臣皇戌前往晋营，以“楚师骤用而骄，其师老矣，而不设备”为由，劝说荀林父进攻楚军，并答应郑军将协同晋军作战。对郑国的这一劝战建议，晋军将帅中又发生了一场辩论。郤穀力主答应郑使的要求，赞成立即出战，认为打败楚国，招抚郑国，在此一战。下军副帅栾书则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楚军实际情况并不是“骄”、“老”和“不备”，郑国来劝战，纯粹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希望晋、楚速战速决，以战争的结局来决定郑国的去从。主帅荀林父一时犹豫于两派的意见之间，迟迟未能决断。

正在晋军进退不决之时，楚庄王遣使求见晋军主帅，表示楚这番出师北上，目的只是为了教训一下郑国，而并无与晋国作对的意思。士会代表荀林父答复说：晋、郑同受命辅佐周王室，如今郑怀有二心，晋特奉王命质问郑国，而与楚国无涉。回答得既坚定又有分寸。可郤穀对此大为不满，认为荀林父谄媚楚国，便派中军大夫赵括用挑衅性的语言答复楚使：晋国出兵是为了把楚军从郑国赶走，为此，不惜同楚军交锋。这样一来，晋军内部的混乱分歧，便直接暴露在楚使面前，楚庄王从而掌握了晋军的意向和虚实。

为了进一步麻痹晋军，确保决战的胜利，楚庄王再次派人以卑屈的言辞向晋军求和。荀林父原先并无决战的决心，见楚军求和，即予以答应，并放松了戒备。这时，楚军就乘机派遣乐伯、许伯、摄政等人乘战车向晋军挑战，既打击了晋军的士气，又摸清了晋军的虚实。

楚军挑战后，晋军中两个心怀不满、希望晋军失利的将佐魏锜和赵旃，也要求前去向楚军挑战，未被允许，改为出使请和。这两人进至楚营后，擅自向楚军挑战进攻，结果恰好为楚军所利用，楚大军遂倾巢出动，猛烈攻打晋军各部，给前来挑战的晋军魏锜、赵旃部以沉重的打击，并乘胜进逼晋军大营。

这时，荀林父还在营中等待楚军派使者前来议和。楚军突然如潮而至，荀林父手足无措，大惊失色，竟然在恐慌中发出全军渡河北撤的命令，并大呼先渡河者有赏。这么一来，晋军更是陷于一片混乱，弃甲溃逃，拥挤于黄河南岸附近，争相渡河逃命。船少人多，渡河没有指挥。先上船的怕楚军追及，急于开船；未上船的跳下河中，手攀船舷，以至船只不能开动。结

果引起一场自相残杀，造成船上断臂断指积成一堆，使晋军蒙受了重大的损失。

所幸的是，楚军并无压迫晋军于河岸聚歼的计划，晋军大部才得以渡河逃脱战场。另外，晋上军在士会的指挥下，预作准备，设伏挫败楚公子婴率领的楚左军进攻，有条不紊地向黄河北岸撤退；又晋下军大夫荀首为营救其子荀莹而奇袭楚军先锋部队并取得成功，射死楚将连尹襄老，活擒公子谷臣。所有这些，也都起到了掩护晋军渡河的客观作用，减少了伤亡。

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楚军取得邲之战的胜利。接着，楚庄王进兵衡雍，在那里以胜利者的身分修筑楚先君宫殿，举行祭河仪式和祝捷大会，然后撤军凯旋南还。至此，楚国北侵中原之势达于鼎盛，楚庄王终于登上了霸主的地位。

邲之战，是春秋中叶的一次著名会战，是当时两个最强大的诸侯国——晋、楚争霸中原的第二次重大较量，在作战中，楚军利用晋军内部分歧、指挥无力等弱点，适时出击，战胜对手，从而一洗城濮之战失败的耻辱，在中原争霸斗争中暂时占了上风。至于楚庄王本人，也由于这一仗的胜利，而无可争辩地挤入史所称道的“春秋五霸”行列。

邲之战的规模、影响和意义都不及城濮之战。此役楚虽胜晋，但并未予晋军以歼灭性打击；晋军虽败，但并未真正大伤元气。这就为以后的晋楚继续争战保存了相当的余力。

第七节 晋国重振霸主地位

一、齐晋鞏之战

周定王十五年(前 592 年)春,晋侯派遣郤克作为使臣到齐国,召请齐侯参加在晋国断道(今山西沁县东北)举行的盟会。齐侯的母亲萧夫人听说郤克是个跛子,想看看他,齐顷公设帷幕遮住,让她躲在帐幕内偷看,郤克一跛一跛登上台阶,萧夫人禁不住笑出声来。郤克非常气愤,出来发誓说,不报复这种耻辱,就不再渡过黄河。这次一同出使到齐国的鲁国使者季孙行父是秃子,卫国使者孙良夫是斜眼,曹国使者公子首是驼背,齐国为了奚落这些使臣,就让在生理上有同种缺陷的人来接待。齐顷公如此轻侮各国使臣,引起了诸位使者的强烈愤怒。郤克回到晋国,就请求晋景公允许他带兵伐齐,景公不同意;他又要求用郤氏家族的兵力去攻齐,景公也不答应。

周定王十八年(前 589 年)春天,齐国出兵攻打鲁国的北部边境,包围了龙邑(今山东泰安市东南)。齐顷公的宠臣庐蒲就魁在攻打城内时被俘,顷公对龙邑守将说,不要杀死他,我同你们订立盟约,军队不再进入鲁国的境内。龙邑守将不理睬,杀庐蒲就魁,并陈尸于城墙上。齐侯很生气,亲自击鼓攻城,经过三天的战斗,攻克龙邑,随即向南进军,到达巢丘(今

山东秦安县境)。在齐国攻打鲁国的同时,卫穆公派孙良夫、石稷、向禽将、宁相率兵攻打齐国。两军相遇,石稷打算回军,孙良夫认为率领部队作战,遇上敌军就回,无法向国君交待。如果了解到不能作战,当初就不应出兵。现在既然和敌军相遇,不如一战。这样,卫、齐两军在新筑展开战斗,结果卫军大败,统帅孙良夫多亏新筑的邑大夫仲叔于奚援救,才免于当俘虏。孙良夫感到丧师辱国,急于报仇雪恨,没回卫国就到晋国请求救兵。

这时,鲁国也派臧宣叔到晋国乞师,两人都找到晋国执政者郤克门下。郤克早想出兵攻齐,于是告知晋景公。景公见齐国接连攻打自己的盟国,再不能坐视,答应出战车 700 辆,派郤克作中军元帅。郤克说,这是城濮之战的战车数,当时有先君文公的明察和先大夫们的敏捷,所以获胜。我比起先大夫们,连他们的仆役都不如,请出 800 辆战车。景公答应了他的请求,又派士燮辅佐上军,栾书指挥下军,韩厥做司马,使臧宣叔做向导,同时让鲁大夫季文子也率领人马与晋军会合攻齐。

部队行进到卫国境内,韩厥要杀人,郤克驱车赶去,本想劝阻韩厥,但人已被杀,郤克马上让人把尸体抬到军中示众,意在分担人们对韩厥的指责。晋军在卫国的莘地(今山东莘县北)追上齐军,六月十六日,军队到达靡笄山下(今山东济南城南)。齐顷公派使者到晋军请战,说:贵军光临,敝国将以为数不多的疲惫士卒,明天早上和贵军相见。郤克回答说:晋和鲁、卫是兄弟国家,他们来告诉说,齐国不分昼夜到他们的国土上发泄气愤。晋君不忍心,派下臣们前来向贵国请求,不要和鲁、卫两国作对,并且不让我军久留在贵国境内。对于您

的命令,我们是会照办的。齐顷公说:晋军的许诺,正是我们的愿望,即使不答应,也要和他们见个上下!齐国大夫高固闯入晋军中,举起石块,掷向晋军,并擒住被打者,返回自己的军营。他把战车拴在桑树根上,向齐军将士们炫耀道:想做勇士的人快来买我多余的勇气!

周定王十八年(前589年)六月十七日,两军在鞌地(今山东济南市西)摆开阵势。邴夏为齐顷公驾车,逢丑父做车右护卫;晋国解张为郤克驾车,郑丘缓作车右。临战,齐顷公对将领们说,我先消灭了这些晋军再吃早饭!马不披甲就驰向晋军。

战争刚开始,晋军主帅郤克就被箭射伤,鲜血一直流到鞋上,仍然击鼓不止。他对驾车的解张说自己受伤了。解张说,从一开始交战,箭就射穿我的手和肘,我把箭折断继续驾车,战车的左轮都被血染红了,哪敢说受伤,您忍着点吧!车右郑丘缓也说:交战开始,有危险的路,我都下去推车,您难道不了解吗?解张又激励郤克道:全军所听所看,在于我们的旗帜和鼓声,是进是退都以它为标志。这辆车只要有一人镇守,就可以成就大事,怎么能因为受伤而坏国君的大事呢?身披铠甲、手持武器,本来就是去死的,伤还没重到死亡的程度,您要尽力坚持!说着,解张把缰绳并在左手,右手操起鼓槌击鼓,帅车向前奔驰不止,晋军都紧随它冲了上去。齐军大败而逃,被晋军追赶,围着华山绕了三圈。

韩厥站在中间驾车追赶齐顷公。顷公的御者邴夏说,射那个驾车人,他是君子。顷公说,认为他是君子反而去射,这不合于礼义!于是,连续射死韩厥左右的两人。晋大夫綦毋张失掉

自己的战车，搭乘韩厥的车。韩厥用肘推他，让他站在自己的身后，又俯身放稳车右的尸体，这时，逢丑父与齐侯在车上乘机交换了位置。危急中，齐侯所乘车的驂马被树木绊住而不能行走，逢丑父因日前小臂被蛇咬伤不能推车，所以被韩厥追及。韩厥拿着马缰走到齐侯的车前，想俘虏齐侯，逢丑父伪装齐君，指使齐侯下车去找水，齐侯乘机坐上副车逃走。韩厥向主帅献上战俘逢丑父，郤克打算杀掉他，逢丑父喊叫着说，截止现在还没有代替他的君主承受祸患的人，如今有一个在这里，还要被杀死吗？郤克认为，一个人不惜以生命来使他的君主免于祸患，杀死他，不吉利，不如饶了他，以此来勉励那些事奉国君的人。于是就赦免了逢丑父。

齐顷公免于被俘，又重整旗鼓，三次冲入晋军，三次杀出重围，寻找逢丑父。然后率残部从徐关（今山东临淄县西）回到齐都。晋军尾追齐军，从丘舆（今山东益都县西南）进入齐国，攻打马陞邑。齐侯被迫向晋国求和，派大夫宾媚人奉送上灭纪国时得到的鬲、玉磬和土地。晋国不接受，提出要把当年嘲笑郤克的齐侯母的亲萧夫人作人质和将齐国田垄一律改为东西向作为条件，宾媚人对晋人的苛刻条件一一反驳，据理力争，最后表示，如果晋国硬是坚持这些无理要求，齐国只有请求决一死战！曹、卫两国也极力劝说，晋国方面才同意与齐国讲和。七月，晋军将帅和齐国使者宾媚人在爰娄（今山东临淄西）缔结盟约，齐国归还鲁国汶阳（今山东宁阳县北）一带的土地和侵占的卫国领土，晋国得到齐国的大量财物。

安丘之战，晋国大获全胜，齐侯几乎成为晋国的阶下囚，齐国在诸侯中的地位大为削弱，而晋国的霸主地位得到巩固和

增强。

二、鄢陵之战

公元前 579 年在宋华元的调停下，晋楚签订和解盟约，但这并没有阻止两国对霸权的继续争夺。时隔三年楚国首先违背盟约，出兵讨伐郑、卫。令尹子囊说：“我们新近与晋结盟，就违背盟约，似乎说不过去吧！”司马子反说：“只要对本国有利的事就可以干，管他什么盟约。”楚共王听了子反的话，就兴兵伐郑、卫。郑国见楚国不守信，也发兵抗楚，夺取新石地方。晋国见楚国背约，就约请诸侯的大夫与吴人会于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预备对付楚人。楚国见势不利，割了汝阴之田拉拢郑国，郑国又叛晋附楚，并且替楚起兵伐宋，卫国就替晋起兵攻郑。这样，中原和平的局面又消失了。

晋国见丢失了郑国，与晋结盟的宋、卫和郑国也发生了战争，晋厉公就决定亲自兴师，讨伐郑国。而郑国也派人到楚国请求救兵。公元前 575 年夏天，晋军渡过黄河，与楚军在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相遇。晋、楚之间继城濮、必阝战后的又一次大战就这样开始了。

楚军方面由楚共王率军，司马子反领中军，右尹公子壬夫领右军。军队路过申地时，子反去见告老在申的申叔时，向他探询这次出兵的利弊。申叔时讲了许多关于军队要打胜仗的条件，如信、义、德之类。又直截了当地指出：楚国对内不给民众以好处，对外不讲信义，缺少援助，现在又正是农耕季节，出兵打仗，谁愿意作殊死的战斗。

晋军方面的统帅是晋厉公，栾书率领中军，士燮副之，谷缙率上军，荀偃副之，韩厥率下军，谷至负责新军，荀罍留守国内。正当晋楚两军相遇时，晋将士燮不主张打仗，栾书不同意士燮的主张。正在晋将和、战不决的时候，楚军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战略，凌晨全军压迫到晋营结阵。栾书看到楚军很轻浮，认为要固守营垒，趁其退兵时再打。晋厉公主张趁楚军立足未稳而击之，谷至进一步分析了楚军的六大弱点：令尹与司马不和，楚军疲于战争，战军阵势不肃，附楚的蛮军阵容不整，楚军结阵于不利的晦日，军队没有纪律等，主张速战。

开战之前，楚王登上巢车观察晋军的活动，令尹子重派由晋逃楚的太宰伯州犂站在楚王身后，向楚王介绍晋军情况。晋国人看到楚军众多，又有了解内情的伯州犂在楚王身边，有些惧怕。由楚逃晋、知道楚军虚实的苗贲皇站在晋厉公身旁，告诉厉公：“楚军的精锐是中军的王卒，我们若先分兵攻它的左右军。然后集中三军攻击王卒，一定能大败它。”厉公听从了他的计策。

战斗一开始，双方军队都攻击前进，晋厉公的乘车陷在泥沼里。栾书正要用自己的车载晋侯，他的儿子栾鍼说：“你赶快去指挥战事，你是主帅，不能离开职责，我来救君主。”他将厉公拽出泥坑。

这时晋将魏缙一箭射中楚共王的眼睛，共王气愤之极，立即命令神箭手养由基给自己报仇，养由基一箭把魏缙射死。晋军上下一心，个个奋战，很快把楚军逼到危险的地方。养由基以其射箭善长，多次射中晋军士兵，暂时阻止了晋军的进攻。但晋人俘获了楚大臣公子筏，栾鍼夺取了令尹子重的帅

旗。

在战斗间隙，楚将公子反命令部下检查军士们的伤情，并补充兵员，修整武器，重列战车马匹。晋将苗贲皇一方面大力整军，喂饱战马，磨利兵器，加固营垒；一方面故意放松对楚国战俘的看管，让他们溜回去报告晋军准备再战的信息。楚王听到这一切，叫子反来商议对策，准知子反喝酒后，酩酊大醉，人事不醒。楚王说：“是天意要使楚国失败，我不能再等待了。”于是，他乘夜幕的掩护，便先行逃回去了。

楚王的南走，无疑使楚军大受震动，军队无心恋战，纷纷南撤。晋军乘势攻占楚营，获得辎重无数，又大吃楚军军粮，沉浸于胜利之中。楚军后退至瑕地，子重归罪子反误军，楚共王欲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但尚未来得及，子反就自杀身亡了。至此，鄢陵之战就以楚国惨败而告终。

晋国虽然取得鄢陵之战的胜利，但是晋楚之间的争霸斗争仍未停止。公元前 572 年，楚国利用宋国大臣之间的矛盾，支持逃到楚国的鱼石回宋，并夺取宋地彭城（今江苏徐州）作为鱼石的城邑，派兵车 300 乘替他戍守，培植宋国亲楚势力，断绝晋与吴的通道。宋华元派人到晋求救，晋出兵救宋，但晋楚两军相遇后不战而回。第二年，晋、鲁、卫、曹、莒等国围宋彭城，鱼石才投降，晋国打破了楚国的计划。在围彭城时，齐国没有出兵，晋国派人问罪，齐国派太子光到晋国去作人质，承认了晋国的霸主地位。

这时本来附楚的陈国，受不了楚令尹子辛的压榨，反叛楚国，与晋国和诸侯结盟。楚军知此消息，便起兵伐陈，而晋方诸侯也派兵救陈。吴国得到晋的帮助，便起兵伐陈，而晋方诸侯

也派兵救陈。吴国得到晋的帮助,国力蒸蒸日上,成为楚国的严重威胁。公元前 570 年,吴与楚开展第一次战争,结果楚兵大败。

鄢陵战后,郑国想到楚的失败,楚王眼睛受伤,都是为了郑国,它仍然承认楚的霸权。公元前 571 年,晋、齐、卫、曹、邾、滕、薛等国,在卫地戚邑开会,共谋伐郑。于是,在卫地虎牢筑城,以威胁郑国,郑也只得向晋求和。

鄢陵之战的胜利,使晋国重获中原霸权,晋厉公之后的晋悼公进一步使复霸事业得到发展。而楚国则开始处于守势,加上晋国南联吴国,共同对付楚国,使楚的处境越来越困难。

三、晋楚三驾之役

晋国悼公继承景公霸业后,由栾书、韩厥、荀莹等主持修正景公时代的方针政策,以适应当前发展变化的形势,主要的措施:改变对中原诸侯政策,首先改变以霸主自居的高压政策,借诸侯间聘问、来往礼仪以增加感情,凡诸侯朝晋者,晋都以聘礼答拜;加强对吴联系,根据景公期间缔结的联吴政策,与吴保持密切关系,确保通吴之路,发挥对楚牵制作用;对齐采取以实力为后盾进行联系交往,以免发生反侧;对秦则阻遏于泾水以西,以免后顾之忧。实行以上战略孤立楚国,展开与楚对中原地区宋、郑两国的争夺战。

楚国从成王、庄王以来图霸逞强,一贯与晋国为争夺中原对诸侯的控制而战,采取控制郑、许、陈、蔡,进攻倾向于晋的宋国;西联秦国,以增大对晋国西部的威胁;争取齐、鲁,威胁

曹、卫，阻碍晋、吴两国的联络；遏制晋国于黄河以北，使中原地区成为楚国的势力范围。

郑国向蔡地进攻，俘获蔡公子燮。同年冬月，楚以援蔡为名，令君子囊率兵直捣郑国。郑在得到楚国进兵的消息后，与楚订盟，倒向楚方，于是楚军撤走。次年（前 564 年）十月，晋联合齐、鲁、卫、宋、曹、邾、滕、薛、杞、郕诸侯军伐郑，进入郑郊。郑以楚援不至，形势危急，乃向晋表示降服。晋将上军将领荀偃建议围郑以待楚救，而与之战，不然事必无成。统帅荀莹则不主张与楚军举行决战，认为：兵不可数动，数动则疲；诸侯不可屡勤，屡勤则怒。如允许与郑国结盟，并三分四军，以一军牵制楚之全军，我能常来，楚军则难以常往，这样比举行决战为好。战则死伤亡大，且达不到战略目的。于是晋军乃接受郑国请和订盟的请求，订立盟约。晋郑议和成功，晋为实行疲敌战略，需要强大的人力物力作基础，回军国内，魏绛提出减轻劳役，改革经济的建议，推行以后，国无滞积，亦无闲人，公无禁利，亦无贪民，殷实富强，有了“三分四军”疲劳楚军战略的经济基础。

周灵王九年四月一日，晋悼公与鲁、宋、曹、卫、莒、邾、滕、薛、杞、小邾及齐世子光、吴王寿梦，会盟于相。晋将荀偃、士匄向荀莹提出：楚联合郑、陈攻宋，楚伐宋必经东道，我兴兵伐逼阳，一鼓而下，赠封宋向戌，以巩固宋国东部。荀莹不同意进攻逼阳，他说：打下这样的小国，算不得什么威武，打不下，就要为各方所笑。偃、士匄继续坚持请求，荀莹仍然不同意。晋悼公随军出征，荀偃、士匄又直接向晋悼公建议，悼公同意。于是指示荀莹出兵，由第一军进攻逼阳城。逼阳为夷族小国，当时

附楚，国虽不大，国人都不甘愿屈服于晋的军事压力，鼓起勇气，对敌战斗。这是东周列国期间，小国敢于抵抗大国最生动的战例。

逼阳军民奋起战斗，晋、鲁、曹、邾⁴国军队虽展开围攻，但城坚难克。经过24天的攻守战，攻者已疲，原来认为逼阳小国，可一鼓而克的荀偃、士匄此时不得不以夏季久雨，水淹将至为由，向统帅荀莹提请“班师”。荀莹大怒，针对他们私向悼公请战之事，严厉申斥说：伐逼阳、封向戌两事，事成才告余。现在打不下来，又让我下令撤兵，悼公一旦追究打不下逼阳的责任，你们就会推在我下令撤兵的问题上，这样的罪名我受之不起。因此，荀莹命令荀偃、士匄说：七天之内，攻不克逼阳，必依军法从事。偃、士匄照例对部属宣布克城日期，不能克城，先斩大家，然后自刎，以申军法。强攻逼阳的战斗又开始了。五月四日荀偃、士匄亲冒矢石，鲁、曹等诸侯也参加战斗，经过5日激战，逼阳终于在孤军无援、苦战恶斗的情况下，无力继续抵抗，于八月沦陷。晋联合鲁、曹等国虽攻克逼阳，但不便派兵戍守，于是做顺水人情，把逼阳送给了宋国。

一驾之役

周灵王九年九月，晋悼公会鲁、宋、曹、卫、莒、邾、滕、薛、杞、小邾诸侯，及齐世子光军伐郑，会师牛首。此时郑国发生政变，公子子孔执政。晋悼公令诸侯军增筑虎牢城，留兵戍守。晋军则进占郑属梧、制两城，由士魴、魏绛担任守备，与虎牢成犄角之势，控制郑国。晋军在黄河南岸占据桥头阵地，形势所趋，楚令君子囊也率军北上，支援郑国。十一月，晋中军元帅荀莹

率上军及诸侯军到阳陵，楚军正在北进，晋军统帅荀莹认为尚不是与楚决战的时机，决定按照疲敌战略的作战方案，作战略退却。并说：“今我逃楚，楚必骄，骄则可与战矣。”上军将领栾郕反对敌前退却，他指出：“逃楚，晋之耻也，合诸侯以益耻，不如死，我将独进”。栾郕的行动，导致了晋军不得不全部前进。

己亥，晋军与楚军夹颍水列阵对峙。荀莹不能控制全军，以战略全局而服从和迁就栾郕的局部鲁莽行动，造成了全军的被动。这一情况为郑国大夫公孙迈所洞悉，认为晋没有与楚真正作战的决心，晋军必将撤退。晋退，楚必围郑，反正晋要撤退，不如从楚促使晋军北撤。于是郑派出代表渡颍水与楚订盟。晋将领十分愤慨，栾郕主张移兵攻郑。荀莹认为不可。因为晋军只能出动一少部分兵力，而且一旦攻郑，楚军一定相救，这样晋不但不能取胜，反而为诸侯所取笑，于是，晋和诸侯军侵扰郑国北郊后，退出郑境，楚军也收兵返回本国。晋军在一驾战役中虽开始有些被动，但尚能进退自如，保持着战场的主动权。

二驾之役

周灵王十年（前 562 年），多年来受南北交侵的郑国，深为介于晋、楚两霸之间而忧虑。在权衡各种关系后，饬边境守军向宋国挑衅，激怒宋军对郑进攻，郑军随之向宋反击。晋出动较大规模的兵力向郑进，荀莹率领的晋新军和齐、宋、卫军于四月十九日，到达郑国首邑附近。各军占据的位置：晋荀莹指挥的新军，进抵郑西郊；齐太子光和宋向戌军先行侵入郑境，推进到东门外地区；卫孙林父军推进到郑北郊地区。各国诸侯

相会于北林，兵力集中后，向南扰前许属各地，企图引诱楚军出动，而击破之。旋即右转回军到琐，进围郑首邑，并于南门外举行大检阅以示威，郑以楚没有来援而向晋屈服，并求和订盟。

楚军北来进入郑境，郑又反过来否定盟约，迎接楚军。楚军到郑，晋军已离开郑境，楚军又扑了空，长途跋涉往返无所收获，战略上被动，将士疲困不堪，国力随之大为损耗。

三驾之役

楚于第二次进军伐郑，也深知独力难以胜晋，乃遣使臣乞师于秦，秦国派遣右大夫詹率军助楚。楚令尹子囊军，于是年九月与秦会师，北上伐郑。按原来郑大夫公孙子展提出的：“迎接楚军，借楚拒秦，导楚伐宋，引晋前来。晋胜则降晋，楚胜则服楚”的策略，郑公决定请和于楚，又挑衅于宋，这样使大局迅速发生了变化。

晋联合各国诸侯军向郑推进。郑则一方面向楚求援，同时又向晋求和的两面政策。但往楚求援的使者被楚扣留，往晋请和大夫王子伯骕，向晋表达了求和的真诚愿望。因为在三驾进军中晋悼公禁止侵掠，宽释郑俘，以示仁德，郑深受感动，表示归服。九月晋派下军主将赵武为代表，与郑缔结联盟。郑子展代表郑简公到晋营地与晋悼公订盟立约，郑完全倒向晋方，荀莹三驾进军获得战略上的全部胜利。楚则以两度被动进军，疲于奔命，无力北进竞争。至此，楚之逐鹿中原的战略，因受到晋的遏制而暂时作罢。

晋、郑和平订盟成功，于十二月二日在郑地萧鱼举行大

会，除晋悼公、郑简公外、鲁侯、卫侯、曹伯、齐世子光和莒、邾、滕、杞、小邾等君主也亲临参加。由晋悼公为盟主的萧鱼大会，成为城濮战后践土之盟以来，以晋为盟主的又一次盛大的盟会。

第八节 晋楚 争霸的终结——弭兵大会

一、弭兵大会前的列国局势

晋、楚之间的争霸战争继续了几十年，到了公元前 6 世纪中叶就再也打不下去了；传统的观念和旧的统治秩序都在遭到破坏，各侯国内部的斗争在不断深入。

晋国栾氏和范氏的斗争中，范氏的势力大大增加，他也就自以为了不起。公元前 549 年（鲁襄公二十四年），鲁大夫穆叔去晋国聘问，范匄在接待他时问道：“古人说功业不朽是什么意思？”穆叔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又夸耀说：“过去我的祖先在虞舜时是陶唐氏，夏时是御龙氏，商时是豕韦氏，周代是唐杜氏，晋国称霸时是范氏，这能说得上是功绩不朽吧！”穆叔回答道：“这叫世代都有官职和土地，不能说有不朽的功德。鲁国有死去的大夫臧文仲，人死了，话却留传下来，这可以算不朽。我听说，不朽的标准最高的是对民众有恩德；其次是对民众有

功劳；再其次是他的言论能对后人有益。具备了这些条件才称得上有不朽的业绩。要是长期保有自己的族姓，又能另立宗族（另立门户），世世代代祭祀自己的祖先，每个侯国都有这种人，算不上什么不朽的功德。”范匄认为能保持贵族姓氏，有世卿世禄就是有不朽的业绩，反映了范氏力量的强大和骄横，也是他欲窥伺晋国政权野心的暴露。穆叔则认为对民众能“立德”、“立功”、“立言”的才是不配，这是两种对立的观念，范氏从宗法制出发，穆叔的看法却是反映了时代的潮流，对这种传统观念的否定。

历史发展到春秋中期，不仅晋国卿大夫之间大出打手，各国也内乱不断。

齐庄公即位前，还能带兵，有眼光，可是即位后，却成为一个淫乐无度的人。公元前548年（鲁襄公二十五年），庄公宠幸的大臣崔杼夺取死去棠公的妻子棠姜为妾，庄公又和棠姜淫乱。崔杼因此对庄公怨恨，再加上庄公乘晋内乱而伐晋，崔杼对庄公更加仇视，并说，晋会报复。想杀掉庄公向晋人请罪，但没有机会。庄公曾鞭打过侍者贾举，又继续使用他。贾举就替崔杼找这个机会。一次崔杼借口生病不理政事，庄公也假意去看他的病，而跟棠姜进入内室，崔杼从侧门出来，庄公敲着房门唱歌，用这种办法暗示棠姜。贾举就让庄公一人进去，并立即关上屋门把庄公侍从挡在门外。这时崔杼早已埋伏好的甲士一拥而上，拘捕了庄公，庄公登台请释放，不许；表示不再胡作非为，不许；请自杀于宗庙，也不许。庄公翻身越墙逃走，被射中摔下，接着被杀掉。

在这一内乱中，晏婴持中立态度，一方面认为杀君不对，

又认为国君为个人私事而死，不值得跟他殉葬，哪边也不去依附。随后，齐人立灵公生的儿子杵臼作君主，就是齐景公。

齐景公即位，实际大权却在崔杼手中。但是，对齐庄公的被杀，齐国史官太史记载道：“崔杼杀死他的君主”，在朝廷上宣布，崔杼将他杀掉。太史之弟接替了他哥哥的职务仍然写道：“崔杼杀死他的君主”，崔杼又杀了他。第二个兄弟接替职务后，还是这样记载，崔杼就不敢再杀了。南史听说太史兄弟被杀，就拿着简册去准备秉笔直书。后来听说已经如实记载下来，才作罢。这是中国古代史官不畏权势，秉笔直书的一个很好的范例。

这是弭兵大会召开前两年发生的事件。

崔杼原来的妻子生下崔成、崔强两个儿子就死了。崔杼再娶东郭姜生下崔明。崔杼废崔成，立崔明作继承人，崔成请求到崔邑养老，崔杼答应了。崔杼的家臣棠无咎（东郭姜原来的儿子）、东郭偃（东郭姜的弟弟）反对说，崔邑是宗庙所在地，一定要留在宗主（继承人）手里，崔成、崔强两弟兄很生气，要杀死他们，告诉庆封说：“我父亲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只听小儿子的话，其他人的话都不听，这对我父亲没有好处。”庆封说：“你们先回去，让我想个好办法。”后来，他把这一情况告诉自己的下属卢蒲癸。卢蒲癸说：“崔杼是君主的仇人，天意要灭亡他，崔家有内乱，对你有利无害。”崔成、崔强再次要求他们的支持。庆封答应其请求。崔成、崔强杀死东郭偃和棠无咎，崔杼生气出走，奴仆们都逃散，只好用养马的人驾车，奄人御车。他一边走一边自语道：“要是崔家有福气，祸事到我身上为止，不要再延下去。”就去见庆封。庆封说，崔、庆犹如一家，我替你

讨伐他们，命令卢蒲癸领着甲士进攻崔氏，崔氏使家丁据宫墙守卫，攻不下，就请国人一起去进攻，消灭了崔成、崔强。卢蒲癸回报崔杼，崔杼这才恍然悟到自己一家完了，他也上吊自杀。崔明躲在墓地里没有被害，后来逃往鲁国。从此庆封在齐国专权。

齐国崔氏内乱的事，发生在弭兵之会的当年。接着，又有齐国讨伐庆氏的事件。

庆封喜欢打猎和喝酒，政事由他的儿子庆舍处理。庆封并把自己的财物和家室迁到宠臣卢蒲癸家，在那里饮酒作乐，庆封在卢蒲癸家一住好几天，政务也在他家处理，卢蒲癸的家简直成了朝廷，史称“国迁朝焉”。庆封招纳崔杼排挤走的人回来，其中有个叫卢蒲癸的得到庆舍的喜欢，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后来，在卢蒲癸的推荐下，庄公同党王何也回来，卢蒲癸和王何成为庆舍亲近的卫士。这二人想为庄公报仇，故意破坏庆氏和大夫的关系，克扣大夫们的膳食，按规定大夫们是一天给两只鸡吃，让厨师们偷偷换上鸭肉，引起大夫子雅、子尾生气。卢蒲癸、王何认为进攻庆氏的时机已到，进行卜卦问是否会成功，并将得到的龟兆去问庆舍，他们说：“有人要攻打仇人，你看是吉，还是凶。”庆舍回答：“准成功，能得到仇人的血。”这二人胆量很大，气焰嚣张，竟敢作这种恶作剧。

在发难之前，庆封和陈桓子在莱地打猎。很会观察形势的陈文子知道要出事，就以自己妻子生病为名，把儿子召回来。庆封的族人庆嗣得知这消息，说，祸事要发生了，要庆封赶快回朝廷，庆封没有听他的建议。陈无宇回城时，一路上“戕舟发梁”，破坏了船和桥梁，以断绝对庆封的救援和归路。

由庆舍主祭祭祀太公庙之前，庆舍的女儿得知王何、卢蒲癸要作乱的消息，她是支持丈夫的；她知道自己的父亲庆舍刚愎愚蠢，故意要他不要去主祭，预料庆舍会不听从，果然庆舍还说：“谁敢胡作非为。”举行祭祀时，由王、卢二人任警卫，庆氏甲士守卫君主殿。陈氏、鲍氏的奴隶会表演戏剧性的动作，庆氏的士兵都把马拴好，边吃酒，边看戏。子尾抽房椽敲三次作暗号，卢蒲癸从身后刺庆舍，王何用戈砍掉庆舍的左肩，庆舍在重伤下，还抽房椽，将房屋都拉动，并拿起祭器打人，坚持了一阵才死。齐景公感到害怕，鲍国回到宫中。庆封回来，知道这一切，攻西门没有攻下；从北门攻入城；再攻内宫，没有成功，知事已失败，就出走到鲁国。不久，齐国派人申斥鲁国收留庆封，他只得逃到吴国，吴君赐给朱方（今江苏镇江市东）作为他的封邑。庆氏宗族聚集在一起，富裕程度超过在齐国的时候。后来庆封的封地被楚人夺去，庆封为楚人杀死。

这时，不仅晋、齐等国内部有斗争，一些小国也有统治者内部和劳动人民反抗统治者的斗争。

公元前 550 年（鲁襄公二十三年），陈哀公朝楚，陈公子黄向楚国告庆寅、庆虎的状，楚人要他们到楚对质，二庆派庆乐去，楚人杀死他。庆氏兄弟反叛楚国，楚大夫屈建和陈侯一起包围陈国都。陈人加固城墙，筑城的夹板脱落，监督筑城的人竟以杀人来惩罚。这激起“役人”的反抗，他们秘密联络起来，分别杀死监督他们劳动的工头。庆寅、庆虎也被“役人”杀死了。这是陈国发生的一次劳动人民的暴动。这表明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利的时候劳动者与剥削者之间阶级矛盾更尖锐化了。

公元前 547 年(鲁襄公二十六年),宋国发生了宋平公杀死太子痤的事情。

以前,宋大夫芮司徒的妻子生个女婴,身上汗毛是红的,被认为是一种不吉祥的事,将她丢在河边,宋共公的妾把她收养起来,取名叫弃,成年后却长得很漂亮,宋平公(共公子)取来做妾,生公子佐,相貌很凶恶,而心地却很善良。原立的太子痤长得很美,而内心很丑恶,左师向戌很讨厌他,而宦官伊戾作太子宫内官得不到信任,也对太子不满。楚国使臣出使到晋,路过宋国,太子向宋君请求设野宴招待他,伊戾也向平公要求赴宴。宋平公说:“太子不是讨厌你吗?”他回答说:“我这个人侍候贵人,不管他对我如何?我都一心一意地对待他。”平公就同意他去了。伊戾就假造太子反叛的证据,去报告宋君,说:“太子勾结楚国,与楚国订下盟约,图谋不轨。”平公说,“已经当了太子,还要干什么?”伊戾回答说:“要快点掌握政权。”平公派人去调查,果真是那样。就把太子痤囚禁起来,太子说:“只有兄弟公子佐替我说话,才能解救我。”就派人告诉公子佐,说:“到中午你要不来,我就死了。”向戌得知此事,故意找些话同公子佐闲聊,时间一过太子痤就自己吊死。平公知道太子死得无罪,就把伊戾扔进锅里煮死。这场内争才算结束。

就在宋平公杀死太子的这一年,卫国献公因复国而进行了一番砍杀。

公元前 559 年(鲁襄公十四年),卫献公因与大夫孙氏、宁氏有矛盾而逃离卫国 12 年。后来在大夫宁喜的支持下,杀死卫侯剽及太子角得到复国。第二年,他又杀死执政大夫宁喜。卫国的这一次内乱,前后经过 10 多年,君主和大夫共死了好

几人，卫国的力量也更加衰弱了。

所有这些，反映出自春秋中叶以来，中原各国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已经愈演愈烈，奴隶制度崩溃之势已成。在这样的局面下，中原各国统治者自然无力进行国与国之间的斗争。而楚国当时，穷于应付东边吴国的挑战，也无力和北方的晋国争霸。这种国内、国际形势，促成了召开弭兵之会的实现。

二、弭兵大会

公元前 546 年 7 月的一天，宋国西城外旌旗林立，战车壁垒，晋、楚、齐、鲁、陈、卫、邾、滕、曹、许、宋、蔡、秦等 14 个诸侯国代表在此举行弭兵大会并缔结盟约仪式。盟坛左侧是晋及其属国的队伍，右侧是楚及其属国的队伍。宋国左师官向戌是大会的倡导者与主持人，晋国执政的正卿、晋平公的全权代表赵武和楚国执政的令尹、楚康王的全权代表屈建两人是大会的主宰。

“楚人气氛凶险，恐怕要动武。”晋大夫伯夙提醒赵武说。

“没关系，宋国的西门就在左侧，楚人如动武，我们可立即退入宋城。”赵武不动声色地说，但内心却稍有不妥。

楚人在屈建的指使下，裹着盔甲，暗藏短器，满脸杀气地虎视会场。楚国太宰伯州犁急冲冲地赶来拦住屈建说：“令尹大人，弭兵大会时咱披盔带甲，会失信于诸侯的。”

“信义？！”屈建哼了一声，冷冷地说：“晋楚争霸，从无一信义，唯利是图而已。只要争得盟主，信义顶个屁用！”

“楚人真动武怎么办？”看着气势汹汹的楚人，赵武不禁转身轻声跟大夫叔向商议。

“没关系，”叔向若无其事地说：“不讲信义的人必死！以弭兵为名召集诸侯而在盟会上动武，这只能反害楚国自己。”

盟会仪式开始了，晋楚争先登坛歃血主盟。

“晋从来就是盟主，理应我们先登坛！”赵武认真地说。

“不是你自己说晋楚地位相等吗？”屈建反唇相讥：“如一直晋人在先，还有什么相等可言？！况且 80 多年来，晋楚交替为诸侯盟主，怎么说从来是你们为盟主？”

赵武正要反驳，叔向扯了扯赵武，悄声说：“诸侯归晋在德不在先。弭兵使天下大利，难道要为争先而失信于诸侯吗？况且从来就有小国主盟的，楚弱于晋，让他们去嘛。”

这样，赵武就让楚国先歃血，¹⁴ 国正式订立了弭兵盟约。盟约规定：与盟各国彼此不得诉诸武力，违者盟国共讨之。晋的属国鲁、卫、宋、郑等，楚的属国蔡、陈、许等须同时向晋楚两国贡献财礼，齐、秦两国是大国，不在其列，邾、滕分别是齐、宋的属国，也不在列。

弭兵大会宣告了晋楚两强平分霸权，晋楚争霸战争从此基本结束。

晋楚争霸长达 80 余年，被卷进的争战国家多达数十个，大大小小战争数以百计，其中几多恩怨，为什么经一个中等国左师官的倡导竟一旦达成和议呢？大会前晋强于楚，为什么晋国不但同意平分霸权，甚至还对楚国避让三分呢？

弭兵的原因有四。其一是弭兵为当时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共同要求。

向戌倡导弭兵，首先征求当时实力最强的晋国的意见，赵武与诸大夫商议时，地位仅次于赵武的韩宣子说：“战争，是人民的残害者，国家财政的蛀虫，小国的大灾难。虽然完全停止战争是不可能的，但也必须同意向戌的倡议，否则小国必然倒向楚国，我们将丧失霸主的地位。”韩宣子的分析可说是入木三分，当时中小国家早已吃尽战争的苦头，出现“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的状况。尤其是地处晋楚之间，被两者视为必争之地的郑国，服楚则晋讨之，服晋则楚讨之，战祸不息，有时郑君还要光着膀子，牵着羊去迎接讨伐者，屈辱至极，所以弭兵对于诸如郑国这样的中小国家，是求之不得的。

其二是晋楚两大国谁也不能臣服谁。

晋楚争霸 80 多年，双方交替为盟主，公元前 632 年城濮之战晋胜而占上风；公元前 597 年邲之战楚胜反占上风；公元前 575 年鄢陵之战晋胜又占上风，直至弭兵大会前。因此楚认为难与晋争霸；晋也认为自己“不能御楚，又不能庇郑。”既然晋、楚双方谁也不能彻底战胜对手，那么停战平分霸权是唯一理智的出路。

其三是晋楚两国为应付内乱，迫切需要一个相对缓和的外部环境。

晋国卿大夫擅权，自鄢陵之战以来内乱不已。公元前 574 年晋厉公重用宠臣胥童等，利用卿士栾书，族灭了威逼公室、擅杀大夫伯宗的郤氏。接着胥童又拘留了栾书与中行偃，但厉公不忍“一朝而尸三卿”。第二年栾书、中行偃杀厉公。晋悼公即位，对外虽能九合诸侯，但对内不敢讨伐杀君者，只是采

取平衡政策，重用魏、范、赵、韩等卿族，以牵制横行的栾氏与中行氏。晋平公即位，先用范宣子为正卿，范宣子利用赵、韩、中行氏与栾氏的新旧矛盾，于公元前 550 年灭大族栾氏，但范氏与中行氏又相勾结横行于晋国。范宣子死后，晋平公在公元前 548 年起用赵武为正卿，以牵制范氏、中行氏。弭兵大会前晋内政如此混乱，也无心对外了。

楚国康王软弱，兄弟横行。当年楚共王立太子似儿戏，他派巴姬在宗庙里埋一玉璧，让五子进宗庙拜祖先，康王正踏着玉璧，因此立了康王。对此，有野心有才干的公子围很不服气，发誓要夺取王位。所以屈建早就预言“楚必多乱”，为延缓内部危机的爆发，康王与屈建也急需弭兵，以与晋国平分霸主地位为满足。

其四是赵武为复兴赵氏宗族，在弭兵问题上起了重要作用。

弭兵的关键是晋楚两强，然而弭兵前的形势是晋强楚弱，因此晋国对弭兵的态度是关键，向戌首先征求晋国的意见，也正因为此。晋国正卿执政，因此赵武实是弭兵问题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赵武推行弭兵在晋国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大夫祁午曾当众指责他使晋国的霸权与自己的成功毁于一旦。难道赵武真这样乐于牺牲自己，成全别人吗？不！赵武所以要弭兵，除了他看到了弭兵是大势所趋外，更主要的是他要结好诸侯，以便集中精力于内政，使几乎族灭的赵氏宗族复兴。晋平公对此就说赵武结党营私。吴国延陵季子也断言晋之政将归赵、魏、韩三家。果然，赵武、韩宣子、魏献子相继任晋国正卿。弭兵大会

后不到百年,赵、魏、韩便三家分晋了。

弭兵大会标志着春秋历史进入了尾声。

春秋时期的战争,可以春秋中期为界区分为前后不同的两种特色。西周时期所确立的古典礼乐文明,表现在军事领域中,就是以一整套“军礼”来指导、制约具体的军事活动。在春秋前中期,旧“军礼”尽管已开始受到冲击,但其基本精神却依然为大多数人所尊奉和向往。这种“军礼”的内容之一,就是讲求战争“以仁为本,以礼为固”。它具体表现为:战争宗旨“征伐以讨其不义”,军事行动“不加丧,不因凶”,战场交锋“成列而鼓”,战争善后“服而舍之”等等。所以考察春秋中期以前的战争历史,可以见到当时的战争除了铁血厮杀这残酷一面以外,还存在着比较多的以迫使敌方屈服为基本宗旨、军事威慑多于会战的温和一面。换句话说,以军事威慑和政治谋略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而屈服,乃是当时相当普遍存在的战争现象,真正以主力进行会战决定胜负的战争为数比较有限。所谓的“霸主”,一方面兼并小国,另一方面在同其他大、中型国家发生战争时,则多以双方妥协或使敌方屈服为结局;而彻底消灭对方武装力量,摧毁对方政权的现象比较罕见。于是会盟、“行成”与“平”乃成为当时军事活动中的重要手段。这和战国以后那种“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战争现象,是有所区别的。

春秋中期之后,随着社会变革的日趋剧烈,战争也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当时的战争指导者,比较彻底地抛弃了旧“军礼”的束缚,使战争艺术呈现出夺目的光彩。这集中表现为战争规模的扩大、战争方式的变化和作战指导的进步。

在春秋前期，各诸侯国军队数量总的来说还不是很多。《左传·襄公十四年》说：“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周为六军，诸侯之大者，三军可也。”管仲辅佐齐桓公治齐，士乡 15，共 3 军，为 3 万人。晋文公在城濮之战前夕作 3 军，也不过 3 万多人。到了春秋晚期，这种情况有了重大的改变，从而导致战争规模的扩大。当时，随着郡县制的初步推行，各国的兵力得到了较大的增加。例如晋国在鲁昭公十三年（公元前 529 年）治兵邾南时，拥有甲车 4000 余乘，这比城濮之战时动用 700 乘兵力，增加了六七倍之多；又如楚国在灵王在位时，光是陈、蔡、东西不羹四个大县，赋皆千乘，具有 4000 乘，再加上申、息等县和其他地方的军队，兵力当有近万乘，兵员有数十万人。

战争的方式从春秋晚期起也有了大的变化。春秋中叶以前，军事行动中投入的兵力一般不多，范围较为狭小，战争的胜利主要靠战车的会战来取得，在较短的时间之内即可决定战争的胜负归属。春秋晚期后，激烈的野战开始盛行，战争带有持久长期的性质，进攻方式上也比较带有运动性了。而与上述变化相适应，春秋晚期起战争的残酷性也达到了新的程度。《墨子·非攻下》说：“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堙其沟池，攘夺其牲牛，燔溃其祖庙，剽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就是很形象的描述。

但春秋晚期战争上最大的新特色，还在于当时作战指导的重大变革。这就是“诡诈”战法原则在军事活动领域内的普遍流行，过去那种“结日定地”、“鸣鼓而战”、“堂堂之阵”战法遭到全面的否定。用汉代史学家班固的话来说，便是“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书·艺文志·兵书

略序》)。

当然,以诡诈奇谲为特色的作战指导现象,在春秋前期的一些战例中即已露出端倪。例如郑、卫制北之战中,郑军正合奇胜打败燕师,既是迂回作战的起始,也是兵分奇正而用的先例。又如周、郑 繻葛之战,郑庄公善察敌情,集中优势兵力攻敌虚弱之处,赢得作战胜利。再如晋借道灭虢吞虞之战,晋以“借道”为名,行攻伐之实,一石二鸟,兼并对手,无不充满了作战指导上的诡诈特色。但是,从总体来看,它们在当时战争活动中并不占据主流。

到了春秋晚期,欺敌误敌、示形机变、避实击虚的诡诈作战指导这才进入了全面成熟的阶段。而当时南方地区的楚、吴、越等国,由于远离中原腹心地区,较少受旧“军礼”传统的熏陶和影响,因此在这方面起到了带头的作用。

公元前 546 年,宋国大夫向戌倡导诸侯列国弭兵会盟之后,中原地区出现了相对和平的局面。当时,晋、楚、齐、秦四大强国,都因国势趋于衰弱,国内矛盾激化,而被迫放慢了对外扩张争霸兼并活动的步伐。与此同时,偏处于东南部的吴国和越国则先后兴盛起来,开始加入了大国争霸的行列。由此,战争的重心也从黄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淮河流域,从中原诸侯国转移到了楚、吴、越诸国。吴、楚数十年争霸战争正是这种战略新格局背景下的产物。

第九节 吴楚争霸

一、太伯开吴

春秋末期，长江下游曾出现一个显赫一时的诸侯国。它就是多次北上争霸的吴国。关于吴国的开创者，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得很明白。司马迁认为，地处南方的长江下游的吴，是所有诸侯国中资历最深的西周姬姓同姓国。所以在《史记》中，吴太伯被列为世家第一。

太伯和他的弟弟仲雍，都是周太王的儿子，季历的兄长。他俩为了成全父亲想传位于季历的意愿，出奔到南方荆蛮，文身断发，不再回去。季历后来被立为继承人，他的儿子昌就是有名的周文王。

太伯死后，其弟仲雍继位，仲雍死后，其子简立，季简死后，子叔达立，叔达死后，子周章立。这正好是武王时代，武王建周以后，寻找太伯、仲雍的后代，知道周章已当了吴国的君主，就封吴国为诸侯，周章的弟弟虞仲到周都北面的夏墟，建立虞国，又封诸侯。从此以后吴国广泛接受中原文化，经济和文化都迅速发展起来。到了春秋中期，吴国实际上已经成为政治、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的大国了。

太伯、仲雍的后代一封于吴，一封于虞。

二、吴楚鸡父之战

吴国王室虽是“华夏”之裔，而其民则为“蛮夷”，其欲则是“文身断发”。因僻处东南，与中原往来较少，故吴国的文化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直到吴太伯第十九世孙吴王寿梦时，情况才起了变化。

吴王寿梦（前 586 年——前 561 年在位）起，时晋国出于同楚国争霸斗争的需要，采纳楚亡臣申公巫的“联吴制楚”的建议，主动与吴国通好，又派巫臣到吴，把中原的乘车、射御、战阵传授给吴人；缔结战略同盟，让吴国从侧后打击楚国，以牵制楚国势力的北上。而日渐强大起来的吴国，为了进入中原，也将楚国作为第一个战略打击的目标，正需要寻找大国作自己的后台，现在晋国主动找上门来，自己何乐而不为，于是就欣然接受晋国的拉拢，坚决摆脱了对楚的臣属关系。并积极动用武力，和楚国争夺淮河流域，逐渐成为楚国的强劲对手和心腹之患。自寿梦起，历经诸樊、余祭、夷末诸王，直至吴王僚，前后约 60 余年间，吴、楚两国彼此攻战不已，互有胜负，但总的趋势是楚国日遭削弱，吴国兵锋咄咄逼人，渐占上风。鸡父之战就是双方长年争战中的重要一战。

公元前 519 年，吴王僚率公子光等，兴兵大举进攻楚国控制下的淮河流域战略要地州来（今安徽凤台）。楚平王闻讯后，当即下令司马薳越领兵应战，统率楚、顿（今河南商城南）、胡（今安徽阜阳西北）、沈（今河南沈邱）、蔡（今河南新蔡）、陈（今河南睢阳）、许（今河南叶县一带）七国联军前往救援州来。为

了协调、加强对军队的指挥，楚平王还委派令尹子瑕带病督师。吴军最高统帅部见楚联军力量强盛，来势凶猛，便迅速撤去对州来的包围，将部队移驻于钟离地区（今安徽凤阳东临淮关），暂避敌锋，伺机行动。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进军途中的楚军发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变故，这就是抱病出征的楚令尹子瑕由于病情加重，死于军中。楚军未战而先失去督师，士气明显受到影响。司马蕞越见众将士情绪沮丧低落，被迫回师鸡父。准备稍事休整之后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吴公子光听说楚军督师子瑕病歿军中，楚联军不战而退，认定这正是吴军把握战机，击破敌人的良机，便向吴王僚建议率军尾随对手，捕捉机会。他具体分析了联军的情况，指出其存在的种种弱点：“随从楚国出征的诸侯虽多，但均是一些小国，而且都系为楚国所胁迫而来。况且这些小国也有各自的弱点。具体地讲，胡、沈两国国君年幼无知，骄狂自大，陈国部队统帅大夫强硬但却固执，顿、许、蔡等国则一直痛恨憎恶楚国的压迫，它们和楚国之间不是一条心，这一点完全可以乘机加以利用。至于楚军内部，情况也是非常糟糕。督师病死，主将司马蕞越资历低浅，不能实行集中指挥，楚军士气低落，政令不一，貌似强大，实则虚弱。”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七国联军同役而不同心，兵力虽多，但也可以击败”。

公子光的分析入情合理，吴王僚欣然予以采纳。并针对敌情作出具体周密的作战计划：迅速进兵，向楚联军逼近，定于在到达鸡父战场后的次日即发起攻击，利用当天“晦日”的特殊天气条件，乘敌不备，以奇袭取胜。在兵力的部署上，拟先以

一部兵力攻击胡、沈、陈的军队，战而胜之；然后打乱其他诸侯仆从国的部队，再集中兵力攻击楚军本身。并决定在作战中采取先示敌以“去备薄威”，后以“敦阵整族猛攻之”的灵活战法。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吴军便于古代用兵所忌的晦日七月二十九日突然出现在鸡父战场。此举完全出乎楚军主将司马薳越的意料，仓猝之中，他让胡、沈、陈、顿、蔡、许六国军队列为前阵，以掩护楚军。吴军方面吴王僚以自己所率领的中军，公子光所统领的右军，掩余所统领的左军等主力预作埋伏，而以缺乏训练、不习战阵的3000名囚徒为诱兵攻打胡、沈、陈诸军。双方接战不久，没有专门军事技能的吴刑徒乌合之众随即散乱退却。胡、沈、陈军见状，以为胜利在望，遂贸然追击，捕捉战俘，纷纷进入了吴军主力的预定伏击圈中。这时，吴王僚等人当机立断，指挥左、中、右三军从三面突然出击，杀得敌人丢盔弃甲，尸横遍野，很快战胜了胡、沈、陈三国军队，并俘杀了胡、沈国君和陈国大夫。然后又放纵所俘的三国士卒逃回本阵。这些士卒侥幸逃得性命，便纷纷撒腿狂奔，口中还叫嚷不已：“我们的国君死了，我们的大夫死了！”许、蔡、顿三国军队见状，顿时军心动摇，阵势不稳。这时候吴三军遂乘胜高擂战鼓，呐喊冲杀向前，直扑三国之师。三国之师的阵势本来已经动摇，又见吴军饿虎扑食似的蜂涌而来，早吓得心惊肉跳，双腿发软，哪里还有同吴军较量的勇气，于是纷纷不战而溃，乱成一团。楚军未及列阵，即被许、蔡、顿等诸侯军的溃退所扰乱，已无回天之力，也迅速陷于失败。至此，吴军终于大获全胜，并乘胜攻占了战略要地州来。

鸡父之战是吴、楚之间为争夺对淮河流域控制权的一场

重要会战。它的结果对于楚国来讲，是一次相当沉重的打击。战后不久，楚司马薳越因楚夫人出走事件而畏罪自杀，庸碌无能的囊瓦担任了令尹这一要职。从此以后，楚军很少主动出击吴军，而基本上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方针，在吴、楚争霸战争格局中更加趋于被动了。

三、伍子胥佐吴

楚平王荒淫无道，听信奸臣费无忌谗言，要废掉太子建，太傅伍奢不服，被投入监狱。楚平王一面遣人追杀太子建，一面强逼伍奢写信召回在外的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子胥，企图一网打尽。老实憨厚的兄长伍尚，明知此去凶多吉少，仍然应召前往，结果与父亲一起做了楚平王刀下之鬼。伍子胥却深知平王为人狠毒，不甘就此屈死，于是孤身逃至宋国，投奔正在那儿流亡的太子建。不料其时宋国正发生内乱，他只好与太子建及其子公子胜辗转流落到郑国。郑国的国君郑定公倒待他们不错，谁知太子建经不住别人利诱，竟丧失理智，暗中勾结晋国，企图灭郑而占其国。事泄，郑定公大怒，立即杀了太子建。可怜伍子胥只得又带着公子胜继续逃亡。太子建一死，伍子胥经过再三考虑，最后决定投奔吴国。这个地处东南一隅的国家正日渐强盛，并且与楚国不和，或许能借兵给他复仇。

伍子胥和公子胜历尽艰险，终于来到吴国。由于伍子胥勇武绝人，素著威名，吴国君臣对他的到来都很高兴，待之以上宾之礼。伍子胥便趁机向吴王僚建议攻楚，但未被接受。不久，他通过上下接触，敏锐地察觉到吴国统治集团内正酝酿着一

场权力斗争。原来吴国相传为西周文王的伯父太伯所创立，太伯为了使周强大起来，自愿把王位让弟弟季历，以便传给文王，所以吴国素重礼让之风。到了寿梦为国君的一代，吴国渐渐强盛，开始称王。寿梦有四子，即诸樊、馀祭、馀目和季札，其中以季札最贤能。寿梦死后，长子诸樊知道父亲生前欲立季札为王，便主动让位于季札，季札坚辞。不久，诸樊死，遗命王位兄弟相传，以便让季札有机会当吴王。老二馀祭和老三馀目相继死后，应由季札继位，谁知季札却躲了起来，于是馀目的儿子僚便立为吴王。僚的登位，使诸樊之子公子光十分不满，他认为父亲所以传位于弟，目的是让季札治国，如今既然季札不愿，就应由他来继承王位。因此一心想除掉吴王而自立。伍子胥仔细分析了形势，认为公子光能礼贤下士和敢作敢为，决定先等他夺得王位，然后再图借兵复仇，因而把勇士专诸推荐给公子光，自己则退居乡间，物色人才，等待时机。

机会终于来了。公元前515年，吴国趁着上年冬楚平王死后楚国政局动荡之际出兵攻楚，不想吴兵反被楚军绝了退路，围困起来。抓住这个吴国内部兵力空虚之机，伍子胥和公子光决定以宴请为名谋刺吴王僚。

吴王僚接到公子光的宴会邀请，虽然有所顾忌，仍然身披重甲，带着一队全副武装的卫士前来赴宴。宴会上，当专诸假扮厨师把一大盘热气腾腾的炙鱼端到吴王僚面前时，猛然从鱼腹中抽出锋利无比的“鱼肠剑”，扎入吴王僚胸口，吴王僚当场死去，两旁卫士见情一拥而上，将专诸乱刀砍死，这时公子光带着预先埋伏的甲士冲出来，高叫：“吴王僚已死，公子光当立，从命者不杀！”众卫士见大势已去，纷纷瓦解。公子光由是

自立为王，这就是吴王阖闾。

吴王阖闾继位后，任命伍子胥为行人，掌管朝覲聘问，参与谋划国家大事。在伍子胥的主持下，吴国修筑了阖闾城（今苏州），并整军经武，延揽人才，招来军事家孙武训练士卒，国势日强。

四、吴楚柏举之战

公元前 512 年，吴国出兵灭徐国，并移师攻楚，打下了舒（在今安徽庐江东南），擒杀了叛吴投楚的公子烛庸和盖馀。但楚毕竟是个地方千里的大国，不易一下子击败。为了削弱楚的力量，伍子胥提出分兵扰楚的计谋，组织了几支军队轮流攻楚，楚军一来，吴兵就主动后撤，楚军离去，便派另一支军队攻楚，弄得楚军疲于奔命。吴国的行动使楚国十分恼火，公元前 508 年，楚昭王命令尹囊瓦率军攻吴，吴国方面派伍子胥率军迎击，大破楚军于豫章（今淮南地区），并乘胜追击，攻取了巢。这时，楚国的政治越来越坏，国君昏庸，大臣贪鄙，百姓怨恨，连原先依附于楚的一些小国，也纷纷离心。

周敬王十四年（前 506 年）晋定公以周室名义，会诸侯于召陵，谋攻楚。沈国人因为亲附于楚国，因而未去参加召陵之盟。于是，晋国就让蔡国攻打沈国。这年夏天，蔡灭沈。秋天，楚国又派兵包围了蔡国。吴国的大将伍子胥与太宰伯嚭商量乘机伐楚，他们让齐国的孙武为将，伍子胥为副将，讨伐楚国。蔡昭侯将自己和大夫的儿子去吴国作人质，以表示与吴联合伐楚的决心。冬天，吴王阖闾、蔡昭侯与唐成公联合出兵，攻打

楚国。

吴军把船停泊在淮水沿岸的凹曲处，从豫章和楚军隔着一道汉水对峙。楚国的左司马沈尹戌主张，由令尹子常率兵沿汉水与吴军周旋，自己带领一部分人马绕道先毁掉吴军的船只，回军堵塞汉水东边险隘的关口，然后子常可渡过汉水正面交战，自己从后面夹击。子常却想独占功劳，听信大夫史皇的话，立即渡过汉水。

十一月十八日，两军在柏举（今湖北麻城县）摆开阵势。阖闾的兄弟夫概王认为，子常不仁，他的臣下没有死战的决心，主张派兵先向子常的亲兵发起进攻，然后以吴军主力猛击，定能取胜。阖闾不同意。夫概王认为人臣见义便行动，不必待命，拼死一战，定要攻入郢都。于是就带领自己所属的 5000 兵士发起进攻，果然楚军大败，子常奔郑，史皇战死。吴军乘胜追击，到达清发河（今湖北安陆县）。阖闾准备进攻，夫概王认为：困兽犹斗，何况人！不如等楚军渡河时再发起攻击。阖闾听从了夫概王的主张，再次击败楚军，并在雍澨（今湖北京山县）又一次击败正在开饭的楚军。吴军屡战屡胜，经过 5 次战斗，长驱直入，到达楚都郢都。楚庄王仓惶逃入云梦泽，惊喘未定，又遭到楚国起义百姓的袭击，只得又逃到随国，差一点被吴军逮住。

吴军占领郢都后，伍子胥想起楚平王生前种种暴虐，十分愤恨，便刨了他的坟，还把平王的尸首狠狠地打了 300 鞭。

当年伍子胥逃吴时，与申包胥很友好，曾表示一定要报仇雪恨，颠覆楚国。申包胥表示，你能颠覆楚国，我就一定能复兴它。等到昭王逃亡在随国时，申包胥就到秦国请求救兵。秦哀

公表示要商议,请他先在宾馆住下。申包胥回答说:我们的国君在远方躲难,尚无得到安身之处,下臣哪敢贪图安逸?于是就靠在秦庭门外哀哭,7天7夜勺水不入口。秦哀公为之所动,于是发兵车500乘救楚。

周敬王十五年(前505年)夏,申包胥带着秦军赶到,在稷地(今河南桐柏县南)与吴军相会,在沂地(今河南正阳县境)大败夫概王,楚平王的庶长子子西,也在军祥(今湖北随县西南)打败吴军。七月,楚子期,秦子蒲联合灭唐。九月,夫概王回国,自立为王,但被阖闾打败,逃奔到楚国,楚封其为堂谿谷氏。

吴军在雍澨再败楚军,秦军赶到又打败吴军,吴军驻扎在楚国的麇地(今湖北京山县境)。子期打算用火攻击吴军,子西不同意。子期后来还是采用了火攻办法,随即又发起攻击,吴军败退。在公土胥之谿谷(今湖北与陕西交界地带),秦楚联军又大败吴军。

吴楚柏举之战历时10多个月。吴军出动3万。楚军投入12万的兵力,这在春秋史上是罕见的。它包括一系列的战役,几个局部战场同时战斗。这次战争,使楚国国都破损,国君逃亡,元气大伤。不久,楚国便向北迁都至郢(今湖北宜城县东南)。吴军虽然最后赶回吴国,但损失较小,回师次年(即周敬王十六年,前504年)吴太子终累又以舟师大败楚军,俘虏了楚国的2个水军将领和7名大夫,同时,又在繁扬(今河南新蔡)打败了子期所率领的楚国陆军,此后,吴国一时称霸于江淮地带了。

第十节 越王勾践的霸业

一、吴越争霸的序幕

曾经杀得天昏地暗、不可开交的吴楚争霸战争，在经过公元前 506 年的柏举之战，楚国遭受惨重的失败后，已基本降下了帷幕。从此，楚国不得不立足于固守自保，在南方争战中甘居配角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吴越之间的战争便成为春秋战争舞台上的压轴戏，而笠泽之战又是这出压轴戏中的高潮。

越国立国于今浙江一带，其统治中心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市）。春秋中晚期它迅速崛起，据《国语·越语》记载，在允常和勾践统治期间，越国的实力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其疆域纵横百里，成为南方地区仅次于楚、吴的大国。随着国势的逐渐强盛，允常和勾践也想学着中原诸国的榜样，循序渐进争霸中原。然而，越国的北方是比它强大得多的吴国，越国要北上，首先要逾越吴国这道障碍，这就势必导致两国政治、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出现“争三江五湖之利”的局面。这就是吴、越争霸战争发生的内在根源。

至于晋楚争霸，争取战略外线的影响，则是导致吴越战争的外在因素。在中原大国争霸斗争中，晋、楚两国势均力敌，形成对峙局面。两国都难以独立打开僵局，于是各自寻求与国，

以利霸业的发展。晋国采取联吴的战略，拉拢吴国从侧后骚扰进攻楚国，置楚国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地位，严重扼抑了楚北上争霸的势头。楚国为了摆脱这种被动的战略态势，遂利用越与吴争夺江湖河泽之利、各自拓展疆域的矛盾，也积极争取和扶植越国从侧后威胁吴国，以减轻吴国对楚自身的压力。越国为了抗衡吴国，正迫切需要有楚这样的大国的支持，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出于各自的利益而联合起来，构成相对稳定的战略同盟。这样，吴越争霸战争就因复杂背景因素的介入，而渐渐激烈起来，到柏举之战后，更发展成为主宰当时天下战略格局的全面战争。

吴越之间的争战最早始于公元前 547 年，但真正全面铺开是在公元前 496 年的携李之战，它一直持续到公元前 473 年越灭吴为止，历时共 24 年。其中一波三折，颇富有戏剧色彩。

二、携李之战

公元前 496 年，吴越两国在携李（今浙江嘉兴西南）发生了一场大战。

吴国的军队由吴王阖闾亲自统帅，他们久经沙场，屡挫强敌，军容壮盛。相形之下，越国的军队虽也挺精神，却总不免势单力薄点。阖闾看着两军阵势，暗自得意，心想，以吴兵之强，加之越国国君刚死，勾践新立，人心未安，此战必可一鼓成功，败越在此一举。

正当他要下令进攻时，越军阵前忽然走出一排士兵，手执

利刃，边走边齐声高呼道：“越国不幸，得罪于吴，致使两国兵戎相见。我们愿以死向吴王谢罪！”说罢，一齐举刀自刎。一排刚倒，越军中又接连走出第二、第三排士兵，以同样的方式，齐齐呼喊自刎而死。一刹时，刀光闪处，鲜血四溅，呼声动地！

吴军虽然能征惯战，却从未见过这等惨忍奇特的场面，一时都看得呆了。正在惊疑之际，冷不防越军战鼓齐擂，杀声大作，向吴军猛地掩杀过来。吴军不备，被越兵冲乱阵脚，纷纷败退。惶乱中，吴王阖闾也被越国的大夫灵姑浮击伤。

三、卧薪尝胆

阖闾兵败后，羞愤交集，很快便因伤势过重而亡。临死时，还恨恨不已地对儿子夫差说：“千万别忘了向越国报仇！”

夫差即吴王位后，日夜操演兵马，筹划攻越之事。为了自勉，还命一人每日上朝和下朝时在宫门边提醒他：“夫差！你忘了越国杀父之仇吗？”他随即应道：“不，不敢忘！”

过了两年，越王勾践听说吴国在伍子胥等人治理下日益强大，心下十分着急。他知道夫差早晚必兴兵来报仇，便想先发制人，不顾大夫范蠡的劝阻，率兵去攻打吴国。吴王夫差闻讯，立即出动大军迎击。夫椒（在今太湖一带）一战，勾践大败，仅带着 5000 残兵退守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吴军乘胜追击，直逼会稽，将其围困起来。

这时勾践才后悔不听范蠡的话而轻动干戈，羞愧地对范蠡说：“我因不听你的忠告，才落到今天的地步，现在该怎么办！”范蠡说：“眼下之计，只有卑辞厚礼，向吴王请和，再徐图

恢复。”勾践便派大夫文种到吴王营里去求和。

文种见了吴王夫差，向他说明勾践愿意投降之意，并说了不少恭维话。夫差心中十分得意，便欲许和，但遭到大臣伍子胥的坚决反对。

文种回去把求和不成的情况一说，勾践大为绝望，咬着牙说：“罢了罢了！和既无望，反正是一死，不如带领人马和他们拼命一战，倒也痛快。”

范蠡和文种都不赞成这样做，认为这时以区区 5000 残兵去敌强大的吴军，不啻以卵击石，自取灭亡。文种献计道：“据我了解，吴国的太宰伯嚭是个贪财好色之徒，与伍子胥也有矛盾，不如以利诱之，使他为我所用。”文种带着一批财宝和美女，私下送给伯嚭。伯嚭得了好处，果然眉开眼笑，答应帮忙。

于是文种再次去见吴王夫差，说：“愿大王接受越国投降，免了勾践死罪，此后越国的一切土地、珍宝、人民均将归属于吴，听凭大王的吩咐。若是大王一定不答应的话，我们无路可走，怕只有焚毁珍宝财物和城廓房屋，背城一战，以战求死了。只是这样对吴国也没有好处。”夫差本来就想同意，又听他讲得有理，再加伯嚭在旁帮文种说话，便不顾伍子胥一再反对，下令接受越国投降，收兵回国。

勾践从会稽山上回到都城，眼看到处是一片战争残破的凄凉萧条景象，壮丁死伤殆尽，老弱无依，他心中悔恨不已，发誓要报仇雪耻。

为了防止自己因眼前的安逸而消磨志气，他特地在座位上方悬挂了一个苦胆，以便坐卧时都能看到。每逢吃饭，必先

尝苦胆，并问自己：“你忘了兵败会稽之耻吗？”又把睡觉休息地方的席子撤去，代以柴草。平时吃的是蔬菜，穿的是土布，与百姓同甘共苦。这就是后世传说的“卧薪尝胆”。

为了尽快振兴越国，勾践还亲自参加农田耕作，叫他的夫人织布，并注意救济贫苦，采取各种措施奖励生产，虚心听取别人意见，招纳四方贤士，放手任用贤能的文种管理全国政事，让范蠡负责训练士卒。这样，越国渐渐恢复了元气。

与此同时，勾践不断向吴国进贡各种珍宝、狗马和美女，特别是把一个美貌非凡的女子西施献给夫差，更使吴王十分满意。有时候，勾践还亲自率人到吴国朝见夫差。夫差见勾践如此恭顺，便放松了对越国的警惕。

经过7年休养生息，勾践自以为国家已强，上下听命，便想出兵攻吴。一个叫逢同的大夫劝道：“国家刚刚医治了战争创伤，力量还不够，如轻举妄动，必然引起吴国警觉，反而不利。不如暂且忍耐，与齐、楚、晋等与吴国有矛盾的大国搞好关系，等待时机。”勾践想起上次失败的惨痛教训，便冷静下来。

不久，吴王夫差自恃强马壮，要去攻打齐国。伍子胥劝道：“我听说勾践卧薪尝胆，与百姓同苦乐，把国家治理得日渐兴盛，看样子一定是想报吴国的仇。此人不除，后患无穷，愿大王先去灭了越国。”

夫差不听，仍然出兵攻齐。结果得胜归来，臣下都向他道贺，惟独伍子胥不以为然，说：“这并不值得庆贺，打败齐国，不过是得小利而招大怨。不灭越国，那才是心腹之患。”夫差正在兴头上，哪里听得进这话，反认为伍子胥仗着是先朝老臣，有功于国，处处和他为难，心下十分恼怒，渐渐地与伍子胥矛盾

越来越大。后来，终于听了伯嚭等人的谗言，逼伍子胥自杀，任命伯嚭主管国事。

勾践得知伍子胥被杀的消息，十分高兴，连忙对范蠡说：“伍子胥已死，这回可以出兵报仇了吧！”范蠡却认为还不到时机。勾践只好继续忍耐着。

夫差因连年用兵得胜，日益骄傲起来。公元前 482 年，他率全国精兵，北上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与中原诸侯会盟争霸，只留下少数老弱残兵守护国内。趁着吴国后方空虚之际，勾践与范蠡决定出兵袭吴，发动 5 万大军，一举攻入吴都姑苏（今江苏苏州），杀了留守的吴太子友。

吴王得到国内告急之信，心中大惊，但已来不及回救，便匆匆结束了黄池之会，率兵回国。吴军因远道往返，无力与越军作战，夫差只好派伯嚭去向勾践求和。勾践和范蠡商量下来，都觉得吴国还有一定实力，不可轻视，便暂时放弃灭吴计划，讲和退兵。

过了几年，越国国力更强盛了；而吴国则因夫差好大喜功，连年与北方齐、晋等大国作战，士民疲弊，军队大量伤亡，国势日益不振。

双方经过槁李之战（前 496 年）、夫椒之战（前 494 年）、越军袭击吴都之战（前 482 年）诸多战役之后，吴越战争的形势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越国方面在几经挫折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实力已有了很大的增长。尤其在攻破吴都姑苏（今江苏苏州市）、俘杀吴太子一役后，便开始占据了一定程度上的战略主动。同越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局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吴国在庸主夫差的统治之下，穷兵黩武

导致国疲民穷,内外交困,加上“北威齐晋”战略选择上的严重错误,放过在夫椒之战后乘势灭亡越国的机会,纵虎归山,遗患无穷,终于一步步陷入战略上的被动,出现了国都一度失陷,太子友被杀,被迫屈辱地向越军求和的悲惨局面。从此之后,吴越战争的胜利天平明显地倒向了越国的这一边。越军步步紧逼,屡战屡胜,志在必得;而夫差则大势尽去,处处被动,一蹶不振,吴越战争进入了新的也是最后的阶段。

四、笠泽之战

夫差向越国卑辞求和后,鉴于连年战争,有生力量伤亡严重,社会生产遭到破坏,经济消耗很大,灾荒频繁,国内空虚,感到在短期内还没有力量对越进行反击,就一厢情愿地“息民散兵”,解散大批部队,让广大民众自谋生路,企图借此慢慢恢复力量,待机再举。其实这样做恰恰加速了吴国的彻底灭亡。越国大臣文种、范蠡等人看到吴国军队疲惫削弱,内外交困,防务松弛,有隙可乘等情况,就建议越王勾践加紧战争准备,以期同吴国进行最后的决战。勾践采纳了这些建议,在国内明赏罚、备战具、严军纪、练士卒,做好了充分的临战准备工作。

周敬王四十二年(前478年),吴国国内发生了严重的大旱,土地龟裂、禾苗枯槁,颗粒无收,仓廩空虚,奄奄一息的饥民被迫到东海边上寻找食物糊口度日。勾践于是召集大臣商议征伐吴国的事宜。大夫文种指出:伐吴的天时和人事条件均已具备,如果立即发兵攻吴,可以一举夺得优势,完成霸业。

另一位主要谋臣范蠡也认为伐吴的时机业已成熟，建议勾践尽快动员民众，集结部队，征伐吴国。勾践虚心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决定动员越国的全部力量，大举进攻吴国。当伐吴大军出发之时，越国全境上下出现了父兄昆弟互相勉励、同仇敌忾的感人场面。

同年三月，越王勾践亲自统率士气饱满、斗志昂扬的越军主力越过钱塘江迅速北上，兵锋直指吴国的统治心腹地区，决定吴、越两国命运的关键一战——笠泽之战全面爆发了。

越军进展十分顺利，很快就开进到笠泽（水名，在今江苏苏州市南，自太湖北至海，南与吴淞江相平行）。吴王夫差闻报越军大举逼近，在姑苏台上再也坐不住了，被迫统率都城姑苏所有的部队出城迎战越军。吴军在江北，越军在江南，两军紧夹笠泽水相对峙。

越军最高统帅部针对渡河作战的具体条件和特点，决定采用“示形诱敌，中路突破，大创聚歼”的战术打击吴军。为此，他们在主力的两翼各派出部分部队，为“左、右勾卒”。到了黄昏时分，勾践命令“左勾卒”沿溯笠泽水上行约5里处隐蔽待命；又传令“右勾卒”顺着笠泽水下行约5里许隐蔽待命。到夜半时分，勾践下令预先秘密潜伏的“左、右勾卒”同时鸣鼓呐喊，对江对岸的吴军进行佯攻。愚妄无能的夫差误以为越军从两路渡江进攻，将对自己构成夹击之势，一时间慌了手脚，于是仓猝应战，作出了极其错误的战术措施，把吴军分散开来，分别前去抵御越军上下10里的两路进攻，中了勾践君臣的诱敌分兵之计。

勾践见夫差进了圈套，喜不自禁，于是及时下令越中军主

力偃旗息鼓，人人衔枚，从中路正面悄悄渡过江去，出其不意地从吴军两路中间的薄弱部位展开攻击，兵锋直接插向吴军中军大本营。吴军因变起仓猝，不及防御，顿时大乱失次，纷纷丢盔弃甲。吴左右两军眼见中军情势万分危急，忧心如焚，急急忙忙想向中军靠拢，但是被越军“左、右勾卒”所顽强阻击，无法会合，陷入了分散孤立作战的困难处境，以至被越军各个击破。一场大血战过后，吴军全线崩溃，死伤惨重，越军完全占据了战场上的主动权。

取得决战胜利的越国军队发扬再接再厉、连续作战的顽强作风，对溃退之中的吴军实施追击，又先后在没溪（今江苏苏州市南郊）和姑苏城下两度追及吴军，对其继续进行歼灭性的打击，消灭了吴军的大量有生力量，大破吴军。吴军“三战三北”，尸横遍野，一败涂地，夫差仅仅带着少量残兵逃入姑苏城中，龟缩不出。越军取得了笠泽之战的重大胜利。

笠泽之战是吴越争霸兼并战争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一场战略决战。它使得吴国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惨重打击，其主力精锐几乎全军覆灭，从此彻底没落，再也没有实力来抗衡越国的进攻。越国方面则因这次战役的全胜而确立了对吴国的绝对战略优势地位，其灭亡吴国，称霸江淮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了。

五、勾践称霸

笠泽之战后 3 年，即周元王二年（前 475 年），越王勾践再一次起兵大举伐吴，一路上连战连捷，杀得吴军“大败军散，死者不可胜计”，很快便进抵吴都姑苏城下，并指挥越军将姑苏

城团团包围起来，断绝其粮道转输，意图困毙吴军，以最后夺取姑苏城，灭亡吴国。到了周元王四年（公元前 473 年），吴都姑苏在被围困近 3 年之后，已是势穷力蹙，难以为继，“吴师自溃”、“士卒分散，城门不守”。勾践把握战机，遂于同年十一月指挥越军对姑苏城发起最后的攻击，胜利攻占了吴都。夫差在城破前夕带着少数亲信残兵仓惶逃奔到城郊的姑苏台上，但很快就为追踪而来的越军围困得水泄不通。夫差无可奈何，只好派人向勾践求和。勾践表示：过去上天曾将越国送给吴国，可吴国没有接受。如今老天爷把吴国赐送给越国，我可不敢违背上天的意志！坚决拒绝了夫差的请和要求，但答应保留夫差的性命，准备把他安置在甬东（在今浙江定海东），以度余年。夫差不愿意屈辱偷生，就用一根绳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至此，曾经强盛一时的吴国终于为后起的越国所吞灭了。

越王勾践灭吴后，越国就成了和楚、齐、晋一起“四分天下”的泱泱大邦。勾践于是统兵渡过淮河，和齐、晋等国诸侯会于徐州，周天子也派使臣送来祭肉，封他为伯，这样南方越国也致贡于周室。为了称霸于诸侯，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勾践还将越国都城由会稽迁徙到琅邪（今山东诸城县境）。“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当上了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个“霸主”。

但是，无论是吴楚战争，还是吴越争霸，其规模和影响都已经不及当年晋、楚争霸的势头了，他们已不过是春秋大国争霸战争的回波余澜，势力都只限于江淮一带。越国为“霸主”7 年之后（前 465 年），越王勾践去世，其子鹿郢继立。5 年后，鹿郢亡故，其子不寿继立。不寿 5 年（公元前 453 年），晋国韩、

赵、魏三卿击灭智伯，“三家分晋”局面形成。至此，春秋业已结束，历史进入了更加动荡的战国时期，战争也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章封建社会的开始 ——从战国到秦的统一

第一节 战国历史帷幕的揭开

一、政出私门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大国争霸，先后出现了“五霸”，左右局势。春秋中、后期，“霸主”的格局式微，各国卿大夫的力量强大起来了，他们在其封邑里设立朝廷，征收赋税，拥有武装，俨然如一个独立的王国。当时齐国有田、高、国、鲍、崔、庆等世族；晋国有赵、魏、范、中行、智、栾等世族；鲁有季孙、孟孙、叔孙等大族；郑国有所谓“七穆”（郑穆公七个公子的后代）等。卿大夫中势力最强者以担任诸侯国的将相形式控制国君，掌握国家的军政大权，同时，卿大夫之间也互相兼并。这样一来，“公室”势力衰落了，让位于诸侯国内以卿大夫为代表的“私

家”，形成了“政出私门”的局面，随着“私门”力量的强大，在卿大夫世族集团内的家臣也逐渐掌握了实权。家臣大都出身于士，因协助卿大夫管理事务而获得大夫身份，担任家宰、邑宰。他们不仅掌握了政权和财权，而且拥有军队。他们既能控制诸侯国君，又有主宰卿大夫世族的命运，如鲁国的阳虎是鲁国季氏的家臣，他叛变季氏时，曾与鲁国军队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春秋时期，以诸侯国君为代表的公室是旧势力的代表，他们维持奴隶制度和奴隶主贵族的利益；而以卿大夫、家臣为代表的私门是新势力的代表，要求改革，建立封建制度。这一新旧势力的斗争以鲁的“三桓”与公室的斗争、齐的“田氏代齐”和晋的“三家分晋”最为典型。

二、三桓分鲁

“三桓”是指鲁国显族季孙、叔孙和孟孙三家，他们是鲁桓公的后代。他们分别筑城壮大自己的力量。其中季孙氏是“三桓”中力量最强大的，控制了鲁国的政权。前562年，他们以扩充军队为名，建立上中下三军，“三桓”各统一军，并各征其军之土地赋税，即把公室的土地和人口分成三份，历史上称为“三分公室”。季孙氏将一军全占之，采用征税制，进一步增强了自己的实力；而叔孙氏取一军之半归自己；孟孙氏则取一军之四分之一。前537年，又改三军为二军，分成四份，季孙得二份，掌一军，叔孙和孟孙各取一份，合掌一军，史称“四分公室”。三家都采取征税制，剥夺了鲁国君的土地和人口，国家只能靠三家纳贡来维持。鲁昭公强烈反对“三桓”的改革，前517

年与旧贵族后邰孙氏勾结进攻执政的季孙氏。季孙联合叔孙、孟孙两家反击，鲁昭公失败逃出鲁国，死于国外。前483年，季康子“用田赋”，按照封建方法剥削人民，鲁政权完全落入新兴“三桓”之手。到鲁悼公时，“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

三、田氏代齐

当吴、越在东南大动干戈的时候，中原地带，诸侯间的战事大大减少，代之以诸侯国内卿大夫间的角逐与兼并。齐、晋、鲁等国的内争都是相当激烈的。

齐国，始封于姜太公，故齐君以姜为姓。春秋初年，齐独霸列国，中叶渐衰，后期已面临崩溃的边缘。齐相晏婴讲到齐国的政治形势时也说是“快完了”。当时，公室仓廩中的布、帛、黍、粟都放得腐烂生虫了，而人民却生活无着，饿殍载道，起而抗争的人被镇压，遭到砍脚之刑的真不知有多少。

齐大夫田氏，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施行新政。田氏借贷给贫民粮食时使用大斗，收取借贷、贡赋时，却用小斗，以此笼络了人心。数十年间，齐民“归之如流水”。田氏势力渐强，先后吞灭了国氏、高氏等显姓强宗，夺得了很大权力。公元前475年前后，大夫田成子又把齐国内残余的旧势力消灭几尽，同时，与各国通好，取得了支持。这样，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田氏就完全控制了齐国的政权。最后，终于把姜姓的齐君放逐海上。取而代之，是为田齐。史称“田氏代齐”。

公元前475年，恰是周元王元年。在中国历史上，这一年不只是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线，也是中国奴隶制时代结束，封建

制时代开始的标志。

四、晋分三家

向戌弭兵标志着春秋大国争霸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各国内部的倾轧斗争上升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其社会政治生活的主流是诸侯国中卿大夫强宗大族崛起和国君公室的衰微。当时各大国的诸侯，都让连绵不断、旷日持久的兼并、争霸战争拖得筋疲力竭，叫苦不迭，这样就给国内那些有野心的卿大夫提供了篡权夺位的天赐良机。他们或侵吞公室的财产，或分割国君的兵权，或用小恩小惠笼络收买民心，长年累月下来，终于尾大不掉了。西周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格局，在春秋前中期一变而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时候乃再度而变为“自大夫出”了。

“一山容不得两虎”，强大起来的卿大夫之间，也像乌眼鸡似的争斗不休，不可避免地互相兼并吞噬。这在晋国表现得最为典型。在那里，首先是 10 多个卿大夫的宗族的财富和势力一天天扩展，而其互相兼并的结果，则只有韩、赵、魏、智、范、中行六大宗族硕果仅存，是为“六卿”。这时，晋君的权力已基本被剥夺，国内政治全由“六卿”所主宰。尔后，“六卿”之间又因分赃不匀而展开火并，一场厮杀下来，范氏和中行氏又被送入失败的地狱，时间在公元前 458 年。晋国于是只剩下赵、韩、魏、智四大贵族集团。可是“四卿”之间也不能和平共处，非闹个你死我活不可，更大的冲突很快就来临了，这样，便点燃了晋阳之战的导火索。

在杀败了范、中行两氏之后，智氏一跃而成为“四卿”中的龙头老大。其代表人物智伯瑶年资最长，实力最强。晋出公死后，他又通过扶立晋哀公，把持了晋国的国政，踌躇满志，不可一世。可是智伯瑶说到底是一个政治智商极低的庸人，他利欲熏心，贪得无厌，依仗自己人多势众，向韩、魏两氏强行勒索万家之县各一。韩康子、魏桓子实力不济，害怕自己的脑袋搬家，只好献出土地以求平安。智伯此举顺利得手后，得陇望蜀，又去找赵襄子的麻烦，狮子大开口向赵襄子索取土地。赵襄子不甘心受制于智伯，就把智伯的无理要求坚决顶了回去。

智伯见赵襄子和自己作对，禁不住怒火中烧。他决定拿赵襄子开刀，进而独占晋国江山，便于周贞定王十四年（前455年）调集军队攻打赵氏，并胁迫韩、魏两氏出兵协同作战。赵襄子当时既然敢于在智伯太岁头上动土，对随之而来的后果自然是早有思想准备。这时见三家联军声势浩大直杀过来，便采纳心腹谋臣张孟谈的建议，制定了依坚城固守、持久抗敌、伺机反攻的防御方针，选择民心向赵、墙高池深、粮草充足的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进行固守。

智伯统率三军联军蜂涌而至晋阳城下，当即发动猛烈的攻击，大有一股“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气势，无奈对手防御太严密，三个月时间攻打下来，不但没有寸土之功，反而白白地损折了不少兵马。智伯一计未成，又生一计，改令对晋阳城实施铁桶一般的包围，可是一年过去了，仍然是白费力气，事与愿违。联军顿兵于坚城之下，渐渐趋于被动。而晋阳城中的军民却是同仇敌忾，士气高昂。智伯眼睁睁看着战事拖延近两年而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不禁焦急万分，寝食不安。他苦苦思索，终

于想出了引导晋水灌淹晋阳城的计策。

智伯乐不可支，马上命令将士在晋水上游修筑大坝，造成一个巨大的蓄水池，再挖一条河通向晋阳城西南，又在围城部队的营地之外筑起一道拦水坝，以预防水淹晋阳的同时大水冲了龙王庙，淹没自己的人马。

在各级军吏的严厉督促下，这一工程进展相当顺利，时隔不久便竣工了。当时正值雨季来临，连日狂风大作，暴雨不止，河水猛涨，把偌大一个蓄水池灌得满满的。智伯见状，心花怒放，认为踏平晋阳城，生擒赵襄子就在旦夕。欣喜之余便下令掘开堤坝，放晋水灌淹城池。一时间大水就像挣脱了铁笼的猛虎，奔腾咆哮，直向晋阳城扑去，很快就把晋阳全城浸泡在洪水之中了。城内军民只好支棚而居，悬锅而炊，病饿交加，情况十分危急。但尽管如此，守城军民始终没有动摇斗志，继续前仆后继，英勇抵抗，把智伯联军挡在危城之外。

韩、魏两家参与攻打赵氏，原先就是出于被智伯所胁迫，这时候他们对智伯的残暴更有了亲身的感受，开始意识到假如赵氏被消灭，自己迟早也难免落得被兼并的可悲下场。兔死狐悲，于是对攻城行动采取了消极应付的态度。赵襄子的谋士张孟谈聪明过人，见微知著，一眼便看出了韩、魏两氏与智伯之间这种貌合神离、勾心斗角的关系，向赵襄子建议：利用韩、魏与智氏的矛盾，采用离间计，瓦解三家联盟，赵襄子欣然采纳。于是张孟谈就乘夜色朦胧悄悄缒出城外，秘密会见韩康子和魏桓子，陈说唇亡齿寒的利害关系，提议三家联合进攻智氏，打败智氏后，除归还智伯强夺的韩、魏土地外，三家再平分智氏的土地。韩、魏两氏终于被说服，暗中倒戈，联手算计智

伯。

赵、韩、魏三家密谋联合就绪之后，便在一个约定夜间展开反攻行动。赵襄子在韩、魏两氏的配合策应之下，派遣精兵实施偷袭，杀死智伯麾下守堤的官兵，掘开了卫护堤坝，放水倒灌智伯军大营。智伯的部队从美梦中惊醒，一见身边已经是一片汪洋，顿时乱作一团。赵军乘势从晋阳城中正面出击，韩、魏两军则从两翼发起夹攻，杀得猝不及防的智伯军伏尸遍野，血流成河。智伯本人也未能有更好的结局，被擒杀于凿台（今山西榆次南）之下。三家军队乘胜进击，痛打落水狗，尽灭智氏宗族，瓜分其土地，为日后“三家分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晋阳之战规模虽然不大，但意义却相当深刻。它的最大特色，就是标志着春秋时期以争霸为主流的战争的终结，战国时代以兼并为本质的战争的到来。

春秋战国之交，随着旧的生产关系的破坏，土地占有权也相对分散。有土地就有入口，有入口就有赋税，就能组建军队，也就意味着拥有了财富和权力。因此，对土地和人口资源的争夺和控制，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为当时战争活动的根本宗旨，在这方面，晋阳之战具有开创性和代表性的意义。它以智氏向韩、魏、赵勒索土地而开始，又以三家瓜分智氏土地而告终；智伯胁迫韩、魏与己联合攻赵，是用三分赵地为诱饵；而赵襄子策动韩、魏倒戈，也是以瓜分智氏土地为条件。由此可见，对土地的争夺如同一条红线，贯穿于这场战争的始终，这一兼并战争的属性，是与以往争夺霸主名分和地位的春秋争霸战争迥异其趣的。

战争的手段是由战争的目的所决定的。兼并战争的激烈

和残酷程度要远远超过以往的争霸战争,这一点在晋阳之战中同样表现得很明显:智伯决晋水灌城,长围晋阳两年,必欲置赵氏于死地而后快;同样,赵、魏、韩击败智伯军后,也是擒杀智伯,尽诛其族,瓜分其地;这里已丝毫见不到邲之战、鄢陵之战中那种彬彬有礼的旧军礼遗风,而只有无所不用其极的酷烈,这正是兼并战争条件下的必然结果。所以,无论是从战争的目的看,还是从战争的手段看,晋阳之战都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它标志着战国时代兼并战争行将全面上演。

第二节 齐魏争雄

一、魏国的兴起

韩、赵、魏三家分晋,标志着历史上新的一页又打开了。魏、韩、赵、齐、秦、楚、燕七个大国占据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上演了一幕幕纵横捭阖、干戈不休、争雄兼并、你死我活的精彩话剧。人们根据这一时代特色,将这一历史阶段命名为“战国”,是名符其实的。

在战国七雄之中,最先崛起的是地处天下之中的魏国。继魏桓子之后的文侯魏斯(前 445—前 396 年在位)变法图强,成为战国前期的一代雄主。

魏文侯是一位积极进取的君主，他任用贤士，改变法制，使魏国出现了一片新气象。其中，李悝、吴起、西门豹三人的贡献尤为突出。

李悝任相

李悝(约前 455—前 395)，魏人，相传是孔门高足子夏的弟子。魏文侯用他为相。他最突出的贡献是编了一部《法经》和“作尽地力之教”。《法经》包括《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六篇，内容以镇压盗贼为主，也包括对赌博，诈骗、贪污等不法行为进行惩处的规定。他可以说是法家的开山之祖。商鞅把他制定的法令传播到秦国，秦、汉两代的法律都把《法经》当蓝本，可惜原书早已失传，我们无从了解它的详细内容了。本悝曾说：“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他的用意当然在于保护经济地位的阶级、阶层或集团，总是要致力于社会秩序的安定，否则是无论什么事情都做不好的。

“作尽地力之教”，简单地说，就是要求每亩多收几斗粮。他算了几笔账。第一笔，每 100 平方里折合 900 万亩，除山、河、民居占 $\frac{1}{3}$ 外，有田 600 万亩。种得好，每亩多收 3 斗，就可以增收 180 万石；反之，种得不好，每亩减收 3 斗，共减收 180 万石，所以必须努力发展农业生产，要人民勤勉种田。第二笔，农民一家五口，种田 100 亩，每亩产量一石五斗，共产小米 150 石，纳税 $\frac{1}{10}$ 即 15 石，自有 135 石。每人每月口粮一石五斗，五人全年吃掉 90 石。余粮 45 石，每石值 30 钱，共 1350 钱。每年村里春秋祭祀等，约用 300 钱；衣服，以每人需

用 300 钱计,需要 1500 钱,已经有 450 钱的亏空。不幸有疾病死丧以及政府所加额外负担尚不在内。李悝根据这笔账,指出这是农民穷困的根子,因此农民对生产缺乏兴趣,从而引起粮价上涨。粮价贵则士和工商受损失,贱则农民吃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提也一个“平余”的方案,由国家于丰收时收购,歉收时出售,使粮价保持稳定,虽有水旱之灾,粮价不致太贵,人民不致流亡。他在魏国推行这个方案,收到了富强的效果。

吴起治军

吴起(? —前 381)是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北)人,一度做过孔门高足曾参的儿子曾申的弟子,因母亲去世不回去奔丧,被曾申逐出门墙。他又到鲁国,学习兵法。齐国进攻鲁国,鲁国原打算要用他做将军,率兵抵御,后考虑到他的妻子是齐国人,只得作罢。吴起一心要博取功名,竟杀死了妻子,表示与齐绝对没有关系。他因此做了将军,大破齐军。但是鲁君对他的为人毕竟有看法,战后又把他丢在一边。

吴起在鲁既不受重用,就去投奔魏文侯。魏文侯问悝,吴起是否可用。李悝说他过分热衷功名,又有好色的缺点,但确系将材。魏文侯使他领兵攻秦,一次就攻下了五座城。

吴起带兵,有一个极大的优点,就是能与士兵同甘苦。为父子两个士兵吮吸脓疮的故事最能说明问题,相传有个士兵生疮,吴起不怕脏,用嘴替他吸脓。事情传到这个士兵的母亲那里,这个女人就痛哭起来。她说当年她的丈夫也在吴起手下当兵,也生过疮,吴起也替他吸过脓。不久,打起仗来,她的丈夫奋勇当先,死在战场上。如今儿子也被将军吸了脓,她估计

儿子也会因感激而奋战牺牲。后来的事情果然证实了那女人的估计。

魏国的兵制很有特点。这种兵制叫做“武卒”，荀子把它记在《荀子·议兵》里。选武卒时，让被选的人，头上戴盔，上身、腿和胫分别穿甲，带上 12 石力的弩，要跑 41.4 公里的路。这项试验比现代跑马拉松的运动量大得多。

以吴起这样的将军，指挥这样精锐的兵士，一时所向无敌，是很自然的事情。魏文侯开疆拓土的方向主要是向西进攻秦国。经过多年的战争，到文侯三十八年（前 408），魏完全占领了今陕西北部北洛水与黄河之间的地带。秦在北洛水西岸筑城防守，魏则设立西河郡，任吴起为西河守。吴起不仅善于带兵打仗，也是一个能干的行政官。他要老百姓相信他说话算数，赏罚分明，便在南门外竖起一根柱子，宣布：“有能放倒柱子，用为上大夫。”百姓起初不信，没有人肯尝试。后来有人觉得试一下，至多得不到赏，不会有其他损失。于是这个人放倒了柱子，果然得到赏赐，从此西河百姓都信服吴起的赏罚。这件事见于《吕氏春秋·慎小》。《韩非子·内储说上》也有类似记载，只有把柱子改为车辕。后来商鞅在秦令百姓移木给赏，同吴起的做法几乎完全相同。

魏文侯所用善战的人，还有一个乐羊。他为魏国攻灭中山。中山是白狄建立的诸侯国，都城在今河北定州。魏军攻中山，必须假道赵国，中山防守也很坚固，乐羊打到第三个年头，才于文侯四十年（前 406 年）把中山灭掉。不过此人后来似乎没有其他建树，所以史籍和诸子著作都不再提起他了。

西门豹治邺

西门豹以兴修水利、破除迷信享有盛名。他任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令,到任时漳水时常泛滥,长老们诉说:“为了给河伯娶老婆,百姓穷苦。”西门豹听得莫名其妙,问是怎么回事。长老们说:“三老、郡吏每年向百姓收钱几百万,用二三十万替河伯娶老婆,其余和大巫分掉。到那时候,大巫挑一个小户人家的美貌女子,说这女子该嫁给河伯。成婚时,把新娘子打扮好了,坐在床上,放到河里,漂流了几十里路就沉没了。有漂亮女孩的人家,怕被选中,都逃往外地,因此户口越来越少。老百姓都说:即使不做河伯的老婆,大水来了,也要淹死。”

西门豹听了,并不表态,只说:“到时候告诉我,我也去送新娘子。”

河伯娶老婆的日子到了,西门豹来到河边,见三老、属吏、乡官连同百姓看热闹的足足有两三千人。大巫是个年近70的老太婆,带了10来个年轻的女徒弟。西门豹看了看新娘子,便对三老、女巫等人说:“这个女人不好看,请大巫去走一趟,告诉河伯,等挑了好女子,择日遂上。他命手下把大巫抱起来,往河里一丢。等了一会,又一本正经地说:“大巫怎么还没有回音,让徒弟去催她。”命手下把一个女徒弟丢到河里。一连三个徒弟后,又说:“这几个女人办不来事情,只好麻烦三老走一趟。”这时围观的人都极紧张,不知道西门豹下一步有何行动。只见西门豹对众人说:“女巫、三老都不回报,怎么办?”他要命一向经手办这事情的属吏下水。这些人都吓得面无人色,跪在地下,不断地叩头,叩得血流满面。西门豹冷冷地说:“大家起

身吧，河伯留客太久，我们不必等了。”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敢提替河伯讨老婆的事情。

接着，西门豹修了十二道渠，引漳河水灌溉田地，化水害为水利，邺人自此富庶。

魏文侯任用的人，除这四个人外，还有翟璜、翟角、屈侯鲋、赵苍唐、魏成子等。另外，他理由从子夏，与子贡的弟子田子方为友。还有一位名士段干木，也是子夏的弟子，他不肯做官，也不肯与国君见面。魏文侯去访问他，他跳墙逃走。

文侯任用的人中，只有魏成子是本族，其余都是异姓。这与春秋世卿都用本族子弟的情形不同。这倒不是战国君主比春秋的国君和列卿高明，原因在于社会上涌现了一大批学有专长并待价而沽的“士”。士的来源很广，首先是败落贵族的子弟，其次是“国人”、“野人”以至工商的成员。私人传授学问的风气既开，各阶级、各阶层都有有想学点本领，钻营仕途。诸侯国的君主，有势力的贵族，在剧烈的竞争中，要想不被淘汰，不能不网罗人才。于是社会风气变了，布衣之士从一国跑到另一国，寻求出路，有时很容易见到国君，谈到投机，顿时成为将相。大多数人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也往往为国君或大贵族养起来，做他们的门客。战国时期的情形就是如此。

魏国强盛的局面保持了百年左右。文侯的儿子武侯魏击（前 396—前 370 年在位）时，魏国的情况基本不变，但是在选贤任能方面，武侯不如文侯。我们没有看到他选拔人才的记载，倒是看到了吴起被人排挤、远走楚国的事情。吴起在楚，被楚悼王任为令尹。他在楚国也干了一番事业，把很多旧贵族迁到空虚之地，进行垦殖；又集中财力，供养选练之士。楚国的国

势为之一振。楚悼王死后，贵族乘机作乱，把吴起乱箭射死。但是他临死还有急智，伏在悼王的尸体上，让死人也中了箭。楚肃王即位，追究射悼王尸体的事，杀了 70 多家贵族，无异为吴起报了仇。

魏武侯死后，惠王魏罃继位。

魏惠王继位以后，继承文侯、武侯的霸业，继续积极向外扩张，更使魏国君临天下，不可一世。

但是魏国本身也存在着先天性的不足。它地处中原腹心，被称为“天下之胸腹”，四周大国环列，西有秦，东临齐，北接赵，南邻楚，是典型的“四战之地”，很容易陷入多面作战的不利境地，战略地理环境较为恶劣。可是魏国几代统治者对这一点缺乏清醒的认识，反而采取了战略上“四面出击”的错误方针，这不但分散了力量，消耗了实力，而且也容易四面树敌，陷于被动。所以在魏国最为兴盛的同时，也埋下了其日后衰落的根源。

魏国的勃兴和称霸，直接威胁和损害了楚、齐、秦等国的利益，引起这些国家的普遍恐惧和忌恨，其中尤以齐、魏之间的矛盾最为尖锐。

齐国自西周以来一直是东方地区的大国。公元前 356 年齐威王即位后，使贤任能，改革吏治，强化中央集权，进行国防建设，国势日渐壮大。面临魏国向东扩张的严重威胁，它就积极利用韩、赵诸国和魏国之间的矛盾冲突，趁魏国深深地陷入四面受敌的内线作战之际，展开了对魏的激烈斗争。

二、桂陵之战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齐、魏间的矛盾冲突在当时只能通过战争的手段来加以解决。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元前 353 年爆发了桂陵之战。

当时赵成侯为了摆脱魏国霸权的控制，进而达到兼并土地，扩张势力的目的，于公元前 356 年在平陆（今山东汶上）和齐威王、宋桓侯相会结好，同时又和燕文公在阿（今河北境内）相会。赵国的举动引起魏惠王的极大不满。适逢公元前 354 年，赵国向依附于魏国的卫国动武，迫使卫国屈服称臣。于是魏国便借口保护卫国，出兵攻赵，包围了其国都邯郸。赵与齐有同盟关系，这时见局势危急，遂于前 353 年遣使向齐国求援。

齐威王闻报赵国告急，就召集文武大臣进行商议。丞相邹忌反对出兵救赵。齐将段干朋则认为不救赵既会失去对赵国的信用，又会给齐国争雄造成困难，因而主张救赵。但他同时又指出，从战略全局来考虑，如果立即出兵前赴邯郸，赵国既不会遭到损失，魏军也不会消耗实力，对于齐国长远的战略利益来说是弊大于利。因此他主张实施使魏与赵相互削弱，而后“承魏之弊”的战略方针。具体地说，是先派少量兵力南攻襄陵，以牵制和疲惫魏国。待魏军攻破邯郸，魏、赵双方均师劳兵疲之际，再予以正面的攻击。段干朋这一谋略显然有一石三鸟的用意。第一，南攻襄陵，牵制魏军，使其陷于两面作战的窘境。第二，向赵表示信守盟约、提供援助的姿态，帮助赵国坚定

其抗击魏国的决心。第三,让魏、赵继续互相攻伐,最后导致赵国遭受重创、魏国实力削弱的结果,从而为齐国战胜魏国和日后控制赵国创造有利的条件。

段干朋的计谋,完全符合齐国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因此为齐威王所欣然采纳。他决定以部分军队联合宋、卫南攻襄陵,主力暂时按兵不动,静观事态的发展,准备伺机出动,以求一举成功。

当时魏国的扩张,也引起楚国的敌视。因此,楚宣王便乘魏国出兵攻赵、后方空虚之际,派遣将军景舍率领部队向魏国南部的睢、汴地区进攻。而西边的秦国也不甘寂寞,发兵先后攻打魏国的少梁、安邑等要地。这样,魏国实际上已处于四面作战的困难境地。幸亏它实力相当雄厚,主将庞涓又决心破赵,不为其他战场的局势所动摇,因而一直勉强维持着邯郸方面的主攻局面。

魏国以主力攻赵,两军相持近一年。当邯郸形势危在旦夕、赵、魏两国均已非常疲惫之时,齐威王认为出兵与魏军决战的时机业已成熟,于是就任命田忌为主将,孙臆为军师,统率齐军主力救援赵国。

田忌打算直奔邯郸,同魏军主力交锋,以解救赵围。孙臆不赞成这种硬碰硬的战法,提出了“批亢捣虚”、“疾走大梁”的正确建议。他说:要解开乱成一团的丝线,不能用手硬拉硬扯;要排解别人的聚殴,自己不能直接参加进去打。派兵解围的道理也是一样,不能以硬碰硬,而应该采取“批亢捣虚”的办法,就是撇开强点,攻击弱点,避实击虚,冲其要害,使敌人感到形势不利,出现后顾之忧,自然也就解围了。孙臆进一步分析说:

现在魏、赵相攻多时，魏军的精锐部队全在赵国，留在自己国内的是一些老弱之卒。根据这一情况，他建议田忌迅速向魏国的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进军，切断魏国的交通要道，攻击它防备空虚的地方。他认为一旦这么做，魏军必然被迫回师自救，齐军可以一举而解赵国之围，同时又能使魏军疲惫于路，便于最终战胜它。

田忌虚心采纳了孙臆这一作战建议，统率齐军主力迅速向大梁方向挺进。大梁是魏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此时处于危急之中，魏军不得不以少数兵力控制历尽艰辛刚刚攻克的邯郸，而由庞涓率主力急忙回救大梁。这时候，齐军已把桂陵（今山东菏泽东北一带）作为预定的作战区域，迎击魏军于归途之中。魏军由于长期攻赵，兵力消耗很大，加上长途跋涉急行军，士卒疲惫不堪，面对占有先机之利、休整良好、士气旺盛的齐军的截击，顿时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困境，终于遭受到一次沉重的失败。它所攻占的邯郸等地，至此也就得而复失了。

三、马陵之战

公元前 343 年，魏侯罃凭借国势强大，建造了高大华美的王宫，穿上了朱红色的王服，坐着君王才坐的车子，打着七星的旗子，摆出了俨然天子的场面，自称魏王，即魏惠王（公元前 400—公元前 319）。因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西北），故又称梁惠王。

公元前 341 年，魏攻韩。第二年，韩求救于齐，齐派田忌为将，孙臆为军师，出兵往救。魏王派出太子申和大将庞涓，率

10 万大军迎战。孙臏深知魏兵强悍而又轻敌，于是就因势利导，佯作退兵，诱其深入。齐退兵第一天扎营时，造了 10 万个锅灶，第 2 天减少到 3 万个，第三天又减少到三万个。庞涓每追一天就察看齐军锅灶。追了 3 天，以为齐兵已逃亡过半，大为高兴，于是丢下步兵辎重，只带轻锐兼程追赶。孙臏计算魏军行程，夜晚当到马陵（今河北大名东南）。马陵路狭，两旁多阻隘，齐军就夹道伏兵。并剥下一块大树皮，在树上写道：“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又命令射手们但见树下火举，就万箭齐发。庞涓果然夜晚赶到那棵树下，举火观看，未及读完，箭如雨下。魏军大乱，自相践踏。庞涓自知大势已去，就自杀了。太子申也做了俘虏。

马陵之战造成了齐国与魏国在东方的均势。从此，齐势渐起，魏势转衰了。

第三节 秦国的勃兴

一、秦人的起源

秦代王朝的创立者——秦族，本是夏族的一支，即羌族的后裔。这个种族，原住鄂尔多斯的原野，大约在旧石器时代的末期，其族类即溯黄河而西上，缓缓向甘肃西南移徙。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或已定住于甘肃西南黄河河谷洮河河谷一带，开

始了植物栽培与动物驯养的生活。但直至此时，秦族并未从羌族中分化出来，所以尚无秦族之名。秦族之从羌族中分化出来，那是有史以后的事。

秦族之离开今甘肃西南而东徙，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即传说中之“尧、舜、禹”时代。当时沿渭水而东徙的羌族，除秦族外，尚有其他诸羌之族，其中首先进入中原的是周族。周族入据中原以后，遂称后来东徙诸羌曰西戎，以别于甘肃的诸羌。实则所谓西戎，就是诸羌的别称。秦族为东徙诸羌之一，故亦称秦戎。大约就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秦族的前锋，即已到达陕西境内，与东夏之族发生接触。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其族类遂分布于今日陕西西部。

以后，由于殷族在东方之勃兴，占领中原，西服诸羌，秦族亦与诸羌同时沦为殷代奴隶国家的臣属。大约即于此时，秦族即通过奴隶制的文明，走出了历史上之野蛮时代的境界。

即至周族克殷，陕西的诸羌，在周族领导之下，大半先后东徙中原。其残留于陕西的诸羌，即被周族称之为西戎。秦族之中，也有一部于周初东徙中原。此等东徙中原的秦族，以后在周族封建文化影响之下，与周族同化。其留在陕西境内的秦族，则沦为周族的臣属。

在周穆王时（公元前 1000 年左右），分布于陕甘边境的秦族又有一支东渡黄河，徙于汾河河谷，这就是传说中所谓造父之族。造父之族，其前锋似曾达到淮河流域。但直至周孝王时（公元前九世纪左右），秦族的大部分族类，还是与诸戎杂处，游牧于汧渭之间。

到周厉王时（公元前 841 年前），陕甘一带，袭来了普遍的

大旱灾。诸戎之族，遂驱其畜群，东向就食，时秦族亦在其内。周宣王时（公元前 827 至 782 年），周族已感到诸戎的压迫，乃运用以戎制戎的政策，封秦族的酋长秦仲为大夫，使之抵抗其他诸戎。秦仲不久死于火并战争之中，其子继之，仍为周族的西垂大夫，是为庄公。庄公在周族支持之下，继续与诸戎相抗。

周幽王时（公元前 781 至 771 年），陕甘一带，又袭来了空前的大旱。当此之时，诸戎之族冲破了周族西北的封锁线，闯进陕西的腹部。其中犬戎与申戎，更攻陷西周的首都，杀死幽王于骊山之下。当时，秦襄公站在周族的方面，“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然而终于不能阻诸戎东徙的猛潮，所以到平王时，周族遂被迫放弃陕西，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据《秦本纪》云：“（当时）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今陕西岐山县）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由此看来，秦国的始建，乃在西周末叶。

春秋初，陕西全境，已成为诸戎驰逐之场，而秦族于诸戎中，最为强大。他占领了汧渭之间土地肥美的河谷，这里，不但水草丰富，宜于畜牧，而且是周族文化发祥之地，有着繁荣的庄园农业和手工业的存在。秦族既据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又因袭周族的文化遗产，同时，更以其氏族制的历史活力，注入于周代封建文化之中，故在春秋初叶，勃然兴起，征服邻近诸戎，成为西北的一个新兴的力量。他把诸戎的土地，收夺为县邑，诸戎的族类，转化为农奴，逐渐把诸戎的社会经济，推向封建主义的历史边缘，并从而使诸戎之族，在封建地方关系之中，化除其种族的界线，融解于秦族的封建国家之中。所以西周时

的诸戎,不复见于春秋中叶以后,这并不是诸戎之族为秦所灭绝,而是与秦族混而为一了。

二、商鞅变法

秦族在不断的征伐战争中,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封建国家。到穆公时,这个国家,便西并诸戎,把他的领土,西展到陕甘边境,北拓至陕西北部。同时又东灭梁、芮,打通进出中原的道路,并进而伸张其势力于中原。为此秦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秦国的改革是从献公开始的。在此之前,虽有“简公六年,令吏初带剑”;“七年,初租禾”,但收效甚微。献公即公子连,曾为质于魏,了解魏国的改革。“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沉之渊旁”。献公元年(衣384年),“止从死”,废除了秦国史上近300年的人殉制度。二年,迁都栎阳,准备东伐。七年,“初行为市”,发展商品经济。十年,“为户籍相伍”,实行五家为伍的编户制,作为征收赋役的依据。经过一番准备,二十一年,“与晋战于石门(三原县北),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二十三年,“与魏晋战少梁(今韩城南),虏其将公孙痤”。改革初见成效。

献公二十四年死,子孝公继位。这时关东有六个强国和秦国相并立,即:齐、楚、魏、燕、韩、赵。淮、泗之间,尚有十几个小国。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挡住了秦国东下的出路。“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狄)遇之”。孝公想光大穆公、献公之功业,于是下令求贤变法,说“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

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为了表示决心，孝公东出兵围陕城（今河南陕县），西斩戎之獫狁王（今天水地区）。偃洛邑的周天子似乎感到一线希望，在次年致胙于秦孝公。

商鞅听到秦孝公求贤变法的消息，西向入秦，托内侍宦官景监求见孝公。他原是卫国诸庶孽公子之后，故姓公孙氏为公孙鞅，亦曰卫鞅。后因在秦受封为商君，才叫商鞅。“鞅少好刑名之学”，在魏相公叔座门下为庶子，深受器重。公叔座临终前把他推荐给魏惠王，代己为相。惠王嫌其年少位卑，不用。商鞅于是带着李悝《法经》到了秦国，以期施展才智，成就功业。

商鞅头几次进见孝公谈论国事，均不见用；最后说以强国之术，深深打动了孝公。但孝公又怕变法会遭到非议，难以推行，乃在朝中进行讨论。果然，甘龙和杜挚出面反对，主张因袭传统礼法。商鞅驳斥了他们的意见，要求以强国利民为目的实行改革。最后，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发布了变法的命令，在秦国进行了比较彻底的封建制的改革。

商鞅变法大致分两次集中进行。头一次在秦孝公三年（前359年），其主要内容是：

一、实行什伍连坐法，奖励告奸，严惩匿奸。“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者同罚。什伍，即5家为伍，10伍为里。里相当于行政村，一般为50家。什伍连坐，一家有罪，同伍者皆受罚，同里者也受牵连。在战场上则以5人为伍，10人为什，互相连坐。这样，就用严酷的手段保证了社会治安和军队的战斗力。

二、整顿军赋，奖励公战，严禁私斗。“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

被刑”。这里说的“赋”指军赋，包括服役当兵。所以，有两个男子而不分户的要加倍征收，扩大兵源。在战场上立功的授予军功爵。军功爵共 20 级。一级曰公士，斩得一个甲首即可得到。“爵一级者，益田一顷，益宅九亩，益除庶子一人”。“庶子”就是没有爵秩而为有爵秩者服定额无以偿劳役的人。依此递增，至第五级爵大夫，机可相应增加田宅和庶子。“故秦人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从第六级爵官大夫以上至第二十级彻侯，就可按等级食邑食税了。所以从第八级爵公乘以上，可以与县令、丞相亢礼。因为县令也不过秩 600 石至 1000 石、甚至不过秩 300 石至 500 石而已。可见，秦国对军功的赏赐是很优厚的。相反，私自进行仇杀或械斗，就要受刑了。其结果自然是：“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形成了风气。

三、重本抑末，奖励耕织，禁止末业游食。“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本业指农业和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副业。那时的不少国家对粮食的亩产量有规定，超过限额的给予奖赏。“复其身”，就是免除其本身的徭役。相反，如果弃农经商，或懒惰游荡而贫穷的，则举以为收孥，即没收其本人为官奴婢。这样，就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即《商君书》中所说的“地著”。应当指出，这项法令不适用于从事正当商业和手工业的人，对他们另有安排，是不能“举以收孥”的。

四、破除宗族等级制度，建立军功等级制。“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各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这里的等级完全是按有无军功和军功的大小来定的，不含其他因素。当

然，封得军功爵不一定都要在战场上杀敌立功，如告奸也可以得到军功爵。其他功勋也准此而定。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无功者不能进入军等级。即使是宗室成员，无军功也要除掉其公族籍，失去其宗法贵族身分。无功的富人就更不必说了。这样就用 20 级军功爵确定了尊卑贵贱的等级。

这些法令自然要触犯那些宗室贵戚和原有富人的利益。所以，“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他们自己不敢犯法，就唆使太子犯法。商鞅深知，“法之不行，自于贵戚”，本想加法于太子；但又考虑到，太子作为嗣君，是不能施加刑罚的，于是“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自是，“秦人皆趋令”，莫敢犯者。“居三年，百姓便之”。变法取得显著成效。

魏国开始对秦刮目相待。秦孝公七年，“与魏惠王会杜平。八年，与魏战元里”，取其少梁。十年，商鞅从左庶长升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安邑是魏国之都城，秦国开始对魏国展开攻势。

在这种形势下，为巩固并发展已有的变法成果，为逐鹿中原创造更有利的态势，商鞅进行了又一次比较集中的变法改革，时在秦孝公十二年（前 350 年），其主要内容是：

一、继秦献公徙治栎阳之后，正式迁都咸阳。“作为筑冀阙宫庭于碱咸阳，秦自雍徙都之”。和献公徙治栎阳不同，这次是从旧都迁往新都。冀阙，古称象魏或魏阙，即宫庭门外的布告墙，在上面可以随时公布法令，通告全国。这样，咸阳就成了秦国的统治中枢，名符其实的首都。

二、在全国设立县、乡、里三级行政建制。“并诸小乡聚，集

为大县”。县置令、丞，由国王任免。全国共设 41 县。这样，秦国就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制度，而与以往灭国设县有本质的区别。

三、瓦解大家族，建立小家庭。“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过去的“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并没有完全瓦解掉这种大家族。这次则“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强制其析户而居，不分居者就要依法论处了。此后两年，“初为赋”，就是按这种个体农民家庭收取户赋。

四、按地方百里提封 9 万顷或 10 万顷的标准，是县为单位计算出土地的总面积，除去山泽道路邑居，其余的耕地按良田一夫百亩的标准授予农民。授定之后，设立阡陌封疆，不许私自更动。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每户农民所受土地相同，出同等的田租，就没有畸轻畸重的问题了。

五、统一度量衡。即：“平斗桶、权衡、丈尺”。后来秦国还专门作了标准器，并定期进行检核。不按标准器行事，则予以处罚。传世的商鞅方升，作为孝公十八年，可证。

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这时“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商鞅认为，他们都是“乱化之民”，“尽迁之于边城”。再后就没有人敢非议法令了。只有“公子虔复犯约，劓之”。从此，秦国成了全面实行封建法制的富强国家。“天子致伯”，“诸侯毕贺”。

三、商鞅取西河

马陵之战，魏军大败。秦孝公高兴地说：“前些年，魏国任用庞涓，常常来攻打我们，现在庞涓死了，魏国的力量也削弱了，我们不用再提心吊胆。”秦相国商鞅对秦孝公说：“秦国和魏国是邻邦，如今魏被齐打败了，暂时没有多大力量了。但是，魏国对秦国来说，总是一块心腹之患，不是魏国侵吞秦国，就是秦国攻取魏国，其势不两立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我们不应给魏国以喘息的机会，趁他现在刚刚败于齐，诸侯中又无人帮助他，我们发兵攻打魏国。魏国无力反抗，就会继续向东迁移，我们也好向东发展，把中原诸国都征服了，这是成就帝王之业的好机会。”秦孝公听了商鞅的话，十分高兴，就任商鞅为大将，公子少官副之，统兵五万攻伐魏国。

这次商鞅要攻占的是魏国西河之地。西河在吴起镇守时固若金汤。可是魏武侯身边的谗臣王错不断说吴起的坏话，最终免去了吴起的西河守职务。吴起便怀愤愤之心离魏到楚国去了。魏惠王接到西河守臣的告急文书，便会集群臣，商讨抵御秦军的计谋。公子卬说：“商鞅过去在魏国的时候与我很好，我曾经向大王举荐过他。现在我愿意率兵前去，先与他讲和，如果不行，我们就固守城池，请韩赵之兵援救。”魏王便拜公子卬为大将，率兵五万，进屯吴城，抵御侵犯西河的秦兵。

公子卬正要给商鞅写信，让其罢兵，商鞅则先把书信送到。信中说：“我们原来在一起时，亲如兄弟，现在虽然是为两个国君服务，都身为将军，可是我怎么能忍心与你交战呢？因

此想与你相会，都去掉兵甲，到玉泉山宴饮，以避免两国交战，人民肝脑涂地。你如果愿意，就请确定日期。”公子卬看后说：“这正是我的心愿。”便回书商鞅，约定相见日期。然后商鞅又送给公子卬秦地特产旱藕和麝香，表示诚实信用，使公子卬确信无疑。

到了约定日期，商鞅将秦兵四散埋伏，约定放炮为号，把来人全部擒获。公子卬却坦然无疑，与商鞅相见。正在宴饮之时，忽听一声炮响，公子卬一行全部束手就擒。商鞅又让公子卬随从赚开吴城城门，秦兵在后飞奔而来。西河守官无力抵抗，商鞅长驱直入，威逼魏国旧都安邑。魏惠王听到消息，吓得心惊肉跳，连忙派大夫龙贾到秦军中讲和。商鞅对龙贾说：“先前魏王不用我，我便到秦国求仕。现在秦王任我为相国，又把兵权交给我，我如果不消灭魏国，有负秦王的重托。”龙贾说：“我听说‘良鸟恋旧林，良臣怀故主’。魏王虽然没有重用你，但你毕竟在魏国做过官，你难道就如此无情？”商鞅沉思了一会儿说：“如果要我班师，只有把西河之地都献与秦国才行。”龙贾也只有如此，便把西河七百里地都交与秦国。商鞅受地后，回复秦王。秦王见商鞅伐魏有功，便把商、於（今河南析川县）等十五座城封赐给商鞅。

商鞅攻占西河之地，使魏的国力进一步削弱，魏便一步步退出了强国行列。

第四节 燕齐角逐

一、济西之战

战国中期,随着魏国霸权的衰落,齐、秦两强成为左右天下局势的主导力量。它们东西对峙,互争短长,使当时的争雄兼并战争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在齐、秦各自称雄东西的战略大背景下,齐、燕两国的矛盾也十分紧张。当时,较弱的燕国是齐的近邻,双方曾结下过不共戴天的仇恨:公元前 318 年燕王哙演出一场“禅让”的闹剧,将君位让于相国子之,结果导致太子平与子之因争夺王位而发生内乱。齐宣王于公元前 314 年乘机发兵攻燕,在 50 天之内攻下燕都蓟(今北京一带),杀燕王哙和子之。但由于齐军在燕国大肆烧杀抢掠,燕国民众纷纷起来反抗,各诸侯国也准备出兵救燕,迫使齐军撤退。太子平即位为王,即燕昭王。经过这一番周折冲突后,燕国对齐怀有深仇大恨,衔思报复。燕昭王即位后,广招贤士,改革内政,发展生产,增强军力,积极准备报齐破国之仇。

当然,从两国的实力对比来看,齐国占有明显的优势。可是自周赧王十四年(公元前 301 年)齐湣王即位以来,齐国极盛的势头却面临着夭折的可能。齐湣王毫无战略头脑,只知道

穷兵黩武，四面树敌，南攻宋、楚，西击三晋，连年征战，劳师疲众，弄得国力日耗，处境孤立。所以，从表面上看，齐国处处得手，神气十足，可实际上早已是危机四伏，衰败在即。

齐国失败的契机，为燕昭王君臣捕捉到了，准备乘机攻齐。公元前 288 年，秦约齐王同时称帝，结成联盟。燕再一次派苏秦到齐国从事离间活动，劝说齐湣王撕毁齐、秦盟约，废除帝号，而后伺机灭亡宋国。昏庸的湣王果然被打动，于同年年底废除帝号，转而与各国合纵攻秦，迫使秦国“废帝请服”。齐湣王取得攻秦之战的胜利后，又经过三次战争，灭掉了宋国。邻近齐国的宋国，土地肥沃，生产发达，其大商业城市定陶的数量可观的税收，尤为齐、秦、赵三国所垂涎。齐攻灭宋国，不仅加剧了齐国同秦、赵的矛盾，也对韩、魏、楚形成相当的威胁，因此导致齐与各国矛盾异常尖锐。燕利用这种形势，积极活动，终于和各国结成攻齐联盟。

周赧王三十一年（公元前 284 年），燕昭王任命乐毅为上将军，统兵伐齐，乐毅佩赵国相印，与赵、秦、魏、韩等国军队约期会师，组成五国联军浩浩荡荡向齐国进军。

齐湣王骄傲自恃，忘乎所以，开始并未料到燕国会联合诸国攻齐。及至发现燕军已攻入齐国时，才匆忙任命触子为将，率领全国军队主力渡过济水，西进拒敌。

联军主帅乐毅鉴于当时齐军主力已被消灭，难以组织有效抵抗的实际情况，果断遣返秦、韩两国的军队，并让魏军去攻取宋国的故地，让赵军去攻占河间，免得诸国继续分享伐齐的胜利成果。尔后，他针对齐国兵力空虚，主力被歼后的恐惧心理，指挥燕军实施战略追击，长驱直入，直捣齐都临淄，一举

加以占领,从而摧毁了齐军的指挥中枢。齐湣王被迫出逃至莒(今山东莒县)。此时楚顷襄王为分占齐地,便以救齐为名,派淖齿率兵入齐。齐湣王幻想借楚军力量抵抗燕军,便委任淖齿为相。淖齿在莒地杀掉了齐湣王,并夺回了以前被齐占去的淮北之地。

攻克临淄后,乐毅根据战局的发展,进一步制定了征服齐国的作战计划。一方面采取布施德政、收取民心的政策,申明军纪,严禁掳掠,废除残暴法令和苛捐杂税,进行政治攻心。另一方面分兵五路,以期彻底消灭齐军,占领齐国全境。燕军五路大军进展顺利,仅在6个月的时间里,就攻取了齐国的70余城,只剩下莒(今山东莒县)和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两座孤城侥幸未被攻克。强盛一时的齐国此时已濒临亡国的边缘,沧海桑田,天翻地覆,真可以说是盛衰无常!

二、即墨之战

齐国毕竟是一个富有尚武传统的大国,齐国军民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在十分困难的局面下,他们奋起了,他们以死相拼了,从而为扭转战局,摆脱覆亡带来了一线希望。

周赧王三十二年(公元前283年),齐国大臣王孙贾等人设计杀死趁火打劫的楚将淖齿,拥立齐湣王之子法章为齐襄王,坚守莒城,并传檄齐地,号召广大民众起来抵抗燕军的侵伐。另一座未曾沦陷的城池——即墨的军民,也在其守将战死殉国之后,一致公推有勇有谋的齐宗室人士田单为守将,万众一心共同坚守城池,抗击燕军,这样便形成了齐国当时两个抗

燕的坚强堡垒。燕军统帅乐毅知道自己这一回碰上了两块难啃的骨头,只好重新调整自己的军事部署,集中右军和前军攻打莒城,左军和后军进攻即墨。希望尽快地攻陷两城,完成灭齐的宏伟大业。

可是燕军这次却打得很不顺手,进攻莒和即墨一年有余,除了损折了一些兵将,其他方面毫无进展。乐毅无可奈何之下改换了战法,全面采用攻心战,下令燕军后撤至距离两城 9 里的地方筑营建垒,以示长期围困,并传令凡城中居民有外出的一律不加拘捕,有困难的慷慨予以赈济,想借此来动摇齐守城军民的意志,努力争取不战而下两城。可是此计似乎也没有很大效果,三年时间悄悄过去了,两城依然没有被攻克。

即墨为齐国境内较大的都邑,地处比较富庶的胶东,依山傍海,土地肥沃,财物丰富,有坚固的城池和较雄厚的人力可用于防守。田单被推举为将后,为挽救危局,除了大力开展争取人心的工作外,还将所带的族兵及收容的残兵 7000 余人,及时加以整顿和扩充;又身先士卒,带头构筑城防工事,加固城墙,浚深濠池;把族人、妻妾编入军营参加守城。由于田单与将士同甘共苦,在各方面作出表率,致使即墨城的军民群情振奋,斗志昂扬,决心为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光复祖国山河而同燕军周旋到底。

田单复齐的机会终于出现了。公元前 279 年,燕国一代名君燕昭王撒手告别人世,燕惠王即位。这位国君早在做太子的时候便和乐毅有矛盾,这时见乐毅数年攻齐不能最后平定,自然是既不满又怀疑。田单及时捕捉到这一信息,立即派人潜入燕国进行间谍活动,到处宣扬说:乐毅借攻齐为名,想控制军

队乘机在齐国为王，所以故意缓攻莒和即墨。假如燕国另派主将，这两座孤城指日可下。燕惠王被敌人蒙骗，果然中计，委派大笨蛋骑劫前去替代乐毅。乐毅被撤换，不仅使田单少了一个难以对付的敌手，而且也使得燕军将士愤愤不平，军心涣散。

骑劫兴冲冲到任后，即一反乐毅的做法，改长围为强攻，但在齐国军民的殊死抵抗面前，燕军依然被阻于坚城之下。田单使计进一步激励士气，同时也用计进一步迷惑燕军，使得燕军信以为真，一心坐待受降，完全失去了对齐军的警惕。

田单在麻痹敌军时，自己却进行着战斗准备。在全城征集了 1000 多头牛，给牛衣以锦绣，画上五彩巨龙，角上绑了利刃，尾上扎了浸油的苇束；同时挑了 5000 名精壮的士卒。一个“火牛阵”的奇袭方案准备妥当了。

公元前 279 年的一个深夜，田单下令出击，火烧牛尾，火牛怒吼着直奔燕军兵营，5000 精壮随后掩杀，城上老弱拼命敲击各种铜器，声动天地。燕军突然惊醒，又见无数火龙东奔西突，吓得慌作一团，溃不成军。

田单奇袭破围得手后，认为燕军肝胆已破，不能再作有效的抵抗，于是就决定全线反攻，乘胜追击。齐国民众痛恨燕军的暴行，纷纷群起响应，协助齐军痛打落水狗，很快就将燕军逐出国境，收复了沦陷的 70 余座城池。取得了复国斗争的胜利。

第五节 “合纵”与“连横”

一、两种对立的斗争策略

随着秦国的日益强大，各国在激烈的争斗中产生了“合纵”、“连横”两种不同战略主张。在当时的“策士”中，就有人提出过“合纵”的学说。苏秦本来先向秦王献过统一六国的策略，未被秦王采用。后转而研究“合纵”战略，他认为六国联合，土地则比秦大 5 倍，兵力比秦多 10 倍，从燕到楚南北结盟，共同反对西方秦国，这不仅能够控制秦国的向外兼并，而且可使六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于是他分别向燕、赵、韩、魏、齐、楚陈述其对秦联合作战的“合纵”战略。

苏秦至燕对燕国君说燕乃“天府”之国，如果燕能够与赵联合，对燕大有好处，进而提出燕、赵联合的策略，燕有赵为南边屏障，赵攻燕则战于百里之内，秦攻燕则战于千里之外，“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是不高明的，应与赵联合以对付秦。燕国君同意苏秦的“合纵以安燕”的主张，表示“请以国从”，并送给苏秦以车马物资，去游说赵国。

苏秦至赵对赵肃侯说：“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赵强为秦所忌，秦不敢进攻赵，顾虑韩、魏乘其后，韩与魏为赵之南蔽，秦攻韩、魏，无山川之限，韩、魏很难抵挡，必被秦所征服，

秦无后顾之忧，则祸必集中于赵。接着提出：韩、魏、齐、楚、燕、赵六国军联合，以秦为共同敌人，“六国从亲，以宾畔秦”，这样秦军就不敢出函谷害山东。并进而陈述了合纵作战计划方案。赵肃侯同意苏秦的策略，即以苏秦为代表，往邀约其他国家。苏秦游说燕、赵的最大成就，获得了赵肃侯的全力支持。

苏秦对韩宣惠王说：韩国地险兵强，而“西面事秦，交臂而服，事秦必先割地，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以有尽之地而逆无已之求”这就形成“市怨结祸”、“不战而地已削”的局面。韩宣惠王表示同意六国合纵对秦。

苏秦对魏襄王则说：魏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国力之强盛不亚于楚，且有武士 20 万，苍头 20 万，奋击 20 万，厮徒 10 万，车 600 乘，骑 5000 匹，是天下的强国。而“事秦必割地以效实，故兵未用而国已亏矣”，进而提出“六国从亲，专心并力壹意，则必无强秦之患”。得到魏襄王的赞同。

苏秦对齐宣王说：齐国地方 2000 余里，带甲数 10 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王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齐国富兵强，如能与五国诸侯联合抗秦，则秦绝不敢进攻齐，并可免去韩、魏攻击它的后背。齐王也很赞同苏秦合纵抗秦的战略，同意合纵。

苏秦对楚威王则劝说，楚为天下之最强国也，地方 6000 余里，带甲 100 万，车 1000 乘，骑万匹，粟支 10 年，此霸王之姿也。参加合纵以孤秦，秦最怕楚，“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楚只能从联合 5 国，以孤秦之势。“故从亲则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则楚割地以事秦，利害关系昭然若揭。”楚威王表示赞成苏秦的“合纵”建议，并表示“谨奉社稷以从”。

苏秦说服六国，获得成功，紧接着组成六国联合阵线，并约定“秦攻一国，五国各出精锐师旅，或挠或救”，“诸侯有先背者，五国共伐之”。苏秦由此佩上六国相印，担任“纵约长”，执行合纵这一重大战略决策。

著名策士张仪为着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西往秦国，向秦惠王提出了政治军事上的重要建议，成为秦国首相。张仪针对合纵对秦战略，提出：“连横事秦”的战略和策略，以扩张领土破坏六国的合纵联盟。所谓“连横”就是与山（关）东任何一国，结成横向联盟，以攻击其他各国，或通过谋略欺诈迫使其他各国割地并向秦国屈服。因此，张仪一上任即展开紧张的外交活动。

张仪先后任秦国相 19 年，全力推行他的连横事秦的政治和军事战略。他想先让魏屈服，做出事秦的榜样。周显王四十一年，秦惠文王十年（公元前 328 年），张仪率秦军打败了魏军，夺取了魏之蒲阳，又归还给魏，以拉拢魏。张仪出任魏相后，由于劝说魏惠王事秦遭到拒绝，暗使秦军再次伐魏，攻占魏曲沃、平周，进一步使魏受到威胁，但魏仍未屈服。周慎靓王三年（公元前 318 年），楚、魏、赵、燕、韩合纵攻秦失败。次年，秦军伐韩，斩韩军 8 万人。各诸侯国对秦深为恐惧，张仪趁此进一步威胁魏襄王事秦，魏终于屈服。于是，魏脱离“纵约”，向秦请和。

张仪在迫魏屈服后，又施展远交近攻之谋，以离间欺诈手段，拆散了齐楚联盟，待楚与齐绝交后，秦便抵赖曾答应给楚割地 600 里的诺言。楚一怒之下，出兵伐秦。楚秦两军在丹阳大战，楚军惨败，主将被俘，8 万人被杀。楚再发全国之兵，与

秦军在蓝田决战，又被秦军打败，楚不得已割汉中郡给秦以讲和。接着秦又提出以武关以外的地区换取楚之黔中郡，张仪并用“秦若攻打楚国，3个月之内即可灭亡楚”的危言恐吓楚国，楚怀王终于屈服，迫于秦的压力，与秦议和。张仪于是围向韩、齐、赵、燕活动。

张仪至韩，仍用同样的手法对韩王说，秦兵与山东之兵，如果联合攻打韩国，“无异垂千钧之重于鸟卵之上”。“先事秦则安，不事秦则危”。如果韩违背了秦国的这一意愿，秦一出兵，韩国就会国破家亡。因此，韩最好的出路，莫为事秦，连横向楚进攻，这样就可以取得秦国的欢心，能够免除秦国向韩国进攻的战祸。韩王于是接受了张仪的建议，转向秦国方面。

张仪至齐，对齐王说：不能听信一些人认为齐国地广人多、国富兵强的说法，实际上齐国并不强大。借以打掉齐国的自信心。进而威胁齐王说：现在秦、楚两国联姻，是昆弟之国，韩、赵、魏均已献地事秦，如果齐国不事秦，秦统率这些国家攻齐，齐国就要灭亡。张仪催促齐王在这样事关国家安危的问题上，不可犹豫不决，否则一旦战争打起来，就为时过晚了。齐王于是同意了张仪的说法，与秦和好，并希望与秦成为东西并立的两大友好国家。

张仪至赵，见了赵惠王，一方面指责赵国，一方面又渲染了一番秦国与诸国连横势力如何强大，用以恐吓赵国。张仪对赵惠王说：赵国不该用苏秦合纵之谋，联合其他国家抵抗秦国，使得秦军15年不敢出函谷关，秦国早已对赵怀恨在心。如今秦国兵力强大，并与楚国联姻，齐、韩、魏也献地朝贡秦国，这就砍断了赵国的右肩，没有右肩是不能搏斗的。如果秦国指

挥齐军进占邯郸和成皋，令韩魏军进占河外、浍池等地。这样，四国一齐伐赵，赵必然被四分五裂，不如约见秦王，相约和好。赵王无可奈何，只得屈从张仪。

张仪至燕，通过分裂燕、赵的关系，而使燕屈服。张仪对燕昭王说：赵国心狠，要吞并别人是不分亲疏的。现在赵王已经臣服于秦，燕如不事秦，秦就要命赵攻燕，这样燕必然为赵所灭。如果燕能事秦，齐、赵两国已经是秦的臣国，没有秦的许可，赵绝不敢进攻燕，燕就可永保平安了。于是，燕王表示臣服事秦，献出恒山五城，以表示对秦的诚意。

经过张仪的“连横而斗诸侯”的一系列活动，将各国“合纵”对秦的局面，转化成“连横”事秦，达到了秦国的战略目的。张仪“连横”战略的成就，对推动中国由长期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大国合纵对秦战争

赵魏燕韩楚五国联合攻秦

秦相张仪来魏，向惠王提出秦、韩与魏联合伐齐的建议，被惠王接受，起用张仪为相。张仪当上魏相后，就积极实现他的“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的所谓“连横”策略，压迫东方各国。在这种形势下，齐、楚、燕、韩、赵五国又联合支持主持“合纵”策略的公孙衍。魏惠王为了巩固与五国的政治关系，改任公孙衍为相国，把张仪赶回秦国。公孙衍这位素见重于六国的新相国，展开“合纵”策略，联合各国，组织第一次“五国伐秦

之战”。实际参加作战的有燕、韩、赵、魏四国军队，公举楚怀王为联合军的“纵约长”，于周慎靓王三年，声势浩大的四国联军，排除秦军的抵抗，打到秦东方战略要隘函谷关。但由于秦军的奋力抵抗，联军最终被秦军击败。四国联军的进攻，虽然没有达到战略目的，但对秦震动极大，纵、横双方的斗争，更加激烈化。

齐魏韩三国联合攻秦

继五国联合攻秦之后，六国间虽也知道应以对秦作战为主，但在此期间，由于秦国极力破坏六国的合纵，挑动各国之间互相攻伐，以削弱六国的实力，所以各国之间也发生过一些战争。周赧王十四年（公元前 301 年），韩、魏受秦军事压力，向东方大国齐靠拢。齐相孟尝君田文，加紧对韩、魏的联合工作，终于促成齐、魏、韩三国合兵对楚进攻。齐将匡章、魏将公孙喜、韩将暴鸢统率的联合军，进攻楚的方城，经过 6 个月交战，击破楚军于小 汭水上的垂沙，宛叶以北地区被韩、魏所占有。齐、韩、魏联合作战的胜利，不仅使楚军屈服，秦也惶恐不安。秦为了拆散这三国的合纵联盟，提出由秦王之弟泾阳君至齐为质，与齐修好。到秦王政十八年，魏景湣王十四年，韩王安十年，楚幽王九年，赵王迁七年（公元前 229 年），秦又邀请孟尝君田文入秦，担任秦相。表面上对齐友好，实际是把田文控制于咸阳，以破坏他的“合纵”战略。这一行动立即引起赵国严重不安，秦、齐两大国联合的战略形势，使赵陷于两面受敌的危险，于是赵国发动政治攻势，策动秦贵族穰里疾借口田文“外借秦权，阴为齐谋”，促使秦免去孟尝君相位，改任楼缓为相。

周赧王十七年，齐、韩、魏三国联合对秦进攻。战争开始后，赵、宋两国并未真正协助秦国作战，而是利用大国间的矛盾冲突，乘三国与秦作战之机，兼并邻近其他小国，以扩充自己的领土。三国进攻秦国的战争，连续3年之久，最后攻进函谷关，迫使秦国承认战败，退还侵占魏的河外、封陵和韩的河外、武隧等地区，缔结了和约，停止了战争。

华阳之战

华阳战役开始于公元前275年。楚国被秦军击破，秦军进攻重点转向韩、魏。韩被迫倒向秦，魏则联赵抗秦。秦军给魏赵联军以歼灭性打击，秦在中原的战略形势大有压倒各国之势。

公元前275年，秦军第2次大举对魏进攻时，韩将暴鸢率兵援魏，遭秦军打击，损失数万士卒。秦、魏战争结束两年后，秦联合赵，企图再度对魏进攻。魏为摆脱困境，由将军芒卯担负分裂秦、赵，把赵化敌为友的任务。为此，派遣谋士张倚前往赵国。张倚到赵，向赵王提出：魏愿以邺城奉送于赵。赵王当即与大臣商讨，认为若与秦合作攻魏，即使得胜也不过得到邺这类大城邑。今不用兵而得到邺，应当接受魏的献礼。于是，赵表示接受魏的建议，张倚乘机提出赵何以“报魏”？赵表示与秦断绝关系，因而秦、赵关系随之破裂。但芒卯过后却否认张倚代表魏把邺城送给赵的诺言，推托说是使臣的信口开河。赵则顾虑魏会利用秦、赵关系的恶化，与秦联合，转而对赵。为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割出5城予魏，魏、赵实现联合。但联合起来后并未对秦，而是把进攻矛头指向三晋兄弟之邦的韩国。

魏、赵联军向韩发动进攻，打到韩战略要地华阳。韩军虽然奋起应战，终以力量悬殊，未能打退魏、赵的进攻，形势紧张危急，韩不得已，向秦告急，秦王不救。韩相国派谋士陈筮去秦会见秦相魏冉请求秦立即出兵救韩，但魏冉仍不派兵。陈筮对魏冉说：你如果不救韩，韩将投向魏、赵。魏冉听了陈筮这些话，才感到秦应当援救韩国，否则韩或被魏、赵瓜分，或转向齐、楚，对秦是严重的威胁。于是决定即刻出兵救韩，从而导致了华阳战役的发生。

周赧王四十二年（公元前 273 年），白起指挥秦军东进援韩，急行军 8 日到达华阳城附近。芒卯以秦军的出现，战况变化，乃停止对华阳的围攻，转移兵力，向到达的秦军进攻。

华阳附近迅即展开交战，秦军攻势虽猛，魏军也奋勇力战，双方反复冲杀。战斗剧烈，互有进退，芒卯亲临前线督战，白起也指挥将士战斗，魏军在华阳久战力疲，伤亡过重，无力继续战斗，而被击破。统帅芒卯则收容残部撤出战场，向大梁方向退却。秦军获得华阳城郊阳作战的胜利。

魏军被秦军击破，退出战场。白起立即转移兵力，对赵军进攻。赵将贾偃以魏军被击破，赵军处境危急，乃向黄河南岸退走，打算渡河魏国，秦军追上，两军再战。赵军一面抵抗，同时渡河，被击死达 2 万以上。秦军前后共歼灭魏、赵军 15 万众，胜利地结束了华阳战役。

秦军两战两胜，击破魏、赵军，韩国遭到的战争压力为之解除。白起乘胜前进，迅即推进到魏首都大梁。魏军主力消耗于华阳，无法编成新军应战，大梁陷入秦军围攻之中，这是秦军第 3 次对大梁的围攻，大有一举灭魏之势。

秦军虽停止围攻，但双方并未立即达成和议，战事有随时再起的危险。魏将段于子向魏王建议割出南阳以求和议的建议，魏王权衡形势，决定把南阳割给秦国。秦军见魏割让南阳，同意停战议和，凯旋而归。

赵楚燕韩魏五国联合攻秦

秦王政六年，赵将庞煖组成第五次联军，推举楚王为联军统帅“纵约长”，由楚相春申君黄歇代行纵约长指挥权。庞煖向黄歇和其他国的将领说明过去关东诸侯对秦作战，主要战略是攻取函谷关，以为只要攻克此关，就能顺利向秦国腹地推进，但终因关隘险要攻而不克，多次受挫，遭到失败。这次应经蒲关渡河直冲渭南。于是五国军队声势汹涌的经河东由蒲关渡河，伸进关中腹地，排除秦军抵抗，进抵距咸阳不远的蕞城。企图攻克蕞城，长驱直入，进攻咸阳。但由于蕞城秦兵顽强坚守，屹立不动，联军久攻不克，出现胶着状态。联军攻城不克，只得停止西进，这给了秦军调动、整顿的时间，重整阵容。后来联军改变战略，攻进关中，打了秦军一个措手不及，首都咸阳形势紧张，国相吕不韦，亲自担任统帅，指挥秦军，进驻灞桥，迎击关东五国军队。汇集于灞桥附近秦军的兵力有王翦、李信、桓喆等约 10 多万人。

秦军认为：“以五国精锐，攻一城而不克，其无能可知”，“晋习秦战，楚兵久未经过战争”进而决定“集中兵力攻楚，击破楚军，其他各国军队会闻风崩溃”。于是除留下部分军队与赵、魏保持对峙状态外，于五军中各抽出精兵 1 万，进攻楚军，

并规定夜间开始行动。由于李信军的一个军官，运粮误期，受到斥责，暗地叛逃于楚军，把秦军作战计划完全泄露给楚军。而黄歇这位庸愚无能的联合军统帅，闻讯后竟惊慌失措，没有通知友军，只率楚军仓猝撤退，离开战场，返回楚国。当秦军按预定计划，对楚军实施大规模夜袭，进入楚军兵营，才发现楚营无人，扑了个空。王翦当即回军转攻联合军队的主力赵军。王翦、蒙骜、李信等率领将士猛攻赵营。赵军统帅庞火爰遭秦军突然猛袭，一方面严令所属，不得妄动，沉着应战，一方面自己亲临营门镇静指挥。双方展开激战，秦军攻势虽猛，赵兵巍然不动，两军激战到天明，韩、魏、燕军闻赵军被攻，前来救援，秦军才停止攻击，收兵回营。秦、赵两军经过这次激战，王翦等将领，称赞赵军战斗力强，并赞扬赵将庞火爰遇到夜袭，临危不惊，从容镇静和韩、魏、燕各军将领，在秦军收兵后，再了解到楚军放弃友军，不战而走的原因，深感痛惜。并一致认为这次“合纵”对秦作战，已失去取胜的希望。于是各自收兵回国。庞火爰既不满楚军的不战而走，又痛恨齐国的拒不参加联合行动，于返国途中，联合燕军，东攻齐属饶安，攻克了饶安城，以示泄愤。自此第五次联合对秦进攻后，六国再没有组成过“合纵”阵线。形势的发展对秦极为有利，为秦将六国各个击破创造了条件。

第六节 秦赵较量

一、胡服骑射

赵国在三家分晋之前就进行了一些田制改革,争取了人心。到赵烈侯(前 409——前 387 年)时,任用公孙连为相,牛畜为师,荀欣为中尉,徐越为内史,整顿吏治,改善统治机构,根据功德和能力大小授与官职,节财俭用,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赵敬侯(前 387—前 375 年)时,赵国继续改革,着重发展生产和加强军事训练,使赵国的经济得到发展。而真正使赵国强盛起来的改革,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是赵国的第六代君主,他继位时,赵国在七雄中只能算二三等国家,国势较弱,经常受到强国的欺侮,曾被齐国、秦国打败,割地与秦国求和。如果这样下去,赵国有被蚕并的危险。因此,赵武灵王决心图强。可是从哪里做起呢?由于赵国北部和东部大多与胡人部落相邻,与胡人接触较多,每每看到胡人作战时,身穿短衣,骑在马上,举动灵便,往来如飞,一边跑一边射箭,流动性很大,战斗力很强,使赵武灵王受到很大启发。他认为,要使赵国强大起来,必须先让军队强大起来,增强战斗力,因为赵国东北面与燕、东胡相接,北面与林

胡、楼烦相连，南面和西南面又处在韩、魏、秦包围之中，东面又是强齐，中山处于赵的国心之地，没有强兵就不能生存。于是他决定在军政制度上进行改革，第一步就是向胡人学习，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骑兵。

建立骑兵就必须改变汉人的服装。汉人的服装当时都是宽袍大袖，袍子必须拖地盖脚，衣袖宽到膝盖，长得伸不出手来，走起路来必须慢慢地，一步一摇地往前挪。战服又甲盔笨重、结扎繁琐，骑马很不方便。赵武灵王决定向胡人学习，改革士兵服装，采用胡人的短衣、长裤。然而，这一服装上的改革关系到赵人的习惯，关系到整个社会风气，社会阻力很大。

赵武灵王与大臣们商议改穿胡服一事，他说：“现在我想继承先王的事业，把赵国发展得更强大。但凡想建立特殊功业的人，往往都要受到旧习惯势力的牵制，凡是能提出独到见解的人，也常常会遭到一些人的非议。我现在打算让赵国的臣民、将士穿胡服，习骑射，这实际上是有利于国家的事情。但是我担心这样做不被人们理解，甚至还会有人讥笑我，应当怎么办呢？”国相肥义说：“我听说，如果一个人在事业上优柔寡断，疑虑重重，就不会在事业上取得成功。你既然要建功立业，又决心摆脱世俗，就不该去顾那些来自世俗偏见的非议。”听了肥义支持的话，赵武灵王非常高兴。

赵武灵王又派人告诉叔父公子成，请他在贵族中带头着胡服。公子成对此很是反对，他说：“我听说，中国这个地方，是聪明才智的人聚居的地方，是古代先贤进行教化的地方，是仁义道德施行的地方，历来被远方国家学习，被四方不开化的民

族效法。如今大王却要在全中国下令改穿胡服,这不是在改变古代的礼教,更换古代的准则,违背臣民的心愿,背离圣贤的教诲,背叛原来的习俗吗?应当三思而行啊!”赵武灵王听了公子成的话并不气馁,而是亲自到公子成家劝说:“历代圣人都是主张因地制宜的,并根据社会的发展和实际需要修定礼法,依据的原则就是利民富国。可是你为了承袭传统习俗,固守世俗偏见,却不顾继承先王大业,更不为国家的长远考虑,这可不是我对你的希望啊!”公子成听了这番话,心悦诚服地穿上了赵王赐给的胡服。还有一些贵族大臣有意见,赵王就对他们说:“古今的习俗不同,没有效法的。三王时也各自看形势制礼、制法,看怎么合适就怎么定,衣服器械也要看怎么方便就怎么用。贤圣的君主,不沿袭前代而成就王业,昏庸的君主,不变易先王的礼法也要灭亡。”至此,保守大臣们谁都无力反驳赵武灵王所讲述的道理,表示赞成这项改革。只有公族赵燕迟迟不着胡服,赵王严令说:“我已胡服,你却迟迟不胡服,有意违抗我,犯了大罪,小心我会对你处以极刑,以示天下执法之严。”赵燕听后,一再称罪并立即胡服。

同时,赵武灵王还亲自训练士兵,组成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骑兵成了赵国军队的主力。公元前306年,赵武灵王率领骑兵攻取胡地到榆中一带(今内蒙古河套东北部),辟地千里。第二年又带兵攻打中山国。号称千乘之国的中山,把车阵摆得很长,看起来声势很大。赵武灵王把自己的队伍分成两支,一支正面近战,敌战深入,一支绕到中山军队背后。赵军边战边退,中山军只顾追赶,但车队怎能追上骑兵呢?正当中山军冲

得起劲，赵军的伏兵和背后骑兵飞快地冲杀过来，把中山军队的车阵冲得七零八落，中山军大败，中山国献四邑求和。公元前 300 年，赵国又大举攻中山，扩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公元 296 年，赵灭中山国。从此赵国的领土扩大，国力大增，提高了威望，中原各国都来朝贺。

赵武灵王在取得一系列胜利后，于公元前 298 年把君位传给自己的小儿子何，以肥义为相，辅佐朝政，自己称为“主父”，专心致力于武功。他的长子公子章封于代，有地盘、有势力，他对赵武灵王传位一事极为不满。当时李兑对肥义说：“公子章势力大，事情有变，你性命难保，不如装病辞官，把相位让出来。”肥义说：“主父把王托给我，我拜命受了重托，我宁愿忠于我的诺言，怎么能只顾自己的安全呢？”公元前 295 年，公子章果然与相国田不礼发努政变，杀了肥义。公子成和李兑又调四邑之兵，杀死公子章和田不礼，并把赵武灵王围困在沙丘宫室中三个月，活活饿死。这次赵国内乱，使赵国力量减弱了。

后来，赵惠文王启用廉颇、蔺相如、赵奢等有才能的人辅政，继承赵武灵王之业，赵国又因之强盛起来。

二、渑池之会

公元前 282 年，秦国派大将白起，攻取了赵国的蔺（今山西离石县西）和祁（今山西祁县）两块地方。

赵惠文王十八年（公元前 281 年），秦国又派兵向赵国进攻。秦国费了很大的力气，攻下了赵国的石城（今河南林县西

南);过了一年,秦军进攻则指向战略要地光狼城,并派遣白起来指挥,战争规模逐渐有了扩大趋势。秦军歼灭赵军2人,占领了光狼城。

公元前279年(赵惠文王二十年),秦昭襄王认为双方相持不下,倒不如先和赵国讲和,腾出力量去攻打楚国。就在这一年,秦王派了使臣到赵国去,约会赵惠文王在西河外的渑池约会见面,互相修好。

赵王害怕强大的秦国,想推辞不去。大将军廉颇和上大夫蔺相如商议,认为赵王推辞不去,不是个好办法,便向赵王说:

“秦王来约大王会谈,如果大王不去,那就是表示我们赵国没有力量,显得太胆小了,所以还是去好。”

赵王这才决定去渑池赴会,蔺相如也随着赵王一起去了。

大将军廉颇把赵王送到边境。在分别的时候,廉颇和赵王约定说:“这次大王去渑池,估计路上来回的行程,加上会见的时间,前后不会超过30天。为了防止发生意外,要是过了日期还不见大王回来,请大王让我们立太子为王,这样就可以断绝秦国扣留大王来要挟赵国的念头。”赵王也同意了。廉颇还在边境上布置了军队,防备秦国的进攻。

赵王到了渑池,和秦王会见了。双方见面行过礼,便在筵席上叙谈。秦王有意侮辱赵王。他对赵王不客气地说:“我听说你喜欢弹瑟,我这里有瑟,请你弹一只曲子给我听听!”

赵王不敢推辞,只好弹了一曲。

秦王身边有御史。这时秦国的御史走来,把这件事情写在简上:某年某月某日,秦王和赵王在渑池会宴,秦王命令赵王

弹瑟。

蔺相如认为这是对赵国的莫大侮辱，心里十分恼火，再也不能忍受，于是他便上前对秦王说：“赵王听说秦王擅长奏秦国的乐器，我献上一个盆缶，请你敲敲盆缶给大家快活快活。”

秦王听了大怒，脸刷地变了色，不肯答应。蔺相如见秦王不肯敲，便揣起盆缶走过去，把它献给秦王。秦王还是不肯敲，蔺相如就说：“现在我离开大王只有五步，如果大王不答应我的要求，在这五步之内，我拼着不要脑袋，也要溅你一身鲜血。”意思是要和秦王拼命。

秦王的侍卫看到秦王受到胁迫，慌忙拔出刀来，要杀蔺相如。蔺相如瞪起眼睛，大声喝住他们，吓得侍卫不由向后倒退。秦王心里很不高兴，只好勉强地在盆缶上“当”地敲了一声。蔺相如回头叫赵国的御史，也把这件事情记下来：某年某月某日，赵王和秦王在渑池会宴，赵王命令秦王敲盆缶助兴。

秦国的大臣们见秦王没有占到便宜，就说：“今天相会不易，请赵王献出 15 座城替秦王祝福！”

蔺相如也不示弱，说：“既然赵王献城替秦王祝福，那么请秦王把国都咸阳（在今陕西咸阳县东）献出替赵王祝福！”

蔺相如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机智而勇敢地和秦国的君臣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秦国始终没有把赵国压倒。当时秦国也知道赵国的大将廉颇率领军队驻扎在国境上，便不敢冒失地动用武力。以后，秦、赵间暂时停止了战争。

渑池相会是秦、赵两国在政治、外交上的一场斗争。由于蔺相如不顾生命危险，机智勇敢地挫败了秦国的气焰，秦国才

没有占到赵国的便宜。

三、秦赵阏与之战

阏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地处太行山山脊，东有大道直达邯郸，西有通路至韩国之上党，为赵首都邯郸西面之战略咽喉要地。

周赧王四十五年，秦王于华阳战胜魏、赵，稳定中原形势后，接着派遣中更胡阳率兵通过魏国轹关，越过韩属上党，进攻赵国西部险要——阏与。阏与城战起，传至赵都邯郸。赵惠文王立即召集重要将相大臣商讨对策，当时出现了救与不救两种意见的分歧：

廉颇、乐乘等将领认为：“道远险狭，难救”主张不派兵援救阏与。赵奢则说：“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赵王认为赵奢言之有理，能够胜任救阏与之重任。于是派赵奢为统帅，率兵前往援救阏与，巩固这个战略要地，解除对京都可能造成的威胁。

周赧王四十五年，赵奢率军由邯郸出发，行军 30 里即停止前进，安营扎垒，并命令军中说：“有以军事谏者死”。秦军到达武安以西，勒兵鼓噪，声势汹涌，武安城内屋瓦皆震。赵军有一中侯建议“急救武安”，赵奢以为违犯军令立即斩之，坚壁 28 日不动，并加紧加固营垒工事。赵军这种驻军筑垒、停留不进的情况被秦军派出的侦察人员发现后回报。胡阳竟大喜说：“夫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乃增垒，阏与非赵地也”。赵奢则于

秦军间谍走后，立即率军，卷甲急进。两日一夜到达距阨与 50 里处，停军筑垒。

胡阳闻悉赵军到达阨与以东，形势突变，立即决定留兵继续围攻阨与城，主力迎击到达的赵军。

秦军突然向东进攻援救阨与的赵军。两军即将交手前，赵军将领许历不顾“以军事谏者死”的禁令，向赵奢提出“请以军事谏”。赵奢命许历陈述意见，许历说：“秦军没有料想到赵军已到，他们的部队前来，士气旺盛，你必须加强部署，待机破敌。”许历并说：“先占领阨与北面山头的就胜利，后占领的就失败”。

赵奢赞成许历的建议，立即派出万余人急进，占据高山。秦军迟到一步，展开攻击。而北山各制高点尽在赵军手中，赵军居高临下，击退秦军的进攻。胡阳以攻击顿挫，用主力攻山，而赵军主力赶到，分路攻击秦军。山峡涧谷，鼓声雷鸣，赵军猛攻，杀声四起，秦军死者尸体纵横，填塞沟谷，全军大败崩溃。胡阳以秦军遭到惨重损失，无力再战，乃撤退围攻阨与部队，掩护残兵败将，返回秦国。这次作战为秦军进攻韩、魏、楚一系列胜利后遭到的空前大挫折。赵军则获得重大的胜利。

秦王不甘心阨与战役的失败，次年（公元前 269 年），派遣胡阳率军再度进攻阨与。由于赵国有充分准备，胡阳攻城不克，又撤军而还。秦以两次袭击阨与无成就，乃改变战略，转移兵力进攻韩属上党，企图进占上党后，以该地作为进攻赵国的战略基地。

阨与战后，赵王论功行赏，封赵奢为马服君，其政治地位

与廉颇、蔺相如并列。赵奢以阏与之战，在诸侯各国间被列于名将之列，赵军的士气和战斗力也随之提高。

四、长平之战

长平之战发生在公元前 260 年，是秦、赵之间的一次战略决战。在战争中，秦军贯彻正确的战略指导，采用灵活多变的战术，一举歼灭赵军 45 万人，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包围歼灭战先例。

秦昭王根据丞相范雎“远交近攻”的战略构想，从周赧王四十七年（公元前 268 年）起，先后出兵攻占了魏国的怀（今河南武陟西）、邢丘（今河南温县附近），迫使魏国亲附于己，接着又大举攻韩，先后攻取了陘（今河南济源西北）、高平（今河南济源西南）、少曲（今河南济源西）等重要战略据点。并于公元前 261 年攻克野王（今河南沁阳），将狭长的韩国拦腰截为两段。消息传来，韩国朝廷上下一片惊恐，急忙派遣使者入秦，以献上党郡（今山西长治一带）为屈辱条件，向秦国求和。

然而，韩国的上党太守冯亭却不愿献地入秦，他将朝廷的指令放置在一边，做出了献上党之地给赵国的抉择。他的用意当然很清楚：转移秦国的锋芒，促成赵、韩携手，共同抵御秦国，挽救被灭亡的命运。

赵王目光短浅，见天上掉下馅饼，欣喜若狂，在不计后果的情况下，将上党郡并入自己的版图。赵国的这一举动，无异于虎口夺食，秦国方面岂肯善罢甘休，秦、赵之间的矛盾因此

而全面激化了。范雎于是建议秦昭王乘机出兵攻赵。昭王便于周赧王五十四年(公元前 261 年)命令秦军一部进攻韩国缙氏(今河南偃师西南),直趋荥阳,威慑韩国,使其不敢增援赵国;同时命令左庶长王齕率领雄师扑向赵国,攻打上党。上党赵军力不能支,退守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

赵王闻报秦军长驱东进,急出一身冷汗,得地的喜悦早就去了一大半,只好兴师应战,委派宿将廉颇率赵军主力开往长平,企图以武力重新夺回上党。廉颇抵达长平前线后,即向秦军发起攻击。遗憾的是,秦强赵弱,赵国数战不利,白白地损失了一些人马。廉颇不愧为一名明智的将帅,见进攻遭受挫折,便及时调整战术,转取守势,依托有利地形,筑垒固守,以逸待劳,疲惫秦军,静候其变。廉颇的这一招颇为奏效,秦军的速决势头被抑制住了,两军在长平一带相持不决。

但是秦国的战争指导者毕竟老谋深算,棋高一着,他们运用谋略来打开缺口,使局势朝着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为尔后的战略进攻创造条件。一方面他们借赵国使者郑朱到秦国议和的机会,故意大鱼大肉殷勤款待郑朱,向各国制造秦、赵关系和解的假象,使赵国在外交上和列强“合纵”抗秦的机会失之交臂,陷于被动和孤立。另一方面,又采用离间计,派人携带财宝前赴邯郸,收买赵王左右见利忘义的权臣,让其四处散布流言蜚语,挑拨离间赵王与廉颇的关系,说什么廉颇不足畏惧,他固守防御,乃是出于要投降秦军的目的,秦军最害怕的是让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为将。终于借赵王之手,将廉颇从赵军主帅的位置上拉了下来:并使赵王不顾贤臣蔺相如和赵

括母亲的反对谏阻，任命赵括为赵军主帅。

赵括是一个缺乏实战经验，只会“纸上谈兵”的庸人。他走马上任后，一反廉颇所为，更换将佐，改变军中制度，搞得赵军上下离心离德，斗志消沉。他还改变了廉颇制定的行之有效的战略防御方针，积极筹划战略进攻，企图一举而胜，夺回上党。

秦国在搞乱赵国的同时，也适时调整了自己的军事部署：立即增加军队，起用骁勇善战的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替代王齮统率秦军。为了避免此事引起赵军的注意，秦王下令军中严守这一机密：“有敢泄武安君为将者，斩。”

白起到任后，针对赵括没有实战经验，求胜心切，鲁莽轻敌等弱点，采取了诱敌入伏、分割包围而予以聚歼的正确作战方针，对兵力作了周密细致的部署，造成了“以石击卵”的强大态势。

白起又下令突击部队不断出击被围困的赵军主力。赵军左冲右突，都无法逾越秦军铜墙铁壁一般的阵地，情况日益危急，不得不就地构筑营垒，转攻为守，等待救援。

秦昭王在都城咸阳听到赵军被围，就歼在即的消息，便亲赴河内（今河南沁阳及其附近地区），将当地 15 岁以上的男子全部编组成军，及时增援长平战场。这支部队开进到长平以北（今丹朱岭及其以东一带高地），进一步断绝了赵国的援军和后勤补给。

到了九月，赵军断粮已长达 46 天，内部互相残杀以食，军心动摇，士气涣散，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整个部队，局势万分危急。赵括困兽犹斗，负隅顽抗，组织了四支突围部队轮番冲击

秦军阵地，希望能杀开一条血路，逃脱性命，但是都无功而返，徒然增大伤亡而已。绝望之中，赵括孤注一掷，亲率赵军精锐强行突围，结果败得更惨，连他本人也丧身在秦军如蝗般的箭镞之下，带着一脑袋的僵化了的兵书条文去见上帝了。赵军失去主将，斗志全无，彻底放弃了抵抗，40余万饥疲之师全部向秦军卸甲投降。白起杀心大起，只放过其中年幼的240人的性命，将赵军降卒残忍坑杀。秦军终于取得了空前激烈残酷的长平之战的彻底胜利。

在长平之战中，秦军前后共歼灭赵军约45万人左右，从根本上削弱了当时关东六国中最为强劲的对手赵国；同时，也给其他关东诸侯国以极大的震慑。从此以后，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如邯郸之战）外，关东六国再也不能对秦国进行像模像样的抵抗，秦国兼并六国、混同天下的道路基本上畅通无阻了。

五、宜安之战

宜安战役发生于秦始皇十三年，赵迁王二年（公元前234年）。

秦军乘燕、赵发生战争，分道进攻赵国，赵以李牧为统帅，给秦军主力部队以彻底的歼灭。

赵国经过长平战争的损失，度过邯郸攻守战的艰苦岁月，接着又击破燕军的进攻。在这胜负交织期间，国内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激化。主要将领廉颇，表面上被晋升为假相国，但已不被重用，赵王饬令他率军攻魏，战争进展顺利，攻克繁阳。这

时赵孝成王死，新王就位，在反对这位老将的逆流推动下，派乐乘接替廉颇的统帅职务，结果矛盾趋于激化。廉颇愤怒之下，竟攻打乐乘。乐乘不敢就职，只是一走了之。廉颇拒绝交职，又动了武，也不好继续留在赵军之内，于是奔往魏国避难。廉颇到魏被以客礼接待，但魏王疑其动机不纯，不敢重用。后来赵军在与秦军作战中，顶不住秦军的攻势，赵王有意重任廉颇为帅，廉颇同样也想再度统率赵军。赵王派人到魏探视这位老将是否尚能重任军事统帅。而政敌郭开用重金贿赂这位使臣，使臣接受贿赂，将廉颇一饭斗米、肉 10 斤、挥舞长戟英勇不减当年、仍想报效赵国的真实情况隐瞒不报，说廉颇已老不堪用。结果使这位当代名将只好接受楚国邀请，到楚为将，常常以楚军赶不上赵军之强，有“我思用赵人”的感叹，而终老于寿春。而这对赵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廉颇这位闻名的将领离开赵国，赵以庞暖继任，引起秦、燕的轻视，尤其燕王，看到赵国疲困，廉颇去国，又发动攻赵，以报复鄲代战败的耻辱。燕相国剧辛也毫无根据地认为“庞暖易与耳”。于是燕就派出攻赵大军，庞暖率军应战，击破燕军，俘斩剧辛以下将士 2 万多人。庞暖乘胜联合楚、赵、韩、魏等国军队进攻秦国，战争无功。庞暖于撤回时联合燕军进占齐属饶安。战后不久，这位将军也因为积劳病逝，这对赵军军心士气有不小的影响。

赵将李牧，镇守代北，曾歼灭匈奴 10 万以上入侵大军，为边疆盛名显赫的将领。赵派他攻燕，曾进占武隧、方城等城。始皇十一年（公元前 236 年）冬，赵又出兵攻燕，攻取狸阳，但燕、

赵战争尚未大打，秦军则已分道向赵进攻。

秦军进攻总兵力达 30 万，赵军以 20 万人分为两路抗击秦军，双方在太行山高地漳河两岸作战，两军势均力敌，形成对峙，旋即停战休兵，各守边界，不分胜负。

秦王嬴政以进军无功，对军队进行整顿，使军内无功的佐吏以下官兵遣返回国，只留 10 万至 15 万人。王翦、桓喆、杨瑞和三部并为一军，以桓喆为统帅，担任对赵进攻的作战任务。始皇十三年，秦军再度对赵进攻，桓喆避开正面进攻，改由漳河下游渡过漳河，迂回赵南路军左侧背。赵迎战于平阳，两军展开交战，赵军被歼数万，将领扈辄阵亡。邯郸形势危急，赵王乃任命李牧为大将军，统率赵军对秦作战。李牧留下部分兵力守代，亲率主力南下。这部赵代军，乃代北歼灭 10 万匈奴胡骑，震惊当时的部队，代北战争获得胡骑的大量补充，因而机动性强，为当时各国难与匹敌的强有力的军队。

李牧新任赵军统帅，鉴于秦军近来攻克赵、魏许多城邑，兵锋甚锐，不可能迅速制胜，要因时因地制宜，利用战机，挫折敌人，并根据所率代北兵马的特点，进而决定采取列营筑垒，坚固拒守，避免决战，坐耗秦军进攻锐气。以待发现有利战机，再机动出击。

桓喆乘连战连胜的声势向赵军进攻，但却遇到和赵将扈辄作战方法完全相反的李牧。李牧固守营垒不战，使桓喆感到李牧很可能仿效长平战役中廉颇对王龁的战术，于是乃决定：分兵袭击肥下，引诱赵军的出击和救援；待赵军兵力移动时，向其主要营垒进攻。

始皇十三年，秦、赵两军对峙于宜安附近。李牧仍然实施代北对匈奴作战的战略战术，筑垒列阵，加紧训练骑射，奖赏优秀士卒，虽将士纷纷请求出击，李牧都不准出战。时日延长，秦军怕战争打成持久战，将对秦军更加不利。于是桓𡗗亲率强有力的部队袭击肥下，企图调动赵军出击以进行决战。

秦军袭击肥下，赵将赵葱提议派兵前往支援。李牧则制止说，以“敌攻而我救，是致于人，兵家所忌，”于是拒绝支援肥下的建议。同时分析认为秦军袭击肥下，大营必然空虚，若派兵袭占秦营，则桓𡗗与秦军必然会受到严重打击。于是李牧当即乘夜分兵袭击秦军营垒。赵军的行动出乎秦军意外，营垒被占，军实辎重全部为赵军所占有。桓𡗗袭击肥下尚未成功，而大营被赵军攻破的信息传来，急忙撤兵返回营救。赵军攻克秦营垒，李牧立即派兵分为左右两翼，机动迎击从肥下方面撤回的秦军。两军于宜安、肥下间地区展开激战，赵军代北士卒，奋勇当先，两翼赵军从左右钳攻，经过反复激战，秦军大败，除桓𡗗率少数护卫化装逃脱外，10 万以上的秦军全部被赵军歼灭于宜安附近，这时战国末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歼灭战。

宜安战役，赵军获得辉煌的胜利，赵人同声庆祝，赵王嘉奖李牧的功勋，李牧被称为赵国的白起，也晋封为武安君，统率全部赵军。次年（公元前 233 年），秦军又进攻赵属番吾，李牧又率军击破秦军的这次进攻，并向魏扩大其势力，赵国大有重新振作之势。

秦军经过宜安、番吾两战的挫折，对统一全国的进程影响很大。到始皇十五年（公元前 232 年），经过充分准备，大举向

赵进攻。主力军由太原进兵井陘并攻取番吾，作进攻邯郸以北的准备；另以强有力一部通过邺邑、安阳进攻邯郸南部。

李牧针对秦军的分道进攻，留司马尚军配备于邯郸以南，集中兵力先进攻由河东方面前来的敌人部队，再回击渡漳而来的秦军。秦军向孟浪、番吾前进，与李牧的赵军相遇，秦军官兵畏惧李牧军队声势，恐敌心重，接战即遭到赵军猛击，损失惨重，狼狈逃窜。李牧击破北部来犯的秦军，回师进攻南部秦军，邺城秦将闻悉番吾秦军受到严重损失，撤离漳河沿线，纷纷逃走，不敢应战，此战之后 3 年左右时间，秦军不敢再对赵进攻。

第七节 秦始皇统一六国

一、统一的趋势日渐明朗

公元前 259 年，一位秦国公子的男婴，在赵国都城邯郸出世。他姓嬴名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嬴政之父异人，又名子楚，是秦昭王的庶孙，孝文王（当时为太子）的庶子。异人的母亲夏姬不得宠。他曾作为“质子”被派往赵国，寓居赵国都城邯郸。秦昭王后期，秦赵关系紧张，异人处境困顿。当时，阳翟（今河南禹县）富商吕不韦正在邯郸经

商，结识了这位窘迫的秦国公子，认为“奇货可居”，便以重金买通孝文王的宠妻华阳夫人，立异人为太子（即秦孝文王）之嫡子，取得了继承王位的资格。

异人的父亲孝文王，是个短命的国君，即位仅三天就死了，异人因而被立为庄襄王。这位曾经失意的王孙，一跃而为国君，对吕不韦格外敬重。吕不韦立嗣有功，当上了秦国的国相，封为文信侯，食洛邑十万户，家僮达万人之多。

但是，庄襄王同样是个短命的国君。公元前 246 年，在位不过三年的庄襄王就死了，十三岁的嬴政登上了王位，吕不韦被尊为“仲父”，执掌秦国的朝政大权。秦王政虽然年幼，一时不能亲政，但是祖辈却为他完成统一大业留下了一份丰富的“遗产”。

在战国初期，齐、楚、赵、魏、韩、秦等七国，并列为“战国七雄”。其中秦国僻处雍州之地，人们视如“夷狄”之属，与山东六国相比，它是个比较落后的诸侯国。秦孝公即位后，任用商鞅，变法图强，秦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执行奖励耕战的政策，使秦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急遽增长。公元前 340 年，商鞅率军东进，击败强大的魏国，俘获魏将公子卬，使秦国“雄诸侯”，初露锋芒。从此，落后的秦国逐步跃居为“七雄”之首，商鞅变法这一社会改革，成为秦国历史发展的转折。

秦孝公死后，秦惠王继位。当时秦国的军事实力，已是屈指可数的国家。它拥有一支约百万的常备军，是当时军事力量最强的国家之一。秦的实力发展如此之快，其威望与日俱增。秦惠王即位之初，一些诸侯国无不刮目相待，楚、韩、赵、蜀纷

纷入秦朝贺；连周天子亦以礼相庆，对这位新国君表示祝贺。

秦惠王继孝公之后，凭借雄厚的军事力量，屡次击败东北方毗邻的强敌魏国。公元前331年，秦大败魏军，斩首八万，虏其将龙贾，魏国被迫割河西（今陕西澄城县以东至黄河一带）之地求和。接着，秦军渡过黄河，以破竹之势攻取汾阳（今山西荣河）、皮氏（今山西河津县），又包围魏邑焦（今河南陕县境内）和曲沃（今河南陕县西南），魏国再次把上郡十五县献给秦国。三年之间，秦接连击败魏国，收复河西失地，夺得黄河天险，顿时威震山东诸国。

秦国频频举兵东向，而且取得节节胜利，一些诸侯国望而生畏，因而“合纵”抗秦的潮流，便随之兴起了。秦惠王针锋相对，起用魏人张仪为相，以“连横”之策，对付“合纵”抗秦的力量。公元前318年，韩、赵、魏、燕、齐（一作楚）五国，联合匈奴攻秦，秦军在修鱼（今河南原阳县西南）击败韩、赵军队，韩将申差被擒，八万余人被杀。这次“合纵”抗秦，以失败而告终。

秦的东北方大局既定，遂将注意力转向西南的巴蜀和东南的楚国。当时楚国的实力比魏强，又是秦在东南方的毗邻，时时威胁着秦国。秦视楚如心腹之患，早在楚威王时期就有举巴蜀并汉中的野心。果然，楚威王死后十三年，秦派司马错挥师南下，一举灭了西南的蜀，接着又吞并巴，下一个目标就是楚国的汉中了。然则，当时楚齐结盟，秦不敢轻举妄动。于是，秦惠王派张仪出使楚国，劝楚怀王与齐绝交，愿以商於（今陕西商肥东南，河南西峡一带）六百里地相送。昏庸的楚怀王喜形于色，立即与齐断交。当楚怀王派人到秦受地的时候，张仪

却表示只能给予楚国六里地。楚怀王大怒，两次发兵攻秦，都被打败。结果楚将屈匄被俘，汉中六百里地落入秦国手中。楚军一败再败，伤了元气，国力开始衰弱。

从此，汉中与巴蜀连成一片，一起并入秦国版图。秦据有一个稳定而又富饶的后方，解除了东进的后顾之忧。

但是，秦惠王“壮志”未酬，过早地死了。他的儿子秦武王，继位只有四年，也相继死去。秦国的王位，由秦惠王另一个儿子继承，这就是秦昭王。

秦昭王即位，因为年纪还小，母亲宣太后临朝，又任用魏冉（宣太后的异父长弟）为相，处理政务。昭王前期的秦国，朝政完全由宣太后及魏冉控制。

秦昭王时期，势力能与秦匹敌的只有东方的齐国，它们成为遥遥相对的两大强国。公元前 288 年，为了拆散合纵联盟，削弱齐国的力量，秦派魏冉约齐称帝，条件是秦齐共伐赵国，齐湣王欣然接受。于是，齐称东帝，秦称西帝。但是，齐国为了孤立秦，争取天下归心，不久即将帝号取消，秦亦随之放弃称帝。当时秦、齐两强，旗鼓相当。直到公元前 286 年，齐国灭宋之后，又南侵楚国，西侵“三晋”，而且企图并周室而代之，许多诸侯国无不为之震恐。齐国势焰逼人，秦受到了威胁。公元前 285 年，秦昭王派蒙武大举伐齐，夺取九城。过了一年，又与韩、赵、魏、燕联合，发动攻齐的济西大战。齐国一败涂地，失去了强国的地位。

接着，秦再败楚国。自从秦夺得汉中以后，对楚国仍然步步紧逼。公元前 299 年，秦昭王诈称在武关与楚怀王会盟，乘

机将他劫持到咸阳,要求割让巫郡和黔中郡,遭到楚怀王拒绝。楚怀王被扣留三年,最后病死在秦国。秦没有就此罢休,幽禁不成,便改用武攻。公元前 280 年,秦将司马错发陇西之兵,大败楚军,楚国被迫割让上庸(今湖北房县西北)、汉水北岸等地。第二年,又遣白起攻楚,水灌鄢(今湖北宜城东南)城,楚军伤亡惨重。公元前 278 年,白起乘胜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楚襄王逃到陈(今河南淮阳县)。秦夺取鄢、郢之后,以该地置为南郡。接着,秦令蜀守张若率兵东下,夺得楚国的巫郡和黔中郡。至此,号称百万雄兵的楚国,仅留下十几万兵力。楚国也一蹶不振了。

破楚之后,秦军移师北上,攻打“三晋”。自秦昭王即位十年后,大约二十五年间,秦对魏、韩频频用兵,所侵占的领土相当可观。魏、韩两国大大削弱,秦军的攻击目标,便指向另一劲敌赵国。

赵国继魏、齐、楚之后,是战国后期的强国。秦国与赵国的关系,在秦惠王后期,两国兵争日渐增多。从秦武王即位,到秦昭王初期,双方关系又趋于平静,十余年间未见兵火。其后三十年,两国处于或战或和的状态。公元前 270 年,秦发兵攻赵,两军战于阏与(今山西和顺)。赵国名将赵奢坚壁不战,后来又抢占北山,乃纵兵大破秦军,使秦遭受了少有的惨败。

此后,秦任用范雎为相,实行“远交近攻”的策略,将主要兵力转向攻魏、韩。公元前 262 年,秦军占领野王(今河南沁阳县),切断上党郡与韩国本土的联系,上党太守自请归附赵国。秦不满赵国接纳上党,立即派王龁进攻上党,赵使廉颇拒秦

于长平，两国关系紧张起来，公元前 260 年终于爆发长平大战。

长平战后，赵国力量大大削弱，白起准备乘胜包围邯郸，攻灭赵国。范雎嫉妒白起功高，乃说服秦昭王，同意赵国割地求和。从此白起与范雎有隙。

公元前 259 年，秦遣王陵将兵攻，白起因病未行。王陵进攻赵都邯郸，遭到赵国军民奋力抵抗，秦军受挫失利。秦昭王令白起替代王陵，但白起认为，秦经长平之战，损失不小，今远征邯郸，赵内励士卒，外连诸侯，里应外合，秦军必破无疑。白起不主张再兴理由伐赵，乃称疾不行，昭王改派王龁代王陵。又经范雎保举，以郑安平为将军，率军围攻邯郸。

邯郸被围之后，赵国派平原君赵胜向诸侯国求援。平原君与魏国有姻亲关系。他要求魏国出兵，魏王害怕秦国报复，由晋鄙率领救赵的十万魏兵，一起持观望的态度。因此，魏公子无忌不得不窃取虎符，夺取晋鄙的兵权，对围赵的秦军发起攻击。平原君又率门客毛遂等二十人，与楚国结盟抗秦，救赵的楚军由春申君黄歇率领，也同时开到了邯郸。

魏、楚救赵的军队汇集邯郸，秦军遭内外夹攻，数战不利，其处境十分危急。秦昭王再遣白起攻赵，白起称病不肯奉命，因而触怒了昭王，终于被削夺爵位，贬迁阴密（今甘肃灵台西），不久被赶出咸阳。白起行至杜邮（今陕西咸阳东北），昭王遣使赐剑“自裁”。在秦历代名将中，白起杀敌最多，战功显赫，其遭遇正暴露秦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与此同时，久围邯郸的秦军，遭到魏、楚、赵联军的攻击。

魏公子无忌大败秦军于邯郸，秦将王龁兵败逃回，被赵军围困的郑安平，率两万秦军投降。邯郸之役表明，诸侯国利用秦内部的矛盾，合纵抗秦，依然可挫秦军的锐气。

尽管如此，秦昭王时期，山东诸国相继削弱，而秦国越战越强，已成不可逆转之势。秦昭王晚年，各诸侯国对于秦，事实上已经宾服。当时韩、魏虽未亡国，但史称“韩王入朝”（《史记·秦本纪》），而魏则“委国听令”（同上）。南方的楚国，由于屡败于秦，不仅丧师破国，还被迫一再迁都，逃之夭夭。赵国自从长平惨败，邯郸被围之后，也如同惊弓之鸟。还有齐国和燕国，因慑于秦的军事力量，它们与其它诸侯国的关系，也常取袖手旁观的态度。秦围攻长平，齐国拒绝支援赵国，使赵军遭受灭顶之灾。

总之，秦昭王在位五十六年，已逐步造成秦统一中国的大势。

庄襄王即位那年，吕不韦诛灭仅存七县之地的东周君，连同西周之地，以及当时攻取韩国的成皋（今河南汜水县东北）、荥阳（今河南荥阳北）等地，在黄河南岸设置了三川郡，使秦取得黄河中游的战略要地，为后来的统一战争铺平了道路。

第二年，秦将蒙武攻赵，取榆次（今山西榆次）、狼孟（今山西阳曲）等三十七城；接着，王龁攻到上党诸城，又在黄河北岸设置了太原郡。这样，北自上郡以东，河东、太原、上党三郡，都收入秦国的版图，形成秦东临赵、燕，南北可以夹攻韩、魏的形势。

秦王政继位之后，秦将蒙武伐魏，接连攻占酸枣（今河南

原阳县东北)、虚(今河南延津东)、燕(今河南延津东北)、长平(今河南西华东北)、雍丘(今河南杞县)、山阳(今河南焦作东南)等二十城,并初置东郡。

上述三郡的建立,秦的势力深入六国腹心之地,使山东诸国受到很大的威胁,形成秦东逼齐国,从西、南两面包抄赵国,楚国则多方受敌,而韩、魏只能坐以待毙的局面。这是吕不韦对秦兼并六国所作的贡献。所以,秦王政登位之后,吕不韦“奉先王功大”(《史记·吕不韦列传》),继任为秦的相国。

秦王政得天独厚,从祖辈那里继承“七雄”最强国家的王位,但是他登位之时因为年幼,不得不依靠老臣辅政,吕不韦成为执掌秦国朝政的主要人物。随着秦王政年岁的增长,秦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终于酿成一场尖锐的斗争。

二、秦王政亲政

自庄襄王即位以来,在秦统治集团内部,逐渐形成三派政治势力。吕不韦因资助异人有功,受到特殊恩宠,一跃而为秦的相国。此后十余年间,吕不韦执掌秦国朝政,继承前辈武功,为统一六国做了许多贡献。在他执政期间,不仅相继夺取诸多战略要地,而且广泛招致宾客游士,成为秦国招揽人才最盛的时期。他还亲自主持编撰《吕氏春秋》一书,囊括一批修养有素的各学派的学者,对统一的大一统政治作了理论上的探讨。其书出自各家各派之手,名为“杂家”,其实更加推许道家的学说。在秦王政亲政前夕,吕不韦将《吕氏春秋》公布在咸阳市门

上,宣布“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史记·吕不韦列传》),借以显示他在秦国的绝对权威,以便使这位行将亲政的年轻的国君,继续执行他的政治主张。

当时新发展起来的另一派政治势力,是与太后关系密切的嫪毐一派。嫪毐本是吕不韦的舍人,与秦王母后同是邯郸人。吕不韦与太后关系暧昧,唯恐被发觉,用以嫪毐为宦者进于太后。嫪毐得幸于太后,赏赐甚厚,势力膨胀地发展起来。他被封为长信侯,拥有家僮数千人,舍人千余人,还将封地太原郡更名为“毐国”。当时政事无论大小,皆由嫪毐决断。他是继吕不韦后,秦国又一铁腕人物。嫪毐的政治野心很大,曾与太后预谋,将来立他们的儿子为嗣,准备夺取秦国的王位。

除了上述两种政治势力之外,还有代表王权的秦王政一派。虽然秦王政曾一度委国事于大臣,但是他作为王权的代表,以及他推崇法家学说,力行君主专制的思想主张,自然不能容忍任何削弱或虎视王权的人物存在。这三种政治势力如水火难容,一旦时机成熟,其矛盾立即表面化和公开化,终于演成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公元前 238 年,秦王政年满 22 岁。按照秦制,他将在秦的旧都雍举行加冕典礼,亲理朝政。这对嫪毐无疑是巨大的打击,而且有人告发嫪毐不是宦者,曾与太后私通,预谋篡夺王位。嫪毐唯恐祸起及身,便盗用御玺及太后玺,征调大量军队,准备发动围攻雍都蕲年宫的政变。秦王政闻讯,立即命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兵平息叛乱,双方战于咸阳,叛军被杀死百人,嫪毐及其党徒都被活捉。最后,嫪毐被车裂处死,夷灭三

族。其党徒或枭首，或处以三年劳役，被夺爵迁蜀者，达四千余家。与嫪毐关系密切的太后，也被幽禁在旧都雍。

秦王政在亲政前夕，成功地将嫪毐及其党徒一网打尽，消除了统治集团内部企图夺权的一大祸根。

在平息嫪毐叛乱后，因事连吕不韦，公元前 237 年，秦王政罢去他的相国职务，并将他迁往封地洛阳。翌年，为了消除隐患，秦王政又赐书吕不韦，令其全家迁蜀。吕不韦恐遭杀身之祸，最后饮鸩自杀。

秦在统一中国前夕，一场延续三年的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最后以秦王政取得胜利而告终。这位年轻国君翦除政治上的两大对立势力，为他亲政之后进一步加强王权，逐步实现君主专制铺平了道路。

三、李斯《谏逐客书》和尉繚献计

在秦国完成最后统一的过程中，李斯曾起过重要的作用。李斯，楚国上蔡人，荀子的学生。他看到东方各国逐步衰弱，他就到秦国去，想在秦国作一番事业。入秦以后，在吕不韦的门下作门客，因而有机会游说秦王。他对秦王政说：“自从孝公以来，诸侯相互兼并。秦国乘胜发展壮大，到现在有六世了。今天以秦国的强大，大王的贤明，象扫灶上灰尘一样，消灭诸侯很容易，是成就帝业十分有利的时机。否则，东方各国合纵抗秦，诸侯又强大起来，即使有黄帝的本领，也无济于事了。”秦王对他的话很赏识，封他为长史。李斯劝秦王派人持金玉去各

国作反间，秦王也采纳他的主意。又封他为客卿。这离秦国统一中国的大进军为期不远了。

这时韩国有一人名叫郑国，来秦国修渠，目的是想削弱秦国的人物物力，事情被发觉。群臣就议论开了，对秦王说：“各国来秦国的人，大抵是为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来秦国作破坏工作的。请大王下令驱逐一切来客。”秦王下了逐客令，李斯也是被逐的。

这时，李斯给秦王写了一封信，劝秦王不要逐客。信中说：“我听说群臣议论逐客，这是错误的。从前穆公求贤人，从西方的戎要来由余，从东方楚国要来宛人百里奚，从宋国迎来蹇叔，作用从晋国来的丕豹、公孙支。穆公任用这5个人，兼并了20国，称霸西戎。孝公重用商鞅，行新法，国家、人民富强昌盛，伐楚、魏，扩地千里，秦国强大起来。惠王用张仪的计谋，拆散了东方六国的合纵抗秦，迫使各国服从秦国。昭王得到了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君，贵戚大为削弱，王权大为加强，蚕食诸侯，秦成帝业。这四代王，都由于任用客卿，对国家有很大的功益。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呢？如果使这四位国君却客，这只会是国家没有富利之实，秦国没有强大之名。

李斯还说，秦王的珍珠、宝玉不产于秦国，美色、好马、财宝也都来自东方各国。如果非是秦国的东西才要、才用，那么这许多也就没有了。李斯反问，为什么这些可用而客就要逐，看来大王对珠宝美玉看得很重，而对于人才却看得很轻，还不是征天下服诸侯的方法。

秦王看了信，把李斯叫来，恢复他原来的官职，去掉逐客

令。后来封李斯为廷尉，后又为丞相，在秦王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和建立秦朝以后的时期，李斯一直是辅佐秦王的最重要人物。

在秦王去除逐客令后不久，大梁人尉缭来秦国，向秦王献计。他劝秦王不要爱惜财物，要收买各国的豪臣，就可以搞乱他们国家君臣的关系，不过花 30 万金，可以收到兼并各国诸侯的效果。秦王接受了尉缭的建议，很厚待尉缭。让尉缭的衣服饮食与自己相同，封尉缭为国尉（统率全国军队的长官）。

堡垒是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在兼并各国的进程中，李斯、尉缭所献的反间计，收到了很大的功效，加速了统一的进程。不过也应看到，如李斯所说：“不肯者，利剑刺之”，秦国是以武力作后盾的。

四、秦灭六国的基本战略与策略

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经过了详细策划，基本的战略是以强大的政治外交攻势，拆散六国的“合纵”联盟，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逐一并灭六国。根据六国当时的强弱态势和山川地理形势，决定先由北路对赵进攻。赵国被攻灭后，再转向灭燕，继而攻灭韩、魏，最后再进攻齐、楚两国。秦国向六国进攻，占有重要的地理优势，几条战略通道均在秦国的控制之下，这些通道为：

成皋道路这条通道由成皋到函谷关，中原各国每次合纵攻秦或秦东出中原均多经由此线进军。秦灭六国的战争，首先

控制了这条通道。

夏路要道这条通道经伏牛山脉、南阳盆地隘口，向东南可达下蔡、居巢，楚都由陈迁往寿春后，这条重要通道即为秦军控制。

井陘、孟门通道这条通道为通燕、赵、齐之要道，也渐为秦所据有。

秦占有了天时、地利、人和诸多方面的优势地位之后，即开始了消灭六国的战争。

五、秦始皇统一六国

兴师东进——秦灭韩

秦王政在消灭吕、嫪的政治势力之后，又任用李斯、尉繚等客卿，直接参预谋划、指挥对六国的统一战争。他们针对当时各诸侯国的情况，提出用重金收买诸侯名士，离间诸侯国内部的君臣关系，破坏诸侯国合纵抗秦的活动，然后用武力征服等实际统一的具体措施，从而拉开了统一战争的帷幕。

在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战争中，首当其冲的是韩国。

韩国是一个小国，地处中原咽喉要地。秦所以首先进攻韩国，一方面因为韩国弱小，容易攻取，可借以威慑其它诸侯国；另一方面韩与秦接壤，既是秦“近攻”的主要目标，又是秦东进必夺的战略要地，攻灭韩国可以向两翼发展，在战略上有利于推进兼并战争。这是秦先到韩的主要原因。

韩国尽管弱小，无力正面对抗秦国，但是为了保存自己，它竭力图谋削弱秦的力量。早在秦王政继位那年，韩国曾派水工郑国入秦，以帮助兴建沟通泾、洛的水利工程为名，借以消耗秦国的实力。但事情很快败露，郑国几乎被杀。接着，韩国又企图借诸侯国之力，阻止秦国东伐。公元前 241 年，楚、赵发动五国合纵抗秦，韩国毅然参加抗秦的联军。但是，五国联军不堪一击，在函谷关打了败仗，韩国拒秦的希望破灭。

公元前 234 年，秦对韩发动攻势。韩王安惊恐万状，乃派韩非出使秦国，以延缓韩国的灭亡。

韩非出身韩国贵族，与李斯同是荀况的门生，擅长刑名法术之学，是战国末期法家学派的杰出代表。由于他的著述适应了君主专制的要求，得到了秦王的赏识。当秦王见到《孤愤》、《五蠹》等篇时，连连赞不绝口。但是在韩国，韩非屡次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当秦即将灭韩，韩王安无计可施，才派韩非出使秦国。

公元前 233 年，韩非入秦，秦王很高兴，但未信用。韩非上书秦王政，企图促秦攻赵，以暂缓攻灭韩国。然而，它与秦灭韩的计划相悖，终于给嫉贤的李斯找到陷害韩非的口实。李斯谗害说，韩非是韩国公子，“终为韩不为秦”（《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久留将是后患，不如法诛韩非。秦王政果然中计，将韩非下狱治罪。

韩非身陷囹圄，无法为自己申诉。于是，李斯对他下了毒手，派人将毒药送入狱中，逼令韩非自杀。事后秦王政反悔，要赦免韩非出狱，但韩非已经死了。

韩非死后，韩国割地称臣，献出南阳之地，仍未使秦罢兵。公元前 230 年，秦内史腾率军长驱直入，俘获韩王安，将韩国并为颍川郡。至此韩国灭亡。

秦灭韩之后，韩王安成为秦的囚徒，但没有立即被处死。韩国的贵族，也没有受到严重的打击。原韩国都城新郑（今河南新郑），一时成为韩国反秦的中心。父祖相韩五王的张良，在韩灭之后，以家财收买刺客，寻机准备刺杀秦王，为韩国复仇。据云梦秦简《编年记》载，公元前 227 年，秦将韩王安迁离新郑。次年，新郑爆发反秦的事变，秦镇压这次事变中，将这位韩国的末代国君处死了。

施行离间——秦灭赵

秦灭韩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赵国了。

赵既是秦的宿敌，又是秦的劲敌。秦昭王后期，秦赵结怨，双方大动干戈。长平大战，赵军惨败；邯郸之役，秦师败北。两国兵争各有胜负，但论实力，赵国显然不是秦国的对手。秦王政即位之初，秦军攻伐无已，各国惶恐不可终日。以楚为首的韩、赵、魏、卫五个诸侯国，又发起合纵攻秦。指挥联军攻秦的统帅，是赵国的将领庞煖。秦不满赵国率先领兵攻秦，在五国联军失败后，对赵国施以军事报复。公元前 239 年，秦派长安君成蟜攻赵，但成蟜在前线叛变，秦军以失败告终，赵国避免了一场兵火的劫难。第二年，嫪毐发动叛乱，秦无暇东顾，两国的攻战，才暂时平息。

秦王政后，秦赵的战争又日趋频繁。公元前 236 年，秦利

用赵、燕战争之机，派王翦、桓喆、杨端和率军进攻赵国上党、邯郸地区，从背后袭击赵国，打得它措手不及，连连丧城失地。王翦率领的一路秦军，先后夺取阼与（今山西和顺）、橐阳（今山西左权），进军比较顺利。接着，秦军进行整编，由桓喆任统帅，又夺取邺县（今河北磁县南）、安阳（今河南安阳）。这次攻赵，秦取九城，赵国失利。

公元前 234 年，秦再派桓喆进攻平阳（今河北临漳西南），赵将扈辄兵败被杀，士卒死亡十万人。赵国在军事上屡遭失败，便以李牧为大将军，与桓喆再战于宜安（今河北晋县西南）、肥下（今河北晋县西）。结果秦军大败，桓喆逃回秦国。

公元前 232 年，秦军分两路，再次伐赵。一路到达邺县，攻打番吾（今河北磁县）；一路进军太原，夺取狼孟（今山西阳曲）。李牧再次率军抗击，大破进攻番吾的秦军。秦不敢再战，被迫撤出赵国。

李牧一再挫败秦军，以至秦军闻风怯战。于是，秦国大施反间计，收买赵王迁的宠臣郭开，促成赵国杀害李牧。公元前 229 年，当赵国接连发生大地震、大饥荒之后，秦乘机派王翦、杨端和将兵攻赵。李牧、司马尚奉命抗击。这时，接受秦重金收买的郭开，大肆毁谤李牧、司马尚要谋反。赵王迁果然中计，便改派赵葱、颜聚取代李牧。当时正处在紧急关头，李牧拒不受命，结果遭到捕杀，司马尚也被废黜。

公元前 228 年，秦将王翦大破赵军，赵葱被杀，颜聚败逃，赵王迁成为秦军的俘虏。同年十月，秦军攻克邯郸，赵国灭亡。赵国公子嘉逃往代郡，自立为代王。

燕国灭亡

在灭赵的过程中，秦国大军已兵临燕国边境。燕国在军事上已无边防止秦的进攻。燕太子丹想用刺杀秦王政的办法来挽救自己的灭亡，于是收买荆轲刺秦王。

荆轲是卫国人。因他的祖先是从小齐国迁来的庆氏，所以原名叫庆轲。卫国灭亡后，他先到赵国，最后到了燕国，改名荆轲。在燕国他和一位擅长击筑的高渐离交了朋友，又和燕国的勇士田光经常来往。相处的很投机。

荆轲到燕国以前，燕国的太子丹曾被当作人质抵押在秦国，秦王政对他很不好，他逃回燕国，时刻想报仇。这次正当燕国危急之时，旧恨新仇促使太子丹去找勇士田光商量对策。田光年老，无法完成太子的重托，便推荐荆轲与太子共谋抗秦大计。

太子丹与荆轲一见如故，把他当上宾，优礼接待。他希望荆轲出使到秦国，乘机动持秦王，归还被侵占的土地，如果秦王不信，就把他刺死，再乘秦国无君内乱之际，联合诸侯，一举灭秦。荆轲答应了太子丹的要求。太子丹很高兴，马上封荆轲为上卿。

这时王翦的大军已经把赵国灭掉，一直到了燕国的南境，而荆轲还没有动身的意思。太子丹十分恐惧，催促荆轲赶快启程。荆轲也正在考虑到秦国后怎样顺利地接近秦王，完成使命。他向太子丹建议：“要是我带着樊于期的头和燕国督亢地方的地图（今河北涿县，定兴、新城、固安一带）做礼物，献给秦

国，秦王必定会亲自接见我，这样我就可以见机行事了。”太子丹对荆轲的计划很赞同，只是觉得樊于期是得罪秦王后走投无路才来投靠燕国的，杀掉他于心不忍。

荆轲见太子丹不忍下手，便私下去找樊于期，把自己打算如何刺秦王的办法对他讲明，并说明刺杀秦王不只是为燕，也是为将军报仇。樊于期听了悲愤地说：“报仇雪恨，是我日日夜夜把心都想碎了的事情，今天才得到你的指教！”说完，立即拔剑自杀了。

樊于期既死，太子丹遂命人把樊于期的头颅放在匣子里，用药保存起来封好。又以重价买到一把锋利的匕首，上面浸泡了毒药，用它杀人，只要皮肤一出血，就会中毒，立即死去。他把这把匕首裹在督亢地图里，另找到燕国一个著名的少年勇士，名叫秦舞阳的，作为荆轲的副手。荆轲本来约了一位朋友同去，但因路远而未能赶到，在太子丹紧急的催促下，荆轲只得匆匆出发了。

荆轲到达了秦国都城咸阳之后，先用重金买通了秦王的宠臣中庶子蒙嘉，要他禀告秦王。秦王听到燕国派人把樊于期的头和燕国督亢的地图送来，非常得意，他了朝服，用最隆重的仪式，在咸阳宫接见燕国的使者。

秦王接见荆轲的那天，咸阳秦宫内外，排列着重兵，戒备森严。荆轲走在前面，捧着装樊于期头颅的盒子，秦舞阳跟在后面，捧着装督亢地图的盒子，依次前进。走到宫殿的台阶上，秦舞阳忽然脸色变白，浑身发抖显出害怕的样子，秦国的官员们都奇怪起来。荆轲却十分镇定。回头笑着看了看秦舞阳，上

前向秦王谢罪说：“北方荒僻地方没有见过世面的人，从没有见过天子的威严，所以有些害怕，请大王原谅。”

荆轲从秦舞阳手上接过地图，献给秦王。秦王接过地图慢慢展阅，突然，“图穷匕首见”，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出现在图卷里。说时迟，那时快，荆轲右手抢过匕首，左手抓住秦王的衣袖，向秦王刺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秦王急忙从座位上跳起来，用力把衣袖挣断，秦王想拔出佩剑抵抗，无奈剑身太长，心又慌，一时拔不出来。荆轲追赶着秦王，秦王只得围着殿上粗大的柱子闪避。

朝廷上的官员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得目瞪口呆。按照秦国的法律，群臣在殿上不得携带任何武器；手执兵器的卫士都在殿下，未奉王命不得随便上殿，而秦王在慌乱中又偏偏忘了下令。着荆轲追击秦王，大臣们只是干着急，没有什么武器来抗击荆轲，有的人只好赤手空拳和荆轲搏斗。秦王的随从医官夏无且拿起药袋，向荆轲击去。

秦王正环绕着柱子跑，急得不知所措，忽然有人提醒他：“大王把剑鞘推到背上，从背后拔。”秦王依言拔出了剑，挥剑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倒在地上，将匕首对准秦王投去，没有击中，匕首中在铜柱上。秦王反身又用剑乱砍荆轲，荆轲受重伤，倚着柱子大骂：“事情之所以不成，是想要活捉你！……”秦王左右的人一拥而上，把荆轲剁成一堆肉泥。

秦王政几乎死在荆轲之手，深恨燕国，立即命将军李信领兵攻燕。公元 226 年，攻下蓟城（今北京市），燕杀太子丹谢罪。燕王迁都辽东。

灭魏之战

灭赵之后，秦即想南下灭楚，但中间尚相隔一个魏国，魏此时虽然已只剩国都大梁和附近的一些城邑，但这些是秦进军楚地之障碍，于是决定先灭魏，再伐楚。本来魏处于“天下之枢”，具有优越的战略形势，但由于战争频繁，魏的实力已大大削弱了。多年来，在强秦的进攻下，节节败退，不断割地求和，魏国大河以北领土被吞食殆尽。秦始皇二十二年，魏王假三年（公元前 225 年），秦派兵进攻魏国首都大梁。秦战地统帅王贲认为大梁城垣坚固，很难在短期内攻拔，于是引大沟之水冲灌大梁城，经三个月战争，城垣崩塌，魏王假出降，被王贲所杀，魏国灭亡，秦以其地建为东郡。

灭楚之战

秦军灭赵、破燕并魏后，公元前 224 年，秦又大举进攻楚国。当时楚仍为中国南方大国，拥有今河南西部及东南部、山东南部、湖北、湖南两省、洞庭湖以东和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全部。楚国此时尚有对秦作战所需要的实力。秦始皇认为年少壮勇的将军李信，曾以数千兵急追燕太子丹于衍水，并获得了胜利，是率兵攻楚的理想将领。于是便委以重任，并问李信说，如果派兵攻楚，需要多少兵马？李信答复说：“不过用 20 万人”。始皇又问王翦，王翦则说“非 60 万人不可”。始皇不同意王翦的意见，而同意李信的说法，当即说：“王老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然壮勇，其言是也。”王翦以言不见用，谢病告

老，归还频阳。李信则受命为秦军统帅，与蒙恬率兵 20 万对楚进攻。李信把兵力集中于颍川郡，鉴于秦楚接界多为平原，无险可扼，认为这次作战的目的在于歼灭楚之野战部队。李信判断，当秦军向楚进攻时，楚军为抗御秦军之进攻，必将兵力集中于汝水两岸，即淮阳、商水、上蔡边界地区。进而决定采取两翼钳形攻势，包围歼灭楚军。于是确定以部分军队由蒙恬指挥，沿汝河两岸前进，从正面进攻楚军。主力军由李信亲自指挥，从汝水以南，经过舞阳、平舆、新蔡、颍邑迂回楚军左侧翼，与蒙恬军会师，包围楚军，聚而歼之。

秦军排除楚边境部队的抵抗，于汝河南北分向寝、平舆展开攻击，击破楚军，李信军占领了平舆，蒙恬军占领寝城。秦军未遇楚军重大抵抗，进占两城后，渡过洪河东进。

楚军统帅项燕以秦军转变进军方向，孤军深入，立即率楚军主力，兼程急进，追击秦军于棠溪，给秦军以沉重打击。李信战败，率军往城父方向撤退。楚军乘胜猛追，三昼夜战斗不息。秦军连日所筑营垒，都被楚军攻破，都尉一级将领七人阵亡，李信军损失惨重，多亏蒙恬军在城父掩护，李信得以突围逃回秦境，才免被俘。这是秦统一战争中宜安战后，又一次重大的挫折。

秦军遭受重大挫折，秦始皇虽然感到自己当初对统帅人选有误，但并未动摇灭楚之决心，仍然继续进行灭楚战争。李信失败后，秦军统帅一职只有重新起用王翦。秦始皇移樽就教，亲往王翦家乡频阳邀请王翦出任秦军统帅。王翦谢绝说，身体不好，难以从命。秦始皇则坚持请他出征，并问他有什么

要求。王翦此时才说：“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秦始皇应允。王翦于是接替李信，担任秦军统帅，率领 60 万大军对楚作战。秦始皇亲送王翦至京郊灞水之滨。王翦请求秦王多赐给他一些田宅。秦王答应了他的要求，王翦遂带兵东去。

王翦根据已往长期作战经验，知道楚军和赵军都具有坚强的战斗意志，是能战能守的军队。楚军新近击破李信指挥的秦军，锐气旺盛，斗志昂扬，对付这样的敌人，不仅没有胜利的把握，一旦行动不慎，还会影响整个战争前途。所以王翦进入楚国后，即令部队在商水、上蔡、平舆一带地区构筑坚垒，进行固守，并令部队不许出战，休整待命，故双方相持数月没有大的交战。

秦军大举东进，集中全部兵力备战。当时秦已灭三晋，无后顾之忧，有物力的大量支援。楚国统帅项燕也集中楚军主力于寿春淮河北岸地区，等待秦军的进攻。楚王责怪项燕怯战，派人数度催他主动进攻秦军。项燕军只得向秦军进攻，但既攻不破秦军的营垒，秦军又拒不出战，项燕无奈，引军东去。王翦立即令全军追击楚军，楚军被涡河所阻，双方交手，楚军被击破东逃。秦军追至蕲南，平定楚属各地。公元前 222 年斩杀楚将项燕，王翦率兵直取楚都寿春，楚国首都被秦军攻陷，楚王熊负刍被俘。秦军进军蕲南，只经一年多的争战，号称南方赫赫之强国的楚，便冰消瓦解。

经过三年左右时间，秦对楚战争胜利结束，又转用兵力，由将军王贲指挥，进攻辽东。燕军无力应战，燕王喜被秦军俘

虜。秦又立即转移兵力，攻击代郡，赵王嘉虽率部力战，但因实力相差太大终于输给秦而悲愤自杀。

灭齐之战

齐经过燕军进占，元气大为损耗，以至没有力量参与东方各国与秦国之间纵横捭阖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在秦军并灭赵、韩、燕、魏、楚战争时期，齐国一直置身度外，坐视各国灭亡。过去当秦赵长平之战的关键时刻，赵向齐请求援助军粮，有政治远见的周子曾向齐王说：“且赵之与齐楚，捍蔽也，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明日惠及齐楚”，力主积极援赵。齐王竟没有接受这一具有战略远见的建议，尔后各诸侯国虽几度联合对秦作战，齐都避免参加，或者参战不力，企图讨好于秦。

齐王建继位 40 余年，三晋、楚、燕与秦战争连绵不断，齐由于与秦没有共同边界，未被攻击，上下安然，长期处于和平环境，不备兵革，不修战备，政治上达惊人的麻木程度。齐王建本人昏庸无能，齐相国后胜又是一个贪财无厌之徒，秦多年来用重金贿赂后胜，后胜就为秦远交近攻的策略效劳，终日规劝齐王建臣服于秦，朝野上下已无丝毫斗志。所以尽管秦灭六国时，齐还拥有 70 余座城邑，但仍不堪一击。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秦王贲统帅的军队，由燕南部对齐北境突然进攻，直趋齐都临淄。齐则毫无作战准备，竟无应战之兵。齐相后胜力劝齐王投降，齐王建也就不战而降。齐王建被送于共这个地方，饿死于松柏之间。

秦获得统一六国之战的胜利，是由于其战略指导正确，作战指挥高明。秦王政在位时期，群雄兼并战争业已进入最后的阶段，秦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国富民众，兵强马壮，有足够的人力物力确保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在战略上处于最有利的进攻态势，所以能够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相继灭亡六国。在战争指导上，秦国执行了由近及远、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正确方针，首先灭掉相毗邻的弱国韩、赵，然后趁热打铁，中央突破，攻燕灭魏，占领整个中原腹心地区；最后再接再厉，消灭两翼的强敌齐、楚。这一战争指导的运用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也是卓有成效的。在具体的战役指挥中，秦军同样高明正确，如在灭韩、赵的战争中，善于根据具体情况，做到机动灵活，赵有机可乘则先攻赵，韩呈败像则坚决灭韩。又如在灭楚之战中，能够虚心汲取首战失利的教训，及时调整作战部署，集中优势兵力对敌，不像楚军正面硬拼，而乘其反击失利后撤之际，发起追击，予以聚歼。再如在攻齐之役中，避实就虚，出奇制胜，政治诱降与军事攻击双管齐下，一举而定。所有这一切，都是值得后人借鉴的优秀军事指挥艺术。

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大帝国——秦王朝，这标志着一个历史新纪元的开端，也意味着波澜壮阔、震撼人心的先秦战争的终结。

第三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 社会经济和民族关系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

一、春秋农业

春秋初年的中国，地旷人稀。到后来出现的齐、晋、楚、秦四强，当初还是边远穷国，十分荒凉：东方齐国靠海，到处是白花花的盐碱地，西方秦国，虽居原西周腹地，因受战乱之害，昔日的王畿已成一片废墟，残墙连着断垣，散发着臭气的破井，常常数十里不见人烟，不见觅食的乌鸦；北方晋国的南鄙之田，更是狐狸豺狼的天下，入夜，“嗥嗥”的狼嚎声在原野上此起彼伏。嚎声起处，时时闪烁着暗绿“鬼火”在离地不高处浮游，令人毛骨悚然；南方的楚国，更甬提了，一群刚移居荆山的

“蛮人”穿着不能蔽体的兽皮，手持木棒、石器，在茫茫的山林里拓荒，大树是他们的屋顶，草丛是他们的暖床。不但边远穷困如此，即使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中原地区，也有大片“隙地”没开垦。周平王东迁后分封的郑国，虽紧挨王畿，却是在荒草荆棘中建立起来的。稍后，郑宋之间还有大片“隙地”作为缓冲地带。一度为狄人所灭的卫国，竟以 5000 人在中原腹地得到大片“隙地”，重新建国。

无怪乎当时人们都说：有人民就有国土。

然而历史进入春秋后一二百年，各国的经济面貌都有了较大的变化。

郑国已出现农业、手工业、商业齐发展的大好势头，郑、宋间的隙地也被郑国开垦，成为郑、宋两国争夺的对象；当初以 5000 人复国的卫国，现已人烟稠密，卫国的陶邑（今山东定陶）被称为“天下之中”，成为各国经济交往的枢纽，后来越国的范蠡因常到此经商而被称为“陶朱公”。

边远各国变化更大，东方齐国五谷丰登，桑麻遍野，齐国国都临淄城遗址面积达 60 多平方里，有十几座城门，有齐崭崭的交通干线和排水系统。甚至原来很落后的吴国，到春秋后期也开挖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运河——邗沟，沟通了江淮水系。

春秋时期各国人们已经普遍使用铁器与牛耕了。

铁的发现大约是在商代，但只是锻铁，到了西周铁已为习见，春秋时代才有了坚硬的铸铁，从此铁器才逐步推广到农业生产领域，以齐国为例，简略介绍如下：

春秋前期，齐桓公想称霸中原，但却为齐国兵器太少而犯愁，管仲建议让犯人用兵器赎罪；如此集得美金（铜），用来铸造剑戟，恶金（铁）用来铸造农具。春秋中叶，齐灵公时的叔夷钟铭文有“造铁徒四千”一句，可见冶铁业已大有发展。

到春秋末，“一耒一耜一铤”和“一斧一锯一锥一凿”分别是农夫与手工工匠谋生的起码手段，可见铁器使用之广。

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迅速发展。促使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首先是铁器的使用。由于铁色黑，粗陋，不像青铜那样漂亮，所以当时被称为“恶金”，青铜则被称为“美金”。

春秋时最早大量生产和使用铁器的国家是齐国。据《国语·齐语》记载，管仲执政时，用青铜（“美金”）铸造剑、戟等武器，试在狗、马身上；用铁（“恶金”）铸造耜、夷、斤等生产工具，试用耕种土地。这是史料上关于用铁器进行农业生产的最早记载。与此差不多同时，反映秦襄公时代的诗《秦风》中有“驪骖孔阜”的句子，“驪”即“铁”字，可能是“铁”字的第一次出现。用铁来形容马的颜色，可想人们对铁已经比较熟悉。齐国境内多铁矿，铁器使用后，开矿和冶铁手工业就发展起来了。春秋中期齐灵公（公元前581——公元前554年）时，齐国铸的叔夷钟的铭文中，记载有4000个官家的奴隶在从事开矿炼铁，可见规模已经很大了。到了春秋后期的晋国，已经使用铁铧犁来耕田，而且还用铁铸刑鼎，鼎上铸着范宣子所作的刑书，用铁鼎把法律条文公布了出来，这样铁器更从生产上普及到贵族们的政治生活中去了。长江流域的楚国、吴国、越国，也是铁器生产的重要中心。越国就使用童男、童女，采用鼓风设

备,提高冶铁炉的温度,来制造宝剑,楚、吴、越都以铸造锋利的宝剑而闻名。

随着冶铁业的出现,采矿知识也丰富起来了。当时劳动人民已知道山有深红色的石头,山里就有铁矿。《山海经·五藏山经》记载了当时有确切地点可查的铁矿有 30 多处。

《管子·海王篇》反映齐国铁器广泛使用的情况是:齐国织布的农家女子一定有“一针一刀”;耕田的农夫一定有“一耒一耜一铧”。铁器广泛地使用到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中,确是事实。

春秋时代铁器的使用,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像齐国这样的东方大国,靠海的地方多盐碱地,内地又多山,土地比较坚硬,在西周初年本来是人民稀少、比较荒凉的国家,在铁器使用以前,主要是靠渔盐为生。春秋时期铁器的使用,就给齐国劳动人民提供了一种青铜器或石器都无法与之比拟的坚牢锐利的工具。利用铁制工具来兴修水利,砍伐森林,开垦荒地,深耕细作,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这对春秋前期齐国的富强和齐桓公的霸业起了很大的作用。西周时期各分封的诸侯国家之间,往往都有大批无人居住和耕种的荒地。那里森林密布,豺狼出没。铁器使用以后,森林荒野之区逐渐开垦为农田,各国的土地逐渐连成了一片。运河的开凿和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也是铁器使用后出现的社会现象。春秋末期吴国开邗沟,沟通了淮河和长江水系,促进了江淮地区和北方的交通联系。楚庄王统治时期,任用孙叔敖在今安徽寿县一带修建了芍陂,可灌溉土地 1 万多顷,扩大了水稻的种

植。如果没有铁器这样坚牢和锐利的工具，这样大规模的兴筑水利工程，确实是不可想象的。

和铁器的使用同时出现的一件事是牛耕的推广。在起初，牛并不是用来耕田的。本来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我们的祖先就开始饲养马、牛、羊等大牲畜。商人的祖先王亥曾作“服牛”，即饲养家牛。当时牛和马主要还是用来拉车、运货、经商，进入奴隶社会后，奴隶主国王和贵族开始大量杀死牛、羊等牲畜，作为祭祀上帝和祖先的祭品。据甲骨文记载，当时祭祀往往一次屠杀几头、几十头甚至上百头大牲畜作为“宗庙之牺”，这就是当时牛的主要用途。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牛耕已经推广了。《左传·宣公十一年》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楚庄王时，楚国打败了陈国，把陈国灭掉，变成楚国的一个县。申叔时劝谏楚庄王说：“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一个牵牛的人踩了人家的田地，田地的主人就夺了牵牛人的牛。牵牛的人踩了田地当然有罪，但夺走人家的牛就罚得太重了。我们打陈国说是讨伐有罪，结果把人家的国家都给灭了，不是太贪欲过度了吗？”这是文献上第一次把牛和田连在一起的记载。这个踩了田的牛可能是耕牛，因为劳动者牵牛从田里走过，这个牛总是和耕田有关的；而踩坏田地要赔偿或夺走牛，当时人们认为处理得过重，可见人们对牛的价值有了足够的重视。

春秋晚期，牛耕进一步推广。孔子的学生冉伯牛名耕，司马耕字子牛，晋国有个大力士叫牛子耕，在人的姓名上，把牛和耕连在一起使用，说明在人们的印象中，牛耕已成为习见的

事物。《论语》记载说：“犁牛之子骍且角”，又把犁和牛两字连在一起。所以《国语·晋语》在形容晋国原来一些奴隶主贵族没落的情况时，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意即作为宗庙中牺牲的牛，现在变成了田地里耕作的劳动力。这一句话，形象地反映了春秋后期牛耕的普遍推广。到了战国时期，原来比较落后的秦国，牛耕也推广了，《战国策》说：“秦国用牛来耕田，以河水运输粮食。这样，在春秋战国之际，牛耕逐渐在整个中国范围内使用了。牛耕的普遍使用，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与牛耕普遍使用的同时，在灌溉和耕作技术上也有了相应的进步。

春秋后期，人们普遍使用桔槔汲水溉田。所谓“桔槔”就是用两根长条的直木，一根竖立在井边或河岸，直木顶端用绳索结住另一横木，横木前端结绳挂上水桶或陶瓶，后端结上石块或其他重物，利用杠杆原理，引绳往下，则桶或瓶自动入水，提绳向上，则装满水的桶或瓶就自动被拉上水面，确实是一种既省力而又效率高的灌溉的方法。

铁器的使用、牛耕的推广、水利灌溉的发展，使得过去粗放的耕作逐渐被精耕细作所代替。西周以前是用人力进行耦耕的，现在牛耕代替了人耕，大而锋利的起土工具耜出现了，据记载这种耜的刃头广八寸，柄长六尺，能够用来推土耕田；还有一种工具是耨，柄长一尺，刃头宽六寸，是一种除草的农具。当时人们称使用这些进步农具进行的耕作叫“深耕易耨”，就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收成。此外，春秋战国之交，劳动人民在

施肥、分辨土壤的性能,挑选优良的农作物品种,掌握节气进行耕作等方面,都积累了比过去更多的知识。

由铁器的使用而引起的这一场生产力的大发展,对春秋时期的社会变革具有深远的影响。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技术的提高,使农业生产力迅速发展。春秋时期从生产关系到上层建筑的一系列重大变化,正是从生产力的发展和铁器的使用开始的。所以,铁器的使用,是古代生产力发展史上一次重大的革命。

二、井田制的崩溃

春秋时期,荒地的大量开发增加了社会的财富,奴隶主贵族们招徕更多的劳动人手,包括一部分从井田上逃跑出来的奴隶,去从事垦荒。这种新开垦的田地不在原来分封的井田范围之内,而属于贵族们的“私田”。“私田”属于贵族本人所有,不向上级贵族交纳贡赋。因此从西周末期以后,“私田”越开越多,占用大量的劳动力。

西周时期井田上采用的是“籍田”形式的剥削。就是,奴隶们成年累月地在奴隶主的鞭子下进行集体劳动,土地上的收成全为奴隶主贵族所占有,他们自己却吃不饱,穿不暖,一无所有。因此,奴隶们常常用怠工、逃亡等形式进行反抗。西周末期,周宣王宣布“不籍千亩”,也就是在周王直接管理的千亩地方,放弃了过去年年举行的周王亲自“籍田”的礼节。这标志着井田制已在王畿内趋于崩溃。到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井

田制也走向崩溃，像在齐国，井田上的情况是：“维莠骄骄”、“维莠桀桀”，原来种植各种谷物的井田，现在却遍布着一片丛生野草。其他国家也是“田在草间”、“公田不治”。说明井田制这种奴隶制的土地制度，再也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逐渐走向没落了。

各大小贵族拼命招徕劳动人手开辟私田，这就使得私田的数量越来越多，面积越来越大，甚至有的公田也逐渐被贵族们霸占为私田。私田的增加，使得贵族间因土地问题而发生的纠纷多起来了。春秋时期，留下了很多贵族之间争夺田地的记载，甚至周王和诸侯、周王和卿大夫，诸侯和卿、大夫之间，争夺田地之事也不断发生。郑庄公称霸时，周王要取得郑国的土地，就要用王畿内苏忿生的田地去交换，公元前 580 年，晋国的大夫谷 至也公然和周王争夺侯 田。公元前 563 年，由于郑国的执政者子驷侵占了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等贵族的土地，结果这些贵族招集了一批人作乱，杀掉了子驷。公元前 528 年，晋邢侯与雍子争鄆 田。此外，田地之间的交换、转让，也屡见记载。到了春秋末期，晋国的赵襄子选拔了中牟地方两个博学多才的人为中大夫，并授予田宅，结果这个消息一传开，中牟地方放弃农业生产，卖掉宅圃，去从事读书作文的人占了一半，当时土地的转移、宅圃的买卖已成为普遍的现象，土地关系向私有化的道路上发展着。

随着土地私有化的发展，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生产也逐渐发展起来了。这种小农经济是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在奴隶制的大生产下，生产者毫无人身自由，所生产

的东西全为奴隶主占有,不利于发挥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不利于劳动者合理安排劳动时间,不能刺激生产者为了多生产而主动地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效率,更积极地从事劳动。这样,在井田制瓦解的同时,个体小农经济开始产生。奴隶主贵族招徕大量劳动人手开辟私田,他们已经看到再用井田制下的集体劳动的剥削方式,已无利可图,只能激起劳动者的反抗。为了更好地剥削劳动者,他们便在私田上改变了剥削方式,把土地分给生产者耕种,允许生产者可以保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和使用小块的土地,进行个体经营,用提供劳役和实物的方式向奴隶主贵族交租。这种租佃制的剥削方式,是在奴隶社会的母胎内新产生的封建生产关系。

新的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越来越多的奴隶和其他劳动者从井田上或者奴隶制国家控制的其他部门逃亡出来,投奔“私”家,成为封建制度下的依附农民。这种劳动者成为最初的封建依附农民,而采用新的剥削方式的奴隶主贵族,也就转化成为最初的封建地主。据《左传》等书的记载,当时鲁国有很多“隐民”,“取食”于新兴势力的代表季氏,为季氏服役、做工、种田。鲁国的奴隶主国君千方百计地想铲除季氏的势力,但季氏几代人都很得人心,人民把国君快忘记了,鲁国的国君拿季氏没有办法,鲁昭公甚至被季氏驱逐出去,死在外地。齐国的新兴势力田氏采用了新的剥削办法,和齐国的国君作斗争,结果人民“归之如流水”。这种“隐民”以及史书上常见的“氓”、“宾萌”、“私属徒”等等,就是我国历史上最初的一批摆脱奴隶主国家的控制,投靠了新兴的封建地主,

和新兴地主阶级建立了宗法性的依附关系的佃农。封建依附关系的发生和发展,反过来加速了私田制的发展。

封建制度下的农民虽然要受到国家和封建地主阶级的重重剥削,他们对地主阶级和国家还有很大的依附性,但是他们已不能被统治者随意当作牛马一样地加以杀害,他们的劳动成果也可以留一部分归自己所有,有自己独立的家庭经济 and 私有的生产工具,这就是他们和奴隶的重大区别。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了。

春秋战国之际在新兴的封建生产关系下,个体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及其原因,反映了新兴的封建生产关系对推动生产力发展所显示的优越性。

随着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和封建生产关系的发生,各诸侯国的国君为了增加收入,也不得不在赋税制度上作一些改革。齐桓公实行“相地而衰征”,根据土地的肥瘠多寡来征收贡税,起了破坏井田制的作用;晋国在惠公时“作爰田”,废除周初以来土地定期分配的制度,而将土地分赐给大臣,等于承认了土地私有;公元前 594 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执政的季氏通过这一法令,对鲁国的公、私土地一律按亩收税,废除了井田制,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以后,鲁国“作丘甲”,楚国“书土田”,郑国“作丘赋”,在军赋制度上进行改革。过去在井田制下,土地定期分配,承担军役的人自备军用品,现在井田制破坏,私田发展起来了,鲁、郑两国就决定以地域的单位丘为标准来征收军赋。到了公元前 483 年,鲁国“用田赋”,即直接根据田亩多少来征收军赋,反映了鲁国土地私有化的进一步发

展并得到了政府的承认。赋税制度的变化,是土地私有化和封建生产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反映了各国土地制度的演变,又反过来承认和肯定了客观现实的变化,促进了奴隶制度的瓦解和封建生产关系的形成。

井田制的崩溃,私田的发展,封建生产关系的成长,这是我国古代生产关系和土地制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的变革。从此,奴隶制的土地国有制由封建制的土地私有制所代替,在农业上没有人身自由的、生产积极性不高的奴隶劳动被有一定人身自由、有较高劳动兴趣的个体农民的劳动所代替。

三、春秋手工业的发展

在井田制日益破坏,土地私有制逐渐形成,农业中出现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时候,在手工业、商业领域内,生产关系和经营情况也起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西周时期“工商食官”局面的被打破,独立经营的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出现。

“工商食官”,即工商为官府服役的意思,它是我国奴隶社会手工业和商业在生产上和经营上的主要特点。在这种制度下,手工业者或商人是官府的奴隶。他们世代受官府的奴役,为官府做工或经商,不能改变自己的职业,不能自由地迁居,没有任何人身自由,能够被奴隶主贵族随意作为礼品或贡物来送人;他们生产出来的手工业品或经营的商品也要交给官府,为官府服务。这种“工商食官”的局面,束缚了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积极性,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这种生产和经营的方式是必然要改变的。

春秋时期,随着铁器的使用,手工业生产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商业活动也频繁起来了。在手工业中,分工越来越细,门类越来越多,有纺织工、车工、皮革工、木工、制陶工,刮磨工等等,每一部分的手工业内又有若干工种。青铜器的制造有了明显的进步,铜器上的雕镂纹饰趋向细致工整,造型趋向轻便灵巧,还出现了富丽美观的错金铭文。煮盐业、冶铁业、漆器业等新的手工业部门也发展起来。齐国很早发展了桑蚕丝织业,齐国的女工织出的纺织品质量优良,花纹美丽,行销到各诸侯国。很受欢迎。

楚国的漆器制造得非常漂亮,长沙春秋楚墓出土的铁器,在地下埋藏 2000 多年之后,仍然宛然如新。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但是,落后的奴隶制度,却阻碍了手工业生产和商业交换的进一步发展。手工业工匠和商人在“工商食官”的局面下,受到奴隶主贵族极其沉重的压迫和剥削,没有生产和经营自由,不能发挥劳动的积极性。春秋时期,手工工匠和其他劳动者反抗贵族统治的斗争,此伏彼起,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动摇了“工商食官”的制度。这样,一部分手工业者、商人从官府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生产、经营的个体手工业者和商人,也有一部分贵族或农业劳动者从事经营手工业或商业。这种独立手工业者的聚居地一般称为“肆”,商人的聚居地称为“市”,即是小规模临时聚集起来的商场。当时物物交换在社会上还是普遍的,所以可以用布去换丝,用粟去问卜。到周景王和管仲时,已使用了

铜铸的货币,反映了工商业活动的发展。独立生产、独立经营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不属官府所有,自己能支配自己的经济,有私有的生产工具,生产或经营得好,就受到群众的欢迎,可以卖得好的价钱,因此这种生产、经营的方式能够发挥劳动者努力生产、改进技术、搞好和扩大经营的积极性,比起“工商食官”的局面来,有利于生产和经营和发展。这样,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阶级斗争的推动,独立手工业者和商人就在社会上大批地出现了,“工商食官”局面逐渐被打破了。

春秋初期的郑国,是一个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国家。郑桓公曾和商人订立盟约:商人不背叛公家,公家也不干涉商人的经营。郑国之所以比较富足,郑庄公之所以在春秋初期一度称霸,和郑国商业的发达、商业税收较多是分不开的。当时,郑国商人的足迹遍布了中原大部分地区,当秦国准备袭击郑国时,郑国商人弦高假托郑国君主的命令,以 12 条牛犒劳秦师,足见郑国商人交游之广、地位之重要。晋国也出现了弦高一类的大商人,《国语·晋语》记载说:晋国的首都绛的富商之财,足能“金玉其车,交错其服”,去交通诸侯。这种商人,不仅是独立经营的,而且已是很有势力的、地位相当重要的大商人了。独立手工业者也常见于记载,我们上面所举的鲁国南部有个“冬陶夏耕”的吴虑,既是个体农民,又是个体手工业者。被称为匠师之祖的鲁班,以能制造多种器械、工艺精巧而闻名,更是一个人所共知的能工巧匠。

春秋晚期,随着各地区经济联系的加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些既插足于政治,又雇佣一批人为其经营的大商人更多

地出现了。像范蠡离开勾践之后，从事商业活动，游历各国。在19年中，三次积累了千金的巨富，最后定居于陶，称为“陶朱公”。孔子的学生子贡，同样周游列国，一面参与政治活动，经常为鲁、卫两国的“相”，游说于各国，“家累千金”；一面又进行商业活动，买贱卖贵，囤积居奇，贩运转买，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成为他从事政治活动的资本，受到各国国君的尊重。

“工商食官”局面的打破，独立手工业者、商人的出现，使各国的经济联系加强了，商业交往频繁了，市场繁荣起来了。当时，北方的马匹、牲畜、齐国的盐、铁、丝绸，楚国的曾青、丹干、齿革，西方的皮毛，都可以在各地买到。住在山上的人可以买到水产品，住在水边的人可以买到山上的木头，农民不必要从事木工陶工就有足够的器械用，工人不必要耕田就有粮食吃。这样的情况是过去没有过的。手工业商业活动的频繁，新的适合封建关系需要的工商业制度的形成，冲击了腐朽的奴隶制生产关系，有利于各地区、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发

四、工匠造反和“民溃”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出现，进一步冲击着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奴隶制度。但是，为了维持旧的奴隶制统治秩序，奴隶主贵族更加残酷地压迫剥削人民大众，妄图挽救奴隶制度的危亡，永保自己的统治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奴隶和平民反抗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

春秋时期各国奴隶主国君的统治更加腐朽，对劳动人民

的压迫剥削更加苛重残暴,社会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在齐国,奴隶主贵族搜括来的粮食堆积如山,以致霉烂生虫,还大兴土木,修建宫殿,过着淫乐奢侈的生活;而劳动人民成年累月挨冻受饿,连去山泽中打柴捉鱼也被严禁。受苦受难的人民起来反抗,奴隶主贵族就用酷刑来镇压。齐国由于被处刖刑的人很多,以致市场上出现“鞋子贱,假脚贵”的怪现象。晋国也一样,晋国郊外的道路上,到处都是饿死的劳动者的尸体。晋灵公经常用弹弓打人以取乐,晋国的公室还不断征发劳动力,大修宫殿,老百姓一听到国君的命令便立刻逃走。就好象躲避强盗仇敌一样。蔡国本是一个比较贫弱的国家,而且介于晋楚之间,经常遭受战争的破坏,负担着极重的贡赋,可是解放后发现的蔡侯墓,其陈设之华丽,随葬的器物之多,为过去所少见。随国是汉水流域的小国,1978年在湖北随县发现的随侯墓中,单是随葬的青铜乐器——钟,就挂满了几个钟架,排列整齐,完好如新,为以往所仅见。郑、来、陈、蔡等国家,在晋楚争霸中遭受连年的战祸,房屋、道路被破坏,树木被砍伐,井灶被填塞,男女被俘当奴隶。就在和平的年代,小国也要向大国进贡大量礼品。这样大规模的耗费,都是从劳动人民身上强取豪夺来的。劳动人民受剥削之重,可以想见了。

有压迫就有反抗。当时负担着沉重的劳役。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庶人和被迫为官府服役的工匠,首先举起了反抗斗争的旗帜。

春秋时期,各国经常发生被强迫从事劳役的庶人集体反抗奴隶主贵族的斗争,对当时政治的影响很大。

公元前644年冬天,齐桓公会合鲁、宋、陈、卫、许、邢、曹、

郑等国的诸侯于淮水旁，准备集体出兵去击退淮夷，保护东方的郢国，并和楚国争夺对淮水流域的控制权。各国都征发了庶人去修筑郢城。在寒冷的冬天，役人们劳动过度，很多人病倒了。有一天夜里，有人登上城墙高喊“齐国有乱！”再也不甘受奴役的各国的役人一哄而起，全部逃散，筑城的计划被迫停止，齐桓公也只得放弃攻伐东夷的图谋。

公元前641年，紧靠秦国的小国梁国的国君大兴土木，征发役人去修城墙，无休止地强迫他们服劳役。老百姓疲惫不堪，再也不愿服役了，国君就说：“有敌寇将来袭击我们呀！”继续强迫人民为他挖宫殿四周的壕沟，忍受苦役的民众怨声载道。国君又说：“秦国快来袭击我们了！”役人们再也无法忍受了，便乘机而起，挣脱了奴隶主的控制，一齐溃散。结果，秦国攻灭了梁国。这一事件，史书上称为“民溃”。

有些役人的斗争更公开采取了武装暴动的形式。公元前550年，陈国的国君陈哀公和贵族庆寅、庆虎发生矛盾，庆氏乘陈哀公去楚国的机会起兵叛乱，楚国派军队包围了陈国。庆寅、庆虎强迫城内的劳动者加筑城墙。在筑城时夹板脱落了，监工的庆氏竟残酷地杀死了役人，激起了役人们的愤怒。他们互相约好杀死役使他们的大小爪牙，燃起了武装斗争的烈火，奴隶主头子庆寅、庆虎也被起义者所杀死。陈国的奴隶主贵族吓得惊慌失措，发出了“惟命不于常”的哀叹。

役人采取的“溃散”或武装起义的斗争形式，在春秋时期不断发生。它往往爆发在各国的交战过程中或各国内部贵族互相斗争的时候。役人们利用这样的时机进行斗争，往往造成了灭亡奴隶主国家，更替奴隶主政权的效果，给各国奴隶主阶

级的统治以有力的冲击。

当广大被征发从事劳役的庶人不断斗争反抗奴隶主贵族的时候,束缚在“工商食官”的制度下,受到监工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手工业工匠,也掀起了武装斗争的风暴。

卫国有个贵族曾经感叹地说:“凡是卫国有祸难的时候,手工业者和商人总是起来作乱造反的。”这句话反映了奴隶主贵族对工匠暴动的恐惧心理。从春秋战国之际卫国的两次工匠暴动来看,说明工匠暴动对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春秋末期,卫国的政治腐朽黑暗,国君卫庄公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他有一次站在城墙上,远远望见戎人所居住的城邑,就发怒说:“我们是姬姓的国家,为什么会有戎人?”于是,出兵毁坏了戎人的城邑;他又在城上看到戎人己氏的妻子的头发很美,便把她抓了起来,剃掉她的头发,却拿来给自己的妻子做假发。他还强迫手工业奴隶日夜不停地为他做工,手工业工匠们劳累过度,一年到头得不到休息。公元前478年,卫国工匠终于发生了暴动。暴动的队伍愤怒地包围了卫庄公的王宫,卫庄公吓得胆战心惊,在宫门内向起义者求饶。没有成功,便急急忙忙带着太子从宫墙北面跳墙逃跑,结果把大腿骨也跌断了。久受卫庄公欺压的戎人乘机进攻,杀死了卫庄公的太子疾。卫庄公带伤逃到戎邑己氏那里,拿出自己佩带的一块玉璧来,苦苦哀求说:“你留下我这条命吧,我愿把璧给你!”己氏忿忿地对庄公说:“我杀了你,那块璧也跑不了。”己氏终于杀了庄公。过了九年,卫侯辄又无休止地强迫工匠服役,工匠们便和卫国国内失了势的贵族一起进行暴动。他们有的手拿

兵器，没有兵器的拿了斤、斧等手工业工具作为武器，和统治者进行英勇的斗争。他们联合了卫侯辄的亲信拳弥到宫里作内应，占据了已被上一次工匠暴动杀死的太子疾的宫室，从那里喊杀着攻打卫侯。这时卫国有个大夫要想用武力镇压起义，拳弥对他说：你虽然勇敢，也无法挽救国君的命运了，难道你不见卫庄公的下场吗？现在是“众怒难犯”呵！卫侯辄得不到支持，只得狼狈地逃了出去，后来死在外地。

工匠居于城中，他们的斗争直接威胁到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有时他们也和一些失意贵族的斗争结合起来，声势就更大，但斗争的主要力量还是工匠。他们的斗争不仅打击了贵族的统治，而且对瓦解“工商食官”的旧制度起了很大的作用。

五、战国农业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突出表现在当时农业的发展上。春秋战国时代，从考古学上看，是由青铜器走到铁器的时代。特别是在战国时代，全国各地出土的铁器，不仅种类多、数量大，而且分布很广。事实证明，战国时代的生产工具已普遍使用铁器；尤其是在农业生产上，铁制农具是大量使用的。建国以来，先后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湖南、湖北等省，都先后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铁农具。从1955年河北石家庄市原赵国遗址发现的农具看，其中铁制的农具占的主导地位生产工具。正因为铁制农具广泛使用，所以战国时代的农业才得以巨大发展。那时不仅有了铁农具，更重要的是还把家畜作为动力应用到农业上。铁器与畜力结合起来，就出现了前所

未有的,以家畜作引力、以铁质作铤尖的犁头。这就有可能大规模的深翻精耕,从而使农业生产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到春秋战国时期,牛耕逐渐普遍起来。到战国时,牛耕农业比起春秋时代更为普遍,这是有考古材料可以说明的。考古工作者曾在河南省辉县的战国大墓中,以及河北省易县等地,都曾出土过 V 字形的铁犁铤。以河南辉县出土的为例,它的重量约为一市斤,斜边长 17.9 厘米,夹角为 120° 左右。有人认为无法鉴定它确实是当时牛耕用的铁犁铤。我们把这种形态的铁器与秦汉以后的牛耕用的铁铤相比较的话,便可以证明它是当时的一种用于牛耕的铁铤。考古工作者曾经在甘肃古浪发现过汉代的犁,将两者比较便一望可知,考古发现的战国时期的 V 形铁器是牛耕用的铁犁铤。

在牛拉的铁犁发明和使用以前,翻地是靠人力的,即所谓“耦耕”。大致那是用二人相配合使用一种歧头的铲子来翻地。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翻耕土地的方法。自然不可能提高工效,而且不可能深耕。有了牛耕,加上锐利的铁制犁具,就可以大大提高功效,并保证翻地的质量;再加上农业生产上都广泛的使用铁器农具,这样就必然把当时的农业生产推进到精耕细作的阶段,从而使生产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农产品就可以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到战国后期,据《吕氏春秋》讲,已可以达到:上等之田 1 人耕种即可供 9 人食用,下等之田也可能 1 人耕种养活 5 口了;如果搞得好的话,还可以“十五人治之(即一人耕种)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不仅一人耕种可养活 10 口,而且马、牛、羊、鸡、犬、豕这些家畜的饲料也有了。这是相当可观的生产水平了。我国已发现的古代最大粮仓,也是战国

时期的。

有了用畜力作动力的铁犁,比起过去那种两人合作的耦耕来,翻整土地要快得多、好得多。但是,好只是搞好农业生产的第一步。接下去还必须播种和进行一系列的田间管理。

正确把握耕播时节,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特别注意的。夏、商以来,我国历法的进步情况充分说明了这点。战国时代的人已非常注意,什么季节是什么天象,生物的生长变化情况如何,都观察得细致,掌握得比较清楚。

在播种的方法上,我国农民在数千年的农活实践中,虽然也逐渐摸索出了一些经验,但在春秋战国以前,总的说还是比较粗放的。对于种植,一般只能把种子撒播在土里,或点播在土里,到收获季节便去收取了事。少数比较先进的农业区,可能已较早的注意到播种的行款、间隔和距离,注意到了作物的通风和阳光等问题;特别是到了战国时代,这种为保证作物通风,吸收阳光,促进作物的健康成长的先进耕作方法,差不多已为当时农民所普遍重视,而且很讲究。如《吕氏春秋·辩土》所讲的:“茎生于地者五分之以地。茎生有行,故速长;弱不相害,故速大。衡行必得,纵行必术,正其行,通其风。”意思是说,农作物的行距适当,互相就不会受影响,这样就长得快、长得好;行距适当,就便于通风,使农作物能舒舒展展的生长发育,这样也就可以得到好的收成了。可见,战国时代的人,对于农作物种植的行距、株距是很注意的。

为了确保好的收成,还要有一系列的田间管理工作,比如施肥、除草、灭虫等等。春秋以后,尤其是到了战国时代,单从先秦诸子的言谈话语之中,我们便可以看到,那时候从政府到

农民,都很注意积肥、造肥和庄稼的施肥。

施肥是改良土壤、保持地力、促进农作物生长的一项重要措施。一年四季的时间不同,各种土质的不同,农作物的种类不同,对肥料的要求也不一样。这方面的问题,战国时代的人已经很重视了。《周礼·地官》“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就告诉我们“草人”是掌管改良土壤,按照不同的土质播种适宜的庄稼的政府小官吏。紧接下去就讲,什么样的土质,该使用什么样的粪便作肥料,才能达到改良土壤的目的。这种作法,就是所谓的“粪种”。从前一些人根据郑康成等人的说法,以为是下种前用肥汁浸泡种子,以便促使种子更好的发芽成长。其实,从《周礼》所说的看,是指用不同粪肥改良土壤的事。原话是:“凡粪种:马辛刚用牛,赤缙用羊,坟壤用麋,渴泽用鹿,咸潟用豕,……”一口气举了九种不同土质所宜使用的动物粪肥,我们这里就不全引了。很显然所谓“粪种”并不是郑玄等人所说的用肥汁浸泡种子的事。

为了保证对各种肥类的需求,当时已注意积造各种肥料。《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夏季纪》,都讲到了积肥造肥的问题,从有关记载中可以看到,大致当时除施用名种粪肥外,还比较普遍的盛行的是夏天把野草割下来晒干烧成灰,或是浇上水使其腐烂沤成有机肥料。除此而外,还把油渣也用做肥料。战国时已经开辟了多种肥料的来源。

对于除草和治理病虫害,战国时代的农民也注意到了。

先说除草吧,春秋以前不很清楚,大致到春秋时是注意到了。春秋以后已有一种专门用于除草的小型农具,当时人称为耨。耨是一种用以间苗锄草的农具,全长有一尺,这种农具的

使用,说明当时的农业已开始达到了精耕细作。

再比如灭虫保苗吧。到了战国时代,农民群众从生产实践中已得到了教训,靠求神是不行的,必须通过自己的双手把害虫消灭,才能保证庄稼有好的收成。所以《吕氏春秋·不屈》篇讲,战国的农民见了害虫不再光靠求神,而是“蝗螟,农夫得而杀之”了。从这里反映出战国时代在消灭病虫害,确保庄稼好收成方面已大大向前进了一步。

由上我们不难看出,到了战国时代,农民对于农业生产,已有一套包括耕、种、管理的切实可行而又比较符合科学原理的措施。这样就可以使农业生产获得较好的收成了。

春秋末至战国时代,各国统治者也很注重农田水利灌溉事业的建设。战国时代著名的思想家荀卿就讲:“修堤渠,通沟洫,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耕耘,司空之事也。”

大面积的水利工程的出现,是农业发展的要求。它本身就表明耕地面积的扩大。从有关文献看,这种大型水利的兴修,大致最先在楚国的江淮地区出现,因为这些地区农业比较发达。据记载,春秋时代,江淮地区的劳动人民,结合当地自然条件,因地制宜的兴修了一些适用于当地需要的农田水利设施。在群众创造的基础上,楚庄王(公元前 613——593 年)的令尹孙叔敖,曾开凿勺陂(今安徽省寿县南),这是我国淮水流域有名的水利工程,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水库工程。据说直到赵宗时代,由于封建统治者的腐败,年久失修才被淤积荒废的。

随着农业生产发展的要求,到了战国时代,中原各国,特别是当时比较强大的诸侯国,都很重视农田水利的建设。最有

名的有魏国的引漳灌邺工程,秦国蜀郡的都江堰工程和关中的郑国渠等大型水利工程的兴修。

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中有一家叫作“农家”。代表人物是许行。我国最早的农业书也是在战国末期写成的。即:《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专讲农业的专题论文。其《上农》是重农的意思,提出了重农的理论,着重阐明了农业与政治的重要关系。而《任地》提出了10个问题,从整理土地,利用和改良土壤、一直讲到耕作保墒、除草通风等。《辩土》篇对《任地》的问题作了具体的回答,主要讲了使用土地,以人力改变土质的问题。《审时》篇则重点讲述了庄稼与时间季节的关系。还应提及的一点是《管子》一书中《地员》篇是我国最早讲到水土与植物之间的关系的文献。

六、战国手工业的发展

战国时期,由于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手工业生产也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新时期,冶铁、青铜器、漆器、丝织品等等方面的生产水平,都有显著提高。

冶铁,是当时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春秋以来,铁器使用不断推广。战国时期不仅大量使用铁制农具,而且还出现了许多铁制的手工业工具,如凿、锥、刀、锯等;还有很锋利的铁制武器,如剑、戟、刀、矛、匕首等;此外,还有其他铁制用具,如铁笼、铁锁、铁铍等等。铁器的广泛使用,使冶铁业兴旺起来了。战国时期铁的冶炼遍布全国各地,铁的冶炼设备和冶炼技术,比春秋时代有了更大发展,在古代世界中是名列前茅的。

这时期的炼铁炉一般都比较高大,而且有鼓风设备。当时的鼓风设备是一种特制的大皮囊。这种皮囊的形状很像当时一种叫“橐”的容器,所以也称这种鼓风皮囊为“橐”。皮囊的两端比较紧缩,中间鼓起,好似骆驼峰,旁边有一个洞口装着一一条竹管通到炉边。如果用力把大皮囊压扁,空气就会从竹管吹到炉中,达到鼓风的目的。有时用一排皮囊鼓风,可以提高炉温,进行生铁和钢的冶炼。冶炼使用的燃料主要是木炭。

在炼铁技术上,战国时期的劳动人民已懂得用“高温液体还原法”冶炼铸铁。“高温液体还原法”,是在石砌或泥筑的炉中,用木炭在高温下还原矿石,得到液体金属,然后浇注入铁范中铸成铁器。过去,在 800—1000℃条件下炼出的铁,出炉时是一种海绵状的固体块,即所谓“固体还原法”。使用“固体还原法”所得的铁块制造铁器,要经过反复加工,才能造成,成形费工,只能造一些形状简单的器物。改用液体铸铁制造铁器后,可以造出形态比较复杂的器物,铸成的器物也比较精美。长沙战国楚墓出土的铁铲比较精致,铲身较薄,表面均匀,可能与使用铸铁制造有关。从目前地下出土的器物来看,战国时期的铁器有许多是用铸铁造成的,可见当时铸铁生产的普遍。在欧洲,直到 14 世纪才开始使用铸铁,我们比欧洲早了 1800 多年。

铸铁有许多优点,但容易断裂,为了克服这个缺点,劳动人民发明了柔化处理法,对铸铁进行加工。可惜史书上对这种处理法的具体工艺,缺乏记载,详细情况已不大清楚。经过柔化处理的铸铁和后来所称的可锻铸铁属同一类型,它具有一定韧性,可以制造更多样、更精细的器物,从而扩大了铸铁的

使用范围。欧洲到 18 世纪才懂得使用柔化法处理铸铁,我国比欧洲早了 2000 多年。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可锻铸铁是洛阳水泥制品厂出土的铁铸,属于春秋战国之际的铁器;长沙战国楚墓出土了一把铁铲,属战国中期的铁器;大冶铜绿山出土的几把铁锤、铁斧、铁锄属战国中、晚期的铁器,都是用可锻铸铁制成的。

战国时铸造铁器已开始使用铁范。在河北兴隆县一个战国后期燕国的冶铁遗址中,曾出土了 70 件铸造铁工具的铁范。过去用陶范铸造青铜器,一个范只能使用一次,战国时期用铁范铸造铁器,一个范可连续使用,从而大大提高了铸范的使用率。在河南新郑县和登封县告城镇的战国时期韩国的冶铁遗址中,还发现了许多卧式层叠铸范,说明当时人们已懂得把许多范片层层叠合起来,一次灌注出多个铸件。虽然当时浇灌的方法还比较原始,但也大大提高了效率。铸铁和金属铸范的发明,在我国冶铁史上是一次革命,它使冶铁业前进了一大步,也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冶金技术的重大贡献。

在炼铁技术提高的基础上,战国时期某些地区已能炼钢。当时称钢为“镡”,即很坚硬、可以镡刻器物。这种最早的钢铁一般都经过水淬、锻打等工序,使其达到钢的含炭量范围,从而制出了和近代铸钢相类似的最早的钢。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载,吴、越是我国最早发明炼钢的地方。早在春秋末期,吴、越的铁剑就以锋利出名,如果不是钢质,刃口不可能达到十分锋利的程度,所以,吴、越的铁剑大概也就是最早的钢剑。据说当时吴、越还出了一些很有名的铸剑师傅。越国最有名的铸剑师傅是欧冶子,吴国最有名的铸剑师傅是干将和他

的妻子莫耶。干将和欧冶子是同学，他俩都很会铸剑。《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载了干将为吴王铸剑的故事。春秋末年，吴王阖闾想称霸中原，听取了谋臣伍子胥的意见，积极练习武艺，但缺少宝剑，于是请干将为他做两把宝剑。干将采集了最好的铁矿石，选好了时辰，溶铁铸剑。开始铸不成，经他妻子莫耶提醒后，想起过去自己的老师铸剑时，铁矿石不溶，夫妻二人一起跳入炉中，炼出了两把利剑。莫耶说：“老师能牺牲自己，我们又有什么困难能阻挡呢！”于是她叫了300个童男童女“鼓囊装炭”，自己“断发剪爪”，投入炉中，结果炼出了两把宝剑，一把叫“干将”，一把叫“莫耶”。“干将”剑上有龟文；“莫耶”剑上有很轻漫的花纹。后来，铸剑师傅干将把刻有“莫耶”名字的那把剑献给吴王，吴王见后十分高兴。这个故事含有神话成分，不完全是事实。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吴国炼钢铸剑的一些情况：使用鼓风囊，由300人进行劳动，可见生产规模之大。同时也使我们看到当时的铸剑师傅为了铸出好剑，不惜牺牲自己一切的忘我精神，这正是我国劳动人民高贵品质的生动反映。后来干将、欧冶子还为楚王铸造宝剑，炼钢技术传到楚国，楚国也成为铸造利剑有名的国家。韩国也铸造了许多宝剑，河南西平县的龙渊水，淬刀剑特别坚利，称为龙渊之剑。

战国时期的铁产区比春秋时期也增多了，其中又以河南产铁最多，大都位于韩、楚两国统治区内。战国时期冶铁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铁工具的广泛使用，从而对整个社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和冶铁业发展的同时，青铜器制造业也有显著进步。在以

前,青铜器主要用来制造礼器、乐器和兵器,供奴隶主贵族享用。到了战国时期,青铜大量用来铸造生活用具,如做釜、甗、镜、带钩等等,还用来制造其他工艺品和钱币,说明这时期铜器的使用范围已超出了贵族礼乐范围,青铜器不再是贵族垄断的器物了。

青铜器的制作方法,这时期普遍应用熔铸和焊接法,即先把器身和附件分别铸好,然后把附件附在器身的范上,灌注铜液,使器身和附件熔铸在一起。有时是把器身和附件分别铸成后,再用合金焊接成一个整体。这时的焊接技术已有显著提高。1978 在湖北随县发现了一座战国初期的墓葬,墓主是当时一个不大的诸侯王曾侯乙。墓中出土了一个建鼓,鼓座用青铜铸成,座上有 8 对主龙,对称地盘绕在座体上,主龙的身部和尾部又有小龙攀附着。构成这个复杂的立体形象的共有 22 个铸件,14 个接头。这些铸件都是通过焊接把它们联结在一起的。经专家研究,这个复杂的立体形象在焊接时,既采用了铜焊,也采用了钎焊。用于钎焊的合金是铅、锡、铜、锌。采用这种焊接技术和所用的合金,是以前所没有的。

由于制作技术的提高,这时的青铜器型体显得轻薄灵巧,花纹细致繁复。青铜器上有鸟兽形图案;有描写车马狩猎、水陆攻战、宴饮歌舞图案;有刻铸铭文作为装饰;还有用红铜薄片和金银丝嵌镶在铜器表面,构成各种图案,即所谓“金银错”,“金银错”工艺在春秋晚期已出现,战国时又产生了在青铜器表面涂金或刻划花纹的“鎏金”和“刻纹”新工艺。这种工艺在我国金属细工工艺上一直十分有名。此外,有些青铜器则用立体鸟兽作装饰,或整个器物作鸟兽形状,体态十分生动。

这时期也制造出了大型的青铜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一个大甬钟,通体高 153.4 厘米,重 203.6 公斤,器形的大小和重量都超过了以往出土的编钟。同墓还出土了两个大铜缶,大约都有 1.3 米高,腹径长 1.1 米,分别重 320 公斤和 361.5 公斤,体型之大,在先秦青铜器中仅次于商代的司母戊大方鼎。这座墓里还有用大量青铜做主棺和外棺的青铜框架,框架总重量有 3200 公斤,至今保存良好。整座墓出土的全部青铜器重量达 10 吨左右。在一座墓中出土总重量这么多的青铜器,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过。曾侯只是当时一个小诸侯,在他的封国里就能铸造出这样体型大、种类多、器形复杂的青铜器,可见战国时期青铜器铸造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漆器制造在战国时期进一步发展起来,并以精美著称。

我国是世界上制作漆器最早的国家。我们的祖先在生产劳动中,很早就知道利用漆树分泌出来的汁液用作涂料,涂在用具上,制成漆器。用漆作为涂料的最早记载是《韩非子·十过》。它说在虞夏时代,人们就知道用漆液涂食具了。在《尚书·禹贡》中把漆列为贡品之一。《周礼》记载西周时民间生产漆需向国家纳 $1/4$ 的税。由此可知,我国可能在 4000 多年前就已经有最原始的漆器,以后不断发展,到战国时期,漆器的制造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漆器的发明和木器的防腐有密切关系,所以,最早的漆器制造是附属于木工的。战国早期,漆器还是木器业的附属部门,战国中期开始脱离木器业,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战国的漆器坚固耐用,外表光泽美观,应用也很广。不但应用于制

造日常生活用具,如饮食器(杯、盘等)、家具(几、案等)、容器(盒、奩等);而且,还用于制造武器附件(弓、盾、剑壳子、戈柄、戟柄等)、乐器(鼓、瑟等),以及丧葬用具(棺槨、镇墓兽等)。当时由于人们对漆膜的防腐作用有了进一步认识,所以,不仅在木制用具上涂漆,在木建筑和金属器物表面也涂上一层漆,以保护器物,并且有黑、红、黄、蓝、紫、白等 10 多种颜色,加桐油配成各种颜色的油彩,绘画出各种美丽的花纹图案。有些日用漆器还回镶了金边和铜边,即所谓“金铜扣”,使器物更加美观耐用。这时劳动人民还发明了催干剂。这些都说明当时漆器制作技术已有很大进步。战国时期劳动人民创造的漆器技术,一直为后世所沿用,并不断发展提高,使我国漆器名闻中外。直到今天,我国出口的具有民族风格的各种漆器,仍深受各国人民喜爱。

和漆器一样,战国时期的丝织业也得到很大发展。

我国的丝织业有悠久的历史,产品丰富。但丝织品一直为统治阶级所占有,供他们享用。战国时丝织品仍是统治阶级主要的衣着原料,工艺丝织品也主要是供他们观赏。统治阶级从其本身需要出发,积极鼓励养蚕种桑,并向农民征收丝帛,作为国家赋税收入的一项。因此,当时刚从奴隶制桎梏下解放出来的个体农民,往往利用宅前屋后、田边地角种植桑树,同时也利用整块土地种植桑树。在全国耕地面积中,桑地占了相当数量,桑蚕生产的重要性仅次于粮食生产。养蚕织绸成为农村妇女重要的劳动项目,也是农村主要的家庭副业之一。丝织业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我国封建社会“男耕女织”的现象,从这个时期开始就很普遍了,2000 多年来一直没

有改变,从而构成了我国封建经济的一大特色。

当时丝织品的主要产地,除春秋时期就很有名的齐国以外,还有楚国。近年来在长沙楚墓中,曾多次出土锦、绢、绸、纱等类织物。长沙左家塘一座战国中期的楚墓中,出土了一叠丝织物,共有 20 多块,其中除了几块平纹绢以外,大部分是结构和花纹都较复杂的织锦。这些锦用深棕色、红色、黄色、褐色丝线织成,花纹图案有菱纹、矩纹、方格纹、燕纹和对龙对凤等。这些锦长期泡在水中,距今已有 2000 多年,但还没有炭化,花纹颜色仍然比较清楚鲜艳,可见战国时期楚国的丝织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战国时的刺绣织锦技术已相当成熟,成品精致华丽,所以,当时人们常用“锦绣”二字称呼最美丽的织品,后来,“锦绣”便成为“美丽”的代称。

除丝织业外,麻、葛纺织以及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染色技术也有很大进步。战国时期的煮盐、制陶、竹木、皮革、玉器、酿酒等等日用手工业,都有所发展。近年来在长沙楚墓中出土了玻璃壁、玻璃珠、玻璃印章,说明战国时我国已能制造玻璃,纠正了过去认为我国最早的玻璃是由东罗马帝国传来的,到北魏时我们才能自己制造玻璃的传统说法。

总之,战国时期的手工业生产,门类增多了,规模扩大了,技术也有很大提高。另外,从经营性质来看,不仅独立的个体小手工业者迅速增加,而且还出现了不少富有的私营大手工业者,这是战国时期手工业生产关系方面的一个新特点。

战国时期私营大手工业者的经营内容,主要是与国计民生有密切关系的冶铁、开矿、煮盐等行业。他们使用依附贫民和奴隶进行大规模生产,有些人成了富比王侯的暴发户。《史

记·货殖列传》记载,当时鲁国有一个叫猗顿的人,原来很穷,后来向大商人陶朱公请教,经营煮盐,结果发了大财,成为好像王公一样有钱的大富翁。四川有一个寡妇叫清的,因为开发丹砂,得了很多钱财,又由于她能坚守家业,得到秦始皇称赞,并为她筑了“女怀清台”,因而名扬天下。还有赵国的郭纵和卓氏、山东的程郑、魏国的孔氏、鲁国的曹邴氏等,都因为经营冶铁,成为拥有家财百万的富豪。

民间私营手工业虽然有很大发展,但是,在整个手工业生产中,官营手工业仍占主导地位。官营手工业主要是生产统治者需要的产品,如战争用的兵器;生活中的奢侈品等等。官营手工业设有专门机构和官吏管理。官营作坊的生产分工细、规模大,直接生产者官奴、罪徒和征调来的民工,有些作坊还有雇工。封建统治者直接压迫这些劳动者生产各种器物,以满足他们骄奢淫逸生活的需要。

战国时期,官营和私营手工业都有很大发展,然而这些发展都是广大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手工业的发展,为商业和城市的繁荣创造了良好条件。

七、战国商业和城市的繁荣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战国时期的商业交换活动也更加频繁活跃起来。

这时期商品交换的范围扩大了。春秋以前,商业主要是为贵族官僚服务的。战国时期,和市场发生联系的不仅有贵族官僚们需要的奢侈品和珍贵用品,而且还有农民、手工业者的生

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如煮饭的陶锅、穿戴的衣帽等。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农民也有条件把一部分农作物拿到市场上出卖,换取自己需要的手工业品。

为了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战国时期货币的种类增多,流通范围进一步扩大。战国时期国家多,各地货币的样式不同,货币的种类繁多。解放以来,全国各地发现了大量战国货币,不下几百种之多,大体上分为铜币和金币两类。铜币从型制看,主要有四种:一是刀种,形状像刀,主要流通地区是齐国和燕国,也流通到赵国;二是布币,“布”是农具镈的假借字,形态像农具镈,主要流通地区是赵国、韩国、魏国;三是圆钱,有圆形方孔或圆形圆孔钱,主要流通地区是秦国、东周、西周和魏国部分地区;四是铜贝,也叫蚁鼻钱,形状像海贝,主要流通地区是楚国。金币主要有楚国的“郢爱”,是一种扁平的四方块,用黄金做成,上面印有“郢爱”二字。“郢”是楚国的都城——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的名字;“爱”可能原来是重量名称,后来逐渐转为郢爱的货币名称。“郢爱”往往是16个小块合成一大块,但有多至19块合成一大块的。由于每一小块大小不一,重量也不相同,所以使用时需一小块一小块切下,按重量定价值。此外,在楚国还有“陈爱”、“郢爱”和印有一个“颖”字的金币,都与“郢爱”相类似。由此可见,楚国是当时金币最流行的地方。除楚国以外,从解放以来地下出土的“郢爱”看来,在中原大部分地区,包括南起湖南、北至河南中部,西自湖北西部、东临海滨、东北到山东南部等地,都有楚国金币流行,可见金币流通地域之广。

金币流通范围的不断扩大,是战国时期货币发展的特点

之一。但是由于黄金是一种稀有金属,比较贵重,所以战国时只有大商人和统治阶级之间进行大宗贸易或赏赐时才使用,一般买卖还是用铜币。

战国时期货币种类之多,流通量之大,充分反映了当时商品交换的发达。但是,货币种类繁多,也反映了当时的交换还带有很大的地域性。

随着货币的发展,高利贷盛行起来了。当时的官僚、地主、商人,一方面通过征收租税、不等价交换等办法,残酷地剥削农民、手工业者;另一方面,他们还趁着农民、手工业者困难的时候,进行高利贷剥削。如齐湣王的相国孟尝君田文,既是一个大官僚大地主,又是一个大高利贷者,他曾在自己的封地薛大放高利贷,剥削那里的劳动人民。

在买卖和借债中,还发明了一种作为凭证的“券”。这种“券”一般用竹或木板做成。“券”上写有买卖或借债的合同,然后分为二,卖主或债务人拿右券,买主或债权人拿左券。大家按合同规定办事,如果发生争执,官府则根据券上合同进行判断。这种券的普遍使用,也是商品货币经济迅速发展的具体表现。

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商人的活跃,战国时期的城市进一步发展起来了,各国的国都和郡县官府的所在地,都发展成规模不等的城市。春秋前期,城市的规模不大,人口也不多。各诸侯国的国都方园不过 900 丈,卿大夫的都城大的也不过 300 丈,小的才有 100 丈。一般城市中的居民最多不过千家,有的是百家,最少的只有 10 家。战国时期,方园千丈、居民万家的城市到处都有了。国家政府机关都设置在城市里,所以城

市里居住着大批官僚和他们豢养的食客；居住着许多商人和各行各业的个体手工业者；还有杀狗的屠夫、卖卜算命的先生等等。在一些大城市里，已经出现人口拥挤的现象。城市里店铺林立，有金铺、酒铺、肉店等等，一般生活上需要的东西都可以在各种店铺里买到。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这时期的城市已经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它的地位和作用更重要了。

战国时期出现的大城市，如宋国的定陶（今山东定陶附近）、燕国的燕下都（今河北易县）、赵国的邯郸（今河北邯郸市西南）、魏国的大梁（今河南开封市）、东周的洛阳（今河南洛阳附近）等都是比较大的城市，这里我们着重谈谈当时两个最繁华的都会——齐国的临淄和楚国的郢。

临淄（今山东淄博市）是齐国的国都，城中有 7 万户人家，壮年男子有 21 万。这个城市十分繁华，居民喜欢音乐游戏，到处有吹竽、弹琴、斗鸡、耍狗的，非常热闹。《战国策·齐策》和《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的话说：在临淄的大街上，车马川流不息，行人来来往往很拥挤；常常是“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即车轮轴碰车轮轴，行人肩碰肩；人们把衣襟拉开连起来可以合成围帐；举起袖子可以连成幕；大家把汗水一挥，就好像下雨。这样说虽然有点夸张，但也绝不会完全没有事实根据。从苏秦对临淄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这座城市繁华的一些情景。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临淄城遗址进行发掘，知道它是由大小两城组成：大城住着官吏、百姓，小城是国君的宫殿所在地。大城的西边是商业区。在宫殿附近还发现有铸造货币的遗址和铁器作坊遗址。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临淄城的建设是很有规则的。

郢是楚国的都城，也是战国有名的大城市。在郢的街道上，由于来往行人很多，也经常拥挤得水泄不通。据说人们早上穿着新衣服上街，到晚上便被挤破了。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郢城也进行了发掘。遗址的城墙有 30 余华里长，比春秋时期的城市要大得多。

战国时期商业贸易的扩大、商人的活跃、货币的广泛流通、城市的繁荣，这些都说明当时的商品经济确有很大发展。但是，在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社会的经济基础。为了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经济基础，封建政府往往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力图控制商品经济的发展。

总的来说，战国时期整个社会经济处于飞速前进之中，但是，各个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齐国和魏国，由于自然条件较好，社会改革较早，因而成为战国初期经济比较发展的强国。秦国，原来比较落后，但它地处关中沃野，社会改革也较彻底，因此能迅速赶上并超过其它六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强盛的国家。楚国，疆域最大，土地肥沃，手工业、商业也相当发达，曾与齐、秦并称为强国，但由于政治改革不彻底，旧的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最后还是落在秦国的后面，被秦国灭掉。至于江南大部分地区，一般还处在刀耕火种阶段，仍较落后。

战国时期的经济发展，是广大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它为全国的统一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第二节 春秋战国 时期的民族与民族关系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各族人民在祖国的土地上劳动、生息和斗争，共同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推进了民族融合的步伐。

西周春秋时期，居于中原地区的文化较先进的民族称为华夏族。华夏族是以夏族、商族、周族为主体，加上和周族结成同盟关系的封国、部落方国的居民的一个总的称呼。由于华夏族居于中原地区，当时人们认为是天下之中，华夏族的周王朝及其封国便自称为“中国”。除了华夏族以外，在中原地区和四周地区，还居住着蛮、夷、戎、狄，这是华夏族对一些文化较落后的民族的称呼。

关于蛮、夷、戎、狄，过去有一种传统看法，认为蛮在南方、夷在东方、戎在西方、狄在北方。这种看法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夷族中主要是东夷，但还有南夷、西夷、北夷；蛮在南方的多一点，但除南蛮外，还有中原的蛮、北方的蛮；戎有东戎、西戎、南戎、北戎，也没有固定的方位；只有狄族一般地居于北方，但在东方和西方也还有一些狄人。当时这些民族经常流动迁移，像狄族曾往东迁移。另外，在中原地区，华夏族居住的只是文化先进、经济发达的平原地区，在他们周围的山、林、川、

泽地区，也居住着蛮、夷、戎、狄，春秋末年卫庄公在都城内能望见戎人居住的城邑。可见，华夏族和蛮、夷、戎、狄在中原地区是交错杂居的。

蛮、夷、戎、狄族和华夏族的区别，主要是文化、风俗差别，而不是血统差别。晋献公宠爱的骊姬是骊戎的女子；而骊戎也姓姬；晋文公的母亲是狄族的女子；说明当时贵族可以和戎、狄等族通婚，没有把戎、狄看成是血统不同的异族。唐朝的韩愈说：孔子作《春秋》，夷狄进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进夷狄，则夷狄之。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所以蛮、夷、戎、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只不过是一部分文化较落后的居民而已。

当时居于华夏族的东、南、西、北四个方面的，是哪些族呢？

东方。东方是夷族的根据地，也是商族的发源地。居于东方的夷族及其建立的国家有郟、邾、郚、杞、莱、介、莒、根牟等，东南方有淮夷、徐、群舒等。商和夷在血统和文化上是有联系的，是比较接近的族。夷族的种类很多，文化也较高。鲁国东边的郟国，他们说自己的祖先是少皞氏，已有了比较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了管理民事的官职，文化水平。已经和商代差不多了。春秋时的郟国是一个文化水平相当高的国家，甚至在《春秋》中把郟看成是中国而把吴看成是异族。夷族建立的另一个国家是徐，它在商、周之际相当强盛，在周初曾和武庚、管、蔡等一起起兵叛周，经过周公旦三年东征之后才把它打败，到了春秋时是期，徐的文化也比较高，是淮夷中一个比较突出的国家。鲁国边上的邾国，在春秋时有名的文化之邦。此外像杞国、郚国文化都不低。

《说文》“夷”字从弓从大，意思是平，没有贬意，而蛮字从虫，戎字从兵，狄字从犬，都有鄙视的意思。就文化水平来说，我们把位于今山东、江苏、安徽境内的夷族称为东方的华夏族，也是合适的。但夷族建立的国家，除徐国一度强盛外，其他都比较弱小，而且分散在各地，在西周和春秋时期逐渐和华夏族融合了。

南方。这里我们先谈江汉流域及西南部的蛮、夷等族。楚国是南方最大的国家，楚国境内的居民多数是蛮、夷等族。除楚国外，江汉流域还有南方各族建立的巴、濮、邓、庸等小国，春秋中期以前都为楚所吞并。西周在江汉流域还分封了一些姬姓小国，称为汉阳诸姬。从考古发现来看，当时这些国家的文化已达到中原各国的水平。汉阳诸姬后来也合并在楚国境内了。楚国的文化可以说是江、汉流域各族人民和商、周文化的融合。

楚国的东部、南部有越族，西部有夜郎、滇等小国。除了越族建立的越国以外，越族其他地区以及西南方的这些部族小国总的来说文化较落后，据记载，吴起在楚国时曾带兵达到江珠流域的苍梧一带，庄跻起义失败后也曾带兵进入今云南省，建立了国家。可是这些问题还待进一步研究。总之，到了战国时期，我国的南方各兄弟民族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楚国和中原各国的先进文化对他们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西方和北方，主要是我国古代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区。他们分布在东起黑龙江流域，西至中亚细亚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所谓戎、狄族只有一个统称，其实包括了很多种族。商代的鬼方，西周的猃狁、犬戎，春秋时的山戎、狄人，秦汉时期

的匈奴,实即一个族的发展。

周族起初和戎狄杂居。《诗经·商颂》说:“自彼氐、羌”,商人说到的“氐、羌”,也是戎、狄中的一部分,但他们在周代文献中很少见到,据近代学者的研究,氐、羌转音为姬、姜。姬族和姜族就是从氐和羌中发展出来的,而且姬族最早还是从姜族中分出来的,周族的祖先弃出于姜女原可以说明。姬、姜成为华夏族的组成部分后,其他地区的氐、羌没有华夏化,后来发展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氏族和羌族。

戎族除居于西方外,今山东境内也有戎,中原地区也有陆浑之戎、九州之戎,南方的楚国境内还有戎蛮氏,分布地区相当普遍。

狄族同样是北方诸侯的一个总称,春秋时期基本上分成赤狄、白狄、长狄三支。晋国分封的地区就是狄人杂居之地。居于今山西东、北部的赤狄,建立了潞国,有了文字,发展了农业和青铜手工业,建立了城廓,加速了与华夏族融合的步伐。

戎、狄族在春秋时期处于从原始社会走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文化落后于中原地区,以游牧为主。他们经常出外征伐,劫掠财富和人口,对春秋时中原各国威胁最大。山戎侵燕,狄人攻卫、邢,都给中原地区造成很大破坏。齐桓公等人“尊王攘夷”,救助遭受戎、狄侵扰的中原小国。这对保卫中原先进经济文化来说,是有进步意义的。

蛮、夷、戎、狄族在和华夏族共同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对祖国的历史发展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祖国东北的黑龙江流域,有着茂密的森林,众多的河流,丰富的矿藏,种类繁多的动植物,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古代兄弟

民族聚居的地区。

西周、春秋时期，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居住着我国古代的肃慎、东胡等族，他们和周朝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肃慎族的酋长曾向周武王贡献过木苦矢，祭石；成王伐东夷胜利，肃慎族又派人来祝贺。这说明早在西周之初，肃慎族已经臣服于周，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分离的成员。

肃慎族等兄弟民族在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下，经过生产劳动，到春秋初年文化有了相当的发展。1974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对肇源县一个距今约2700年的文化遗址进行的发掘中，出土了很多陶器、骨器、石器、铜器、蚌器等，其中陶器的种类有鬲鼎、罐、钵、壶、盆、杯、碗、支座、纺轮等。陶鬲是我国中原地区从原始社会晚期到商周时期的典型的炊煮器，现在黑龙江流域也发现了这种陶器，说明中原地区和黑龙江地区的文化有共同的特征，中原各族人民和黑龙江流域的肃慎等族人民早就有了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

在长江以南的东南沿海、岭南的广大地区，是我国古代的兄弟民族——百越族居住的地区。

越族人民在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下，社会发展异常迅速。吴国和越国的主要居民就是古代的越族人。春秋末期吴、越两国的铜器和铁器都制造得很好，所造的宝剑闻名于中原，说明在今江浙两省古代越族人居住的地区，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

在今江苏南部、浙江、福建境内的越族，称为东瓯、于越、闽越，广东境内的称为南越，广西境内邕江中游和桂江流域的称为西瓯，邕江上游及南部地区的称为骆越。他们统称为百

越。

居于今福建、台湾、澎湖列岛的我国古代越族的文化，有共同的特征。在福建福清、福安、寿宁、厦门、崇安、南安等地发现的考古遗址中，和青铜工具一起出土的有几何印纹硬陶，而在台湾的圆山贝丘遗址也发现了有几何印纹硬陶，与福建福清等地的文化特征类同，它们属于同一文化系统，说明居于祖国大陆和台湾岛的兄弟民族早就有了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

在岭南地区居住的越人，在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下，也有了较高水平的青铜文化。

据历史记载，广西境内的古代越族中的一支——西瓯，已有了君主，秦始皇平岭南时，秦军曾杀西瓯君译吁宋，西瓯又“相置桀俊以为将”，说明已建立了国家，但还保留了推举首领的军事民主主义传统。从考古发掘来看，剑、钺、矛、镞等兵器出土很多，锄、刮刀等生产工具也不少，反映越族内部战争很多，生产也发展了起来。在广东清远、广西恭城，发现了东周时期规模较大的墓葬，出土了大批青铜器，其种类大体上和中原地区的相同。这批青铜器是否都是在本地铸造的，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但在清远墓中发现的乐器钲为南方吴、越、楚文化的特点，清远和恭城两地出土的青铜兵器中有用人形装饰的匕首，刃部成扇形的钺，车器中用人头饰或动物饰的辖、提梁鼎及细密的云雷纹等，则为中原文化所没有的，当为本地的产品。两广地区的越族，当时既接受了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也独立创造了具有地方风格的青铜文化。南越地区最晚在春秋战国时代已进入阶级社会了。

岭南地区的古代越族人民和西南地区的其他各族人民，

制造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青铜器——铜鼓。铜鼓的铸造始于春秋,迄于近代。除我国外,某些东南亚国家也出土了少量铜鼓,但我国出土的铜鼓时代最早,是铜鼓的发源地;出土的铜鼓数量最多,占了世界上已出土的铜鼓数目中的绝大部分。铜鼓体型巨大,鼓面上铸有各种花纹,敲击时声音宏亮,是部族首长统治权力的象征。它在作战时可作军鼓,指挥军阵;重大集会时以击鼓为号令,召集民众;在祭祀或庆典时作为乐器,以敬神祇;平时可贮存财富;有时也有放置尸骨或作陪葬品埋入地下的。铜鼓出土的地点集中在广西、广东、贵州、云南等地。云南省楚雄县出土的一批铜鼓,形制简单古朴,经科学测定,铸造的时间是春秋时期,是我国和世界上已发现的铜鼓中时代最早的。战国以后,铜鼓的分布地区向东和东南方向扩展,而以广西境内出土的铜鼓最多。铜鼓的铸造是我国古代越族等各兄弟民族在商周青铜文化影响下,对祖国和世界古代文化所作出的伟大创造。

战国时期,岭南地区的越族人民开始铸造和使用铁器。广西平乐县银山岭战国墓中发现了铁农具和铁工具等铁器 181 件,其中锄就有 89 件,说明铁器在岭南地区已经推广使用了,这对于岭南地区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对南北的统一有着重要的意义。

东北的肃慎等族和南方的越族等兄弟民族,都为开发祖国,推动祖国的历史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到了战国时期,它们多数已经从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

匈奴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三国边于匈奴”,就是匈

奴和燕赵秦三国毗邻。三晋的北边有林胡、楼烦，燕北有东胡、山戎、东胡以东有秽貊、肃慎。东胡大概分布在今辽宁西部和西北部、河北北部和内蒙古赤峰市一带。林胡在今内蒙古河套地区。楼烦分布在今山西西北部和内蒙古集宁一带。中山国属白狄族，与赵齐燕接壤，后为赵所灭。春秋以来，秦国北边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春秋战国之际，“是时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后汉书·西羌传》）陇西有羌、氐诸、混戎、翟、原等，再向西敦煌、祁连一带有月氏，天山以南有楼兰、龟兹、于阗等，准葛尔沙漠以北有乌孙、呼揭等。秦国南部有巴、蜀，巴、蜀的南部，楚国的西南有夜郎、滇、邛都、犍、昆明、徙、笮都、冉马、白马等。越族散居在今福建与浙江南部等地，居住在今两广地区的少数族也属越族，“百越”、“扬越”指越族居住的地方。

越国赵襄子（前 457——前 425 年）占领代地，代地属戎族，和赵国关系密切，赵灭中山国以后，代地和赵国本土连接起来。赵肃侯时（公元前 349——公元前 326 年）赵国想夺取林胡的地方，曾打败林胡于荏。赵武灵王（前 325——前 299 年）大破林胡、楼烦，扩大赵国北方领土，新设置云中、雁门、代郡，林胡属赵。公元前 297 年，赵国进而征服楼烦，楼烦臣属于赵。燕惠王（前 278——前 272 年）时燕国的大将秦开大破东胡，扩地 1000 多里，燕国在新扩大的领土上设备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郡。公元前 273 年赵国出兵打败过东胡，夺回东胡强占的代郡地方。公元前 265 年，赵国李牧又打败过东胡和林胡。“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史记·太史公自序》）可见战国以前的长时期以来，中国北部的匈奴就和

中原地区的国家常有征战。进入战国，匈奴威胁到秦、赵、燕三国的安全。公元前 310 年左右，匈奴骑兵“驱驰于楼烦之下”，势力到达三国边境，赵国北部边境“不得田畜”，匈奴军队掠夺人口、财物，边境不得安宁。

赵国大将李牧，驻守在雁门，防卫匈奴，这是一个险要的地方。他平时很注意训练士卒，对待士卒很优厚。在战术上他采取严守阵地的办法，使匈奴无法入境。相持很长时间，匈奴来骚扰也不出战，匈奴误以为李牧是胆怯。公元前 265 年，他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挑选精壮的骑兵、步卒、射手和最好的战车，布置好了战阵。他派兵士赶着大批牲畜引诱匈奴来攻，李牧军佯败，让匈奴深入，匈奴以为得胜，很高兴，大举进攻李牧军。匈奴军队陷入了包围圈，李牧军队四面冲杀，大破匈奴，歼灭 10 多万骑，取得一次辉煌的胜利。以后 10 多年匈奴不敢接近赵国国境。杜佑把这次战争列为“示怯”取胜的战例（《通典》153 卷）。

李牧不愧是一位守边名将，后来他又打败过东胡，征服过林胡。

秦国不断对周围各民族发动进攻，公元前 461 年秦灭大荔（今陕西大荔县），5 世纪中叶到 4 世纪中叶，氐诸（今甘肃天水县）、乌氏（今甘肃平凉县）、翟（今甘肃临洮县）、原（今甘肃陇西县）先后为秦所灭。羌和秦有过密切关系，秦孝公时，羌首领曾随秦太子朝见周显王。秦并原，羌被迫向西迁移。义渠是秦国西边、北边最强的戎族，义渠约有今陕西北部 and 甘肃东北部泾水、渭水以北地方和宁夏少数地方。义渠的都城在今甘肃宁县。义渠和秦国不断有征战，公元前 444 年，秦伐义渠，虜

义渠王；公元前 430 年，义渠伐秦至渭阳；公元前 331 年，义渠败秦师于洛；公元前 327 年，义渠国内乱，秦派兵征伐，义渠臣服于秦，后又反秦；公元前 319 年，秦伐义渠，取郁郅（今甘肃庆阳县）；公元前 317 年，5 国攻秦时，义渠败秦师于李帛；公元前 314 年，秦伐义渠，占 25 县；公元前 272 年，秦昭王诱杀义渠王，接着派兵攻伐义渠残部，灭义渠。在新扩大的地方设置陇西郡、北地郡、上郡。陇西郡为原属翟原的地方，北地郡为原义渠的地方。

公元前 279 年，楚国派兵征伐西南，占领了夜郎、滇池等地，即今云南昆明为中心的大片领土。由于秦国占领了黔中郡，切断了与楚国本国的联系，领兵的将军就“以其从王滇”。

从考古发掘看，辽宁为燕国与东胡接境地方，燕国右北平、辽西、辽东郡境内基本上是中原地区文化面貌。在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锦西乌金矿和大连后牧城驿等地，发现了不少东胡的遗物，如青铜短剑、刀、长方形饰等。东胡处于青铜时代。东胡畜牧业很发达，出土马、牛、羊、猪等多种动物骨骼。出土器物上有各种饰牌，其中双虺纠结形饰牌和人面形饰牌最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在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老哈流域发现数以百计的东胡遗址，其中有些墓葬出土遗物很多，如宁城南山根的一座石槨墓，仅铜器就有 71 件；许多墓葬没有任何随葬品，这是阶级分化后期进入阶级社会的明证。

辽宁是北方出土青铜短剑最密集一个地区，时间从西周延续到战国。喀左南洞沟、沈阳郑家洼子等地出土的青铜短剑和朝阳二十台营子出土青铜短剑相似，喀左南洞沟属春秋晚战国早期。以后牧城驿一号墓青铜短剑为代表，窄身、直刃、长

锋、有饰细鳞纹的剑柄,时代属战国晚期。在河北承德和青龙等地发现以青铜短剑为代表的一种文化类型遗物,和分布在辽宁等地的以青铜短剑为代表的文化属于同一类型,也是东胡族文化。和剑共出有燕明刀钱,说明和中原地区文化的关系。吉林集安县多次出土战国的布币、燕明币钱,也说明这种关系。内蒙古的林格尔县上土城子古城,凉城县双古城有赵国遗迹遗物,凉城县新堂镇出土的一批铜币中,有赵国布币、燕国明刀,齐国刀币。

1973 年内蒙古抗锦旗桃红巴拉发掘一批墓葬很有价值,时代属战国,是首次发掘的早期匈奴墓葬。不采用棺槨的特殊葬俗以及富有游牧生活气息的遗物,如青铜短剑、鹤嘴镐、动物形饰牌等,反映了早期匈奴民族的习尚。同时出土的铜斧、铁刀和丝织品等物来自中原地区。还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范家窑子,土默特右旗水涧沟门等地发现战国时匈奴遗物。宁夏大部地区为匈奴所居,发现的几批遗物,也是富有匈奴文化的特色,如透雕虎博驴铜牌、鹤嘴斧、各种铜马具、银器及装饰品。还发现具有中原地区文化特色的铜铤。出土的战国匈奴遗物中,有刀、剑等铁制兵器,镰、铎等铁制生产工具,马嚼、铁环等生活用具,说明匈奴人已较多使用了铁器。从早期匈奴墓葬的遗物还可以明显看出贫富的分化。

中原地区生产的青铜器、铁器、丝绸等传到甘肃、新疆,在新疆吐鲁番盆地阿拉沟发现的春秋晚期和战国的墓葬,出土文物多是当地少数民族的产品,其中铁刀、丝绢、刺绣、漆器为来自中原地区或受中原地区影响的产品。今苏联境内的巴泽雷克地方和阿尔泰山西麓等地的墓葬中,出土不少我国战国

时期的文物,其中丝织品有平纹织物、刺绣和斜纹织物,青铜镜有“山”纹镜等。战国时期中原地区文化已经影响到阿尔泰以西的地方。同时,甘肃、新疆等地出产的“玉”等珍贵物品也传到了中原地区。

吴起在楚国变法时,记载“南平百越”,两广地区受楚文化强烈影响。战国时广东进入青铜文化的兴盛时期。建国以来在广东始兴、四会、肇庆、德庆、增城、清远等地发现战国遗址、墓葬,发现的青铜器和铁器相当精美,花纹有常见的云雷纹、蟠虺纹等,与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楚文化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如鼎、壶、盘、剑、矛、斧和清远出的铜罍。也有富有本地特色的,如匕首、人首柱形器等。钺、戚两种兵器,又在广西、云南、贵州常有相似的发现。始兴最早发现铁器,时代属战国晚期。广东这时许多地区已进入奴隶社会。1974年在广西平乐银山岭发掘一批战国中晚期墓,这批墓葬同湖南等地早期楚墓有不少相似之处,如长方形墓穴;随葬品有铁锄、和实茎剑、扁铍、矛、戈等,都和楚文化遗物相同。又在灌阳、兴安、灵山等地发现战国墓,与平乐银山岭大体相同。在田东锅盖岭发现的战国墓,与平乐银山岭大体相同。在田东锅盖岭发现的战国墓,出土的铜鼓属滇桂系统,出土的剑有的和平乐银山岭相同,有的和云南石寨山新出剑相似。

浙江属越国,楚灭越以后属楚国管辖,绍兴凤凰山等地发现的木槨墓,德清武康发现的金质郢爱,是楚文化的印迹。

云南在整个战国至西汉时期青铜器最为发达,解放以来出土青铜器达7000多件,有戈、矛、斧、钺等兵器,壶、尊、贮贝器等生活用器,有锄、镰、锯、凿等生产工具,其中兵器种类数

量最多。青铜器的题材、内容、铸造工艺具有独创的民族风格；但铜戈、铜矛、铜斧和中原地区有不少相同之外，尤其是铜尊等生活用具更是相同。到西汉初更多接受中原地区文化影响，西汉末就完全融为一体。云南青铜器的发展过程生动说明在原来具有民族特色的基础上接受中原地区文化影响、发展变化的过程。云南西部以洱海地区为中心的青铜文化，和四川、西北、内蒙古各民族文化关系很密切。江川李家山、楚雄万家坝、祥云大波那出土了大量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和兵器，这时也已进入奴隶社会。

大量的文物证明战国时期，华夏国家和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交往更为密切，各民族互相学习，互相吸收先进的科学、文化。战国时期是我国各民族逐步融合的时期，为组成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加速各民族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第四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 思想领域和科学文化

第一节 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

一、孔子的思想和学说

孔子的政治思想和伦理学说

孔子生于公元前 551 年(鲁襄公二十二年),正处在奴隶制社会崩溃、封建制社会将要脱胎的历史转折点上,他的思想明显地带有时代的特色。

传统的思想文化给予他沉重的负担,而现实社会的变动又启发他一些新的见解。他维护的是政治和宗法的双重等级秩序。这是孔子政治思想的一个基本方面。

但是客观社会的变化发展,不能不使他看到了一些新东

西,产生了一些新见解。他哲学思想的“仁”是一充分论述的新命题,用到政治上无疑是发现了人的价值,看到了奴隶阶级身份的变化。他主张礼、学、官禄都该下来人民中来,说对民要“齐之以礼”、“有教无类”和举贤任能,他教出来的弟子不少是平民而参与政治的。他提倡“泛爱众”、“仁民爱物”,作官的要以仁、德服民,十分郑重地使用民力,要用恭、宽、信、敏、惠这些优良作风从事政治,反对刑杀和暴敛,提出“苛政猛于虎”的名言,提倡“百姓足”、“足食、足兵”,在富庶的基础上搞文化教育,他主张一般分配均等,人们和好,有一个安定的生活和生活的社会环境。这些思想有些在孔子参政中实行过。孔子对春秋时代一些新政有时也持同情态度,对管仲、子产的功绩和为人评价很高,肯定亚国祁奚、魏舒的举贤行为,对赵盾蒙受杀君罪名有怜惜的心情。

孔子思想中最丰富的要推他的伦理学说。他提出的“仁”学,以前的政治家也提到,但从来没有像孔子这样详细而深刻地阐发过。孔子的“仁”学也用于政治,但是,他把政治与这个人修养、社会关系结合在一起,成为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应有的美好道德原则,形成了他的伦理哲学。他主张仁必须出乎本心,不事虚饰,“能好人,能恶人”,“巧言令色鲜矣仁”。他强调事君尽忠,事父母尽孝,对兄长能悌,交朋友要信,都是仁的根本,扩而充之,尊师、慈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直做到“博施济众”,达到尧舜也难做到的最理想的境界。在这个前提下,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内容:爱人、恭敬、谨慎、含蓄、制欲、刚毅、朴素……等等,都是仁的表现或方法,要达到这个目的,仁者还必须有勇气、乐观、能吃苦,甚至“杀身成仁”,不

要“求生害仁”。

他还提出忠、信、恕、直等概念，他说没有忠信，在州里就行不通，没有信就像车子的辕与衡之间缺少了连接的零件，简直行走不了。他要求人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秉心正直，不做无是非无原则的“乡愿”，不见小利，不逞一朝不忿，“群而不党”、“和而不同”、“周而不比”，即是不结党营私。他还说“政者正也”，正人先正己。要不畏强暴，坚持岁寒时节的松柏节操，在浮华的世界里视富贵如浮云，要发愤求道不要以衣食简陋而自觉寒伧，……如果人人都能做到这些，人人都是“君子”，这个社会当然就太平无事。所以，我们仅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不能不说孔子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伦理学家，后来历代的哲人谈论这个问题都要索源于他，并不断加以充实，成为世界上罕见完善的中国伦理哲学。

不过孔子的这些伦理观念和后来三纲五常一类原则是不同的，君臣关系上他要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强调孝、悌的同时，也提倡慈幼，达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的好团结。可以说其中有一个对等的原则。后来封建社会那一套森严的纲常伦理则是对孔子学说的片面发展，就不是孔子的愿望了。

必须指出：孔子的这些学说毕竟是理论、是思想，甚至是理想，和具体实践不能等同。而且，孔子的整个生活经历和社会地位相当于士的阶层，这个阶层处于中间状态，与贵族有差别，但又依附他们而瞧不起务农务圃的劳动者，希望做官食禄。向上看时，他有迎合贵族利益的保守思想；向下看时，他有同情庶民的进步思想；时有妥协性，时有反抗性。由于孔子接

受传统文化知识丰富和长期在政治上失意,更多的时间从事于学术教育活动,就决定了他除了一般士阶层特点之外,还具有思想家的特点。所以,为什么说古代圣贤提出爱人的理想而总是不能实现,道理就在于此。

孔子的认识论和教育思想

孔子的认识论带有很多唯物辩证法因素,这是在他所有思想中最先进的部分,大概同他在年轻时“多能鄙事”到以后一直从事学术、教育和政治实践有关。

他认为,人的自然本性都是相近的,环境习惯使人们变得各不相同。他提出人们求得知识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困而不学的几种情况,虽然生而知之带有先验论,但也表达为是一种天赋好的人,整个来说他是主张知识来源于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所以,他特别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学习能改变人的认识和品质的片面发展。他说如果要做到仁、智、信、直、勇、刚、敬等等而不去学习,就会分别流于愚、荡、贼、狡、乱、狂的片面发展。孔子的学习对象固然是古代典章制度、简策记载的文化知识,但是也注意从现实社会人事中去学习,故要多闻多见,又不能道听途说,还要持“缺疑”、“缺殆”的谨慎态度。要防止主观片面,“子绝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要有面向客观的求实态度。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他自己“入太庙,每事问”,向实际学习。学习有待于深化,方法是“温故而知新”,“学而时习之”。学习要善于循序渐进,他对弟子们说:“日知其所不能,月毋念其所不能。”要学会推理,能“闻一知十”,“举一反三”。

学思结合,学用结合,由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是孔子认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把学与思想结合起来,但须以学为基础,故而又说:“吾尝终日不学、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学了就得去用,否则是白废。“君子学以致其道。”如若读好了《诗经》不在政事上表达,不能在国交上应对,就等于没有学。因此,孔子一再反对说多做少,而要少说多做。从这一角度看,孔子是求实的人。所以在他的理论中,很少讲怪力乱神和天道性命之类。即使偶尔说到,也是一种传统的或者习惯的说法,并没有把它们作为探讨的命题。

也必需指出,孔子所要向实际学习的实际,还多半停留在思想政治领域。他并不主张了解生产实践、甚至鄙视生产实践。

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在中国,都是首创的。他是第一个把“学在官府”下放到平民社会中来的。商周时代是官府设学,学生是贵胄子弟,教师是官府的师氏、保氏等。而孔子宣布“有教无类”,只要“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因而他个人就设坛讲学,于是来自列国的学生据说达到 3000 人,有成就者 72 人。这些人中确有不少平民甚至贫困的人,也有从事各种各样职业的人。如颜渊住在破巷子里,吃粗饭、喝菜汤,就是个典型。子路是卡之“野人”,仲弓之父是“贱人”,子张是“鲁之鄙家”,子贡经商,颜涿聚是“盗”……真可谓“孔门多杂”。这些充分显示了时代的特色——士阶层的发展、庶人地位的变化。也是孔子“庶——富——教”这一思想体系的体现。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才,这和孔子的“举贤任能”、“举直措(置)诸枉”的政治思想分不开。事实上他的教育有成效,孔门高足当时在列国中参政的不少。如孔门四科拔尖的十大子弟中冉求、子路,的确能于政事。子贡更善于言辞,一次游说四周,拒齐、弱吴、强越、存鲁,充分显示了他的学识和才智。如果说学以致用仕的思想由孔子导其先河,是有一定道理的。

孔子强调人的后天教育,他一再表白他自己好学才达到博学多能。他说“学而不厌”,强调学习必须勤奋、热心、专注,要做到“发愤忘食”的程度,才有所得;必须持之以恒,一贯到底,好像堆一座山,差一筐土也会前功尽弃;不仅刻苦而且要乐于学习,充分发挥自觉性,效果才会更大。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把颜渊家贫而以学为乐、故而成才作为表率;前面说到学思结合、学行结合的原则,也是孔子教学原则,反对读死书或流于空想的片面性。

他乐于教人,把“诲人不倦”纳入他的仁学中。他注意启发教学,循循善诱,不搞填鸭式,主张在学生本人主动要求的基础上去引导,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他实行因材施教,首先是了解学生所长所短,他对弟子们的性格、气质特点如数家珍,他说:“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柴也愚”、“参与鲁”、“师也过,商也不及”等等。然后是有针对性地施教,同一问题对不同的弟子作不同的解释,对不同气质的学生作不同的教法。如子路和冉有同问一个“闻斯行之?”的问题,他分别给以截然相反的答案,他分析原因道:“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孔子把教学与教人、做人结合在一起,他慨叹“古之学者

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学习应该是为自己提高知识和德行，这就叫“为己”，不是学了去炫耀于人、哗众取宠即“为人”。所以，学习的结果是造就品学兼优的“君子”。他很重视培养弟子的志趣、精神，所谓“修己以教”、“士志于道”，排除利欲的干扰，要甘愿过艰苦生活，把学有心得和达到做人的理想境界当作愉快的事。同时，他把音乐、游泳、美术、射御等教育手段都利用起来，培养学生的高尚志趣和实际能力。

孔子从教育形式、教育理论、教学思想到教材、教学方法、教学手段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是我国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孔门教材与“六经”

古人官府的学校分“大学”、“小学”两类，但和今天的概念不同。凡人7岁入小学，15岁入大学，两段课程有别，总起来不外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起初并没有现成课本，是一些约定俗成的科目：礼是敬祖尊长一些礼节，乐是音乐包括舞蹈，射是射箭一类武艺，御是学会驾车使马，书就是识字写，数就是算数包括计日时的干支表。这些都是很古传下来的一个成人必备的操作行和本领。到春秋时代，有些科目已经形成了文字简册，《诗》很流行，有歌辞也有乐谱，多用在庙堂和盟会之上；当时人们言辞中说《书》引《易》的也不少见；各国都有《春秋》的史册；鲁国已有《礼》书。孔门已多讲“诗云”、“书云”。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并有“诗三百”，又说“五十以学《易》”，也说过“执射”、“执艺”等等，反映社会上初步形成了后来所称的“六经”，并纳入孔门的教学课

程。

《易》又称《周易》，后世称《易经》，原是一本卜筮的记录，共有 64 卦，每卦有卦辞；一卦由六爻组成，每爻各有爻辞，爻分阳爻和阴爻，视爻在卦中的地位而不有同的解释，以判断所占卜事情的吉凶，与商周的甲骨卜辞相当，只是用蓍草作爻排列成卦。后来对卦爻辞给予很多解说，出现了象辞、彖辞、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等七种，前三种各分上、下篇，旧称“十翼”，又叫《易传》，成篇较晚。传说古先圣人画卦作辞，都不中据，它是社会性的东西。《易》的成书约在商周之际，春秋时人们用它来占卜吉见，比较普遍。孔子对《易》有所研习，传说他“韦编三绝”，经常翻阅，把联结简册的皮条磨断了三次，大概也以此教授门人。《周易》固然是为了人们卜筮之用，但其中也有一些朴素的唯物辩证法因素，如把自然界 8 种物质作卦名，互相搭配演成 64 卦和 384 爻，来象征万事万物，它们都有变化，其变化又源于阴阳两方面的对立和互相作用。只是《易传》的解释加进了唯心的形而上学的互相作用。

《书》后称《尚书》、《书经》，是我国最古的一部政治历史文献汇编，从《尧典》至《秦誓》，时代上起尧舜，下迄春秋，文体有典、谟、诰、誓、命等，纪录了古代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言论，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商书》、《周书》诸篇，叙述两代政治事件，反映了那时社会经济和上层建筑等方面情况。《禹贡》讲地理，《洪范》讲哲学，《立政》讲西周官制，《吕刑》讲刑法，等等。历代流传中，传抄、流散，出现了古文、今文的不同本子，篇目曾多至百篇，经过经师们研究，确定 28 篇今尚书可信。春秋时有《书》流传。汉代检始说孔子删定，但证据不足，孔子可能

选辑这些政治历史文章作为教材传授。

《诗经》春秋时称《诗》，是两周时代一本诗歌总集，现存 305 篇，统称为 300 篇。按乐调或内容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即各国（或地区）的风谣，有 15 种，雅分大、小，颂分周、鲁、商。少数篇章据说可以早到灭商以前的先周，豳风和周颂大致是西周的作品，雅则多数是西周后期之作，商颂、鲁颂约在春秋前期成篇，保存有关前代的素材。国风是列国的地方乐歌，多采自民间，富于对人民生活的描绘，文句流畅，篇章结构利落，节奏明快，思想鲜明，咏物生动，读来铿锵有声，艺术感染力和音乐性很强。它描写人民艰苦生活，抨击社会不平等，或描述社会生活，吟咏婚姻爱情，……文学价值和思想性都很高。大、小雅主要是周族地区的乐歌，反映周室衰微、统治者穷兵黩武、横征暴敛，人民倍受压榨、生活艰苦，抒发不平之鸣，也有少数是贵族阶层哀叹穷途末路之作，政治性都很强，很具有史料价值。颂诗则是宗庙祭祀的乐歌，歌颂统治者的宗功祖德，粉饰太平，也有少数涉及社会生产，颂诗语句简古，诘屈聱牙，和《尚书》、金文相类，艺术性较差但亦富于史料价值。《诗经》绝大部分是整齐的四字句，间或有三、五、六、七字成句，一篇之中分有数章，各章都是相同的语句结构，又多双声、叠韵、叠字的词汇，便于人们反复吟诵，运用兴、比、赋等形象思维手段以写景抒情，是我国诗歌文学的最初形式，也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极大，春秋时代贵族社会很重视赋诗言志，《左传》记载各国君臣朝聘会盟、迎送宴饮之次，多半用赋诗表达各种思想、意愿或某种行为。“弭兵”大会刚过，吴国公子季扎周游中原列国，在鲁国听取各国风诗

和雅颂等乐歌和乐舞，逐一评论各种民风和格调，反映了《诗经》当时已普及吴国“荆蛮文身”之地；他所观赏与评论诗篇的次序与现存《诗经》的次序基本相同，说明此时《诗经》已编辑成书。

《礼》今天指《周礼》、《仪礼》、《礼记》三书，称为“三礼”，春秋时大概只有“礼”书。西周以来，礼是表现宗法制度、政治等级的各种规则和仪式，是当时社会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士大夫必习的业务，也自然是孔门教育的重要科目。长期研习，逐渐形成文字。《周礼》是一部官制汇编，是大致综合了西周——春秋时期王朝和各国出现过的官职，掺杂了大一统的思想，加以编排的。《礼记》是汉代人戴圣博采孔门后学讲礼的论文 49 篇纂集而成，是讲礼的理论和制度以及解说礼的一些故事；其兄戴德还选编了一个 85 篇的本子称《大戴记》，但不大被人们重视，不入六经之列。《仪礼》是详细介绍各种行礼细节，十分繁琐，也借此可见古代社会生活风习。这些书成书时代均在战国及其以后。

《春秋》是鲁国一部编年史，也是我国现存下来的最大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它记载了 244 年的鲁国大事和周室、列国的活动，每年按春夏秋冬四时排列，取“春秋”以概括四季即全年，故名。当时各国都有这一类记载，不少国家称“春秋”，晋国称《乘》，楚国叫《杻杙》，秦称《记》。那时王室和各国都设有史官，除记本国的事以外，别国发生的事件，也互相“赴告”加以记载，会盟时的盟书又称“载书”，也藏入各国政府档案，这都是史书的直接的材料来源。春秋时史官记事十分严格，像本书前面说的晋国董狐、齐国的太史、南史等，开创了我国史学“秉

笔直书”的优秀传统。

由于《春秋》纪事简略，事件内容、性质都不易为人们所了解，后来就有人为它作“传”，就是评细注解或补充一些史事。最著名者有左、公羊、谷梁、邹、夹等五家，现存在前面三家。春秋——战国之交的左丘明作“传”就是《春秋左氏传》，战国时齐人公羊高作的《公羊传》，鲁人谷梁赤作的《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后二书多半只就《春秋》史事加以评说。所谓“微言大义”的东西，而《左传》则评载具体事实，把每年事的过程，其中人物言行，事件时间、地点、结果等都交代清楚。而且它语言生动，优美而又简洁准确，那么错综复杂的政治事件，大大小小的战争，各处曲折的情节，各式各样的人物和惊险场面，都写得真实而生动。它还往往一事追溯远古千百年，涉及许多国族，还有不少典章制度名物，都囊括为一体，所以《左传》既是一部翔实的史书，也是一本优秀的文学作品。

孔子与“六经”的每一经几乎都有关系，是他首次用它们作为教材，并对它们作一定的辑录、解说等整理工作，对我国古籍的保存和古代文化流传是有贡献的。

另外，《论语》是孔门弟子纪录孔子一生言行的集子，共分20篇，是了解和研究孔子本人以及当时社会状况、语言文字的重要文献。

二、墨子的思想和学说

在孔子倡导儒家学说后，春秋战国之际，我国出现了另一个学派——墨家。墨家学派是墨翟创立的，他的学说和儒家的

学说当时流行全国，并称为“显学”。

墨翟是宋国人，生活的年代约在公元前 468 年至公元前 376 年间。他的学生们尊称他为墨子。墨家学派的特点是，有一个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墨家的领袖称为钜子，所有的人必须服从他。他们熟悉工艺技术、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和军事知识，是从手工业者、农民中上升起来的、占有一定财富但还没有脱离生产劳动的私有者。他们代表手工业者、富裕农民和中、小地主的利益。

墨子的中心思想是“兼爱”，认为社会上一切人们只有“兼相爱”、才能“交相利”。人们如果能够互相爱护、互相协助、互相取得利益，这样一来，就可以使饥饿的人得到食物，缺衣的人得到衣服，辛劳的人得到休息，混乱的社会秩序也可以得到治理了。墨子的“兼爱”和孔子的“仁”不同之处在于：孔子认为“小人”不能行“仁”，爱有差等；而墨子的“兼爱”是爱无差等，对社会一切人是普遍适用的。但是，他的兼爱说实际是不可能实行的，因为“王公大人”决不会去爱劳动者；劳动者也决不会去爱“王公大人”。他的“兼爱”实际上是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阶层的“兼爱”。“兼相爱”目的是为了“交相利”，兼爱的表现就是交利。按照墨子的看法，社会上一切矛盾着的力量，能够彼此“交利”，各自的利益得到了满足，封建国家的统治得到了稳定，私有财产得到了保障，墨子和他所代表的学派参加了国家的政权，这是最符合墨子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的。墨子兼爱说的实质虽然不过是爱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但在当时“王公大人”对劳动人民的惨酷压迫和剥削的情况下，墨子要求兼爱，主张减轻剥削，反对奢侈腐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劳动人民的呼声；他对掌权的“王公大人”经常进行批评、责难，暴露了一部分社会黑暗，体现了对劳动人民处境的同情，代表了一部分人民的要求。

既然要“兼爱”、“交利”，就必然要反对战争，所以墨子主张“非攻”。“兼爱”和“非攻”的思想是联系起来的。非攻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保护已经掌握了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新兴富人的利益。“非攻”否定战争，有利于保护劳动人民生命财产和社会经济不受损害，这有好的一面；但战争是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劳动人民反抗压迫剥削的武装斗争是正义的，就是封建统治者的兼并统一战争，当时对实现中国统一，客观上也有进步作用，而墨子一概加以否定，这就是暴露了他“非攻”思想的片面性。“非攻”的主张在当时也只能是一种空想。被压迫阶级要反对压迫不得不采用暴力，当时统治者之间你争我夺的兼并战争也是难以避免的。但墨子在论述“非攻”的主张时，大力谴责了那种在“攻伐无罪之国”时，抢割人家的庄稼、砍伐人家的树木、杀死人家的牲畜、焚烧人家的宗庙、屠杀别国的人民、抢夺别人的财富珍宝等的掠夺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对劳动人民遭受战争痛苦的同情。

那么由谁来实行“兼爱”、“非攻”呢？墨子提出了“尚贤”、“尚同”的主张。他认为，最早管理国家的人是由选举产生的，因此建议打破阶级局限，选举最贤能的人当国王，其次的当三公，将军、大夫、乡长、里长等各级大小官吏。虽然是“农与工肆之人”，只要有才能，就选拔他当官，使“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这一思想是对西周以来宗法分封制的否定，反映了出身贫贱、但已经占有一定经济地位的手工业者、中小地主参与国家政

治生活的要求。墨子主张由这些贤人来管理国家，一切在下的人都要绝对服从在上的人，建立起从上到下的绝对的统治权，使一切影响社会安定的事情不致发生，做到天下“尚同”，即国家的统一。“尚贤”、“尚同”的思想虽然反对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但它要求打破阶级限制选拔贤才，实现封建统一，是有进步意义的。

墨子反对掌权的“王公大人”奢侈腐化的生活，主张“节用”。他反对儒家鼓吹的厚葬，号召“节葬”，认为贵族们厚葬成风是浪费社会财富。他生活俭朴，认为音乐、舞蹈都是无用的，主张“非乐”。他认为“农与工肆之人”都可以当官，反对“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命定论，主张“非命”。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鬼是存在的，把天和鬼作为制裁、恐吓当时掌权的“王公大人”们的一种工具，这当然是一种宗教迷信，但墨子是把它作为推行自己整个学说的一种舆论工具而提出来的。实际上天和鬼的意志正是代表墨子自己的意志。既然墨子的学说从总的来说是应予肯定的，因而他提出“天志”、“明鬼”，利用天和鬼的意志为自己的学说制造舆论，在当时条件下客观上可以起一定的积极作用。

“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是墨子的十大主张。十大主张的核心是兼爱，这反映了墨家学派的阶级实质。“非攻”和“兼爱”是连在一起的。“尚贤”、“尚同”是实现“兼爱”、“非攻”的具体政治办法。“节用”、“节葬”、“非乐”、“非命”既是对当时掌握国家政权的“王公大人”奢侈腐化生活和垄断政权的批判，也是墨子对自己“兼爱”、贤人政治的具体设想。“天志”、“明鬼”

则是墨子宣传自己政治主张所利用的宗教迷信工具。墨子的十大学说有机地连结在一起,构成了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

在认识论上,墨子提出了认识客观事物应以“三表”作为判断是非真假的标准。“表”是“标志”或“标准”的意思。墨子认为,判断事物真假的标准,第一要“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要根据历史上前代帝王统治的经验;其次要根据“百姓耳目之实”,即根据当前人民群众的感觉和经验;第三要观察它符合不符合国家人民的利益。这三项标准总的要求是判断是非应根据前人的经验、当前群众的反映和实际效果,因此他的认识论是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认识论。墨子强调间接经济和直接经济,强调实际效果,这和他出身于比较贫贱的生产者家庭有一定的关系。他的十大学说就是以“三表”作为认识事物的方法而提出来的政治理想。

墨子的学说在很多方面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对当时统治人民的“王公大人”们横征暴敛的剥削、奢侈腐化的生活和连续不断的掠夺战争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要求减轻人民的负担和实现社会的安定统一,这是他思想进步性的表现。但他主张非攻,对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也加以反对,强调节俭的时候也反对必要的精神生活和娱乐活动;宣传了宗教迷信,反映了他代表的是已从庶人中上升起来的手工业者和中小地主的思想,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有一定距离,这是他思想上的局限性。

墨翟出身贫贱,生活俭朴,注重力行,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往往穿着粗布衣服和用木头或草做成的鞋子,不顾辛劳,到处奔走游说。有一次,鲁国的巧匠公输般(即鲁班)制造

了攻城用的云梯，楚国要在公输般的帮助下使用攻城器械去攻打宋国。为了止楚攻宋，他命令自己的学生禽滑釐带了 300 人，准备好了防御武器，守卫在宋国的城头上，准备和楚军决一死战；之后，自己便穿了极其简朴的衣服，从齐国出发，前往楚国。他步行了 10 天 10 夜，赶到了楚国的郢都，和楚王、公输般进行辩论，终于使他们放弃了攻宋的战争计划。

墨子的很多学说是在批判儒家学说中提出来的，儒、墨两大学派的论争揭开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序幕。

三、孟子的思想和学说

战国初期，墨家的学说很流行，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受到了批判和破坏。到了战国中期，出现了另一位儒家大师孟轲，他补充、发挥和改造了孔子的学说，驳斥了反对儒家学说的种种观点，使儒家学说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孔子和孟子的学说，后来经过汉代儒生们的改造，构成了封建社会中的正统思想——孔孟之道。

孟轲是鲁国邹（今山东邹县）人，是春秋时鲁国新兴势力孟孙氏的后裔。他生活的年代约在公元前 390 年至公元前 305 年间。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其中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是其中八派之一。孟子幼年丧父，家境贫困，自幼信仰子思的学说，极其尊重子思，虽然他从来没有和子思见过面。但是曾经在子思的学生那里读过书。他自认为是子思的学生。孟子生活的时代封建制已在各国确立，以商鞅、吴起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激进的革新派在各国大力推行变法改革，而孟子代

表了从贵族阶级转化过来的地主阶级改良派的利益。他和旧制度旧思想有较深的关系。但他也主张实现封建化,希望在基本不触动现存制度的前提下,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来达到建立国家的目的,反对法家代表的变法改革和劳动人民的武装斗争。孟子的思想,成为地主阶级改良派的典型,他的学说发展成为战国时儒家各派中影响最大的一派。

孟子的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是兴“王道”,行“仁政”。“王道”就是先王之道。孟子把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时期的统治者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政治看成是最理想的政治,这就是王道。孟子希望各国的统治者不要去打破古代圣王统治的旧形式,而要推行和复兴这种“王道”,反对主张暴力改革的“霸道”。为复兴王道,孟子建议实行“仁政”。仁政的内容是恢复井田制度。他设想的井田制度是:方一里为一井,共900亩,中间为公田,四周八家各种100亩,为私田,并且共同耕种公田,耕种公田完毕后才能够耕种自己的私田。他说:“实行井田制后就可以使老百姓不管老死迁移都不出自己的乡里,互相友好协助,有病的人也会得到扶持和照应,老百姓就亲睦团结,不会有什么矛盾发生了。孟子所说的井田制和奴隶社会的井田制不同,他实际上是主张农民可以有自己的家屋、土地,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时间和家庭经济,为地主耕种一部分土地并向地主交纳劳役地租,让农民世代安心地在土地上劳动,老年人能有衣穿有肉吃,八口之家的小家庭不受饥寒的威胁。孟子的恢复井田。不是为了恢复西周的井田,而是设想了一种包含封建生产关系内容的井田。仁政的另一内容就是要“制民之产”,即规定老百姓有最低限度的生产和生活

条件。他说：老百姓应该能够供养父母，养育妻子和儿女，丰年能够吃得饱，遇到荒年也能免于死亡。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建议给农民以“五亩之宅”和“百亩之田”，统治者“勿夺其时”，并且用孝、悌等的伦理道德去教育他们，这样，劳动者可以安居乐业，统治者也可以“王天下”了。

孟子的这一政治思想是在鼓吹先王之道和井田制的形式下提出来的，希望在旧的形式下增加新的内容。他反对法家的政治变革，痛骂破坏井田制的统治者都是“暴君污吏”。

孟子所说的划分成井字形，八家共耕公田的井田制，只是一种空想，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他的“王道”、“仁政”说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他在论述“仁政”时，批判了暴政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一定程度上表示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要求给人民以安定的社会环境和最低限度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这是值得肯定的。

春秋时期，随着奴隶制度的逐渐瓦解和人的价值的提高，重民的思想发展起来了，孟子更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的民贵君轻论，把人民放到了封建君主之上。在君臣关系上，他说：国君看待臣下像手足，那末臣下对待国君就像腹心；国君对待臣下像狗马，那末臣下对待国君就像过路人；国君对待臣下像土芥，那么臣下对待国君就像仇敌。他认为汤放桀，武王伐纣，只是诛杀了一个独夫，并不是杀国君。孟子的民贵君轻论引起了主张极端封建专制主义的明太祖朱元璋的发怒，他下令删改了《孟子》一书，把孟子的泥塑像撵出庙堂。在 2000 多年君主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中，孟子的这一思想具有进步意义。春秋战国之际，旧的奴隶制宗法秩序在逐渐

没落，庶民阶级在地位在不断提高，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局面还没有形成之时，在孟子思想中出现这些积极的方面，正是当时时代潮流在他思想中的反映。

孟子虽然主张民贵君轻，但他又认为，国君必须坏到像桀、纣那样，统治阶级中的人才能起来“征”和“诛”，而劳动人民却不能起来造反。他反对暴力行为来推翻国君的统治，要求维护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巨室”和“世臣”的利益，认为推行政治要依靠他们而不能得罪他们，应给他们享受优厚的爵禄和世代当官的利益。孟子把实现“王道”、“仁政”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巨室”、“世臣”的身上，反对对旧制度进行比较彻底的变动改革和人民群众的武装斗争，这反映了他思想上的保守和落后面。

孟子从剥削阶级的立场出发，把奴隶社会中“上智与下愚不移”的伦理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下之通义”，把奴隶社会中出现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和对立加以规范化。这也是由孟子思想的阶级本质决定的。

在哲学思想上，孟子提出“性善论”。他认为每个人一生下来的性情本来是善的，人的性善是天生的。但是，孟子并不是说人的整个性都是善的，而是说其中有仁、义、理、智等等的善端，也就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是人人本来就有的。每个人的心一生下来就是相同的。为什么后来有些人做好事，有些人做坏事呢？他认为这是由于外界事物的引诱引起的。为了避免外界不良事物的引诱，使人生下来本来就有的仁、义、礼、智等善良的性情得到发扬光大，

孟子主张做到“不动心”和“寡欲”，即不为一切外界事物所干扰，不想一切心以外的东西，来养“浩然之气”。大家知道，人的行善行恶，完全是受社会制度、社会条件决定的，一个人刚生下来时还没有知识，无所谓善与恶。孟子说每个人刚生下来时就有善性，完全是唯心主义的思想。在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的人衡量善与恶的标准也不完全相同，所以，更不存在共同的善性。孟子提出“性善论”，是为他的“王道”、“仁政”的政治主张服务的。有的君主认为自己不能推行王道、仁政。孟子就鼓励说：可以的，是你不愿意做，不是你不能做；因为人性善，每个人只要发扬这种善心，就都可以做到尧、舜这样的圣人，就能够推行仁政了。孟子的哲学思想中认为所有的道德伦理都是天生成的，是永恒不变的，属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体系；但他认为庶民的人心也是善的，只要培养这种善心，“人皆可以为尧舜”，从人的本性上否定了贵族和庶民之间的天生的界限，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总起来说，孟子的思想代表了地主阶级中改良派的要求。他们愿意实行封建制，但和旧制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希望在不改变旧形式的前提下，用渐进的办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做既不会触动到自己已经获得的经济利益，保全自己已经占有的政治地位，又使庶民的生活能够过得去，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从而稳定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

但是，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各国新兴地主阶级的变法改革，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各国统治者之间的兼并统一战争，不可避免使用暴力的行为，通过改良的办法，来缓和社会矛盾，既使劳动人民保有一个起码的再生产的条件，又使

当时的统治者能够长治久安地稳定自己的统治地位。他的这种政治主张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尽管他领导的儒家学派的势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孔子的时候,他也像孔子那样,带了几十辆车子和几百个学生,游历了宋国、滕国、魏国、齐国,并一度在齐国当了官,到处宣传他的“王道”、“仁政”说,但是国王们都认为不合时宜。他的政治主张没有得到推行。孟轲晚年也像孔子一样回到鲁国整理了自己的著述,写出了《孟子》七篇。

四、老、庄的思想和学说

在儒、墨成为天下“显学”的时候,道家的学说也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参加了争鸣的行列。

道家这个名词在历史上出现是很晚的。在战国时期,为人们所知道的是关尹老聃学派,此外还有一些接近道家的思想家,如杨朱、庄周、列御寇等人,他们当时都是作为诸子百家之一而出现的,没有像儒、墨那样形成为一个大的学派系统。大致上说来,杨朱、老聃、关尹、庄子、列子的思想可以定为道家。杨朱生活的时代约晚于孔子,早于墨子,他的思想孟子说是“为我”。这个“为我”实质上说是把天下大事都丢开不管,避世隐居,保全自己的天性,不为他人他事牵累自己,并不是说自私自利。这是道家思想的先驱者之一。

后世传称道家的祖师是老子。一般人认为,老子应该就是老聃,他是东周时期周室的守藏吏,是个博览群书、知识渊博的学者,年纪略大于孔子,孔子曾向他问过道,尊他为师。但是

老聃自己没有写过书。现在流行的《道德经》5000言,注明老子作,但书中反映了很多战国时期才能出现的语言,因此《道德经》不可能为老聃所写。据学者研究,《道德经》当为战国中后期的道家人物根据老聃的遗说,加以补充、发挥,推衍而成的。我们现在讲老子的学说,一般都以《道德经》作为依据。庄子和道家的其他各派没有发生过直接关系,他是战国中期道家的中心人物,传世的有他写的《庄子》一书。现在都把老子和庄子,作为先秦道家的主要代表。

老子学说的宗旨是“无为自化,清静自正。”主张“无为而治。”他认为老百姓要没有知识、没有欲望、没有事可做,永远安静地住在一小块地方,人人无所作为,就可以做到“无为而治”,达到最理想的社会了。他又是一个复古主义者,要求社会回复到“小国寡民”,也就是保留部落组织的原始社会去;废除文字,结绳记事;有了器械不要用,有了车船不要乘,有了甲兵不打仗;村落与村落之间互相隔绝,做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他认为,智慧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生活要求的提高,人们间交往的增加,社会的每一项进步,都是罪恶的根源,因而反对一切社会的进步,只有原始时代那样最低的生活水平才是最理想的社会。老子的思想,反映了春秋战国之际已趋没落的奴隶主贵族消极、悲观、厌世的心理状态。

在哲学思想上,老子提出了一个“道”。什么是“道”呢?老子说,“道”就是世界上万事万物的本体,“道”就是“无”,它是“先天地生”的。它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无形无踪,无声无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可以勉强给它加个名词,叫“大”。他说,这个“道”,人们的感觉器官是不能认识的,道即“无”,

“无”生出了“有”，“有”又生出天下的万物。“道”在万物中表现出来的具体的东西，就是“德”。因此，老子的“道”，是一个虚幻抽象、恍恍惚惚、似是而非、人类无法认识和觉察的精神实体。正是这个精神实体，被老子说成是产生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始祖。至于老子所说的“德”，是个概念，更为精神状态的东西。先有精神实体，后有物质世界，精神产生了物质，老子正是这样来认识世界的。因此，老子的哲学思想是属于唯心主义的体系。他提出的“道”不是存在于人的心中，而是开天辟地以前就有的，存在于客观世界之中，是主宰和决定世界万事万物的精神体。这种哲学体系，就是客观唯心主义。

老子的思想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却包含了很多辩证法的因素，这是他思想中积极的一面。他观察了世界上万事万物之间的矛盾对立和相互转化的情况，认为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道德经》中曾列举了很多事物的双方相对立的名词，如有无、多少、轻重、长短、高下、美丑、坚柔、生死、祸福、巧拙、难易、善恶、强弱、得失、予夺、贵贱等等，这说明他对世界上事物的矛盾对立认识得非常广泛和深刻。他认为事物的双方是相互依赖而存在的，缺了一方对方就不存在。所以他认为：有和无是互相产生的，长和短是在比较中得到的，高是以下为基础的，难和易是相辅相成的。事物双方矛盾发展的规律是：总由柔弱的、卑下的、虚无的、静止的一方最后取得胜利，而且循环不已，柔弱的会变成刚强，变成刚强后又会转化成柔弱；得了祸往往接着来的福，有了福也往往埋伏着大祸。老子正是这样来认识事物转化的规律的。这说明他思想中的辩证法因素仅仅表现在事物矛盾对立和相互

转化的一面上,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却陷入了周而复始的循环论。他思想中的辩证因素是不彻底的。这种哲学思想支配了他的历史观,他认为人活在世上应该永远处于柔弱、卑下、落后的地位。老子要求社会倒退到“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去,是从“柔弱胜刚强”的原则出发,想使自己安居于极其落后的、与世无争的地位,来达到争得天下的目的。在他看来,“柔弱”可以胜“刚强”;“不争”是为了“天下莫能与之争”,因此,并不是主张绝对的消极。这是没落奴隶主贵族既希望恢复失去的天堂,又无力恢复这个天堂的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在哲学思想上的反映。

老子思想中出现一些辩证因素是有原因的。他是一个没落贵族,是一个史官。作为一个熟悉历史的学者,他看到历代统治者的衰、盛、兴、亡;看到原来的贵族下降为士甚至变成耕田的劳动者;看到毫不知名的下层人物变成了新的统治者。社会的急剧变化,社会上一些事物向对立地位的相互转化,反映到老子思想上来,使他产生一些朴素的辩证观点,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然而,老子是站在落后的、处于没落地位的贵族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些变化的。《道德经》一书中充满了对社会的急剧变化的恐惧、怀疑、敌视的情绪。他不希望社会前进,而是主张社会倒退;不希望社会变化,而是要求社会停滞。他要求在辩证的世界中找到一个不辩证的东西,以自己的辩证法来否定辩证法。当时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在社会的急剧变化中感到,社会只有退步、只有停顿,人民只有无知无欲,才能恢复自己失去的天堂。所以老子的辩证观点是和他的政治思想结合在一起的,是极不彻底的。

战国中期道家的著名代表是庄子，即庄周。他生活的时代大约同于孟子，或稍后一点。他的著作收集在《庄子》一书中。由于老聃没有留下著述，《道德经》成书比较晚，所以到庄子时，道家才形成一个比较大的派别。庄子是宋国人，做过小官。他把老子的某些消极思想作了改造和发挥，创造出的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来为他所代表的没落阶级服务。由于他写的文章笔调动人，文辞优美，在一定时期内，庄子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在社会上起了很大的宣传和欺骗作用。

在政治思想上，老子虽然主张社会倒退，但他的消极面还有一定的限度，即只主张社会退到原始社会去，“无为”是为了“有为”。在一定条件下，“无为”思想还可以对社会起一些积极作用，如西汉初期就实行过“黄老无为之治”，使汉初的社会保持了一个时期的稳定。而庄子却是一个绝对的悲观厌世者。他认为，社会的一切存在都是坏的，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希望回复到浑浑沌沌、是非不分、生死莫辨的虚无境地；人生在世界上，对一切东西都无所谓，一切都随自然，人的生老病死，社会上的一切变动，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人总要和万物的本体“道”合在一起的。有一次，庄子做梦时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醒来后看到自己还是庄子，他就自己问道：是庄周变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变成了庄周呢？大概庄周和蝴蝶，是互相变化出现的吧！他认为自然界是由“道”组成的，自己要和这个“道”合在一起，就可以解脱人生的一切忧虑、烦恼、痛苦以至生死。死了还是存在，变成了其他东西，变成什么东西都一样。这样，人生就可以不生不灭，无穷无尽，达到最理想的境界，也就得到了最大的自由和快活。庄子称这种打破一切差别的境界，和万

物的本体“道”合为一体的理论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就是修养出来的“有道之士”，就是“真人”。“真人”是庄子最理想中的人。

老子的宇宙观是客观唯心论，而庄子的宇宙观本质上是主观唯心论。就以“道”来说吧。老子把“道”看成存在于客观世界中的东西，而庄子要把自身和浑沌的“道”合一，有我的心就是“道”，“道”就是我的心的倾向，认为人的命运决定于自身的修养和内心的活动，这就属于主观唯心论了。庄子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可能来源于儒家八派中的颜渊学派。颜渊是孔子的学生，孔子多次赞扬颜渊住在破陋的房子里面，过着清寒的生活，自得其乐地闭门修养的功夫，做到了自己的心 3 个月内不违背“仁”。依靠闭门的内心修养就能做到“仁”，不就是说人的内心活动就可以决定一切了吗？庄子发展了颜渊的思想，完全走上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道路。

老子的哲学中还有一点辩证法的因素，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间存在着种种矛盾对立并且会彼此转化，而庄子则要否定世界上的一切差别和对立，认为高下、好恶、是非、真假、贫富、祸福、生死等等什么都一样，这就走到绝对的相对主义上去了。庄子认为，首先认识的对象本身是相对的，例如美和丑，高和下，生和死，最后都是一样，因此它的性质是无法认识的；其次，主观认识能力是相对的，例如我们上面提到庄子做梦变成蝴蝶的事，他自己不能确定是庄周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变成了庄周，因此他认为一般人没有认识事物的能力。他又说：毛嫱和丽姬是美人，但鱼见了她们吓得深入水底，鸟见了她们吓得高飞，麋鹿见了他们赶快跑开，那末，美不美究竟以谁的

判断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呢？因而他得出人的认识能力也是相对的；第三，真理的标准也是不可知的，因为万事万物没有什么是非、真假之分。庄子从人的认识都不免带有局限性、片面性出发，加以无限的扩大，把相对论绝对化，引导人们走向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和神秘主义的错误道路上去。总之，庄子取消了老子思想中的积极性的东西，而把他的消极思想发展到了极点。

庄子哲学思想是主观唯心论和绝对的相对论的结合。他的学说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因为他既然把所有的东西都看成相对的，没有一个真理和是非标准。

庄子的学说是一套宗教迷信思想。这种思想无论在战国时代以至现在，都会起欺骗和毒害作用。在战乱极端频繁、政治空前黑暗、人民生活异常痛苦之时，庄子哲学或许能对劳动人民起某种精神上的安慰作用，但这种作用也只能如同佛教那样，是对人民一种精神上的麻醉，并不能使他们认识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实质。汉初统治者采用黄老思想，没有采用庄子思想，就是因为庄子思想消极面太大，为封建统治者所不采。庄子学说使人们消极、懒惰、悲观、颓废。但是，庄子的文章写得很好，想象力丰富，优美动人，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庄子》一书有一定的地位。

五、荀子的思想和学说

荀子名况，字卿，是战国后期赵国人，约生于公元前 313 年，死于公元前 238 年，是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

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荀子年轻的时候曾到过齐国,当时齐国首都临淄的稷下聚集了很多学者,在那里著书讲学,到荀子去的时候,齐国的国势已经日益衰落,很多学者离开了齐国,荀子又到楚国游学。到了齐襄王执政时,荀子和很多学者又回到齐国,这时,他成为齐国稷下最年长的老师。后来,荀子又到过楚国和赵国。当范雎在秦国当相时,他又到了秦国,最后离秦回赵,到了楚,当了兰陵的地方官,年迈的时候失掉官职,在家著书,死后葬在楚国兰陵。

荀子所处的时代和孔子、墨子、孟子生活的时候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那时候,由奴隶主阶级转化或由庶人上升而形成的新兴地主阶级,已经通过夺权斗争和变法改革,掌握了各国的政权,而成为统治阶级了。新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也即将在中国出现。荀况出生在赵国,时代的变化,使他的思想和孔、孟有很大的不同。他虽然名义上属于儒家中的一派,但他改造了孔、孟的儒家学说,也吸收了其他一些学派的学说,使其适合新兴地主阶级统治的需要。孟子提出的儒家学说保守性太大,不易为当时希望用激进办法巩固封建政权的各国统治者所接受;李悝、吴起、商鞅的法家学说在封建制度确立时期有很大进步作用,但它作为已经取得政权并巩固了统治地位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工具来说,因为它主张绝对的专制主义、严刑酷法的统治等等,容易激化阶级矛盾和暴露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本质,因而,也有重大的缺陷。荀子接受了孔、孟儒家学说中那一套礼治、孝悌、任贤等等的思想;又肯定和赞扬了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强调加强君权、统一国家的

重要。这样，荀子把儒家和法家思想中适合封建统治者需要的部分都继承了过去，加以发展和改造，构成了自己的学说。因此荀子的学说对于已经取得统治权的封建统治者来说，是比较适用的，封建国家统治人民就既有硬的即镇压的一手，又有软的即思想上进行欺骗的一手，使它的统治地位便能够保持得长久。荀子的思想对以后封建社会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清代末年改良派思想家谭嗣同曾说：“二千年之学，皆荀子学也”，指出封建社会中的儒家思想实质上渊源于荀子的思想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政治上，荀子强调礼、义。他所说的礼，已不是周代的礼，而是指封建社会的礼，也就封建的道德规范、社会秩序和制度。荀子的礼也是统治人民的一种工具。但和法不同。法是靠法律规定的刑法，是完全消极的、比较露骨的统治工具；而荀子强调的礼治，则要通过宣传教育的办法，使人民遵守封建道德，学习封建的规章制度，遵守封建法纪，不做非份乱法的事，来巩固封建统治。荀子也认为，单用礼治还不行，也强调要使用刑法，以作为礼治的补充。荀子还提倡义，是封建社会中的一种伦理规则。所以，礼、义合起来是一个东西，礼是制度，义是伦理，加上统治人民的刑法，这样，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手段就完备了。荀子把一套礼、义的制度看成是天经地义、永恒不变的。

荀子主张“法后王”，就是学习当世的君主。他到秦国去的时候，看到经过商鞅变法后的秦国，社会秩序良好，矛盾比较和缓，对外边来的人恭敬有礼貌，中央集权的政治比较稳定，政府办事效率较高，出现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赞扬备至，认

为是“治之至也”。可见，荀子实际上要效法的是当世的君主，而不是古代的圣王。

在认识论上，荀子批判了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了性恶论。他认为，凡人生下来时的天性都是恶的，因为人都有欲望，要吃、要穿、要利，得不到了就要争，争起来了就要乱。要去除恶性，就要用自己的努力来“化性去伪”，学习礼义，来培养善性。人性恶和人性善一样，本质上都是唯心主义的、错误的。荀子说，变恶为善，就要学习礼义；学好了礼义，路人都可以成为大禹那样的圣人。荀子实际上是认为，只有遵守封建礼仪和法律制度的人才算是好人，违反的是恶人。这暴露了性恶论的阶级性。当然，性恶论强调了人性的善恶是由生活的客观环境决定的，物质利害关系决定了人的一切，从这一点上看，也有一些朴素唯物论的倾向。

正因为荀子主张人性恶，他就特别重视客观环境的影响，重视教育，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这是他思想中积极的一面。他说：凡是王公、士大夫的子孙，不学习礼义，就要归到庶人那边去；如果庶人的子孙，能够学习礼义，就要归到卿相、士大夫一类去。在学习上，他认为“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只要有这种坚韧不拔、刻苦努力的精神，即使再硬的金属和石头，也可以镂刻；再大的困难，也可以攻破。在学习上后来者可以居上，学生可以胜过老师，他说“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荀子的这句名言，说明在学习上只要刻苦努力坚持不懈，后辈可以胜过前辈。虽然荀子主张学习的内容主要是诗、书、礼、义，但他总结的这一学习方法和规律，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荀子思想中最光辉的部分是他对自然界的看法。针以商、

周时代崇拜天,认为天意决定治乱的思想、荀子举了个通俗的例子:日月星辰天象历法,禹和桀统治时都是相同的,然而禹治理得好,而桀亡了国,难道社会治乱是由天决定的吗?他认为天的变化也就是自然界的变化,没有什么神在主宰着。一切天象上的变化,一切地上的灾异,都是自然界各种事物运动的必然表现。天意不能决定社会的治乱,社会的治乱也不会改变自然界的规律。所以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日食月食的发生,有时风雨不调,天上出现怪星,是每个时代经常有的,如果国家政治搞得好,虽然自然界出现了这些现象,也不会伤害人类;如果政治腐败,虽然这些现象一样也不发生,对人民也没有益处。对自然现象感到有些奇怪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怕它就不对了。荀子的这些言论,把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命运区别开来,说明他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揭露和批判了古代统治者利用天、神、鬼、怪的迷信来恐吓、统治人民的欺骗性。

荀子认为,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自然界的灾害,改善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他告诉人们:“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下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只要努力生产又注意节约,就不会穷困;注意营养又经常运动,就不会得病;遵循规律坚持去做,就不会得祸害。荀子进一步提出“戡天”即征服自然的学说。他大声疾呼地说:与其尊崇天而整天仰慕它,不如积蓄财物而来控制它!与其依从天而来称颂它,不如掌握天的规律而来利用它!与其空望天时而坐待恩赐,不如顺应时节而来利用它!与其让自然物自己繁衍增多,

不如发挥人的才能来帮助它生长和发展！这种人定胜天的思想，是当时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文化技术知识有了提高的反映。荀子认为人就是自然的主人，人定胜天，人可以戡天，应该充分发挥人力的作用来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这是荀子思想中的杰出贡献。

荀子人定胜天的唯物主义思想，反映了封建社会初期，新兴地主阶级不仅在国家的政治改革上，而且在改造自然以加强封建国家的经济力量上，有一种生气勃勃的进取精神。这正是代表没落阶级的思想家们所不可能具有的。荀子不愧为2000多年前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六、大法学家韩非

韩非，约生于公元前280年，死于公元前233年，是荀子的学生。他的著作有《韩非子》一书。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时代在不断前进、变化，不是停滞，不是倒退的。他认为圣人也不是循守一种东西不变的。他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蠹》），时代变了事物也变，事物不同了做法也要改变，这表明他的历史观是进步的。

韩非所处的战国时代，兼并战争很剧烈，这就要看谁有力量了。韩非说：“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显学》）谁力量大就能兼并谁。他着眼于“力”，即要富国强兵。在韩非看来，要富国强兵就要实行法治，要实行法治就要批判儒家的仁义。

韩非提倡以法为本的法治，是法、术、势的结合，他总结了过去法家的经验教训，主要继承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

“术”，慎到的“势”，他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在他看来，法、术、势不可缺一。他指出商鞅在秦国行“法”，因为没有“术”，“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定法》），变法的果实落到了权臣的手里。申不害只讲“术”而没有“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定法》）弊病也很多。所以他说：“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法和势都是关系到法治的成败问题。

韩非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定法》）就是以官府的宪令作为法治的依据，人人遵守。宪令不能违反，不能“去规矩而妄意度”。“法”，是规矩准绳，不能离开，不能任意行事。他主张大力宣传“法”，“法莫如显”，连“卑贱”的人都要知道“法”。他说，“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就是所谓“法不阿贵”，无论什么人不能犯“法”。为了行“法”，不惜设重刑，“上设重刑而奸尽止”（《六反》），韩非等法家很重视刑和赏，认为重刑能够杜绝犯“法”。

韩非说“术”是国君驾驭群臣的手段，是一种权术。“术不欲见”（《有度》），“术”是不能让人知道的。商鞅行法，数十年没有能够成就帝王的事业，“主无术于上之患也。”（《定法》）在韩非看来，没有掌握“术”，“法”也等于失败了。韩非的“术”，后来被统治阶级继承成为使用阴谋权术的手段。

韩非说的“势”是国君的最高权力，他说：“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人主》）他说，暴君夏桀能够控制天下，因为是天子，“势重”；尧是普通人时，谁也不能管，因为“位卑”。

韩非强调权力要集中，“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物权》）， “要”指中央集权，国君要紧紧掌握这种权力。他认为对于

“势”运用得如何，关系到法治的成败。

韩非强调富国强兵，很注重推行耕战政策，认为这是必由之路。“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有事无事，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韩非在《五蠹》篇里把不从事耕战的游说之士、侍臣、学士、游侠、工商之民斥为社会的五种蠹虫，他严厉批判儒墨等言仁义而妨碍耕战的行为。韩非等法家对耕战的重视，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进取精神，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韩非的哲学思想继承了荀子的唯物主义传统。他批判地改造了老子“道”的思想，把“道”说成是自然界的本身和运动着的规律。他认为自然界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的，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一存一亡，乍死乍生”，“不可谓常”。“万物”服从必然的总规律，“万理”体现不同事物的特殊规律。他对“道”和“理”关系的解释，类似我们今天说的万物各有特殊规律，所有规律共同体现了普遍规律。

韩非反对天命鬼神，他认为“天”是没有意志的，就是10个尧那样的“圣人”，也不能使农作物在冬天里长出一株穗来。韩非反对迷信鬼神，“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亡征》）他认为迷信鬼神是国家将亡的一种征兆。

韩非认为客观事物是可以认识的，他说：“物有常容。”（《喻老》）事物有一定的内容和一定的表现形式，即有一定的自然常态。怎样去认识呢？“虚以静后”（《扬权》），即认识产生于对事物的观察研究以后。他在《解老》篇里批判了“前识者无缘而忘（妄）意度也”，即还没有接触事物就想当然得出认识的先验主义。

韩非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维护地主阶级的等级、剥削

制度。他歪曲事实说：“侈而惰者贫，力而俭者富。”（《显学》）他美化了地主阶级的剥削，污蔑了劳动人民。他还说：“贵贱不相逾，……治之至也。”（《有度》）封建等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极力为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剥削唱赞歌。韩非还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忠孝》）这和儒家的思想没有什么两样。

秦王政看到韩非的书很有感慨，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韩非的法治主张，深得新兴地主阶级的赏识。

七、孙武与孙臆的军事学说

孙武与《孙子兵法》

孙武字长卿，他的祖先本是陈国的公族，姓妫。后迁居齐国，改姓田。齐景公时（前 547 年——前 490 年在位），他祖父田书因功封于乐安（今山东惠民），赐姓孙氏，父亲孙冯亦位居齐卿。孙武年轻时，很想有一番作为，但看到齐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十分激烈，执政的贵族间不断互相倾轧残杀，颇为失望，遂离开齐国，来到南方新兴的吴国。

孙武到吴国后，居于都城姑苏（今苏州）附近的乡间，潜心研究军事，写作兵法，并结识了楚人伍子胥，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讨论天下强弱大势和吴国政治动向。不久，吴王阖闾当国，任命伍子胥为吴国行人，参与计议军国大事。伍子胥深知孙武的军事才能，竭力向吴王推荐他。吴王开始不以为

然,后来读了孙武写的 13 篇兵法,不觉大为叹赏,很想起用他为将军,但又担心孙武从未打过仗,会不会是个纸上谈兵的角色,便决定先试他一试。

一天,吴王把孙武召来,对他说:“先生的兵法果然十分高明,但不知实用起来如何,能否小规模演试一下,让寡人开开眼界?”孙武答道:“当然可以。”吴王见他如此自信,有心要难他一难,便问道:“妇女也可以操演吗?”孙武知道吴王的用意,稍稍迟疑一下,说道:“可以。不过,用兵是严肃之事,来不得半点游戏,请大王放手让臣操演,万勿中途干涉,方有成效。”吴王点头同意。

就这样,孙武以练女兵开始了他的军事实践。他把吴王从宫中挑选来的 180 名宫女分为 2 队,指定吴王最宠爱的两位美姬为领操队长。然后向她们耐心讲解操练要领。他问道:“你们都知道自己的前心、左右手和背后吗?”众宫女七嘴八舌地答道:“知道。”孙武点点头,又大声说:“操演时,一切行动以鼓声为号。向前,即视前心;向左,视左手;向右,视右手;向后,则视后背。懂了吗?“懂了。”宫女们依然边说边嘻嘻地笑着。

布置已毕,孙武命军吏扛来执法的大斧,竖在练兵场的一侧,并指着大斧反复申明军法。接着,下令操练开始。

一阵“咚咚”的鼓声响起,命令“士卒”向右前进。但宫女们闻鼓,谁也没有按号令行动,反觉得十分好玩,纷纷掩口而笑。孙武见了,先严肃地自我检讨说:“军士不熟号令,是为将的规定不明之故,过失在我。”又把操练要领和军令军法细细交代一遍,同时特别关照两位队长要带头听令,领好队伍。然后,亲自击鼓,令“士卒”向左前进。谁知宫女们这回笑得更乐了,一

个个前俯后仰，你推我拥，挤做一团，弄得队伍大乱。孙武见状大怒，厉声说道：“操演要领和军令我已再三讲明，你们却明知故犯，这就不能怪军法无情了。”说罢，喝令军吏将两个队长推出斩首。

坐在高台上观操的吴王，本想看点笑话，见孙武竟认起真来，知道事情严重了，急忙派人对孙武说：“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了。但少了这两个美人侍候，寡人寝食不安，请将军宽恕她们。”孙武说：“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治军之道，在信赏明罚，不然，则何以练成劲卒？”坚持把两个违令的美姬杀了。并另外指定两个队长，下令继续操演。

众宫女见了这种场面，莫不悚然，哪里还敢有半点怠慢，个个屏息静气，全神贯注，随着鼓声前后左右，旋转跪起，操练起来，不一会儿，便练得步法渐熟，动作整齐。

于是孙武派人报告吴王说：“女兵已训练就绪，请大王前来检阅。”吴王正为两个宠姬被杀而心痛，气恼之下，便说：“寡人不愿去看，让孙武先回家休息罢。”孙武听后，叹道：“看来吴王喜欢的只是兵法上的词句，而不想去真正实行。”伍子胥知道此事后，急忙劝吴王消除杀姬之怨，以大局为重。过了好几天，吴王才稍稍回心，正式任命孙武为将军，负责训练吴军。

在孙武的主持下，吴军经过几年训练，日益强盛。公元前512年，吴王派孙武、伍子胥率兵讨伐庇护吴国叛臣的徐和钟吾国。钟吾国小民贫，很快被吴军击灭。吴军乘胜移兵攻徐。徐国君臣一面死命守城，一面火速向楚国求援。孙武见一时难以取胜，怕旷日持久，楚军来援，于己不利，便提议堵截山水，灌淹徐国。结果楚国救兵未到，徐国已被攻破。

吴王见吴军初战告捷，十分得意，便想乘势伐楚。孙武分析了敌我形势，认为不妥，劝阻说：“我军已连灭二国，人马疲惫，军资消耗，如立即与楚军开战，必然不利，不如暂且收兵，养精蓄锐，再图进取。”吴王点头称是，遂下令班师。

吴军回国后，为了削弱劲敌楚国，一面采用伍子胥提出的“疲楚误楚”法，不断分兵轮流骚扰楚境，使楚军疲于奔命；一面加紧争取盟友，孤立楚国。经过五六年时间，终于使楚国劳师丧财，附庸离心，渐渐陷入被动局面。

吴王见伐楚时机已成熟，便派孙武为将军，伍子胥、伯嚭为副将，倾全国兵力，并联合唐、蔡等国，大举出兵攻楚。

吴军在孙武的指挥下，北上溯淮而西，行至维汭，忽舍舟登陆，昼夜兼程，直扑楚国东北境。楚国得到吴军来犯，急忙派令尹子常（即囊瓦）率领 20 万人马，星夜赶赴汉水南岸立营相拒。孙武见楚军大规模出动，便下令吴军在豫章地区安营扎寨，休整待命。他已通过伍子胥等人了解到楚国政出多门，行事无定见，决定以静制动，相机行事。

楚将子常原来以为吴军千里远袭，军资接济困难，必求速战。如今见吴军忽然按兵不动，反倒困惑起来，不知对方葫芦里卖什么药。正在狐疑之际，手下的左司马戌进来献计说：“兵法云：千里馈粮，士有饥色。吴军远征，利在速战。今孙武按兵不动，正犯兵家大忌。将军可在此与吴军相持，待某分兵绕出敌后，断其粮道，然后与将军夹击吴军，如此必获全胜。”子常听后，连称好计。左司马戌当即领兵而去。

左司马戌走后，手下的武城大夫黑和部将史皇也来见子常，都主张乘楚军兵多势众，速战速决。甚至对子常说，如拖延

不决,使左司马戌此去独得头功,恐怕于他的威望有损。子常听后,不觉心动,便不顾与左司马戌的前约,下令强渡汉水,在大小别山一带连营数十里,摆开了与吴军决战的架式。

孙武正在静观形势,见楚军行动露出破绽,心中大喜,立即乘其立足未稳,发起攻击,与楚军大战3次。吴军因深入敌境,处境险恶,无不欲死里求生,个个奋勇冲杀,终于击败楚军。

楚军退到柏举(今湖北麻城以东),重新集结兵力,欲与吴军决战。但经不起吴军先锋夫概5000劲卒的冲击,便阵势大乱,连连败退。楚军主将子常弃军而逃,部将史皇死于乱军之中。吴军乘胜追击,在清发水(今湖北安陆西之涓水)、雍澨(今湖北京山县西南)等地又连败楚军,赶来救援的左司马戌也因兵败自杀。至此,楚军全线崩溃。孙武抓住战机,迅速抢渡汉水,直捣郢都(楚国都城,在今湖北江陵北),楚昭王带着一些大臣慌慌张张地逃了出去。

在这场战争中,孙武指挥数万吴兵,以少击众,大破楚军20万,五战克郢,表现了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经此一战,吴国声威大震,楚国受到了立国以来最大的打击。

孙武不仅用兵如神,还写下了中国第一部军事理论著作《孙子兵法》,对后世军事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孙子兵法》的问世,是世界军事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比色诺芬(前403年——前355年左右)的号称古希腊第一部军事理论专著《长征记》,以及古罗马弗龙廷(约公元35年—103年)的《谋略例说》、韦格蒂乌斯(公元4世纪末)的《军事简述》,不仅成书早,学术性强,而且有其独特的思想体

系，因而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公元7世纪时，《孙子兵法》便传到日本。18世纪以后，又被译为法、英、德、俄等多种文字，受到各国军事理论家的高度赞扬，他们公认“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

车轮上的军师孙臆

孙臆是兵圣孙武的后代子孙，出生于齐国的阿（今山东阳谷东北）、鄆（今山东鄆城北）之间，具体生卒年不详。他自幼生活孤苦，却胸怀大志，一心想成就一番事业。长大以后，便拜当时一位隐居深山的鬼谷子为老师，跟随老师学习兵学和纵横之学。孙臆有一位同窗好友名叫庞涓，天资聪颖，学习优秀，毕业后投奔了魏惠王，做了一名将军。魏惠王很信任他，派他南征北战，打了不少胜仗。但庞涓心里却很清楚，他的军事才能远远不如孙臆，万一哪天孙臆下山，无论是到魏国还是其他国家，对自己都是个极大威胁。为一劳永逸除掉后患，庞涓心生一计，派人上山请孙臆到魏国来，然后捏造罪名对孙臆施以臆刑（去膝盖骨），使其永远不能站立起来，不能领兵打仗。

孙臆无故遭此大难，且为同窗好友陷害，心中悲愤莫名。他决心坚强地活下去，最终干出一番事业来，令世人刮目相看。为了摆脱庞涓手下人的监视，他伪装经受不住这样沉重的打击而精神失常，整日里蓬头垢面，又哭又笑，暗地里却加紧研读兵书，准备有朝一日逃离虎口，利用自己的智慧才能报仇雪恨。果真，庞涓听说孙臆已疯，便放松了警惕性，不再去关心这位衣衫褴褛的同窗的行踪了。过了些日子，一个齐国使团到达魏国，孙臆悄悄地以刑徒的身份去拜访齐使。齐使听见这位

衣衫破烂的人谈吐大为不俗,猜度他也许是个人才,便趁回国之机,用车把孙臆秘密载回齐国。

孙臆到齐国后,被齐国大将田忌待为上宾。只是他究竟有什么才能,大家还不清楚。孙臆也很想找个机会表明自己的才能和抱负。恰巧这时田忌正热衷于赛马,其主要对手是齐威王,而且总是负多胜少。孙臆经过仔细观察,发现他们两人的马皆分为上中下三等,马的足力大体相近。根据比赛三局两胜的规则,孙臆建议田忌以自己的上等马对威王的中等马,以中等马对下等马,以下等马对上等马。这样虽然输掉一局,却可以赢得两局。田忌对孙臆的巧思大感惊讶,将他推荐给齐威王。在齐威王的宫殿里,孙臆畅论兵法,其道理之深奥,言谈之巧妙,使威王深为折服,很快任命他为军师,辅佐田忌去解赵国之围。

孙臆终于得到一个向庞涓复仇的机会。但他并没有急于与庞涓在战场上相见。他劝田忌放弃领兵直趋邯郸,与魏军决战计划,并指出魏军长期出兵在外,国内必然空虚,如果齐军直捣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必然逼得庞涓回救,可以取得一箭双雕的结果。田忌十分赞同孙臆的主张。这样在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中孙臆两次献策,使齐国战胜强大的魏国,终于威服诸国,称霸中原。但后来他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新的作为,而是将精力放在教授弟子,钻研兵法上面。他曾经著有兵法,汉代时仍有流传,称为《齐孙子》,以别于他的先祖孙武的著作。可惜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孙臆的兵法竟于东汉时期失传。后人不明真相,还以为孙臆就是孙武,孙臆的兵法就是《孙子兵法》。这种张冠李戴的笑话一直延续了上千年之久。

1972年4月,一群考古工作者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座古墓意外地见到了一大批陪葬的竹简。它们中间的大部分依然保存较好,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见。经过长期的研究整理,专家们终于认定这中间就有久已失传的孙臆兵法的内容,孙臆也决不会与孙武是同一个人。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一书认定,属于《孙臆兵法》的内容共计16篇,共222简,近5000字。从这部分《孙臆兵法》的残简来看,孙臆在继承其祖先孙武军事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新的思想观点和作战原则。其主要内容有:

一、根据战国中期七雄并立、混战不休的现实,充分肯定统一战争在历史上的作用。认为奢谈仁义礼乐是有助于制止战争的,只有“战胜而强立”,以战争手段实现国家的统一,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二、强调提高人的素质,以为强兵的基础。对将帅不仅提出德、信、忠、敬等要求,还强调要有上知天文地理,下知民心、敌情、八阵部署的能力;对士兵不仅要严格选拔,精心组建,而且要进行系统的政治教育、队列训练、行军训练、阵法训练、战法训练,使之能够适应严酷战争的需要。

三、提出要认识战争规律(“道”),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有利态势,运用大规模野战机动的方式,批亢捣虚,围魏救赵,从而争取主动,克敌制胜。

《孙臆兵法》虽然失传上千年,但孙臆的一些思想观点通过其他古籍流传于世,在历史上颇有影响。孙臆所提出的“围魏救赵”战法,成为战争舞台上的经典之作,深得后人的赞赏。

八、惠施、公孙龙的名家学说

春秋战国时期，很多学派都提出了“正名”的主张，就是按照自己的观点来校正每件事物的名和实，以调整事物的“名”和“实”之间的矛盾。为此，各派引起了争论。战国时期，发展为专门进行名词和概念的探讨和辩论的名辩学派，简称名家。名家的主要代表是惠施和公孙龙。

惠施是战国中期宋国人，其活动年代略晚于孟轲和商鞅，曾做过魏的相国，帮助魏国编订过法律，又曾陪同魏惠王到徐州去会见齐宣王。后来，他一度出亡到楚国、宋国，以后又回到魏国。公孙龙是战国后期赵国人，其活动年代约和燕昭王、平原君同时。他和惠施一样，主张“偃兵”，停止战争，先后游说燕、赵等国，是惠施学说的继承者。他们虽然都从事名辩，但惠施学说的特点是讲“合同异”，即注重事物性质的“同”的方面；公孙龙学说的特点是“离坚白”，即注重事物性质的“异”的方面。惠施由于过分强调了事物性质的“同”，忽视了事物之间的本质差异，陷入了类同于庄子思想的那种相对主义；公孙龙无限夸大了事物概念之间的“异”，陷入了客观唯心主义。

惠施的著作已失传，他的学说保存在《庄子》、《荀子》、《吕氏春秋》等书中。《庄子·天下》说：南方有一个奇人，名字叫黄缭，问天地之所以不坠不陷、发生风雨雷霆的缘故。惠施不加思索地立即作了回答，还对万事万物作了普遍的解说，而且言语很怪诞。惠施的话怎样的怪法，那段话没有讲清楚。《荀子·不苟》说：“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卵有毛，是说者之

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把高山和深渊说成是平的，把天和地说成是可以比高低的，把两个不接壤的国家齐国和秦国说成可以互相侵袭对方的边疆，把鸡蛋说成是有毛的。这是哪一个能说会道的人都很难自圆其说的，而惠施等人却能够说得很像。从荀子对惠施的这一段评论中，我们对惠施如何“合同异”有个印象了：他抹煞两件不同事物性质上的差异，把不同的东西硬说成是相同的，把没有关系的事物硬说成是有关系的。从一般情况来看，这种说法当然是完全错误的诡辩。但是，在惠施的命题中，也反映了某些辩证的和逻辑的思想。惠施曾提出了十个命题，我们举其中几个略作分析。“天与地卑（近），山与泽平”，即荀子所讲的“山渊平，天地比”，如果我们眺望远处的话，确实见到天和地接近起来，高山上的湖泊确实也比低的山要高。事物的高低大小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某些情况下，一般人认为低的东西，比一般人认为高的东西要高。所以惠施的这一命题有辩证的因素在内。惠施认为“物方生方死”。生物活着就是活着，死了就是死了，没有哪个生物既是活的，又是死的。这个命题一般看来是错误的，但它说明了事物在不断变化发展之中，生命的开始就酝酿着它将来的死亡，也有一些辩证的因素在内。惠施又说：“南方无穷而有穷。”有穷尽就是有穷尽，没有穷尽就是没有穷尽，地理上讲最南就是南极，再往南的地方是没有的，“无穷而有穷”一般来说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我们从地球是圆为这一概念去理解，往南极去是有穷尽的，但过了南极仍旧沿着原来方向往前走，就会绕行地球而无穷尽的了。所以惠施的上述几个命题，包含着辩证的观点。但是，他把事物相对的一面无限夸大了，

就否认了事物本质的稳定性,否认了一事物和他事物的质的区别,抹煞不同事物间质的差异。象上述几个命题,本来只存从某种特殊意义上去理解或在某种特殊条件下,才具有意义,在普遍的和一般的情况下,是不存在的或错误的;而惠施的分析很多出于抽象的逻辑推理,又把自己的结论作为普遍存在的现象来论证,强把自己的命题说成是普遍真理,这就陷入了相对主义的诡辩中去了。惠施对事物的认识,总的来讲是相对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因此,他的理论受到了战国后期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子和后期墨家的批判。

公孙龙的哲学比惠施带有更浓厚的唯心论和诡辩论的特点。他发展了惠施思想中的消极面,陷入了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诡辩论的错误。公孙龙留下的六篇著述中,白马论和坚白论是其代表。

公孙龙认为:“白马非马。”因为:“白马”这个东西,是指“白”与“马”两样东西。“白马”不是马,白是指颜色,马是指形体;指颜色的“白”字不是指其形体,指形体的“马”字不是指其颜色。“白”“马”两个观念不同于“马”一个观念,所以“白马非马”。公孙龙的诡辩术,就是要把人们看到一匹白马后得来的白的颜色和马的形体,这明明是一匹白马在人们头脑里的反映,硬要分析成两件事物,也就是让马的颜色从马的本体上割裂开来而单独存在,让马的本体脱离它的颜色而单独存在。这样,在公孙龙看来,当然“白马”不是“马”了。

属于同样的诡辩是他的“坚白论”。他认为,一块又坚又白的石头,它的颜色是“白”的,质地是“坚”的。“白”是人们看到的颜色,“坚”是人们的手摸到的感觉,当人们看到“白”的颜色

时,就没有触到它的“坚”;当人们触到它的“坚”时,就没有看到它的“白”,“坚”和“白”在人们的感觉中是分离的,不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坚白石”是“坚石”与“白石”,并非“坚白石”,而“坚石”又是“坚”与“石”,“白石”是“白”与“石”。这就是“坚白石二”。

公孙龙的这种诡辩,否认了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否认根据人们的实践早已认识了的外界一切事物的客观存在,强调事物只是依赖于人们的感觉而存在的。当你以这一种感觉器官接触某件事物的一种特性,就存在着这件事物;当你以另一种感觉器官接触这件事物的另一种特性,就存在着另一件事物。公孙龙在《指物论》中说:“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就是说,所有“物”都是人的观念,而一切的观念却不是别的观念所化成的;他又说:“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就是说,没有了人的观念,一切“物”就不存在了。他的思想,完全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是荒谬的诡辩术。公孙龙在进行诡辩时,把事物某一方面的概念和性质说成是永恒地孤立地单独地存在,否认了事物各方面的概念之间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否认了事物间的统一性,片面地孤立地夸大事物某方面的性质,片面地夸大事物的一般和特殊的差别,这是完全错误的,但他也注意到概念的明确与概念之间的差别,对古代逻辑思维的发展,也有一些作用。

名家的出现是和战国时期的社会形势分不开的。当时新事物不断涌现,旧的名称、习惯、风俗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社会形势在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因而出现了“名实不符”的情况。各家的“正名”,正是代表了当时统治集团中保守、改良派

的想法和要求。他们在进行诡辩的时候,可以任意“合同异”,即把不同性质的新旧名称说成是一样的,共同的东西;可以任意“离坚白”,把一件事任意说成是两件事。因此,他们可以随意解释和否定客观世界已经存在着的事物,随意把新事物和旧事物说成是一件事物;随意把新出现的事物分割成莫须有的其他事物;任意把已经瓦解了的旧事物说成是永恒存在的。这反映了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保守力量对社会激烈变革的不满和反抗,希望通过在名词概念上的诡辩达到否定和颠倒客观世界早已存在了的事物,多保留一些旧事物、旧名称的目的。当然,惠施的哲学在辩证法和逻辑学方面,公孙龙的哲学在逻辑思维的方式方面,在古代哲学发展史上也起了某些作用。

九、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

和公孙龙差不多同时,齐国出现了一位思想家邹衍(约前305——前240年)。他提出了阴阳消长、五德终始的学说,简称为阴阳五行说,在当时以及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起了一定的影响。

原始的五行学说,并不是邹衍第一个提出的。它本来是一种对物质构造的古老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物质世界中各种各样的事物,虽然形态、大小、质量各异,但归根结底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东西所构成的。后来这种学说由于子思、孟子的创导而流行了开来。这种学说试图用几种人们常见的物质作为构成事物的基本元素,来解说宇宙万物的构造,因而这是和名家相反的一种原始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到了邹衍的

时候,又发展和改造了这种学说,把它说成和历史发展、朝代的更替有关的一种历史规律了。

邹衍的著述今天已失传,只是在先秦诸子的著述中留下了一些片断的记载。《吕氏春秋·应同》说:“凡是古来帝王将兴的时候,老天爷一定先显现祥瑞给人们看。黄帝的时候,天上降生了蝼蛄等飞虫,黄帝说:土气胜。所以黄帝时是土德,尊崇黄色。大禹的时候,草木到秋冬不死,大禹说:木气胜。所以夏代是木德,尊崇青色,木胜土,夏代代替了黄帝时代。商汤的时候,青铜的刀刃生于水,商汤说:金气胜。所以商代是金德,尊崇白色,金胜木,商代代替了夏代。周文王时,火赤鸟含着丹书集中在周的土地神那里,文王说:火气胜。所以周代是火德,尊崇赤色,火胜金,周代代替了商代。代替火德的将是水德,天将先显现水气胜火气的祥瑞,而且一定会尊崇代表水德的黑色。”这一段话,介绍了战国时代五德终始说的大概内容,当出自邹衍无疑。

从上面介绍的阴阳五行说的梗概来看,邹衍试图用阴阳消长、五行相胜,来说明旧的王朝必然会灭亡,新的王朝必然会出现,历史不是静止的,而是发展变化的。这种理论很符合于战国时期新兴封建国家统治者的需要。他们需要借助于邹衍的理论,来说明周代的灭亡,新兴国家的出现是必然的、合理的、符合天意的。因而邹衍的理论,成为战国时期的七雄争胜,展开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一种舆论工具。因而,他的学说受到了当时各国统治者的欢迎。邹衍是齐国人,齐国的统治者非常看重他的学说,他到了魏国的大梁,梁惠王亲自到郊外迎接,待之以上宾之礼;到了赵国,受到平原君的器重和优待;

到了燕国，燕昭王筑起了碣石宫，招来了一批学生专门在那里跟他学习，昭王自己也拜他为师。各国的诸侯对他如此热情的优待，是因为他提出的阴阳五行说，适合各国统治者需要的缘故。邹衍写出了《终始》、《大圣》等篇共 10 万余言的文章，构成了他的学说的体系。

但是，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却绝不是关于历史发展的科学理论，因为它没有说明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所以不得不归结为天的意志；另外，五行相胜，不是辩证的发展，而是历史的循环，周而复始，今天是土德的朝代，过了五代后，还会重新出现这样一个朝代。因此，五德终始说虽然可以被当时新兴的封建国家代替奴隶制国家提供理论根据，有一定可取之处，但实质上还是一个唯心主义的体系，必然发展为宗教迷信。

在邹衍以后，一批以谈论神仙之术来骗取帝王信任的方士们，把邹衍的学说和道家的仙术以及鬼神之说结合起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相信阴阳家的说法，迷信于方士的欺骗宣传，以为秦代周就是五德终始，秦为水德，崇尚黑色，一切都是天意，于是，就大搞祭天、求仙等迷信活动，对秦代政治的发展起了有害作用。汉代天命迷信思想非常盛行，成为神化皇权的工具。秦汉时的阴阳家，已经完全变成了为封建统治者统治劳动人民的宗教迷信思想的宣传者。

邹衍除用五德终始说来解释历史外，还对我国的地域概念也大胆地作了设想。

我们知道，先秦时期儒家的经典《尚书·禹贡》和《周礼·职方氏》，曾把中国分为九州，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地理观念的广阔。邹衍发展了儒家经典中对中国和世界地理观念

的范围。他根据自己了解的一些地理知识,以小推大,至于极限,详细开列了中国的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中和土地上所生长的东西,物产中的珍品,称中国为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有九洲,这和儒家的说法基本一致。邹衍又进一步认为,中国以外像赤县神州那样的州有九个,外面有小海环绕,合称一州;小海以外这样的州又有九个,外面有大流海环绕。再往外面就是天地的边际了。因此儒家经典《禹贡》、《职方氏》中所说的中国,只不过占邹衍所说的包括九大洲的天下的 $1/81$ 罢了。邹衍的大九洲说把儒家的九洲说大大扩大了,当然完全出于以小及大的推想,夸大过甚,并不是科学的地理概念。

总之,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把历史的观念从当时上推到黄帝时代,并提出了他对历史发展的解释,他的大九洲说把地理概念从中国外推到世界,并提出了他对“天下”的设想。他的理论带有很多宗教色彩和空想的成份,但是他用自己的观点,说明了朝代的兴亡、社会的新陈代谢是必然会产生的,中国以外的地理范围是广阔的。这对于巩固当时新兴封建国家的统治,解放人们的思想,还是起了一定的有益作用的。

十、战国时的农家学说

战国诸子中还有农家,可惜他们的学说大部分已经失传。我们从现在看到的片断材料来说,认为农家代表了战国时新出现的个体农民的思想。他们在政治上要求统治者与人民一块劳动,“并耕而食”,反对过度的压迫和剥削;在经济和科学上,农家学派总结了很多有益的农业生产经验。农家的代表人

物往往本身就是劳动者，他们和广大农民有血肉的联系，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

《孟子·滕文公》记载了农家的代表人物和孟子之间的一段对话，对于我们了解农家思想，是很重要的。

当孟子在滕国宣传“王道”、“仁政”学说，滕文公想实行他的政治主张时，有一位宣传神农学说的人名叫许行，从楚国来到滕国，对滕文公说：“远方来的人，听说您推行仁政，愿受您一块土地做您的农民。”滕文公就和他相处在一起。许行的学生数十人，都穿粗布衣服，织草席打草鞋以为职业。另一位农家的代表陈良的学生陈相及其弟陈辛，肩上扛着耒耜等农具，也从宋国来到了滕国，对滕文公说：“听说您推行圣人的政治，您也就是圣人了。我们愿意做圣人的老百姓。”陈相见了许行，非常高兴，放弃了自己的学说，完全学习许行的学说了。

陈相见到了孟子，宣传许行的学说，对孟子说：“滕文公本人倒是一个贤惠的人，然而他没有听到正确的道理。贤惠的君主应该与老百姓一块儿参加劳动，一块儿吃饭，同时治理好国家。现在滕国有仓廩府库，堆满了粮食和其他物资，都是剥削老百姓而来的呵。怎么能算是贤君呢？”孟子是一位老练的辩论家，他不露声色，以犀利的语言来质问陈相，驳斥许行和陈相的观点。

孟子说：“许行是自己种了粮食然后才做饭吃的吗？”陈相回答说：“是的。”问：“许行是自己织了布才做衣服穿的吗？”回答说：“不。许行只穿粗布衣服。”问：“许行戴帽子吗？”回答说：“是的。”问：“用什么做帽子呢？”回答说：“用素色的布做的。”问：“是自己织出来的吗？”回答说：“不，是用粮食换来的。”问：

“为什么不自己织呢？”回答说：“因为许行要耕田呀！”又问：“许行用陶器来做饭，用铁器来耕田吗？”回答说：“是的。”问：“陶器和铁器是自己制造出来的吗？”回答说：“不，是用粟换来的。”孟子说：“以粮食换陶器铁器，是为了自己不必去制造陶器铁器；生产陶器铁器的人也以器械换粮食，为什么一定要叫他们务农呢？许行为什么自己要拿现成的器械来使用，为什么要忙忙碌碌地和百工进行交换，许行不怕麻烦吗？”陈相说：“百工干的事，当然耕田的人是做不到的。”

于是，孟子发表了一通议论。他说：“按照同样的道理，管理天下的事难道是耕田的人能够干得了的吗？有‘大人’做的事，有‘小人’做的事。一个人用的东西一定要百工替他生产出来，如果一定要自己生产的东西才能自己使用，是引导人们走贫困的道路。所以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的人统治别人，劳力的人被人统治，被人统治的人依靠自己的劳动来过活，统治别人的人依靠别人的劳动来过活。这是天下的通义呵！”

孟子和陈相的这段对话，说明了农家和儒家对政治问题的根本看法及其对立。许行、陈相宣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要求统治者和劳动人民一块耕种，一块吃饭，兼管理政治，反对建立仓库府廩、剥削劳动人民来养活自己，这虽然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但却代表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度瓦解，个体农民大量涌现，劳动者的身分有了提高，并获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统治，也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这就是代表农民意志的农家思想出现的社会背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形成风气，这也为农家的发展和参加争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农家思想反映了

刚从奴隶制桎梏下解放出来的个体农民响往人人平等、反对贪官不均、反对压迫剥削的政治理想,不仅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而且在 2000 多年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中,农家的平均主义思想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孟子所谈的社会分工固然是社会发展所必需,但是他在辩论中却别有用心的利用了许行学说中主张人人都自耕而食、反对社会分工这一主张的片面性,强把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阶级对立也说成是社会分工,把社会分工和阶级统治混为一谈,从而为他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辩护。因此,孟子的发问和推论虽然其言凿凿,语词锋利,实际上是要用社会分工的必要性来论证剥削制度的合理性,为剥削阶级统治劳动人民的社会现实制造理论根据。

战国时期农家的重要贡献是总结了古代农业生产的知识和经验。吕不韦当了秦国的丞相后,依附于他的游士、食客有 3000 多人,其中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以及农家等等学派的人物。吕不韦依靠他们编成了《吕氏春秋》一书。《吕氏春秋》成书于公元前 239 年左右,虽然它总的思想倾向偏重于儒家和道家,但对各家的学说能够兼收并蓄。该书中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就是农家学说的一部分。农家强调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提出了“上(尚)农”的理论,在《上农》一篇中,农家提出了重农的理论和政策。它的思想和商鞅等法家崇本抑末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很注意对土壤的分辨和改造,在《任地》一篇中,讲了利用土地的原则,主张要整地、改良土壤、深耕保墒、除草通风等等;还提出了对土壤的软和硬、实和松、瘦和肥、湿和燥,都要使其能够适合于种植,在

实行轮流休耕时,休耕地和耕地要注意进行调节。《辩土》讲如何使用土地,来改变土壤的性质,并提出土质的类别不同,耕作的时间也应不同。说明了整地不良、耕作不时的毛病。《审时》提出了农业生产中掌握节气的重要,并对禾、黍、稻、麻、菽、麦六种主要作物的耕作时节的“得时”、“先时”、“后时”的利弊作了比较。这些农业生产上的经验,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但农家的学者把它整理成规律化的东西并记载了下来,这对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是有贡献的。

第二节

科技与文学艺术

一、《星经》和发达的天文学

每当月光皎皎的夜晚,人们不难看到月面上环形山的绰绰阴影。那些环形山中,有4个就是以中国古代天文学家的名字命名的:有元代的郭守敬(1231—1316),南朝的祖冲之(429—500),东汉的张衡(78—139),还有一位是中国最早的著名天文学家,叫石申。

石申,是战国时代魏国人,曾著《天文》八卷。同时代还有位天文学家叫甘德,楚国人,著有《天文星占》八卷。后人把这

两部最早的天文学著作合编在一起,称为《甘石星经》,亦叫《星经》。《星经》是战国时代的星象记录,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360—公元前 350 年间。

中国古代天文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到战国时期已形成了自身的体系。以方位天文学的 28 宿来说,也可窥见一个发展的大体轮廓。

中国古代为了便于观测星象变化,把天空当作地域一样来认识,依据在地上划分东、西、南、北四方的习惯,也把天空划分为东、西、南、北四象,即四方的星象。又依据人乘车马在大地上奔驰,每隔一段路程就有一个可供食宿的驿站,也给日、月在天上的运行划分出一个可供停宿的地方,称之为“宿”。每宿就是一个星群。又依四象划分“宿”,每象七宿,四象共二十八宿,即把黄道及其附近的星划分为二十八个星群。这种方位天文学,大约早在 3000 多年以前的商代已开始,并逐渐形成。殷墟甲骨文中就有关于“四象”的记载。西周初期,二十八宿的划分已最后确定下来。《诗经》中就提到了其中 8 个星宿的名称。石申与甘德的《星经》,则是战国时期星象观测的一份完整记录。当时还有一部天文著作,叫《巫咸》,是假托商代的星官的名字而记录的恒星图。经整理,当时这三部天文著作共有恒星 284 座,计 1464 个。这可以称作是一份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了。大约过了七八十年,希腊人也制出了西方最早的恒星表。

甘德的著述中说,木星“若有小赤星附于其侧,是谓同盟”。同盟的意思即是说木星有卫星。1981 年 3 月上旬,天文学家对此进行了验证。他们在北京天文台河北兴隆观测站进

行观察,果然用肉眼观察到了木星的3颗卫星。在此以前,一般都认为木星的卫星是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在1610年用望远镜发现的,然而早在西方发明望远镜之前约2000年,中国的天文学家就已经将其记录在案了。

随着图象观测的发展,中国的历法也有很大发展。春秋时,人们已能运用立圭表准确地测定夏至和冬至,由此,历法编制开始准确起来。战国时的思想家孟子就曾感慨地谈到那时天文历法学的成就,他说:“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指冬至、夏至),可坐而致也。”

春秋时,各国使用了三种不同的历法。以冬至月为正月的,叫做“周正”;以冬至后一月为正月的,叫做“殷正”;以冬至后二月为正月的,叫做“夏正”。夏正也叫“夏历”,比较符合一年四季气候的变化。到战国时,夏历被各国普遍采用。而且,中国历法独具特色的二十四节气,即月令,这时也完备了。这使得人们可以根据节气的变化,从容地安排农业生产。战国时,还产生过一种古代四分历,叫《颛顼历》,它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历法之一。

这时,为计算更精细的时刻,一种叫做“滴漏”的计时仪器也早已发明了。那是用装水的铜壶,在下部打个小孔,让水匀速滴出,滴到刻有度数的器皿里,看水到什么度数,用来计算时刻。这种仪器一直沿用到清代。滴漏就是现代小小手表的远祖。

二、民间工艺大师鲁班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手工业奴隶的解放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独立手工业者中出现了不少能工巧匠,如手工业者出身的墨子,曾用木料造了一只能飞上天的木鸟;齐国出现了技术精良的造车工匠轮扁等。在众多的能工巧匠中,鲁班是最著名的代表。

鲁班,姓公输,名般,当时人称他公输子;因为他是鲁国人,“般”与“班”同音,所以后人称他鲁班。根据明代传下来的《鲁班经》记载,鲁班生于春秋末期鲁定公三年(前507年)。鲁班一生有很多创造发明,当时人们很钦佩他,称他为“巧人”,后世土木工匠尊称他为“祖师”。

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鲁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在生产工具方面,木工常用的刨、墨斗、曲尺、钻、铁锯和人们生产中常用的铁铲,都是他发明的。

据《丛书集成·物原》记载,“刨”是鲁班发明的。在鲁班以前,要使木板平滑,都是用刀斧之类工具砍的,效率低,造出的东西也不够精美,即使是鲁班这样一个手艺很高明的木匠,遇到木纹粗或节疤多的木料,也很难砍得平滑。在劳动实践中,鲁班不断摸索,发现用比较薄的斧头砍木料较省力,也容易平滑。于是,他仿照斧头的样子,磨了一把小小的薄“斧头”,上面盖块铁片,只露出一条窄刃,往木头上一推,果然能把木料表面推得又平整,又光滑。后来,鲁班又为它装上一个木座,这样,世界上第一把“刨”便诞生了。鲁班的母亲和妻子也是很善

于动脑筋的。据说鲁班在用这把初生的“刨”来刨木料时，为了防止木料移动，总要他的妻子云氏在对面顶住木料，很影响他的妻子做家务。云氏想了一个办法：在坐凳上钉一个木橛子顶住木头，刨起来既稳当，也不用人抵住木料了。这样，一套完整的刨具便完全创造出来了。鲁班妻子做的那个木橛后人称作“班妻”。

鲁班在劳动中很善于观察，墨斗就是他从母亲裁衣服用的粉袋得到启发创造出来的。但鲁班做了墨斗后，每次弹线都要请他母亲帮助捏住墨线的一端，妨碍了他母亲缝衣做饭。鲁班的母亲对儿子说：“你做一个小钩子勾住墨线一头，不就可以代替我捏墨线了吗？”鲁班听了感到很有道理，很快便做了一个钩子，把它固定在木料的一端拉住墨线，于是他一个人就可以划线了。这个钩子一直用到现在，也许是为了纪念鲁班母亲的启发帮助吧，木工师傅们把它称作“班母”。

鲁班还根据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发明，改进了木工画直角用的“矩”，做了一把“D”形的木尺，用它来画直角非常方便。后人称它为“鲁班尺”，直到今天仍是木工师傅不可缺少的工具。

鲁班还发明了钻和铁铲，可惜记载的资料太少，发明的具体过程已不清楚。

在生活用具方面，鲁班也有不少创造发明，如锁和磨的创造。在鲁班以前，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仿照鱼的样子，做成最原始的“锁”挂在门上，意思是要人们象鱼一样不眨眼地专心看守门户，但实际上没有起到锁的作用。鲁班改进了这种原始的“锁”，在里面安上机关，如果不用钥匙就打不开，这就成为真

正的锁,可以代替人看守门户了。

磨也是鲁班在不断的观察中创造的,《世本》有“公输作磨石臼”的记载。日常生活中,鲁班看到人们要把米、麦的壳去掉,磨成粉,费了很大力气还搞不好,他很想帮助人民解决这个困难。有一次,他看见一位老妇人用石杵捣麦,捣了一下就累得举不起石杵了,只好摇动着石杵来研磨臼里的麦粒。老妇人的动作给了鲁班很大启发。他回家后,用两块比较厚的石块,先凿成圆形,又在圆面上凿了许多齿槽,然后把它们合起来,在中间放上麦粒,使石盘转动,很快便磨出了面粉。这就是我国2000多年来农村一直广泛使用的石磨。与此同时,鲁班还仿照磨的样子,用木料制造了砮,用石头做成圆柱形的碾。用砮可以使谷子去壳变成米,滚动石碾,可以使粮食去皮破碎,也可以用来碾平物体。

鲁班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土木工匠,也是一个杰出的器械制造师。根据《墨子》等书记载,鲁班曾用竹木造成了一只鹊,能高飞三天不降落。这个说法虽有些夸张,但它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征服天空的宏大志愿。鲁班造成木鹊后,曾向墨子夸耀。墨子却说:你造这个东西不如我造轮轴端的键,只用三寸木头削成,就可以运输50石重的东西。墨子指出,制造出来的东西,有利于人民才算巧,无利于人民只能叫作拙。鲁班听了很受教育,从此他更努力制造于人民有益的工具。

鲁班造过一辆能自动行走的木马这一传说在民间流传很广,对后世也有影响,据说后来三国时诸葛亮做木牛流马,就是得到了鲁班做木车马的启示而创造的。

在战争器械方面,鲁班曾为楚王设计了“钩强”和“云梯”。

“钩强”适用于水战，打仗时，敌船退却可用它勾住攻打；敌船进攻又可用它来抵抗。“云梯”适用于攻城。这种梯高耸入云，不仅可以从高梯上窥视敌人城中情况，还可以用它爬越敌人的城墙。今天我们用的消防梯就是从这种云梯发展来的。鲁班制造进攻用的战争器械，遭到主张“非攻”的墨子的反对，后来他就没有再造这方面的器械了。

此外，传说鲁班还带领工匠建造了许多桥梁和楼阁，虽然有许多是后人的附会，但它反映鲁班的创造发明已在人民心中生根开花，反映了人民对鲁班的热爱和敬仰。

鲁班这个来自人民群众之中的普通工匠，以他辛勤的劳动，做出了很多贡献，他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手工业工匠的杰出代表。他精巧的技艺正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手工业技术得到很大发展的最好说明。鲁班的创造发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也是他在长期实践中，善于观察、善于思考、善于总结、不断提高、忘我劳动的结果。劳动人民把鲁班比作智慧的化身，这是很有道理的。

三、传统诊断法的奠基人——扁鹊

扁鹊是战国时代的一个著名的医生。他姓秦，名叫越人，是渤海郡鄆邑（今河北任丘县北鄆州镇）人。他的出身现在已无从查考，仅仅知道他青年时代曾经替贵族管理过客馆。

客馆里有个常来的食客，叫长桑君，医术很高明，扁鹊就拜他做老师。因为扁鹊决心要以医术替人们解除疾病的痛苦，所以学习很努力。他除了学会长桑君的一套本领以外，还用心

研究前人的医学著作。他又善于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因而终于在医学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对我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多的贡献。他把别人的病痛看作自己的病痛，常常深入民间，一丝不苟地为人治病。这使他在当时就博得了人们普遍的崇敬，人们把他比作传说中的黄帝时候的神医扁鹊，称他做“扁鹊先生”。他原来的姓名秦越人，反被人忘掉了。后人还尊崇他为医学的祖师，他的故乡也被人称为“药王庄”。

我国医学上的传统的诊断疾病的方法——望、闻、问、切，是扁鹊首先根据前人的医学经验，结合他自己的实践，加以条理化的。在这四种诊断方法之中，扁鹊特别擅长于望诊和切诊。相传那时候晋国的赵简子，有一次病得很严重，已经五天昏迷不醒了。赵简子的家人十分惶恐，请扁鹊去给他诊治。扁鹊切过赵简子的脉搏以后，断定赵简子不会死。他给赵简子配了药，又扎了针，果然，不出三天，赵简子就苏醒过来了。

有一次，扁鹊路过虢国（今河南陕县东南），听说虢君的太子突然昏死了。他认为这事很可疑，要去看个究竟。当扁鹊跑到宫里的时候，大臣们已在替太子办理后事。扁鹊问明了太子怎样昏死的情况以后，就仔细地察看。他发现太子还有微弱的呼吸，两腿的内侧还没有全冷，因而断定太子不是真死，而是得了“尸蹶病”，认为还有治好的希望。他就给太子扎针，太子果然醒了过来。扁鹊接着又在太子两腋下施行热敷，不一会儿，太子就能够坐起来了。这使得虢君万分惊喜，热泪盈眶，向扁鹊作揖道谢。扁鹊临走时还留下了药方，虢太子按方服了20多天的汤药，便完全恢复了健康。

这就是世代传说的扁鹊起死回生的故事。因此，当时的人

都把扁鹊当作神仙看待。

又有一次，扁鹊到了齐国，齐桓公知道他有很高明的医术，就热诚地招待他。扁鹊见了齐桓公，根据齐桓公的气色，断定有病。他对齐桓公说：你已经有病了，现在病还在浅表部位，如果不赶快医治，就会加重起来。齐桓公因为自己当时并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所以不相信扁鹊的话，反以为扁鹊是想借此显示自己的本领，博取名利。过了五天，扁鹊又看见了齐桓公，观察到齐桓公的病已经进入血脉之间，再劝他赶快医治。齐桓公还是不听。再过五天，扁鹊又告诉齐桓公说：你的病已转到了胃肠，如果再拖延不治，恐怕就无法挽救了。齐桓公这一次不仅不听，反而对扁鹊说：我起居同平时一样，没有什么毛病，请你不要再噜苏了。又过了五天，扁鹊细看齐桓公的气色，知道他的病已经无法医治了，于是一句话也不说就走开了。齐桓公派人去问他为什么走开，他说：病在浅表，可以用汤药医治；病到血脉，可以扎针医治；病到内脏也还不是没有办法；可现在齐桓公的病已深入到骨髓，再没有方法可以医治，所以只好退了出来。

不久，齐桓公果然病倒了。他派人去请扁鹊，这时扁鹊已经到秦国去了。齐桓公终于因为没有听扁鹊的话而病死了。

这就是著名的扁鹊会见齐桓公的故事。

从上面一些流传下来的故事，可以知道扁鹊是如何地精于望诊和切诊了。

这并不是说扁鹊治病只用望诊和切诊的方法，他同时也很注意从多方面来诊断疾病。他既看舌苔，又听病人说话、呼吸和咳嗽的声音，还问病源和得病前后的种种情况。除了病人

以外,他还向病人的家属和亲友细细查询,以求得准确的结论,便于对症下药。这就是上面提到的望、闻、问、切的综合的诊断方法。这一套诊断方法的建立,是扁鹊在我国医学史上的巨大贡献。

扁鹊不仅在诊断学上有很大的贡献,而且是医学上的“多面手”。上面说到扁鹊给虢太子治病,就用了针灸、热敷和汤药三种方法综合治疗。扁鹊说:病的种类实在太多,这使人民痛苦;医治方法太少,这是医生的苦恼。为了能够迅速有效地给人们解除疾病的痛苦,满足医疗上的需要,扁鹊还研习针灸、按摩和外科手术。他也精于医治妇女、小孩和五官的疾病。相传因为邯郸西南妇女多病,扁鹊在那里的时候就花费大部分的时间为妇女治病。洛阳风俗尊重老人,扁鹊在那里就当耳目科医生,替很多老人治好耳聋眼花的毛病。他到咸阳(今陕西咸阳市)的时候,因为那里的孩子多病,就几乎变成小儿科的专门医生。这些都说明扁鹊之所以能够精通各科和各种医疗技术,是与他这种处处从人们需要出发的热情是分不开的。

扁鹊一生有很多的时间是背着药袋,带着徒弟,天南地北地在各处奔走。他不辞登山涉水的辛劳,替各地人民治病。因为他有这种治病救人的精神和高明的医术,所以各地人民都非常爱戴他、称颂他。现在山东、河南、河北等地,还留存着古代人民纪念他的古迹,如庙宇、石碑等。

扁鹊为了人们的健康,还提出了一套破除迷信和预防疾病的思想。他认为身体应该好好保养和锻炼,有了病以后要赶紧请医生医治,拖延久了病就会加重起来,以至于不能医治。他说,人不怕有病,就怕有了病以后不好好医治,应该懂得轻

病好治的道理。他又说,相信鬼神和巫师而不相信医生的人,他们的病是不会治好的。扁鹊在迷信思想还很浓厚的古代,能够毫不踌躇地提出反对巫师的看法,是很不容易的。

从扁鹊提出的这套思想中,也可以看出他是把人的生理和心理看成有机的整体,是能够互相影响的。这一点有很大的实践意义。

关于如何预防疾病,扁鹊告诉大家,健康时就要注意寒暖,节制饮食,胸襟要舒畅,不能动怒生气等等。在今天看来,这些也都是合乎科学的。

到汉朝的时候,扁鹊的医疗理论和经验,被总结成一部医学的经典著作,书名叫做《难经》,一共有 80 篇,其中有《脉经》、《经络》、《脏腑》、《病理》、《穴道》、《鍼法》等篇。

四、《左传》和《国语》

我们伟大的祖国,很早就注意历史的记载,但是开始只有一些事实的片断记录,并没有编成系统的史书。

春秋时,孔子开始整理鲁国的历史记载,编成《鲁春秋》(《春秋》是西周、春秋时代诸侯国史书的通称。《鲁春秋》即鲁国的史书)。但是《鲁春秋》很简单,比现在报纸上的新闻标题还简单,而且只有标题,没有下文,不容易理解。据说在孔子同时代,鲁国有一位太史,名叫左丘明,很有才学,他虽然双目失明,还毅然为《春秋》做注,在每个大标题下增添了不少“新闻”、“故事”,即史实,并用这些史实写成了我国古代第一部较详细的编年史——《春秋左氏传》,《左传》是它的简称。

对于《左传》的作者初和书时间，历来有不同说法，上述传说只是最早的一般说法。有不少人认为：《春秋》记事既简单又紊乱，不象出自孔子的手笔，并认为左丘明所处的年代比孔子要略早一些，不大可能绘《春秋》作注，而《左传》的记事对三晋地区较详细，对齐、鲁较简单，也不象出自鲁国人的手笔。这部书可能是战国前期三晋地区的人所写。我们现在只能这样说：《左传》成书后，很可能还有人作过增补，它的成书时间大约在战国前期。

《左传》按编年体裁记事，记录了春秋时期丰富的历史资料。它以《鲁春秋》为纲，把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历史按年、月顺序叙述下来。《左传》全书 60 卷，18 万多字，纪事编年从公元前 722 年（鲁隐公元年），到公元前 464 年（鲁悼公四年），共 259 年的历史。其中对于中原各国特别是晋国的历史记载得较具体，对吴、越、燕、秦等国的历史记载较简略，书中还保留了夏、商、周的一些史料。《左传》所反映的社会情况是：政治上，封国林立，宗法制度和政治相结合；经济上，还没有土地买卖；军事上，实行车战；文化上，西周的礼乐盛行。这和战国以后的社会面貌大不相同。《左传》以较原始和真实的资料，相当全面地反映了春秋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情况，是研究我国古代社会状况，特别是研究春秋时期历史的一部重要文献。

《左传》的主要篇幅是记载统治阶级的活动，包括各诸侯国贵族的祭神、会盟、战争、婚姻、丧葬、篡弑、饮宴、田猎等等。但是，《左传》并不是单纯地描写贵族们的活动，而是叙述了整个社会矛盾。

《左传》对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贵族们丑恶糜烂的生活,诸如诸侯、大夫、后妃的奢侈腐化、勾心斗角、阴谋私通,争权夺利、互相残杀、以及他们贪婪、残暴的性格等等,也能不加隐讳地揭露出来。同时,《左传》的作者坚持了“据实以录”的态度,较客观地反映了事情的全貌。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想,在《左传》中也有明显反映,写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事例也屡见不鲜。《左传·宣公二年》记载:鲁宣公二年春天,宋国和郑国发生战争,宋国的大将华元兵败被俘,逃回来后,却又拿着棍棒去监督民工筑墙,民工们唱起歌谣讽刺他说:“大眼睛,大肚子,亡师而归。长满了胡须,亡师而归。”对华元进行了嘲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劳动人民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和敢于斗争的精神。至于大规模的“国人”暴动、工匠逃亡、奴隶起义的例子,在《左传》中更是不胜枚举。此外,《左传》还记载了劳动人民集体开山辟林,与险恶的自然环境作斗争的史实。如《左传·宣公十二年》写楚国的先君“若敖、蚡冒筭路蓝缕以启山林”,反映了楚国劳动人民和大自然艰苦奋斗的情形,楚国后来的发展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从上述事例可见,《左传》能较真实、全面地反映春秋时期的历史面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是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左传》一书也宣扬了不少唯心主义观点,书中所提倡的道德观念和统治秩序,是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的,至于书中关于占卜、鬼神的描写,更是十分荒诞,都应加以批判。但从全书的主要内容来看,《左传》仍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而珍贵的历史名著。

《左传》不仅是一部历史名著,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

它的艺术成就,自古以来为人们所公认,《左传》的文字通俗、流畅,是后人学习的典范。所以,《左传》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战国初期,我国还有一部历史名著,叫《国语》。《国语》按不同国家记载历史,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国别史。

《国语》的作者相传也是左丘明,但从它的内容看,可能是战国初年的人根据各国史官的记载整理编成的。《国语》全书有 21 卷,记载了从周穆王起到周定王为止 500 多年内,西周后期和春秋时期各国的历史,其中晋国的历史记载最详细,周、鲁、楚三国其次,齐、郑、吴、越四国最少,宋、卫、秦的少部分材料则散记在有关篇中。《国语》是我们研究先秦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

《左传》对历史的记载,重在记事,而《国语》对历史的记载,则以各国贵族的言论为主,其内容可与《左传》相互参证,所以有《春秋外传》之称。但是自唐代以来,人们对这部书不够注意,因此不如《左传》有名。其实,在我国古代历史著作中,《国语》也有重要史料价值。《国语》和《左传》一样,也有关于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和矛盾发展的丰富记载,而且有些内容是《左传》中没有的,如《周语上》关于西周后期厉王止谤的历史事实,作者对厉王的贪婪残暴、实行专利、严禁舆论、任意屠杀,不听邵公劝阻,以致被“国人”放逐到彘(在今山西省霍县境内)的前因后果,都作了简明扼要的记载,比《左传》更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发展的情况。又如,《齐语》关于管仲改革内政的记载;《楚语上》关于教育方面的议论;《楚语下》关于楚国官吏象饿狼一样掠夺人民,和人民深受压迫剥削情况的记

载;《吴语》、《越语》关于吴越军事谋略的一些情况的记载;《论语》关于渔猎制度的记载;……等,都是很重要的历史资料,也是《左传》中找不到的。由此可见,《国语》在我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国语》分国编纂历史的特点,对于后来国别史书的编写也有一定影响,如《战国策》、《十国春秋》、《十六国春秋》、《三国志》、《北史》、《史记》中自吴太伯以下的十六世家、《晋书》的30载记,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国语》的影响。《国语》以记载言论为主的写法,也为后来的言论总集、言行录等写作开创了先例。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国语》也宣扬了不少宗教迷信思想,应当加以批判。

五、《诗经》和《楚辞》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诗歌大发展的黄金时代。当时,统治阶级在祭祀、交往、外交活动中,都喜欢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以诗言志;广大劳动人民在劳动和生活中,也普遍以诗歌形式表达自己对劳动、生活的热爱和对剥削阶级的不满及反抗。《诗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包括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的共305篇作品。因为《诗经》中的作品都可以用乐器伴奏演唱,所以,《诗经》也被称为我国古代第一部乐歌总集。《诗经》的作品主要产生在黄河流域和江汉流域一带,绝大部分是口头流传下来的民歌,所以,关于每一篇作品的作者,由于缺少记载,已无法知道。这些作品主要是由政府派专职人

员收集、整理、配上乐谱，因而保存下来的。

春秋时期《诗经》只称《诗三百》。孔子办私学很重视《诗》的教育，并对《诗三百》进行整理，作为教授弟子的课程。《庄子·天运》篇开始明确地把《诗》列为《六经》（即《诗》、《书》、《易》、《礼》、《乐》、《春秋》）之一。到了汉代，儒学占据了统治地位，汉代儒生们把孔子教育弟子的各门课程都奉为经典，而且肯定这些经典都是孔子亲手编订的，于是《诗经》的名称便沿用下来了。所以“诗三百”在孔子以前已有定数，而《诗经》这个名称则是后世统治者把《诗》定为儒家经典以后才有的。在我国封建社会中，统治者根据本阶级利益的需要，对《诗经》作了许多穿凿附会的解释，歪曲了它的本义，使其完全成为统治者修身教化的信条和加强对人民思想统治的工具。直到“五四”运动以后，才逐渐恢复它原来的文学作品地位。

《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三部分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我国奴隶社会从鼎盛走向衰落的社会面貌，思想内容非常丰富。特别是《风》这部分作品，保留了大量民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人民的思想感情，无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上都有较高成就，是全书精华所在。

《风》又称《国风》，有 160 篇，包括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优秀民歌和少量贵族作品。在大量民歌中，有的揭露了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剥削和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有的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产情况；有的则描写了劳动人民对爱情的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等。在这些诗中，大量运用了朴素的语言、形象的比喻、细致的描绘、生动的想象来反映主题，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清新、明快、朴实、优美的艺术风格，显示了

很高的艺术技巧。

在《国风》中还有许多反映奴隶、平民深受压迫剥削、愤怒反抗的诗篇。如《魏风·硕鼠》，奴隶们把奴隶主比作贪婪丑恶的“硕鼠”——大老鼠，公开表示了与奴隶主誓不两立的决心；《唐风·鸛羽》，反映了在无休止的“王事”差役下，人民不能正常生产，生活毫无保障的困境；《魏风·陟岵》，则是描写一个征人在出征途中，登上山头，遥望家乡，想起离家之时，父母兄弟嘱咐他保重身体，早日归来的情景。此外，如《豳风·七月》、《豳风·东山》、《邶风·式微》、《王风·黍离》等等诗篇，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处境，说明不仅奴隶受着残酷的压迫剥削，就是稍有自由权的平民，生活也很不安宁。从这些诗篇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西周、春秋时期奴隶、平民起义的原因，以及奴隶制度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

《国风》中还有不少表现农业生产、婚姻恋爱和揭露统治阶级丑事的政治讽刺诗。如《周南·关雎》诗中，反映了妇女采车前子的劳动情景，《周南·关雎》诗中，则生动地描述了一位男子热恋一位在河边采苕菜的少女的情形、《邶风·新台》、《鄘风·墙有茨》两篇则是揭露统治阶级宫廷荒淫无耻生活的讽刺诗。有些同志认为这两篇是卫国人民揭露卫宣公生活腐化，自食恶果的政治讽刺诗。诗文说卫宣公中途截娶儿媳齐女姜氏为妻，而在他死后，姜氏又与卫宣公庶子公子顽私通。这些诗都是很有名的诗篇，它们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诗经》中的《雅》、《颂》多是贵族的作品，其中有不少糟粕，大部分诗篇语言枯燥，形式呆板，和《风》相比大为逊色。但

是有些诗篇却保留了一部分重要的历史资料和神话故事,反映了一些社会现实,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雅》分《大雅》、《小雅》,有 105 篇,大部分是贵族在宴饮时相互应酬的乐歌,少部分是民间歌谣。其中一些诗篇叙述了周民族发展的历史,也有些诗篇涉及到农业、畜牧业生产,还有一部分政治讽刺诗则暴露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社会的某些黑暗面,反映了奴隶制日益衰落的真实情况,具有一定人民性。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和《绵》便是关于周部族发展的史诗。《生民》通过对后稷的歌颂,叙述了周部族产生的历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知道,我国在远古的时候,就已经具有不少的农业实践经验,对于谷物的种类、种子、土壤,以及农作物的生长过程都有较全面的认识。《公刘》主要是歌颂周族的一个远祖带领本部族从邠迁到豳的事迹。诗中以赞美的语言,描写了公刘这个既有远见,又勤于政事的部族首领形象;他带头登山涉水,开垦土地,建造房屋,事事躬亲,为部族的生存、发展立下了功勋。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具体了解周部族最初发展的历史。《绵》是歌颂古公亶父的诗。古公亶父是周文王的祖父,他带领周族人民由豳迁到岐山,周部族从此在那里定居下来,日益强大。诗篇虽然主要是写古公亶父,但有好些地方形象地描写了人民群众进行大规模劳动的场面,使我们看到,周部族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此外,《小雅》的《无羊》、《北山》等篇,也都写得较生动,有可取之处。至于《大雅》、《小雅》中一些用于祭祀、宴会的作品,内容主要是对统治阶级歌功颂德,并极力美化他们的寄生生活;用为奴隶主贵族祝颂“万寿无疆”的一片欢呼声,掩盖了奴

隶们痛苦的呻吟。

《诗经》中的《颂》，包括《周颂》、《鲁颂》和《商颂》，有 40 篇，是贵族们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其内容多半是炫耀祖先建国的功勋，以及祈求神灵保佑的作品，大部分应当批判。但其中也有少数诗篇记载了古代农业生产和社会制度的一些情况，如《周颂》中的《噫嘻》、《戴芟》、《臣工》等，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社会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总观《诗经》的全部内容，我们认为它不仅是我国古代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也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

继《诗经》之后，在我国南方又产生了另一部著名的诗集——《楚辞》。西汉以前，“楚辞”是对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楚国人所写的诗歌总称。西汉末年，刘向把这类诗辞編集在一起，这时，《楚辞》才成为一部书的名称。因为其中诗篇用的是楚国的方言，发的是楚国的声调，写的是楚国的地理、物产，故称《楚辞》。《楚辞》的主要部分是屈原的作品，此外还有楚国人宋玉和西汉人模仿屈、宋所写的作品，一般讲《楚辞》主要是指屈原的作品。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一个伟大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屈原本名屈平，“原”是他的字，自汉代以来，大家多采用他的字，屈平的称呼反而不为人们所注意了。屈原出身于楚国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生卒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340 年——公元前 278 年。屈原从小就受到较好的教育，学识渊博。他的文章写得很好，特别擅长外交辞令。他对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十分熟悉，年轻时深得楚怀王信任，做过左徒，当过三闾大夫。他生活的年代，正是各诸侯国互相称雄兼

并的战国时期,当时南方的楚国、西方的秦国和东方的齐国都较强大,都具有统一中国的可能性。屈原一心想使楚国富强起来,统一中国。所以,他对内主张任用贤人,改革政治,限制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对外则主张联齐抗秦。但是,当时以楚怀王的宠妃郑袖、儿子子兰和近臣靳尚为代表的旧贵族,不甘心放弃特权,千方百计排挤屈原,离间屈原和楚怀王的关系。昏庸的楚怀王内欺于郑袖,外欺于张仪,在秦国的威胁利诱下,疏远了屈原,使屈原的改革措施一再遭受挫折。到楚顷襄王时期,在郑袖等人一再诬害下,屈原被流放到了江南(今湖南南部和湖南北部一带)。顷襄王 21 年(公元前 278 年),楚国的都城郢被秦军攻陷,楚国面临灭亡的危险,屈原无限悲愤,最后投汨罗江(今湖南省汨罗县北)而死。

屈原的一生,在政治上是失败了,但在文学上却取得了辉煌成就,成为我国古代第一位著名的伟大诗人。屈原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很注意吸收南方民歌的精华,并运用大量古代神话传说,写下了许多优美壮丽、生动感人的诗篇,创建了“楚辞”这一新诗体。屈原的诗流传到今天的有二十几篇,如《九歌》、《招魂》、《天问》、《离骚》、《九章》等。这些作品少部分是他年轻时写的,大部分则是在他被流放时的作品。年轻时候的作品,写得十分清新优美,如《橘颂》;流放时期写的作品则充满着忧国忧民的心情和悲愤、抑郁的思想感情,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离骚》是屈原最成熟的作品,也是《楚辞》中最典型的诗篇,一般人说起屈原的作品,首先是指《离骚》。

《离骚》是屈原流放到江南时写的一篇长抒情诗。全诗

373句,2490字,反复表述了作者的远大政治理想,充满着作者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嫉恶如仇的思想感情和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

屈原在《离骚》中除了叙述现实外,还写进了许多奇特的幻想。诗人把风、雨、雷、电、云、月都作为他的侍从、御者、卫士,让凤凰和龙替他拉车子,在天空中奔驰;他忽而飞到了天国的门前,忽而攀上了世界的屋顶,忽而又跑到了西极的海边,上天下地去追求他所理想的“美政”。诗人把自然现象、历史人物、神话故事揉合在一起,绘出了一组雄奇瑰丽的画卷,反映自己的思想感情,使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了高度的结合,常为后人所赞佩。

屈原的其他作品,同样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具有强烈的号召和鼓舞力量,它有力地鼓动着人们为保卫祖国,不惜流血牺牲。今天我们读起来,仍然可以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屈原以他高超的才华,战斗的一生,写下了这些光辉的诗篇,大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宝库。人们常把以《离骚》为代表的屈原作品与《诗经》中的《国风》相提并论,称之为“风骚”。“风”指的就是《国风》;“骚”指的是《离骚》。它们都是后世诗歌创作的榜样,对我国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六、音乐艺术的繁荣

今天,人们一般都把有规律而动听的声音称为音乐,大致可分为声乐和器乐两大类。但在战国以前,音与乐是既丰区别

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礼记》中有一篇关于音乐的专文叫《乐记》，是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和他下面的儒生“采《周官》诸子言乐者”作的（《汉书·艺文志》），里面保存了不少战国及其以前的音乐方面的重要材料。

《乐记》中对古代音乐下一个定义，说：“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行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大意是说，当人们见景生情有所感动时就发出相应的声响，声响按一定规律变化，再与乐器演奏配合舞蹈动作，就是音乐。乐的内容，照《乐记》讲，包括“器”和“文”。说是：“钟鼓管磬，羽龠干戚，乐之器也；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所谓“钟鼓管磬”指的是古代主要的乐器我称；“羽龠干戚”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服装道具之类。据说“羽龠”是表演文舞的，“干戚”是跳武舞用的。“屈伸俯仰，缀兆舒疾”则是讲的舞蹈动作和姿态。由此不难看出，战国以前是把唱歌（包括诗词）、跳舞、奏乐等等都所括在我们现在讲的音乐中。诗歌在古代都是可以演唱的。《诗经》是战国以前的诗歌集，里面分《风》、《雅》、《颂》。《风》就是古代各地的民歌；《雅》、《颂》则是王公贵族们在宴飨、祭祀等场合演唱的音乐舞蹈之词。战国时的《楚辞》，我们已知道，它是在楚国民间歌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仅可发演唱，而且有的还配合着舞蹈动作。据研究，屈原早年深得楚怀王信任时，他的作品常常在宫廷里演唱。可见，诗歌在战国时代及以前也是属于音乐的一部分。只是到了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艺术门类才更加细密繁复，舞蹈、诗歌才渐渐从音乐里分出来，音乐演变为主要指声乐和器乐，即唱歌和奏乐之类了。

我国幅员辽阔,从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家。全国除有共同的文化特征外,各兄弟民族、各地区又形成了具有浓厚民族地方特色的丰富多采的文化。反映在音乐上,我们可以从有关文献记录中看到战国时代各地音乐的大致情况。

北方以燕、赵为代表的音乐,似乎以悲壮慷慨闻名。象荆轲赴秦在易水相别时,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据《淮南子》记载说“闻者莫不眦目裂眦,发植穿冠。”据研究,此歌是很有北方地区音乐特点的。

秦地的音乐特色,据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讲是“击瓮扣缶,弹筝抚髀,而歌呼呜呜,乃真秦之声也”。

东方的音乐,与西北则大不相同。比如齐国是金石之音疏,而尚丝竹之声,故其音舒缓。大致是以轻音乐为主,或许有点软绵绵的味道。所以后来有人认为是秦汉间淫声之祖。

南方的楚国,更是有名的音乐舞蹈之邦。楚人唱歌,有其独特风格,形成有名的“楚声”。楚声在汉初仍然流行于淮河流域。因为“楚声”通行于南方,所以又叫“南音”,它的特点多用“些”字音为尾,故有“楚歌曰些”之说。我们看《楚辞》中《招魂》的句尾就多用“些”字。

战国时代各地音乐特点的形成,都有其历史渊源。据《吕氏春秋·音初篇》说,东音相传形成于夏代孔甲之时,南音则形成于夏禹之时,西音形成于殷河甲徙西河,后来秦穆公之时,大概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改造成为秦音。北音则和殷人关于玄鸟的传说有关。虽然,这些都是传说,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国时代的音乐仅有在演唱艺术方面有了进

步,而且已有人探索我国音乐的地方特色和形成的历史渊源,表明了战国时代音乐艺术有了新的发展。

音乐,作为人类精神文化财富的一部分,也和人类的物质财富一样,本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是在战国以前,音乐为少数王公贵族所垄断。他们一方面把音乐作为自己享乐生活的补充;另一方面又把它神秘化,与旧的礼教结合起来。他们认为:乐“可以善民心”,乐行能“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礼记·乐记》),因而是维护统治秩序的一种重要工具。民间有劳动群众自己的音乐,它反映了劳动群众的喜怒哀乐。在春秋以前,官府每年要派人采风,其中除部分作品被采风者收集改造献给统治者、作为考察民情的参考,真正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在群众中有广泛基础和影响的乐歌,是不被统治者所重视的,登不了大雅之堂。但是,战国时情况不同了,旧统治阶级从前用以麻痹人民的雅颂古乐渐渐使人乏味。甚至新的统治者也不爱听了。《乐记》中记载有魏文侯与子夏的一段谈音乐的话,文侯就说,他听古乐就要打瞌睡,而“听郑卫之音,则不倦”。《孟子·梁惠王》篇中,记有梁惠王对孟子说的一段话,更是说得明白,梁惠王说他根本不爱好“先王之乐”而“好世俗之乐”。可以清楚地看到,过去那种空洞的歌功颂德的旧腔调——雅、颂已不受欢迎,而从前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世俗音乐,渐渐为新兴统治者所接受和喜爱。因此,战国时代民间音乐有了新的发展。随着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都市的发展,市民们的文化娱乐生活也大大发展起来了。比如东方齐国的都城,据苏秦说:“临淄之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

在音乐舞蹈之邦的楚国,除了王公贵族们的宫廷音乐外,

民间也流行着许许多多为民众所喜爱的乐曲。据宋玉答楚王问时讲,有人在郢都唱歌,开始唱《下里巴人》时,“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或作“数万人”);唱《阳阿薜露》时,“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唱《阳春白雪》时,“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从宋玉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知道,春秋战国以来,楚国民间有许多流行歌曲。《下里巴人》大概是流行最广的民间歌曲,而《阳春白雪》之类的宫廷音乐,只有少数人才能唱。不过,也反映出战国时代的音乐艺术也和其他艺术一样,少数王公贵族所垄断的情况已经走向结束,高级的宫廷音乐也可以在街头唱了。

战国时代音乐艺术的发达情况,从当时乐器种类之多也看得出来。

当时乐器的种类极为繁多,见于记载,并有出土文物佐证的有:钟、磬、琴、瑟、笛、箫、笙、竽、箏、铎、鼓、等等。其中齐国的瑟、秦国的箏特别有名,而楚国的笙更是中国之冠。

这许许多多的乐器,又可以细分为不同类型,如钟,可分为按大小音高次第排列且悬挂组成的“编钟”和单独使用的“特钟”。磬,也可以发为编磬和单独用以按节拍演奏的磬。琴、瑟又可以分为不同弦数的大小的若干类型。鼓也可分为建鼓、悬鼓等等。

历年来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不少战国乐器,差不多文献上有的,实物都发现过。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

1957年5月在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的战国编钟。这是我国出土的第一套保存完好的编钟。出土时,钟的表面只有一层薄薄的黑色炭质,连一点锈蚀也没有。用手摸去表面一层,铜质光亮如新,好象不曾埋入土中似的。经实测,不仅有一定的

音律,而且音质也很好,真是十分难得。

春秋战国之交的随县曾侯乙大墓中的乐器。这座墓是1978年3月发现的。所出乐器达120多件,种类繁多,保存也较好。其中仅各种编钟就达64件之多,分3层8组悬挂在饰有彩绘的铜木结构架上。架高达2.65米,组成曲尺形,气势宏伟而壮观。用这架悬挂的编钟,仍然可以演奏出古今中外的各种乐曲。

与之相配合的还有编磬1架3组,共32件,以及鼓、琴、瑟、笛、笙、箫等等。鼓有悬鼓、带柄的双面鼓和竖立在铸有复杂纹饰铜座上的大建鼓。琴有五弦和十弦的。瑟也有不同弦数的,计12件之多。横吹的竹笛有两件,和现在的竹笛差不多,它是我国目前见到的最早实物。笙的种类有12管、14管、18管的。箫和一般的单管直吹者不同,在曾侯乙墓中所出的是两件排箫。这种箫古人有时称作“籁”,它和古代壁画、石刻中的形象是一致的。据音乐工作者研究,这种排箫还与罗马尼亚舞台上演奏的一种叫做“Nay”的排箫相同。因此,有人认为这种流传至今的排箫,与我国古代的排箫形制和名称都一致,表明它们之间有某种渊源关系。

我们上面所举,虽然都是王公贵族们所有的乐器,但由此也充分地显示出:从春秋到战国,我国的音乐艺术是高度发达的。只可惜音乐是器止声消、口出即逝,我们不能听到当时的乐曲声,只能从出土的乐器和有关记载推想而知那时美妙动听的音乐了。

七、战国的绘画艺术

战国时期的绘画艺术水平已达到相当的高度，这一点不仅文献记载可供查考，而且还有不少绝妙佳品——考古发掘所获的帛画、铜器纹饰、漆彩绘等展现在我们眼前。

据记载，战国时已有许多画家专门从事绘画艺术的创作。在当时王公贵族的宫室、庙堂里，梁柱上有图案，墙壁上有绘画，各种陈设器物也都有装饰图案。东汉顺帝时（126—144年）作过侍中的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讲，楚国王公贵族的庙堂里，都画有“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圣贤怪物行事”。这些为王公贵族们作画的，就是当时的画家。

又据韩非说：“客有为齐君画者，问之画孰难？曰：狗马最难？孰易？曰：鬼魅最易。狗马人所知也，旦暮于前，不类之，故易。”这是当时画家从绘画实践中深有体会的回答。

《说苑》中也讲了一个关于战国画家的故事。讲的是齐国国君修建九重台时，利用巨资招募国内的画家为之作画。有一个名叫敬君的人，家里很贫寒，一直在家学画，得到齐王招募画工的消息就去了。敬君到九重台作画后，很久没有能回家，很想念自己的妻子，于是他就在自己前面画了一幅妻子笑咪咪的像。旁人见了后报告了齐王。齐王起了淫心，对敬君说，国中献的美女没有一个好的，愿以百万巨资换他的妻子，如果同意就算了，否则要杀掉敬君。这个故事除了说明王公贵族的荒淫无耻外，还可以看到，象敬君这样的画家是有相当的高绘画水平的。

这两个小故事，充分反映出战国时代已有了专业的画家，他们在绘画实践和理论上都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下面我们就考古所得的在关绘画艺术品看看战国绘画的艺术成就。

战国帛画发现的不多。其中有两幅最有名，一幅是《龙凤人物帛画》，一幅是《人物御龙画》。

《龙凤人物帛画》是 1949 年春在湖南长沙近郊战国墓中发现的。原来人们称作《夔凤人物帛画》或《妇女凤鸟图》，是一块画在长 30 厘米，宽 22.5 厘米的平纹素绢上的画。郭沫若同志曾作《关于晚周帛画考察》，认为画中左上的独脚蛇状怪物是邪恶和死亡的象征，应是古代所谓的“夔”。右上为凤鸟，下为合十束腰妇女祈求凤鸟战胜邪恶势力。后来不少学者发表文章，有的提出了不同看法。近年来，经过对帛画的科学处理，使画面更为清晰，同时发现早期摹本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从新摹本可发看出，左上角那条蛇状物是一条龙，身着束腰长裙的妇女脚下还有一弯月形状过去摹漏掉了。由于旧本摹错了，根据它考察的主题思想当然也错了，这应该是一幅祈求飞凤引导死者灵魂升天的迷信画。从绘画艺术的角度看，帛画的艺术性还是很高的。它的构思比较巧妙，画家的想象力丰富；画的笔调显得古拙，但人体部位比例却把握的很准确。据文献讲楚国妇女爱细腰，这幅画中妇女的装束符合当时楚国的时尚。由此可见，这幅帛画既有丰富的艺术想象，又有现实生活的写实，和后来发现的《人物御龙帛画》一样，技巧都是相当成熟的。

《人物御龙帛画》是细绢地，长 37.5 厘米，宽 28 厘米，大致和 8 开大小版面差不多。画面正中为一身材修长的中年男

子。头戴高冠,身着广袖长袍服,腰挂长剑,神态刚毅,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一条巨龙。这条龙的龙头高昂,身体半伏,尾巴上翘。尾上还站着一只圆睛长喙、昂首仰天的仙鹤。人的头顶上有舆盖,舆盖上三条飘带随风飘拂。龙身下有一条鱼。这奇特的画面,大致表示乘着飞龙升天的意思。这幅画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技巧相当成熟。画家使用单线勾勒,丝毫也不呆板。画中人物——从原物要以看出——略施彩色,龙与鹤以及舆盖基本上用白描,而有的地方还施以金白粉彩。据美术工作者讲,用这种画法的作品,是目前发现的古代绘画中的第一幅。再从人物形象、画面布局、主题构思等等看,也都达到了非常成熟的地步。物加紧是画家运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更体现了战国时期的时代精神,以及当时绘画艺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和高度统一的光辉成就。

战国的绘画成就,在当时的铜器、漆等纹饰上更有充分的反映。

铜器的纹饰,殷周以来就非常精美繁复,但图案多是比较板滞的几何纹、夔纹、云雷纹等等。春秋时代,少数铜器上出现了刻铸的人物、禽兽之类的写生画,但只刻有一个轮廓线条,显得很古拙。战国时铜器纹饰继承和发扬了这种新的画法,更进一步产生了反映当时社会生活而具有真实性的作品。如河南汲县山彪镇所出的《水陆攻战图铜鉴》,辉县赵固镇所出《宴乐射猎纹铜鉴》以及在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的嵌错铜壶上的演武宴乐采桑弋射和水陆攻战等图案花纹等等,都是很生动的写实作品。故宫博物院曾经收购过一批战国刻画铜器的残片,其中有一片刻有楼台,楼上有引弓而射的人物,另外

还有驾车的御者,对尊而钦的人物以及飞鸟、走兽、植物、仙鹤之类,都是用细致的线条刻成的,形象栩栩如生,十分巧妙地表现了各种生物的姿态和动作。

这些铜器上的纹饰图案,都是用写实的手法,着重描绘人物和动物。笔法占拙纯熟,有明有暗有透视,使平板的花纹更具有立体感,形成了富有战国时期独具风格的铜器花纹艺术。同时,从这类铜器的刻画中,可以看到装饰花纹的发展,已由图案走向写实的趋向,从而为后世的写实绘画开了先河。

战国时期的漆器花纹,在绘画史上占有突出的一席。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南方,特别是两湖地区,曾发现了大量的战国漆器。这些漆器一般都饰以美丽的花纹,如彩绘的奩、箱、盒、杯、盘、棺槨、木俑、盾牌、马具等等。它们的图案结构既新颖又精彩,有的继承和发扬了商周以来的图案花纹特色,多数是战国特有的人与动物的活动定实画。

1952年,在湖南长沙的战国墓中,曾出土过一件狩猎漆奩,上面有上下两层彩漆绘画。画有手持长戟、用力刺杀野牛的猎人,猎人显得勇敢而动作敏捷;野牛低头扬角,俯身前扑,凶猛异常,在这危急时刻,牛后一人引弓将发。画中还有猎狗与野猪相峙搏斗的形象。所有这些情景,都描绘得活灵活现,非常生动形象,充分地显示了战国时绘画艺术的巨大成就。